

#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1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一期 ★

## 目 录

社 论	鼓足干劲, 争取社会主义 建设的新的胜利 .....	(1)
	欢呼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 .....	郭济洲 (6)
	当“败狗”翘起尾巴的时候 .....	袁先祿 (15)
	现代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 .....	陈元暉 (18)
	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权威问题 .....	海 波 (27)
	做好人民公社的财务工作 .....	朱光福 (32)
	关于戏曲老艺人的艺术经验 .....	曲六乙 (36)

☆ 一月一日出版 ☆



## ——社 論——

# 鼓足干劲，争取社会主义 建设的新的胜利

一九六一年过去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又跨进了一个新的年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满怀信心地迎接新的一年的来临。

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完全是正确的。为实现总路线所必要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具体办法，正在逐步发展和完备起来，并且已经在实际工作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广大干部和群众，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中，从具体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中，从克服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更加提高了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的自觉性，更加看清楚了我国的光明前途。

一九六二年将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带来新的重大任务，这将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过去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所遗留下来的困难，需要我们去继续克服；在一九六一年已经获得了成效的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需要我們进一步全面进行。我们要在生产 and 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使已经制定的和正在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具体办法更加完善起来，并且切实地加以实施，要把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代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更高地举起。新的一年要求全党全民树雄心，立大志，在党中央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扎扎实实地工作，鼓足干劲，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新的胜利而斗争。

加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一切工作部门，一切地方工作，一切事业单位中加强全局观点，这是为了推进我们当前的工作必须特别注意的一件事。

集中统一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和各个地区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发展，必须有统一的政策、统一的计划，在一定范围内统一地调配人力、物力和财力。列宁说



过：“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sup>①</sup>。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优越性。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是集中统一的经济，就有可能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进行综合平衡，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向前发展。

目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所进行的调整工作带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我们要总结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全部工作，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且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成就。同时，我们又是在开辟前进的道路，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新的水平上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强调集中的领导，以保证党中央所规定的统一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国家的统一计划的贯彻执行，而反对在实际工作中任何形式的分散主义的表现。我们愈是能使一切力量在集中统一的指导下发挥其作用，就愈是能顺利地做好调整工作，顺利地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当我们有了正确的路线、政策、方针、计划的时候，如何保证它们的贯彻执行，是事业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问题。在（过去的）长期的革命时期中，我们党也曾经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发展关头特别强调集中统一。全国解放前夕，当我们面临最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形势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把加强集中统一、加强纪律性，提到了极端重要的地位。当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区，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sup>②</sup>那时，毛泽东同志还用通俗的语言教导全党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不但对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而且对于一切解放地区迅速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①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8页。

②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33—1334页。





在我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有东、南、西、北的各条战线，各个战场。所有这些战线和战场总起来，成为战争的全局。各个战线、各个战场，如果不从全局出发，各自为战，仗是打不好的。高度统一性是我们人民解放军能够打胜仗的重要保证之一。每一个作战单位都懂得，要从全局出发来考虑自己的行动，因此，它们勇于接受上级分配的任务，争先恐后地承担那种最艰难的，甚至难免要使自己受到较大牺牲的战斗任务。在人民解放军中，就是普通的战士也具有全局的观点，他们不但知道整个战争的目的是什么，而且知道我军整个的战略思想。既然在我们的军队中，连一个普通的士兵都有全局观点，所以它不能不成为一支具有在高度觉悟性的基础上的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军队，不能不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这种全局观点在战争中是必需的，在建设事业中也同样是必需的。

中央和各个地方、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就其实质来说，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要正确地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必须从全局出发。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sup>①</sup>他说：“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sup>②</sup>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同在战争中一样，没有一个局部是可以脱离全局而孤立的。固然必须要有各个局部的胜利，才能形成全局的胜利，但是不从全局的需要出发，任何局部单独的胜利都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靠的。测量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程度，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是不是能够以局部服从全局。

高度的集中统一，一切服从全局的原则，同充分发挥各个局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一致的。我们党和国家所规定的一切正确的政策，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总结各地方、各部门和广大群众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这些政策反过来又成为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所必须遵循的正确轨道；如果离开正确的轨道，人们的努力不但会“事倍功半”，而且会弄到“南辕北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实行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又按照情况实行分级管理。各级、各部门、各地方在自己所管理的工作的范围内，为了正确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23页。

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3—514页。



必須認真地研究具體情況，尋求在當時當地行之有效的必要措施；為了實現國家計劃所規定的任務，也必須千方百計地創造各種有利的條件，充分地依靠群眾的力量和智慧。因此，一切服從全局的原則不但不妨害各個局部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且是發揮各個局部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必要的前提。

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加強集中統一，同堅決執行群眾路線也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黨和國家的一切政策和計劃，歸根到底，是從群眾中來的；這一切政策和計劃，歸根到底，又是要依靠廣大的人民群眾來執行的。任何一個地方、一個工作部門、一個企業事業單位的領導機關，如果脫離了它周圍的群眾，就不可能正確地執行黨和國家的政策，就不可能完成國家計劃所規定的任何任務。

列寧曾經在他的著作中提出過“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紀律是依靠什麼來維持的？是依靠什麼來檢驗、來加強的？”這樣一個問題。他回答說：“第一、是依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它對革命的忠誠，它的堅韌性，它的自我犧牲精神，它的英勇精神；第二、是依靠它善於與廣大勞動群眾，首先是與無產者勞動群眾，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群眾密切聯繫、接近，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同他們打成一片；第三、是依靠這個先鋒隊的政治領導正確，它的戰略與策略正確，而且要使廣大群眾根據切身經驗也確信其正確。”<sup>①</sup>由此可見，貫徹執行群眾路線又是建立和加強黨的紀律性的必要條件。

群眾路線是我們黨在一切工作中的根本路線。在革命和建設中，我們黨在執行群眾路線方面取得了豐富經驗。對任何工作，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忘記群眾路線，但群眾路線的表現形式則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時候需要發動廣大群眾進行某種突擊性的運動，但更多的時候則需要在群眾中扎扎實實地做許多艱苦細致的工作，而且只有在這樣的艱苦細致的工作的基礎上，才会有真正深入的和符合於實際需要的群眾運動。

過去，在土地改革工作中，我們反對恩賜觀點，而要發動群眾自己起來進行鬥爭。領導土地改革工作的工作隊一般總是首先從訪貧問苦、扎根串連做起，一戶一戶地，一個人一個人地進行訪問交談，一件事一件事地摸清底細。經過這樣深入細致的工作，積極分子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基本群眾的覺悟迅速提高，黨的政策被群眾所掌握，群眾才敢於同地主進

<sup>①</sup>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頁。



行面对面的斗争，才会形成真正的轰轰烈烈的斗争局面。凡是这样做的，土地改革工作就进行得彻底。反之，如果哪个地方的土地改革工作没有经过这样深入细致的工作，而只是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那末，那个地方就会出现夹生饭的现象，就会发生许多遗留问题，甚至会造成地主复辟。在那里，就必须进行补课，重新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

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依靠工农群众开展生产运动，也必须在工农群众中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国家的路线政策是符合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因此，是能够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我们的有些工作同志漂浮在群众外面，却总以为群众的觉悟水平低，似乎群众只能懂得眼前利益而不能懂得长远利益，只知道局部的需要而不能看到全局的需要。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一定要信任群众中的多数，一定要在工作中依靠群众。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同群众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置身于群众之中，切实地把党所提出的政策和生产任务交给群众，并且细心地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耐心地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凡是这样地认真做了的地方，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会不断增长，一部分认识比较落后的群众也会逐步提高起来。事实证明，只有这样细致地认真地在群众中做工作，甚至是一个人一个人地做，一件事一件事地做，我们在生产建设中才是真正地执行了群众路线，我们的一切工作也才能够真正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于实际需要的，也就能够依靠群众的积极性来完成党和国家所规定的一切工作任务和工作计划。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中都是中国人民中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人民群众信任我们党，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他们看到，我们党是一个具有无产阶级高度组织性和铁的纪律的战斗组织，这个组织能够担当得起最严重的任务，他们还看到，我们党具有实事求是、密切地同群众联系、艰苦奋斗这样一些优良的作风，这种作风是符合于人民的要求的。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更好地带领群众前进，我们党一定要不断地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不断地加强全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并且进一步发扬我们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克服和反对一切与此违反的不好的作风。

当前的形势很好，全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正在英勇奋发地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一定能够百倍地加强起来。在新的一年里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用坚定的步伐向着胜利的目标前进！



# 欢呼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

郭 济 洲

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中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发展。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指出：“殖民主义的完全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历史意义说来，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一九六一年，世界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又取得了新的重大的胜利。目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呈现出一片大好的形势。

一九六一年，亚洲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继续取得了新的胜利。日本人民在为废除日美“安全条约”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和争取日本的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斗争中，进一步显示了雄伟的力量。有着英勇斗争锻炼的南朝鲜人民，也接连不断地继续展开了大规模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他们要求和平统一祖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人民斗争怒潮的压力下，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再发动政变，来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越南南方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集团的斗争更加高涨

了，人民自卫武装斗争猛烈地打击着摇摇欲坠的吴庭艳傀儡政权。特别是老挝人民的重大胜利，给了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侵略活动以严重的打击。

美帝国主义一直把老挝视为它侵略东南亚、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滩头堡，用美帝国主义自己的话来说，“老挝是美国设法为东南亚铸造的防务锁链中的决定性环节”。肯尼迪上台后，继续加紧支持老挝叛乱集团，扩大老挝内战，妄图消灭老挝爱国武装部队。但是，美帝国主义的打算落空了。老挝的爱国民主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在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得到了发展。他们坚决地击败了美帝国主义扶植的诺萨万叛乱集团的武装进攻，解放了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地。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尊重老挝独立、中立的国家的支持下，老挝人民对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同意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来解决老挝问题。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更加处于狼狽和孤立的境地。现在老挝人民一面继续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坚持斗争，一面警惕地注视着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妄图破坏老挝



人民的胜利成果、重新点燃起战火的阴谋。

最近，印度人民从葡萄牙殖民者的统治下收复了果阿。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为收复西伊里安和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在非洲，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战争，已经胜利地进入了第八个年头。阿尔及利亚人民在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英勇战斗，使法国殖民者遭到接二连三的惨败。在阿尔及利亚法国占领区，人民的反法爱国示威运动也有巨大发展。一年来，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曾经同法国政府举行了两次谈判，但是，由于法国政府拒绝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拒绝保证阿尔及利亚领土、主权完整，谈判不得不再宣告中断。阿尔及利亚人民坚决把民族独立战争进行到底，这种决心和行动有力地鼓舞了其他地区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长期以来，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称为“沉默地带”的葡属非洲殖民地，已经燃起反殖民主义的熊熊烈火。半年多来，安哥拉人民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受美国支持的葡萄牙殖民军，解放了大片国土。在葡属几内亚、莫三鼻给、佛得角群岛等地方，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也方兴未艾。现在仍然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东非、中非人民，也积极地开展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也在继续高涨。

一九六一年，非洲独立的国家增加到二十九个。这些国家的人口约占非洲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面积约占非洲总面积的百分之

七十二。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的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继续同帝国主义进行着斗争。加纳、几内亚、马里等国家的人民，为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和影响，巩固民族独立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他们从政府机构中驱逐殖民官吏，赶走外国军队，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等等。喀麦隆人民联盟一直代表着喀麦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反对法帝国主义的军事镇压和政治、经济上的控制，实现喀麦隆的彻底独立，而坚持着英勇的武装斗争。突尼斯人民开展了收回法国占领下的比塞大基地的斗争。这些斗争，为彻底消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势力，做出了重要的积极的贡献。

在美帝国主义、比利时殖民者和他们的代理人杀害卢蒙巴之后，刚果人民在艰难复杂的处境下，仍然高举着卢蒙巴的旗帜坚持斗争。刚果的爱国力量正在重新集结起来，尽管刚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还会要经历曲折、困难的道路，但是他们一定能够在艰苦斗争中成长壮大，克服各种困难，把刚果的民族解放运动推向前进。刚果形势的发展，给了非洲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以深刻的教育。刚果在宣告独立以后，民族解放运动本来是蓬勃发展的。比利时殖民者发动的武装进攻，遭到刚果爱国军民的有力反击。自从美帝国主义盗用联合国的旗帜，利用所谓“联合国军”进占刚果以后，刚果的形势就发生了严重的逆转。一年多来，在“联合国军”干涉之下，以卢蒙巴为首的合法政府被颠覆



了，卢蒙巴本人被杀害了，刚果陷于更加四分五裂的状态，爱国力量遭到惨重的摧残。美帝国主义一直在散布幻想，企图使人相信通过联合国可以“给予”被压迫民族以独立。联合国在刚果的所作所为又一次揭穿了美帝国主义的这种谎言。刚果民族解放运动所经历的曲折道路表明：被压迫民族要取得独立，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斗争，绝不能对联合国抱有什么幻想。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决议说得好，联合国已经变成新殖民主义的一个工具，在它的掩护下，殖民国家正在独立国家中卷土重来。

美帝国主义把拉丁美洲称做美国的“后院”，肯尼迪上台后就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革命的古巴，消除古巴革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但是这一年来，英雄的古巴更加坚强地屹立在加勒比海，古巴人民的革命旗帜越举越高。古巴人民坚决迅速地粉碎了美国雇佣军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发动的武装侵略，保卫了古巴的革命事业。古巴人民正沿着他们选择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不断地把革命推向前进。古巴人民面临的敌人，是离他们很近而又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但是由于敢于斗争，他们不但推翻了美帝国主义扶植的巴蒂斯塔反动统治，使自己从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大庄园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且在革命胜利以后，能够使这个革命巩固和向前发展。这一事实，大大鼓舞了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走古巴的道路”已经越来越广泛地

成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和意志。一年来，巴西、厄瓜多尔等国家的人民，为反对美国干涉内政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有力地制止了美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建立亲美独裁政权的阴谋活动。多米尼加人民不顾美帝国主义恫吓和反动政府的镇压，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独裁政权的斗争。在巴拉圭、尼加拉瓜等国家中，人民的武装斗争正在日益发展。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风暴，越来越猛烈地席卷整个拉丁美洲。

一年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的伟大胜利，进一步动摇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加速了殖民主义制度的崩溃，有力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民族解放运动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了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们。只有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才感到丧气和恐惧。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是不甘心失败的，它们正在以更加狡诈的伎俩来继续推行殖民主义。肯尼迪在最近一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就是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肯尼迪宣称，他同意殖民主义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说什么“应该充分讨论这个问题的充分事实”。请看肯尼迪是怎样从“事实”来谈论殖民主义的吧！

第一、肯尼迪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项世界范围的独立宣言已经





把将近十亿人民和九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变成了四十二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目前住在‘附屬’領地上的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二。”肯尼迪在这里使用“自由”和“独立”的字眼，絕不表明他贊成这些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只是企图用这些字眼来麻痹这些国家的人民，似乎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殖民主义势力已經一扫而光了。肯尼迪把目前世界上存在殖民主义的范圍縮小到了仅仅占世界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附屬領地”的狭小圈子。他企图由此来证明，反对殖民主义已經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人民所面临的迫切問題了。

肯尼迪完全是歪曲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殖民主义，許多原来处于殖民地状况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宣告了独立。殖民主义体系进一步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但是，帝国主义目前还活着，它們还在世界的广大地区横行霸道。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国家，还遭受着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新老殖民主义的奴役和压迫。美帝国主义一方面支持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維持它們的殖民統治；另一方面，打着帮助被压迫民族爭取“独立”和“自由”的幌子，利用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許多地方的統治日益削弱的情况，力图取而代之。美帝国主义正采取威胁、利誘、顛复、渗透以至武装干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

大地区的許多国家加紧进行侵略。正如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所指出：“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拚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剝削。”

肯尼迪把殖民主义的范圍縮小到“附屬領地”的狭小圈子，无非是想为美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打掩护，麻痹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的斗争意志。但是，謊言毕竟是掩盖不住事实的。

在肯尼迪的字典中，南越并不属于“附屬領地”的范圍吧，可是，誰都知道，吳庭艳的政权是美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組織。美帝国主义从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控制着南越，并且帮助吳庭艳集团对南越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这难道不是十足的殖民主义統治嗎？

剛果宣布独立一年多了，不但比利时、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主义者沒有退出，而且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又闖了进去。美帝国主义企图排挤老殖民主义在剛果的势力，把剛果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嗎？

拉丁美洲的許多国家，都是独立的国家。但是，美国的壟断資本控制着許多国家的經濟命脉，使它們实际上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像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它被拉丁美洲人民称为“綠色的魔鬼”）这一类的壟断組織，在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中形成了“国中



之国”。这些壟断組織，不但残酷地剝削这些国家的人民，而且粗暴地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美帝国主义还在一些国家中經常策动政变，建立亲美独裁統治。美国殖民主义的这笔賬，肯尼迪难道能够賴掉嗎？

美帝国主义把它的侵略魔爪伸向了資本主义世界的各个角落，它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驻扎了几十万军队，建立了几百个軍事基地，派出了許多軍事顧問团，并且扶植許多国家的反动派，到处鎮压人民革命斗争。美帝国主义欠下数不清的血債，肯尼迪要賴掉是不行的。

一切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国家的人民，都深深懂得殖民主义意味着什么。他們清楚地知道，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新老殖民主义，是他們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他們在斗争中日益提高了觉悟。現在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凶恶面貌。非洲国家民族主义組織駐开罗办事处的一个声明写道：“肯尼迪当政下的美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决意千方百計地破坏非洲的解放斗争”，“他們正装作提供帮助和援助的朋友，从后門进来，从而带来一种新的更加恶毒的殖民主义”。拉丁美洲争取国家主权、經濟解放与和平會議宣言这样写道：“阻止拉丁美洲发展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它与各国寡头势力的紧密联盟以及它的經濟文化渗入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表明，它是拉丁美洲普遍停滯落后的罪魁。”

在不久以前举行的不結盟国家會議上，有人发表了这样一种論調，說什么“傳統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經过去了、死亡了”，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視問題“都居于次要的地位”；还說什么战争与和平問題“是今天最生死攸关的和最重要的問題”，如果不首先解决战争問題，“任何別的問題都不存在了；它們被淹沒在可怕的战争的灾难之中”。很显然，所謂“傳統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經过去了、死亡了”的說法，完全是无稽之談。这种論調，同肯尼迪的論調如出一轍。

认为战争与和平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把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当作次要的問題，这实质上是把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这是抹杀了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破坏世界和平的危險来自帝国主义。因此，要保卫世界和平，就不能不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如果說，反对帝国主义不过是“次要”的事情，好像除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外另有取得和平的最好的办法，那在实际上就是纵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民族解放斗争，包括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不但不妨碍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而且，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一样，打击了战争危险的根源——帝国主义，縮小了它的活动范围，分散、牵制和消耗了它的武装力量，因而是对于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愈发展，世界和平就愈有保障。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当作次要的問





題，就会阻碍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这对于保卫世界和平是极其有害的。

第二、肯尼迪假惺惺地装做“同情”民族独立的样子，对他所說的百分之二的“附屬領地”的問題，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說什么要采取“和平”的办法，使它們“从殖民地地位改变到平等伙伴地位”。按照肯尼迪的說法，被压迫的民族完全可以等待帝国主义的恩惠，通过和平的道路取得他們所要求的独立，斗争是不需要的，武装斗争更是不需要的了。

但是，历史事实证明，殖民地、附屬領地所得到的纵然只是部分的独立，那也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沒有人民群众的斗争，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从来不会自动地做任何让步。被压迫的民族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是由帝国主义用武装压迫这些国家的人民所引起的。帝国主义派出自己的军队，或者利用它們的走狗，对要求独立的民族实行血腥的镇压，这就使被压迫民族采用武装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成为必需。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完全是正义的。列宁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以設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sup>①</sup>。中国人民在获得解放的道路上，对于用武装斗争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有着深切的体会。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把刀架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中国人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起武器

坚决和敌人进行斗争。中国人民正是按照这个办法，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被压迫民族遇到的情况也是这样。試問，当新老殖民主义者对古巴、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老撾、南越人民拿起刀来，并且已經向人民砍来的时候，人民如果不願意听任新老殖民主义者摆布，那么，除了拿起刀来奋起自卫，用革命战争反对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反革命战争，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呢？

葡萄牙并不能算是帝国主义强国吧，但是，它并不願意自动放棄任何一块殖民地。这个帝国主义侵占果阿达四百多年之久，印度独立以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直頑固地坚持殖民主义，企图永远霸占果阿。直到最近，印度政府根据人民的意志采取了军事行动，才使果阿回到印度的版图。即使要从像葡萄牙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手里收回一块土地，也还需要用武装斗争的办法，何况对付比葡萄牙大得多和凶恶得多的那些帝国主义国家呢！

帝国主义是被压迫民族的最好的反面教員，被压迫民族总是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实践中学会怎样对付帝国主义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本·赫达說：“我們是迫不得已才进行武装斗争的。本来处于殖民地地位的阿尔及利亚的客观条件迫使我們把武装斗争作为争取民族独立的主要斗争形

<sup>①</sup> 《論尤尼烏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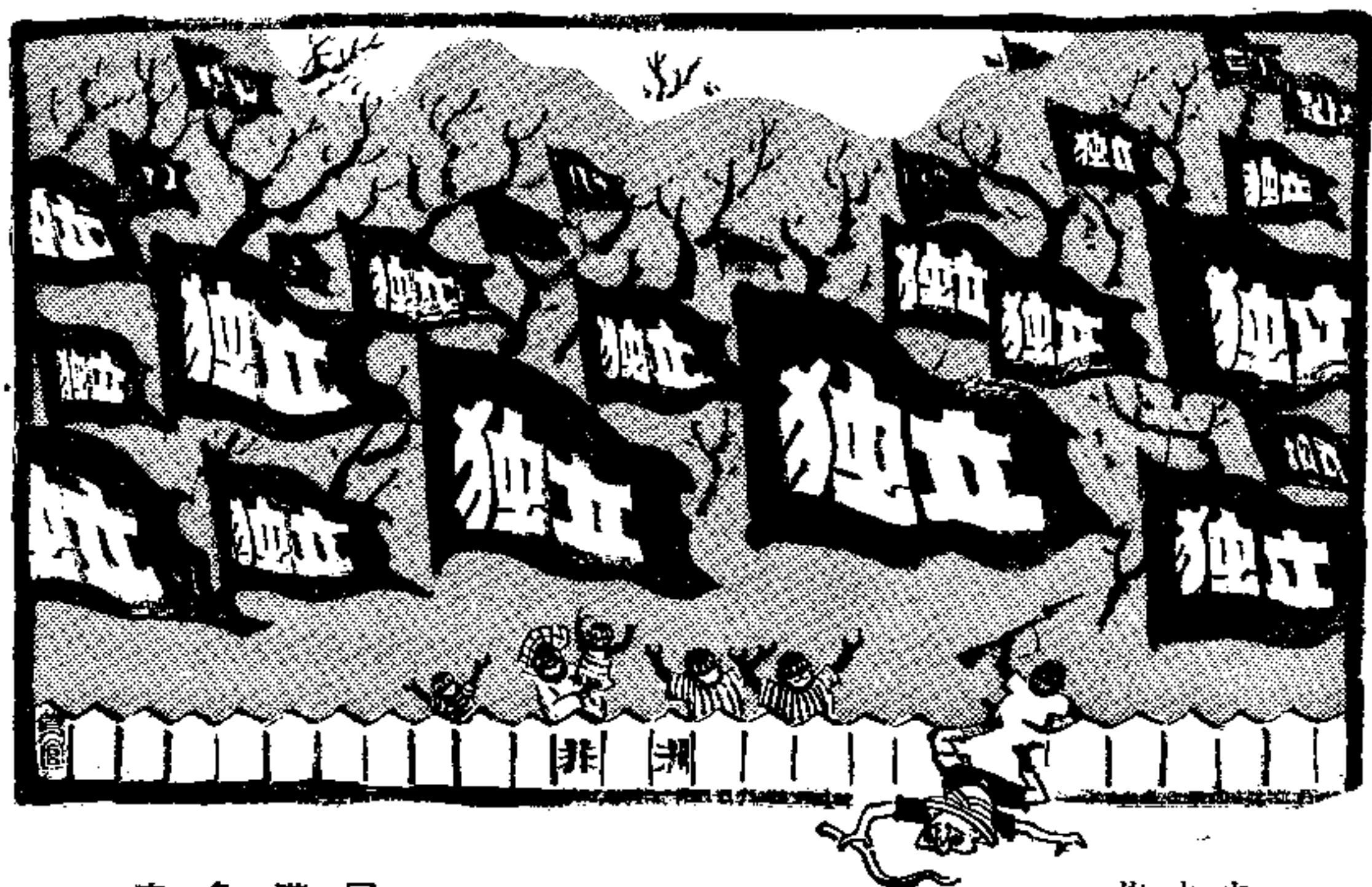


式。多年来这是我们的行动准则，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其如此。”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马里奥·德安德拉戴说得好：“我们曾经徒劳地企图通过和平手段得到我们的政治权利，现在正进行斗争以便夺回这些权利，萨拉查政权对我们的正义要求的回答是取消一切自由，并进行镇压。……这种作法强迫安哥拉人民采取武力行动。”

肯尼迪说什么“我的国家一度是一个殖民地，我们知道殖民主义意味着什么”。肯尼迪想利用美国过去是殖民地的历史，使人相信，今天的美帝国主义似乎是同情反殖民主义的，借以掩盖他们推行殖民主义的罪恶勾当。在这里，肯尼迪恰恰撇开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这就是：北美人民的独立是用战争的

手段反对他们的宗主国——英国而取得的。虽然当时要求北美独立的人很多是英国人的后裔，但是英国统治者也没有因此而用“和平”方式把独立恩赐给他们的北美殖民地。

在反对被压迫人民进行武装斗争方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也没有放过给帝国主义效劳的机会。铁托集团所鼓吹的反对一切战争的谬论，就是有利于帝国主义，极其不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铁托集团的“理论家”卡德尔认为不应当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他主张“反对每一种战争”。他荒谬地说：“十分正义的战争也会具有反动的效果”。大家知道，在现代，正义的战争无非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民族解放战争；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国内革



春色满园

毕克官



命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自卫战争。按照卡德尔的说法，在帝国主义用武装进行侵略的时候，被侵略的国家是不应当用武装反抗侵略的——因为这样做，“也会具有反动的效果”。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用武装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的时候，被压迫人民是不能用武装进行革命的——因为这样做，“也会具有反动的效果”。在这里，充分暴露出了铁托集团的叛徒嘴脸。

第三、肯尼迪颠倒黑白，诬蔑社会主义国家为“共产主义帝国”，妄图把殖民主义的帽子扣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并且离间社会主义国家与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肯尼迪的这些话，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不过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叫嚣了几十年的陈词滥调。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就永远地消灭了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绝不会有产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社会主义国家既没有剥削别的民族的经济根源，也没有剥削别的民族的阶级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绝不需要侵略别人和压迫、剥削别的民族。肯尼迪想要给社会主义国家扣上殖民主义的帽子，只是暴露了一切新老殖民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怀着刻骨的仇恨。

肯尼迪离间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

之间的关系，妄图阻止社会主义国家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办不到的。按照肯尼迪的如意算盘，社会主义国家最好关起门来，自己埋头建设，不去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让被压迫民族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永不翻身。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这样做，他就可以污蔑你“输出革命”，给你扣上“共产主义帝国”的帽子，或者叫你“死硬派”，栽诬你“好战”、“反对和平”。肯尼迪在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头上打这种如意算盘必然是要落空的，他们绝不会因为肯尼迪的恫吓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上后退一步。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搞好本国的建设同支援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美帝国主义污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革命”，企图以此作为借口，来阻碍社会主义国家支援被压迫民族，这是不值一驳的。被压迫民族谋求解放的斗争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所引起的。只要哪里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那里的人民就会起来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一切被压迫民族谋求解放的斗争，不是任何外国所能挑动得起来的，也不是任何外国所能够制止得了的。

用各种可能的办法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社会主义国家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列宁认为，已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一方面团结各国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一切被压迫民族，坚决地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列宁还认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代表，而且是被压迫民族的代表，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sup>①</sup>。在列宁的这一光辉的思想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社会主义国家把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当作自己的光荣的国际义务，还由于民族解放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要争取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利国际条件，也必须得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毛泽东同志说过：“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sup>②</sup>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事业中，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是互相鼓舞、互相支持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壮大，是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最有利的条件，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广大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最有利的条件。同时，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各种斗争，又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一种巨大的支持。

被压迫民族在谋求解放的斗争中努力争取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他们要取得胜利，归根到底，自己的斗争是决定的因素。老挝人民的斗争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老挝人民在争取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斗争中能够取得重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国

家以及其他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国家的支持是重要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由于老挝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坚决地不断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古巴人民、阿尔及利亚人民、安哥拉人民以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在一九六一年能够不断地取得胜利，都是主要由于自己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用更加凶狠和狡诈的手段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斗争还将是长期的，在有些地区革命力量的成长还需要有个过程，那里的斗争还会经历曲折和艰巨的道路。已经取得独立或初步独立的民族，为了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斗争果实，为了抵抗一切新老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的阴谋，也还必须进行严重的斗争。但是，可以肯定，整个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必将一浪高似一浪地不断向前发展。被压迫民族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起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任何反动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解放力量，从过去的斗争中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一定能够击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新的进攻，在今后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①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2页。

②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56页。



## 当“败狗”翘起尾巴的时候

袁先祿

肯尼迪在一九五八年曾經无可奈何地把美帝国主义比做一只“败狗”。当时他承认，在美国和苏联之間存在着“导弹差距”，美国的军事力量已經明显地落后了。

最近一个时期，这条“败狗”把尾巴翘得老高老高，大事炫耀美国的核力量，显出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

为什么“败狗”近来翘起尾巴来了呢？原来，美国統治集团尽管在世界各地推行侵略政策不断遭到了挫败，但是，他們仍旧妄想利用自认为有利的时机，更加張牙舞爪地在世界許多地区“摆脱守势地位”和“重新掌握主动”。《华盛顿邮报》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一篇文章里认为：美国要在冷战中掌握外交上的主动，就应该不要“害怕让人们觉得我們是在冒战争的危險”。美国的一个御用学者、康涅狄格州大学的高尔登·克里斯琴森則建議：应该使敌人毫不含糊地相信，美国不管是受到攻击或者是受到刺激，都要当真使用核武器，而这首先需要美国“自己绝对地和毫无疑问地相信”。总之，华盛顿“冷战”策略家仍然把加紧核讹詐当作推行侵略政策的一条妙計。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败狗战略”——“败狗”为了掩盖住怯相

而猥猥凶吠，企图把人們吓住而使自己可以横行霸道。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从来迷信武器的力量，但武器的力量从来不能吓倒革命的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初期，美国在原子武器方面不但掌握着优势，而且还曾經占据着壟断地位。难道这使得美国在那时能够称心如意地推行侵略政策，实现独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嗎？不，沒有。看一下美国壟断资本的附屬机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本世紀中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吧。这本由現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主持编写的小册子，在叙述美国战后初期原子讹詐政策失败的結局时，悲哀地写道：“共产党的最大进展，包括中国的共产化在內，是在战后初期美国享有这种武器壟断，因而在理論上享有极大的力量优势的时候取得的。这种力量并没有有效地变成支持（美国）外交目的的压力。”

为什么美国当时的原子武器的壟断地位沒有能够使它的侵略外交获得成功呢？美国的一个进步評論家詹姆士·艾倫在《原子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原子时代的世界帝国主义已被我們这一时代的社会主义的变革





和殖民地革命大大地限制住了，……这就是它的致命的弱点以及无法超越的困难的根源。就是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孤立的、貯滿原子武器的堡垒也不能阻擋这种形势；全世界正在经历的基本的社会变革也不是另一次世界战争所能制止得了的。”

事实的确是这样，决定人类发展前途的是人民，是人民的斗争，而从来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武器。

用核讹诈政策来恫吓世界人民，这并不是肯尼迪之流首先采取的手法。自从美国一有原子弹以后，华盛顿的当权人物就不断地威胁说，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将用核武器来支持自己的行动。但是，为什么这种武器终究没有被使用呢？回顾一下历史是不难得到正确的答案的。

当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而被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从华盛顿传出了一阵暴跳如雷的怒叫声。不少将军和议员们吵吵嚷嚷地主张用原子弹来对付朝鲜和中国人民。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马上答复说：“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正在考虑中”。在华盛顿那帮狂妄的老爷们看来，只要他们拿起原子弹来恐吓一番，似乎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就会害怕得膝盖发软，俯首贴耳地让美国侵略者任意宰割。可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仍然昂首屹立，严正地警告侵略者，如果胆敢发动原子战争只能自食苦果，并且在朝鲜战场上继续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军队。当时，在世界人民中间，也掀起

了一场反对美国原子讹诈政策的斗争风暴。结果怎样呢？华盛顿的战争狂人被迫缩回了企图制造原子战争的罪恶的黑手，而且还因为在朝鲜战场上吃了败仗，终于不得不在一九五三年同朝中人民缔结停战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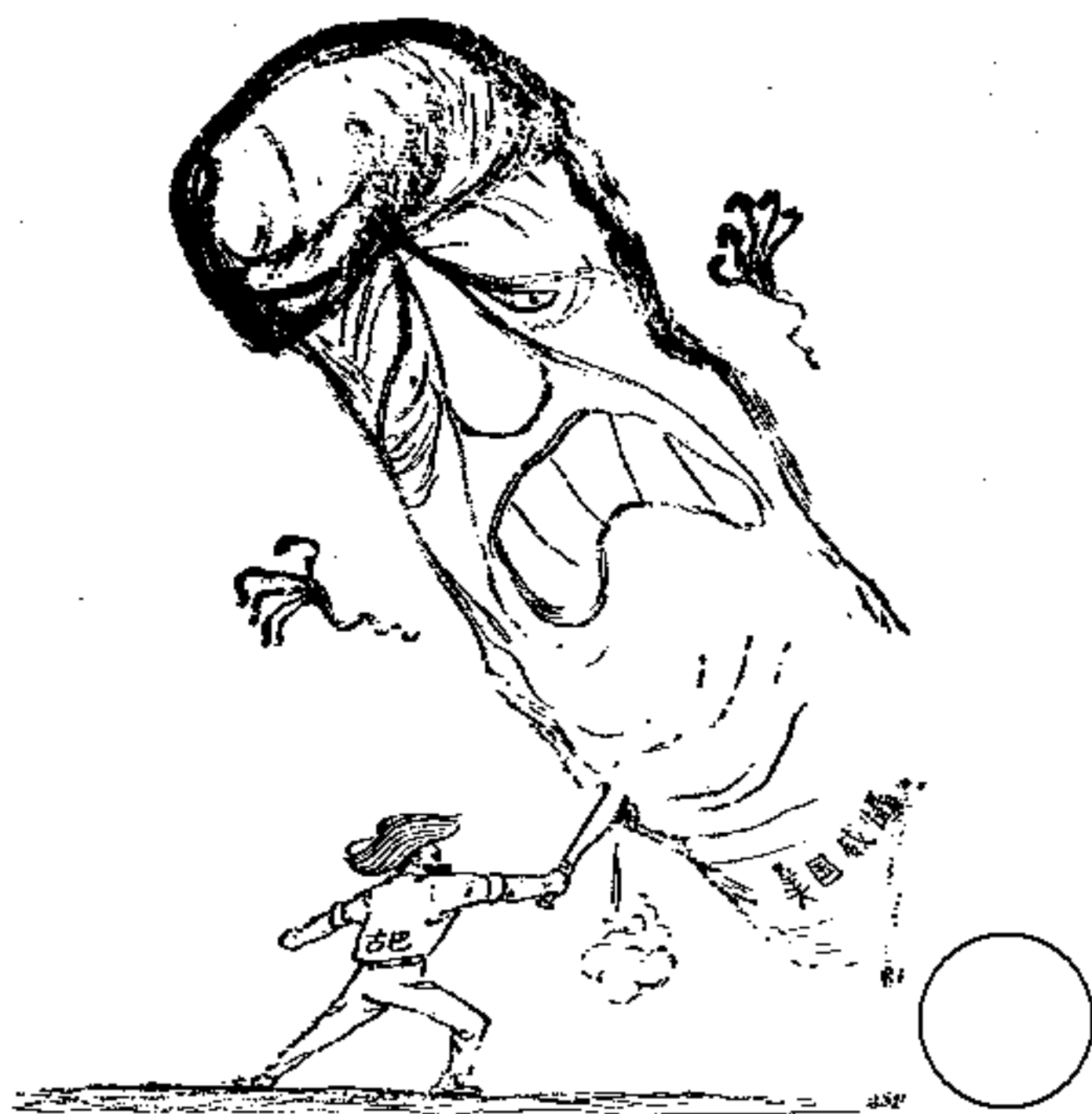
当美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四年策划直接参加印度支那战争，并且企图取代法国在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的时候，印度支那人民在反殖民主义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和举行日内瓦会议来谋求印度支那停火的前景，使得华盛顿的当权人物大为恼火。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一面警告法国不得无视美国的总的战略利益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一面又叫嚣说，一旦美国总统认为美国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使用原子武器“立即进行大规模的反击”。显然，杜勒斯也认为，美国拿起原子武器来恫吓一番，就能够毫无阻碍地吓唬住世界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可是，他的算盘同样是打错了。印度支那人民强烈地谴责了美国的罪恶阴谋，并且更加英勇地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战斗。在全世界也响起了反对美国的核讹诈和反对美国干涉印度支那局势的强烈呼声。由于形势的逼迫，美帝国主义终于无法阻挠日内瓦会议达成关于印度支那停战和恢复和平的协议。

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只有不害怕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才能使它的讹诈手段无所施其技吗？这里，借用肯尼迪关于“败狗”的比喻倒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在一只张牙舞爪的恶狗面前，如果人们见而胆怯，转



身退逃，它就会凶焰陡增，穷追猛赶，甚至乘势把人毒咬一口；相反地，只有不怕恶狗的凶相，坚决拿起棍子来准备迎头痛击，才能迫使它夹起尾巴，落荒而逃。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人们被肯尼迪之流别有用心地描绘的核战争的恐怖情景吓得心惊胆战，那就恰恰会上美帝国主义的当，会使自己在精神上解除武装，人们就会老是耽心触怒美帝国主义，害怕说不定哪一天会有核武器飞来“毁灭人类”，因而不敢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样，肯尼迪之流就会越来越得意忘形地挥舞核武器进行恫吓，结果只是使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更加增加。相反地，只有不被肯尼迪之流制造恐怖的言论所吓倒，对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采取藐视态度，不断地揭露和反对它准备核战争和推行侵略政策的阴谋，并且用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来限制和束缚它的手足，这样才能击败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使得它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核战争。万一美国战争狂人竟敢不顾一切地把一场核战争强加到世界人民头上，世界人民也就能够坚决进行抵抗，不致因为缺乏精神准备而遭到更大的损失；并且在最后像消灭咬人的疯狗一样，把帝国主义埋葬掉。

美国代表史蒂文森最近在联合国大会上攻击中国的时候，特别咬牙切齿地攻击中国



不怕鬼的眞事

方成

人民不怕帝国主义核讹诈的态度，并且企图使人们相信这是中国“好战”的证明。但是，谁都看到，穷凶极恶地在世界人民面前挥舞核武器的并不是中国，危言耸听地向世界人民散布“毁灭人类”这种恐怖论调的也不是中国。中国人民认为核武器是毁灭力量很大的武器，因而一贯反对使用核武器，坚决主张彻底禁止一切核武器。“好战”的帽子，对于帝国主义自己倒很合用，在中国头上是绝对扣不上的。华盛顿的当权人物在加紧核讹诈，企图以此来挽救美国侵略政策的失败的同时，对于不怕核讹诈的态度这样地痛心疾首，正好清楚地告诉世界人民，当“败狗”翘起尾巴来用核武器吓人的时候，人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付它。



# 現代資產階級的实用主义哲学

陈元暉

实用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一个流派。最先把实用主义这个名詞引用到哲学上来的是美国人皮尔斯。皮尔斯在一八七八年写了一篇题名为《怎样使我們的观念明白》的文章，发表在美国出版的《通俗科学月刊》上。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要使人們对一个事物得到完全明了的概念，只須想一想这个事物有哪样的实际上的效果，效果的概念就是我們对于那个事物的概念的全部。效果决定事物的概念。对人有实际上的效果，就有这个事物的概念；沒有实际上的效果，也就沒有这个事物的概念。这便是由皮尔斯提出的最早的实用主义原理。这个“原理”显然是同概念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的唯物主义观点相对立的。在这个“原理”发表了二十年后，一八九八年，另一个美国人詹姆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哲学讲演中把它重提出来，实用主义就傳播开来，并在美国形成了“实用主义运动”。一九〇七年，詹姆斯出版了《实用主义》一书，实用主义作为一个資產階級的哲学流派就形成了。所以，严格說来，实用主义作为哲学流派的出現是在本世紀初年。

实用主义哲学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庸俗的实利主义的观点。它特別为帝国主义所欢迎，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資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資本剝削空前殘暴，侵略战争空前野蛮。帝国主义需要这样一种哲学：它可以用来說明，不管是剝削行为或侵略行为都是合理的、正确的。行动是从需要产生的，从需要产生的行动就是合理的，所以从帝国主义的需要出发的侵略行为也是合理的，实用主义就是用这样的“行动哲学”来为帝国主义辯护的。

实用主义哲学的理論根源是近代主观唯心主义經驗論。由“心”产生經驗，由經驗創造世界，这是所有主观唯心主义經驗論者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所遵循的道路。主观唯心主义經驗論，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到二十世紀初叶出現了新的流派，这就是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的首創者是法国的孔德、英国的弥尔和斯宾塞等人。实证主义者认为，只有“經驗”才是“确实的”实在，除人的經驗外沒有确实的世界，世界是由經驗創造出来的，科学只是对于經驗事实的描述。有了人的經驗才有外在的客观世界，沒有人的經驗就沒有外在的客观世界。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經驗





論的基本論點。這種論點還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初葉英國的主觀唯心主義者貝克萊。貝克萊說：“人們觀察到一定的顏色、滋味、氣味、形狀、硬度結合在一起，就承認這是一個單個的物，并用蘋果這個詞標志它；另外一些觀念的集合構成了石頭、樹木、圖書以及諸如此類的感性實物”<sup>①</sup>。在貝克萊看來，物是觀念的集合。實證主義者繼承了這個論點，只不過把“觀念”一詞改成了“經驗”或“知識”。

實用主義是實證主義的繼續。實用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語義哲學、馬赫主義，都是從實證主義派生出來的。邏輯實證主義主張世界是由邏輯結構創造出來的，語義哲學主張世界是由語言的意義和語法創造出來的，馬赫主義主張世界是由感覺和感覺的復合創造出來的，實用主義主張世界是由“經驗”和他們所謂的“實踐”創造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的這些哲學流派之間雖然有微小的差異，但是實質上都是一樣的，都是從觀念創造世界、人的意志創造世界這一基本觀點出發。實用主義一開始流行，列寧就指出，馬赫主義和實用主義之間的差別，就像經驗批判主義和經驗一元論之間的差別一樣，是微不足道的和極不重要的。

實用主義和其他各種實證主義流派的觀點和目的，實質上沒有多大的差別。例如：

第一，它們都着重“經驗”，而且都僅僅着重“經驗”。它們和唯物主義對立，不是把經驗看作是客觀世界的映像，而是把經驗看作是造物主，認為世界和人類都是由

它創造的。

第二，它們都偽裝中立，或偽裝超然派。它們裝着既反對唯物主義，也反對唯心主義，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都說成是“形而上學”。其實它們是在“實證科學”這一招牌的掩蓋下，調和科學和宗教的矛盾，宣傳信仰主義，是十足的道地的主觀唯心主義。

第三，它們都偽裝科學，把自己標榜為“科學的”學說，並且口口聲聲強調“科學”，主張由“科學”來統治世界。這種主張的實質是想利用“科學”的名義維護資本主義制度。誰能掌握“科學”呢？在實用主義者和實證主義者心目中，只有資產階級。

第四，它們都反對階級鬥爭，主張社會“均衡”，主張階級合作。它們實際上都否認階級的存在，用各種花言巧語，麻痹工人階級的意識。

第五，它們都反對馬克思主義，惡毒地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竭力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它們反對馬克思主義，往往是用混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抹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界限的手法來進行的。

## 二

美國的實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杜威，在他所著的主要哲學著作《經驗和自然》一書中，開宗明義就告訴大家說，他的哲學是經驗的自然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經驗論。什

<sup>①</sup> 《人類知識原理》第1節。轉引自《列寧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頁。



么是杜威所強調的“經驗”呢？杜威說，“經驗”具有“兩套意義”，他的說法是：“‘經驗’指開垦过的土地，种下的种籽，收获的成果以及日夜、春秋、干湿、冷热等等变化，这些为人们所观察、畏惧、渴望的东西；它也指这个种植和收割的人，工作和欣快、希望、畏惧、计划、求助于魔术或化学的人，垂头丧气或欢欣鼓舞的人。”杜威认为，“在动作与材料、主观与客观之間”是沒有区别的，这两个方面包括在“一个不可分析的整体中”<sup>①</sup>。杜威这些話的意思，就是把客观世界、物质、人和人的思想都看成“經驗”，也就是用“經驗”来消除物质和意識的区别，消除“事物”和“思想”的区别。

本来，經驗是客观实在的反映，客观实在是經驗的源泉。实用主义者把客观实在看作是經驗的产物，认为經驗不是依賴客观实在而存在，倒是客观实在依賴經驗而存在。这就是自然主义經驗論的唯心主义路綫。实用主义者強調“經驗”，好像他們重視客观事物，其实他們是用“經驗”这个字眼来混同唯物主义路綫和唯心主义路綫。列宁說：“目前，各色各样的教授哲学都以侈談‘經驗’来掩飾它們的反动性。”<sup>②</sup> 实用主义就是以侈談“經驗”掩飾其反动性的教授哲学。德国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費希特說：“我郑重声明，我的哲学的真諦和灵魂在于：人除了經驗以外什么也沒有；人所要获得的一切，只有通过經驗才能获得”<sup>③</sup>。康德主义者維也納的哲学教授耶魯薩倫姆說：“承认神的原初存在，是和任何經驗都不矛盾的。”<sup>④</sup> 一切內在論者，經驗批

判論者，經驗一元論者和实用主义者，都援用“經驗”，企图在“經驗”这个字眼下掩盖其唯心主义路綫。

在实用主义哲学中也常談“实践”。实用主义者从“行之有效的就是真的”这一前提出发，注意“行动”；杜威并把实用主义叫做“一种行动的唯心主义”。他认为行动的重要，或者說实践的重要，完全在于它具有“兌現价值”。所謂“兌現价值”，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有报酬”。在实用主义者看来，重要的不是使認識符合于客观实际，使行动符合于社会发展的規律性，他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們实际上是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立場出发，宣揚“有报酬”就是真理。“有报酬”的行动就是实用主义者所說的“实践”。他們強調“实践”，就是因为从“实践”中可以得到他們所企求的“报酬”。

实用主义者特別強調“效用”，就是从这种实践观出发。实践就是为了“效用”，就是为了“成功”。一切有效用的就是有“兌現价值”的。在他們看来，宗教有麻痹人的意識的效用，所以上帝有“兌現价值”。侵略战争对帝国主义有效用，所以侵略战争有“兌現价

① 參看《經驗与自然》，商务印书館1960年版，第10頁。

②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0頁。

③ 《就最新哲学的真正本质向广大讀者的明白报道》。轉引自《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9頁。

④ 《批判的唯心主义和純粹的邏輯》。轉引自《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0頁。



值”。实用主义哲学之所以为华尔街老板們所欢迎，就是因为它有这种“效用性”，它为他們产生了“兌現价值”。

实用主义者认为科学是一种高度专门化的“实践方式”，科学是为了发现技术以便有效地“經营业务”。在他們看来，科学不是关于客观实在的知識，而是发现經营业务的方法，科学的价值也在于它有这种“兌現价值”。在他們看来，沒有“兌現价值”的，也就是不能当下使他們得到好处的，就不是科学。

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認識論指出，实践是認識的基础。人类經過实践得到了感性認識，并且发展为理性的認識。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就在于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符合到什么程度。理論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或理論的錯誤，經過实践的檢驗得到补充和糾正。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列宁說：“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sup>①</sup>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实践和認識論是分不开的。認識只有当它反映不依人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观实际时，才能指导人們的实践达到成功。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們的認識和我們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但实用主义者和馬赫主义者一样，认为实践是一回事，認識論又是一回事，实践是为了取得“兌現价值”；“价值”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它和認識論毫无关系，和是否正确認識客观实际毫无关系。

实用主义者这样地歪曲实践的意义，是替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的行为辯护，替帝国主义的疯狂的侵略行为辯护。所以当年意

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就自称为实用主义者。他說：“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有很大的用处。詹姆斯指教我：一个行动应当由它的結果来判断，而不是由它的学說的基础来判断。我从詹姆斯学得了对行动的信心，对生活和奋斗的强烈意志，法西斯主义的大部分的成功都靠这些。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行动。”<sup>②</sup>

### 三

实用主义者认为哲学的全部問題是方法問題和真理問題，他們把实用主义哲学規定为对这两种問題的討論。詹姆斯曾經在他所著的《实用主义》一书中說，实用主义的范围，第一是一种方法，第二是一种真理的发生論。他把实用主义限定在这两种范围中。不論是詹姆斯本人或以后的杜威等人，都是从这两方面来发挥他們的論点。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面貌，从这两方面的論述中也最容易看出。

什么是真理，有沒有客观真理，有沒有绝对真理，这些問題是認識論中的重要問題。实用主义对这些問題的看法，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它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绝对真理，否认經驗、感觉、知觉是外部世界的映像。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2頁。

② 1926年4月墨索里尼与新聞記者的談話。参看哈利·威尔斯著《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54—155頁。



实用主义的真理論的基本論点是：真理就是效用。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是和效用一致的，有效用的便是真理，沒有效用的便不是真理，效用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詹姆斯說，一个观念是真的，就是因为它“能安安稳稳把我們从一部分的經驗，引到別一部分，把事物聯絡得滿意，应用得妥貼、簡單、省力”<sup>①</sup>。这也就是說，能使你滿意并可以应用的东西就是真理。

从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它的效用性的論点出发，杜威提出了真理就是工具的观点。为了表达真理就是工具这个观点，他把实用主义改称工具主义。在他看来，“工具”一詞更能表现实用主义的实质。

他們把真理說成是“工具”，其用意在于說：真理并不是客观的，它和工具一样是人造的。詹姆斯詭辯說，一个数目如 27，它可以是  $3^3$ ，或  $3 \times 9$ ，或  $26 + 1$ ，或  $100 - 73$ ，等等，一般都是真的；又如“北斗星”，你可以叫它为“北斗星”，也可以叫它为“大熊星”，或“杓”，或“查礼氏車”(Charles's Wain)，这些名詞都是真的，都可以适用。哪一个更真些呢？詹姆斯說，这完全看它对人的用处怎样。中国的实用主义者胡适也說：“一百个大錢，你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的。”<sup>②</sup> 他們企图用这种詭辯来证明，真理是随人摆布的，它并没有什么客观性，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都是沒有的。詹姆斯认为，宇宙的空間和宇宙的时间都是“人为的构造”。总之，真理是人造的，所以真理不是客观现实的规律

性的反映，而是随心所欲、由人的自由意志支配的主观观念的产物。这就是实用主义者对真理的基本看法。

“工具”是用来制造成品的，它是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既然真理仅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所以真理是随人的意志而不同的，随人的願望而不同的。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一书里說过这样的話：“能起作用的假設是‘真’的，所謂‘真理’是一个抽象名詞，适用于因其作用和效果而得着确证的、现实的、事前預想和心所期願的諸事件的汇集。”<sup>③</sup>

实用主义者认为，真理并不是定律、定理、原則，它仅仅是一种假設。杜威說：“概念、学說、系統，不管它們怎样精致，怎样坚实，必須視为假設”<sup>④</sup>。他們认为假設的真或不真就全看它的效用。詹姆斯說：“或然的真理之唯一試驗就是引导我們，什么应用得最好，什么能把生活的各部和經驗总体的要求，配合得最妥貼。”<sup>⑤</sup> 实用主义者所謂“效用”，就是把生活安排得最妥貼。他們认为，能够把生活安排得好就有效用，对生活有效用的假設就是真理。

实用主义者所謂“假設”，并不是科学的

① 《实用主义》第 1 册，商务印书館 1930 年万有文庫版，第 41 頁。

② 《实验主义》。《胡适文存》(二)，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第 106 頁。

③ 《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館 1958 年修訂版，第 84 頁。

④ 同上书，第 78 頁。

⑤ 《实用主义》第 1 册，商务印书館 1930 年万有文庫版，第 58 頁。



假設，而是某種能滿足資產階級的生活要求的東西。詹姆士說：“如上帝的假設有滿足的功用，這假設便是真的。”<sup>①</sup> 實用主義者公開地厚顏地宣稱，只要有了禮拜日可以休息的利益，就不妨認上帝為真。詹姆士在《實用主義》一書里這樣說：“我們能因上帝而喜悅，只要我們有一個上帝，我們可于種種勞苦以前，得上帝的所予我們的喜悅。我自己信上帝的證據，根本的在內部的個人經驗里。你自己個人經驗給了你一個上帝以後，上帝的名詞，至少給你休息日的利益。”他認為：“如果神學的概念，能對具體的生活有價值，它在實用主義上就是真的。就真到這個限度”。他還說：“一個概念，只要我們信仰了它是有益於我們的生活，就是‘真’的。”<sup>②</sup> 這類的話，實用主義者說得很多，舉不勝舉。從這些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實用主義對“真理”的態度了。上帝是真的，因為它有用。對什麼有用呢？對資產階級生活有用。只要對資產階級的生活有用的就都是“真理”，而且只是在這個限度內有真不真的問題。這就是實用主義的真理觀。這是一種徹底的市儈主義的哲學。

實用主義者從他們的真理觀出發，認為哲學不外是一種方法，用它來達到對資產階級生活有“價值”的目的。實用主義者宣布他們的哲學僅是一種方法，就是從這裡來的。實用主義者說他們的哲學是一種方法，是一種真理的發生論，兩者是一而二，無論說它是哪一種東西，總不外是宣布哲學是用來為資產階級謀利的一種工具，哲學是市

儈的生意經。

這樣的真理觀，當然為一切帝國主義者所歡迎了。如果凡是能滿足生活要求的就是真理，那麼侵略、剝削、壓迫、奴役等等罪惡都是真理了，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帝國主義者的生活所“需要”的。

同“有用的便是真理”這種真理觀相適應，他們在道德觀上認為“有用的便是善”。實用主義者的道德觀，用詹姆士所說的“方便”一詞可以概括無遺。詹姆士說，所謂真實只是我們在思想方面的一種方便，而所謂正義只是我們在行為方面的一種方便。對行為方便與否便成為實用主義者的道德標準。法西斯主義和侵略戰爭，如果這些對帝國主義者奴役世界人民方便，也就是“正義”的了。

實用主義者自稱反對對世界採取悲觀主義的看法，也反對採取樂觀主義的看法，而主張改善主義（meliorism）。他們認為，實用主義必定是傾向改善主義的，是相信世界可以用漸進的方法來“拯救”的。所謂改善主義當然也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方便，它的效用就是能夠避免革命。

從改善主義出發，實用主義者認為漸進的便是善。他們斷言道德沒有固定的目的，它永遠是漸進的；也就是說，它永遠是一個過程，沒有最終的目的。所以杜威說生長自身就是道德的目的。例如“增進健康”這一

① 《實用主義》第2冊，商務印書館1930年萬有文庫版，第96頁。

② 《實用主義》第1冊，商務印書館1930年萬有文庫版，第76、52、54頁。





句話，在他看来，重要的不在于“健康”这两个字，而在于“增进”这两个字；健康并不是要达到的目的，增进本身就是目的。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說：“有意义的不是静态的結局和結果，而是生长、改良和进步的过程。所謂‘善’并不在于已被定为不易的目的的‘健康’，而在于健康所需要的增进——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目的不再是所达到的終点或极限了。它是改变现状的积极的過程。……生长本身是道德的唯一‘目的’。”<sup>①</sup>

实用主义者宣揚过程就是一切、目的没有什么这样的思想，完全說明了：他們所代表的，是一个只顾眼前利益、沒有远大前途、竭力掙扎着的反动沒落的階級。

杜威认为：“改善主义相信，存在于某一时刻的特殊的情况，无论它們是比較坏的或是比較好的，总是可以改善的。它鼓励智慧来研究善的有效的方法和实现善的阻碍，并努力改善情况。”<sup>②</sup> 他的意思是說，即使资本主义现状不好，那也不过是“比較坏”的情况，还是可以“改善”的。他用改善主义来反对革命。所謂用“智慧”改善世界状况，就是說不要用暴力来推翻旧世界的秩序，只要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改善世界的关系，而这种改善是不需要任何远大的目的的。实用主义者的生长論的道德論，受到了一切改良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費边社会主义者的欢迎。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喜欢实用主义，就是因为这种改善主义适合他們的胃口。

#### 四

帝国主义把实用主义哲学当做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一九五九年美国哲学界紀念杜威誕生百年的盛况，证明帝国主义对实用主义的重视。

实用主义哲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庸俗的、反动的思想的一个集中表现。在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界、思想界活动的許多人物，虽然并不一定自认为是实用主义者，但实际上是这种把“效用”和“方便”当作行为准则的哲学的信徒。

美国的許多实用主义哲学家明白地表示反对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也有人利用实用主义哲学把“实践”当做一个重要范畴这一点来进行混淆，把它說成是同馬克思的学說在“基本邏輯原理”上、在“哲学立場”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們这种說法实际上是企图用主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观点来曲解馬克思主义。

在工人运动中出現的修正主义或右傾机会主义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的直接产物。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思想，往往带有很濃厚的类似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色彩。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虽然他們不一定直接向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家請教（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的开始形成同美国实用主义学派的建立差不多同时），但是那种缺乏任何坚定明

<sup>①②</sup> 参看《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館1958年修訂版，第95、96頁。



确的原則，随波逐流，只顧某些眼前利益，放棄无产階級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机会主义思想，是会很自然地同資产階級的市儈主义哲学取得一致的。在下列几个問題上，可以看到修正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共同性。

第一，效用主义。成功高于一切，效用高于一切，这是实用主义者的格言。为了当前所要求的成功和效用，可以无原則地采用任何手段。手段有效驗，那就是善，也就是真。所以实用主义者认为，眼前的利益至上，具体的利益至上。眼前的利益能够猎取到，这就最有效用，最有价值。至于未来呢？那可以不管。

伯恩斯坦的有些議論同实用主义者的腔調是很相似的。例如伯恩斯坦說：“对于我來說，运动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謂的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实际上是算不得什么的，……我无論在什么时候，对于未来总不会具有一般原理以上的兴趣，无論怎样的‘未来記’对我都是不堪卒讀的。而現在和最近未来的任务，对于我的思索和努力却是非常要紧的事，至于过此以上的未来，只有在最适合于上述一点的行为的准繩时，才会成为我的研究的对象。”<sup>①</sup>在工人階級中宣揚目的没有什么、运动就是一切，未来没有什么、眼前就是一切这样的思想，就是引誘工人階級放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修正主义者叫人只顧眼前，不要去想未来，这和实用主义者是“異曲同工”的。

列宁駁斥修正主义說：“修正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終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同他

們的經濟傾向和政治傾向相輔相成的。‘最終於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斯坦的这句風行一时的話，要比許多长篇大論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記无产階級的根本利益，忘記整个資本主义制度、整个資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階級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就可以明白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穎的’問題、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沒有預先觉察到的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內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綫）都不可避免地总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sup>②</sup>

实用主义者提倡效用主义，就是叫被剝削、被压迫的人民去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时的利益，放棄根本利益，放棄階級斗争。就这点來說，无論哪种形式的修正主义，都带有实用主义的气味。

第二，渐进主义。实用主义者的渐进主义是从过程就是一切的主張而来的。它主張渐进，反对革命，否认发展过程中的飞跃、质变。胡适主張“一点一滴的进化”、“一点一滴的改造”，就是这种渐进主义。实用主义者用庸俗进化論来代替革命論，所以实用主义

①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頁。

② 《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20頁。



哲学就为那些反对革命、主張改良的人所欢迎，为一切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所欢迎。老修正主义者和現代修正主义者宣揚的所謂“資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渐进主义的貨色。

伯恩斯坦曾这样地宣傳他的修正主义观点說：“我所考虑的不是久远的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而是現在可能发生和應該使之发生的事情。因此，我的这个叙述的結論是这样一个极为平凡的命題，即爭取民主，改善民主制度的政治机关和經濟机关，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条件。”<sup>①</sup> 这段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还承认社会主义的前途（只是現在不加“考虑”而已），但是他接着又說：对于资产階級，“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一般地实行暴力的剝夺，而应通过組織和法律实行渐进的交代。”<sup>②</sup> 他又歌頌資本主义制度說：“这些制度不应加以破坏，而应使之进化。为此就需要有組織和有效的活动。”<sup>③</sup> 这样，这个老修正主义者就用渐进主义的思想来取消了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完全走到资产階級实用主义者行列中去了。

第三，伪装科学，蔑視理論。实用主义者装作是維護“科学”的样子，他們和一切实证主义者一样，口里不离“科学”，常常用許多迷惑人的字眼，如“实践”、“經驗”、“效用”等等，把他們的学說标榜为“科学”。但他們的“科学”是伪科学。他們实际上是蔑視理論、蔑視科学的。他們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否认客观真理，从而也就否认了正确認識世界和預見未来的一切可能，那还有什么理論

和科学呢！在实用主义者看来，規律是人造的，客观事物是随人的意志而轉移的，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反映客观事物規律的科学。科学是尊重客观事实、尊重規律、尊重真理的，实用主义者与此相反，在他們眼中，科学就是“自由意志”，就是“信仰”。

許多实用主义者公开宣布，像物质和意識的相互关系这样的哲学上的根本問題，是毫无意义的問題。从资产階級市儈的眼光看来，完全不必理会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人們一样可以做买卖賺錢。中国的实用主义者胡适就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主張“少談主义，多談問題”，认为“主义”不过是抽象的名詞。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也有同样的情形。他們在实际上否认客观事实，否认客观規律，用歪曲和詭辯来伪造“理論”，尽力躲避无产階級革命的理論原則。伯恩斯坦之所以拒絕承认无产階級运动的終极目的，也就是否认理論原則。他說：“不論是在什么样的进化阶段上，凡不足以使人期待工人階級当前的利益的理論或主义的宣言，总应当舍棄”<sup>④</sup>。这种說法也显然是同资产階級实用主义一脉相通的。

所以，分析批判实用主义哲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不但可以帮助我們解剖現代资产階級的意識形态，而且可以帮助我們解剖在工人运动中出現的、接受资产階級影响的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想。

① ② ③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99-100頁。

④ 同上书，第119頁。





# 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权威问题

——读恩格斯的《论权威》

海 波

恩格斯曾经为了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观点而论述过权威问题。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猖狂地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他们否认任何权威、任何服从、任何权力。他们攻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是“极权主义者”。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绝对自由的经济组织”的社会，反对建立有统一政纲、统一指挥的无产阶级政党，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要求，实际上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他们把无产阶级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想象成是以小生产为基础的散漫的无组织的社会。

恩格斯针对反权威主义者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一八七二年写了《论权威》一文。恩格斯在这篇不长的论文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透彻地分析了权威的作用与实质。恩格斯的论述，狠狠地打击了无政府主义者，有力地保卫了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发表将近九十年了，直到现在，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什么是权威？恩格斯说：“这里所谈的权

威，是说别人的意志强迫我们接受；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 这就是说，权威是带有强制性的，人们必须服从它。

革命是要反对和破坏那种旧的、已经不能适应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权威，但是，革命并不是取消一切权威。把无产阶级革命说成是反对和消灭一切权威，这是错误的。巴枯宁之流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以为，既然要推翻旧的权威，那末，人们就应当从此完全无拘无束地生活了，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威、权力而只有个人自由的社会，也就是一个完全由他们所说的“自治原则”所支配、而绝对排除他们所说的“权威原则”的社会。恩格斯说：“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描写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

从政治上来说，每一个社会都要建立自己的权威。在阶级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强使同它对立的阶级服从它。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专政，以他们的军队、法庭、警察等强制手

\* 凡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



段維持自己的統治。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須打倒资产阶级的权威，同时，必須建立无产阶级的权威。恩格斯在談到政治权威的問題时写道：“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而获得胜利的政党往往迫于必要，不得不借自己武器所給予反动派的威吓，来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曾凭借武装人民的权威来反对资产阶级，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么？反过来说，我們不是有理由因为公社把这个权威运用得太少而加以責备嗎？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些什么，那末他們就仅仅是散布糊塗观念；或者是他們知道这一点，那末他們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前后两种場合，他們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實踐經驗，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列宁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原理，結合俄国的具体革命实践，运用和发展了这一学說，从而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人民以武装起义的手段，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統治，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并且巩固了这一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和毛澤东同志也正是結合我国具体的革命实践，运用并进一步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学說，领导我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战争，才取得了偉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进而胜利

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无产阶级不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統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即使胜利了也不能巩固。

在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国家这种权威最后是要消亡的。当然，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关于国家消亡的学說决不是从反权威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当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存在的时候，当共产主义还没有完全实现，当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不但不能取消，而且是人民大众所十分需要的。国家权力只是在它已經丧失作用，没有需要的时候才会逐步地衰亡下去。恩格斯指出：“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一举而把政治国家廢除，即要求在那些产生出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尚未廢除以前就把它廢除。他們要求社会革命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廢除权威。”这就证明了，这种反权威主义者完全不懂得在权威問題上作具体分析，不懂得应当反对什么权威，建立什么权威，也不懂得在什么条件下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权威。

恩格斯的文章中还就經濟生活的領域詳細地討論了权威問題。

人們为了生产的需要，就必须进行联合活动，組織起来，这就要服从一个統一的领导。由于生产的发展，生产者的分散行动愈益变成联合活动，手工业为大机器工业所代替，工作过程日益复杂化，联合活动、互相依賴、互相制約，代替了人們各自的独立活动。因此，不論任何社会，生产愈是集体性的，权威就愈显得重要。



拿最简单的上工下工的时间来说吧。既然是集体性的劳动生产，劳动者当然不能像个体小生产者那样按照自己的方便，任意在什么时间上工，在什么时间下工，而必须服从统一的规定。在资本家的工厂里，资本家定下这种规定，命令工人服从。在社会主义的工厂里，资本家已经没有了，但这种规定仍然是必要的。所以恩格斯说，在“社会革命已把目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受其权威支配的资本家们推翻了”的时候，权威并不会消灭，而“只会改变自己的形态”。

在集体的生产中，必然要有各种规章制度，否则就不可能使在不同的车间中从事不同的工序、不同的工种的劳动者联合为一个整体。这种上工下工的时间的规定和各种规章制度，是不是属于恩格斯所说的带有强制和服从性质的权威范畴里面呢？是的，都属于这个范畴。因为这些规定既然是生产所必要的，那末，人们就必须服从它，而不能任意违反它。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规定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它既已成为规定，那末，人们就不能按照个人意志在行动中违反它。这些规定也会因为条件变化而需要改变、修订，但是在按照一定手续加以改变、修订以前，人们也还是需要认真遵守的。

在现代化的生产中更不能没有统一的指挥。恩格斯说：“在每个厂房里，时刻都会发生关于生产方法、材料分配等局部问题，它们要求马上解决，免使全部生产工作立刻停顿下来。不论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即无论是由选出来领导各该劳动部门的人去决定，或

是在可能情况下由多数表决，个别的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而这也就是说，问题是由权威来解决的。”恩格斯又以需要无数人合作的铁路运输为例。他说：“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实行。这里工作上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有一个支配的意志来解决所属一切问题，——不管这个意志是由一个选出的人来代表，还是由一个负责执行大多数有关人们的决议的委员会来代表，都是一样。无论在前一场合或后一场合，都存在一个表显得很鲜明的权威。”

所以，这种权威的必要性是由大生产的性质所决定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生产过程更加复杂化和科学化了。生产部门更多，分工更细，更加需要权威。例如，汽车制造厂制造一辆汽车，从原料、材料到成品要经过许多道工序，同时，还有成百上千种材料、零件要外厂协作。任何一个部门、一道工序、一个生产者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质按量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如果有一个协作厂、一个部门、一道工序或一个生产者不能配合好，就会影响整个生产。恩格斯说得好：“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工人群众是资本家榨取利润的对象。工人群众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在资本家的工厂中，资本家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对生产的指挥，是生产能够进行的一种必要条件；但工人群众只是因为受到饥饿和失业的威胁，才不得不承认这种权威。在社会主义社



会里，广大工人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变成了企业的主人，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給他們的种种束縛。劳动不是为了資本家而是为了自己和整个社会，他們关心自己企业里的每一件事情，关心自己的每一个劳动成果，因此，他們的劳动积极性和創造性空前高漲。工人群众的这种高漲的积极性和創造性，是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取得一切成就的重要基础。但是，只有把工人群众的这种积极性和創造性合理地組織起来，成为集体的力量，才能充分發揮这种积极性和創造性的作用。这就要求有集中的領導，要求有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要求有严格的科学的規章制度。

在我国工业企业内部，普遍实行在党委領導下的厂长（經理）負責制的領導制度，这是适合大机器工业权威的要求的。党是一切事业的領導力量，集体領導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要原則，这种集体領導又必須同个人負責密切結合起来。在工业企业内部，厂长（經理）是最高的行政負責人，因此，必須在党委的集体領導下，建立以厂长为首的生产指揮系統，建立各职能科室的責任制，在技术上建立总工程师責任制，在各項工作中建立职工的崗位責任制，建立其他各种必要的合理的規章制度。坚决糾正任何无人負責和不按規章制度办事的現象。这样就可以在厂长的統一指揮下，把职工群众的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合理地組織起来，使許多复杂的部門步調一致，使全体职工的意志变成一个意志，使全体职工的分散的力量，变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按照工业生产的需要，进行有节奏的生产。

不仅在一个企业中，而且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国民經济中，也可以看到权威的必要。

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經济的发展，要求高度集中的領導，要求有权威。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比資本主义更高。列宁曾經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任务就是“把全部国家經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計劃工作的經济机体”。<sup>①</sup>社会主义經济的发展与資本主义經济的发展有本质的不同。在資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发展的比例是通过經常的波动、比例失調和周期性的經济危机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生产資料的公有制，形成了統一的国民經济整体，国民經济有可能而且必須有計劃按比例地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經济的重要規律之一。这个規律要求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必須經常自觉地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生产資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賦予了社会主义国家特殊的、新的职能。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是政治权威，同时也是經济权威，它負有領導整个国民經济发展的任务。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規律，是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制訂的长期的和年度的国民經济計劃反映出来的。国家根据全国的資源、設備、劳动力等各种情况，通过科学的計算，从全局出发，根据需与可能，制訂出長期計劃和年度計劃，尽量使計劃符合于客观經济規律的要求。国家計劃是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它是国家的意志，也是人民的意志，这就是

<sup>①</sup>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8頁。



权威。任何組織和个人必須服从这个意志，服从这个权威。根据需求和可能，国家有权安排一切国营企业生产国家需要的产品，国家有权調用和分配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財力。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可以根据需求和可能，規定集体所有制单位对国家应負的义务，比如，征购一定数量的农业产品和副业产品等等。国家計划一旦制訂和下达，任何单位和个人就必须坚决服从并千方百计地完成和超額完成。在这里，必須坚决反对分散主义的錯誤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必定会破坏国家的統一领导，破坏国家的統一計划，影响整个国民經济的发展，危害国家、集体以至个人的利益。

当然，不能不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权威有着自己的特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权威是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服务的，是統治工人的一种专制力量。权威与工人是反映压迫与被压迫、剝削与被剝削的关系，这种权威使工人受到无限痛苦。它与工人階级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权威是人民群众集体意志的表現，群众服从权威是因为它符合于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視、破坏社会主义建設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实行专政；而在人民内部，則实行广泛的民主。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通过压服的方法，而是要通过說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的。权威虽然带有强制和服从的性质，但在人民内部，它并不是同說服教育的方法相抵触的。毛澤东同志說：“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

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維持，这是人們的常識所了解的。这同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輔相成的两个方面。”<sup>①</sup>

在社会主义建設中，所有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貫徹群众路綫。一切要求人們服从的規章制度和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必須是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見而制定的。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权威才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官僚主义习气，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都是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社会中真正的权威的。

人民要实现自己的意志和願望，就必须把自己的意志形成一定的計划、紀律、規章制度等等。这些計划、紀律、規章制度，就是权威，一經制定，就带有强制性，每个单位和个人就必须坚决服从，不得違反。这种强制性同时也是一种必然性，当人們能够認識这种必然性的时候，自觉地服从，才能够有自由，才能把工作做好；如果不認識这种必然性，就要受到集体意志的强制；如果違反它，就会使工作受到損失。恩格斯的《論权威》这篇文章，从理論上启发我們应当如何正确地認識权威問題。对权威問題有了正确的認識，那末，我們对于社会主义建設中的集中統一和紀律性組織性的必要，也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sup>①</sup>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 頁。





# 做好人民公社的财务工作

·朱光福·

农村人民公社的财务管理工作，是经营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财务管理工作做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公社生产事业发展的快慢，关系到收入分配是否合理。这是广大社员极为关心的一件大事。

农村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是按照计划来进行生产和分配的。而财务管理工作是农村人民公社实行计划管理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农村人民公社有了健全的财务管理工作，才能正确反映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生产经营状况，了解各项经济活动和经营成果是否经济、合理，各项生产费用的开支是否节约。在此基础上，就可以不断改进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生产经营，更好地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以达到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发展生产的目的。有了健全的财务管理工作，进行分配就有了确切的依据，对党的分配政策执行的情况也就容易检查了。健全的财务管理工作会使社员群众了解到一切实物和现金收入的来源，开支的去向，就更利于鼓舞他们的劳动热情和对干部的信赖。因此，做好财务管理工作，对于发展生产和合理分配

具有保证和监督作用。对于贯彻勤俭办社方针，促进公社的巩固和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党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关于加强农村人民公社财务工作的指示曾指出：“一定要用极大的努力，加强经营管理，建立一套比较健全的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度，才能保证公社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充分发展，和社员收入的不断增加，才能促进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才能把人民公社完全办好。”

人民公社要搞好财务管理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实行民主管理。

农村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生产经营权、产品的支配权都属于集体，盈亏也由集体负责。在总收入中分配给社员的消费部分，又是按劳动日进行分配的。每个社员都清楚地了解：集体生产收入愈多，支出愈少，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的也就愈多；反之，集体生产收入愈少，支出愈多，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的也就愈少。集体经济在财务上的每一笔收入或支出，都与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关，广大社员对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财务管理工作极为关心。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受自然条件、生产条件的影响，这



一块地和那一块地所需要的人工、种子和其他生产費用，各不相同。种植不同的农作物，所需要的費用也各不相同。如何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尽可能做到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財力，降低成本，节省开支，决不是靠少数财务工作人員所能办到的，必須依靠群众力量，发动群众提意見、想办法，才能做到用最少的开支收到最大的生产效果。至于对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公共财产，例如农具的保管、牲畜的使用等，也必須依靠社員群众的自觉性和責任心，才可能管好、用好。因此，只有认眞实行民主管理，才能使财务管理工作适应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和农业生产的特点，更好地为发展生产和合理进行分配服务。

民主管理财务的根本問題，是财务管理由誰当家作主的問題。社員群众既然是集体經濟組織的主人，财务管理工作自然要由他們当家作主。干部和财务會計人員是受社員群众的委托，为社員服务的，他們具体执行社員群众在财务管理工作方面共同所做的决定。当然，由社員群众当家作主，并不是說在财务管理上的一切事情，都要由每一个社員直接去办。这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做法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財权，應該属于各級社員代表大会或者社員大会；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干部和财务會計人員，應該按照社員代表大会或者社員大会的決議办事，坚决地执行财务制度；同时，社員群众对各項财务的收

支，應該有監督的权利。

农村人民公社各級社員代表大会或者社員大会，是公社各級的权力机关，它集中地代表着社員群众的意見和要求。公社各級在财务管理工作方面的一切重大事情，例如财务計劃的編制和修訂，預分和决分方案的确定，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資的分配，基本建設的投資和固定资产的购置，集体企业和福利事业的举办和投資，粮食的儲备和动用，以及有关财务方面的其他重大問題，都應該由社員代表大会或者社員大会討論决定。在討論这些問題时，必須确实做到充分发揚民主，使大家暢所欲言，以便能够全面地反映社員群众的意見和要求，作出正确的結論。对于一切与社員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而又比較复杂的問題，在大会討論之前，應該提出几个不同的方案，組織社員代表以至全体社員进行充分的酝酿、討論，并很好地集中社員群众的意見。对于某些酝酿还不够成熟的問題，也可以暂时不作出决定，繼續广泛征求社員群众的意見，然后重新开会討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員代表大会或者社員大会充分反映社員群众的意見和要求，使社員民主管理财务的权利得到尊重。

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管理委员会是农村人民公社各級的管理机关。管理委员会所有干部必須坚决执行社員代表大会或社員大会的決議，模范地遵守财务制度和财务紀律，按照已經通过的财务計劃中所規定的項目开支，爱惜社員群众創造的財力和物力，克勤克儉地为社員服务。财务會計人員是在管



理委员会的领导下，办理日常财务工作的干部。财务工作的好坏，与财务会计人员的政治责任心和业务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挑选财务会计人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财务会计人员应该由成份好、办事公道的人来担任。财务会计人员应该尽职尽责，对于一切不合财务制度、手续的开支，要拒绝支付并且积极提出意见。管理委员会和财务会计人员对于社员提出的建议、批评和疑问，应当及时作出认真的答复，做到条条有交代。

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和财务纪律，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合理使用资金、正常进行生产经营的重要保证。公社各级管理机关必须适应民主管理财务的要求，建立和健全财务制度和财务纪律。在制订财务制度和财务纪律时，必须考虑到社员群众管理财务的切身经验，这样才便于广大社员参加财务管理，使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在群众中生根。否则，尽管订出许多条文，也会流于形式。上级机关的有关部门有责任帮助农村人民公社去总结财务工作的经验，把各项财务制度建立与健全起来，并对它们的财务工作进行领导和监督。在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领导和监督各生产大队的财务工作；生产大队也必须经常督促、检查和帮助各生产队做好财务管理工作。一般地说，根据实际需要，自上而下地规定一套财务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这必须是从群众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于现在有些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已经采用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财务制度，尽管还不够完善，但它们

是从群众自己的经验中产生的东西，上级有关部门应当帮助他们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和修改，使之逐步达到完善。

各项财务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不仅要适合集体经济的需要和便于准确地反映经济活动的实际情况，而且必须与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目前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相适应。因此，会计制度如何做到简便易行是非常重要的。简便易行的会计制度，既要便于会计人员记清账、算好账，又要便于社员能够看懂，随时可以查账。只有这样，会计制度才能适应民主管理财务的要求，也才有可能把一切财务收支真正放在社员群众的监督之下。目前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会计制度，应该根据这个要求，加以改进。应当承认，会计制度上的复式记账法是比较科学的，人民公社的一部分会计人员已经比较熟悉了这种记账法。凡是采用这种记账法已经取得经验而社员群众又满意的，应当继续使用，并力求做得更好。而在那些目前会计人员还不熟悉这种记账法，社、队干部和社员还看不懂这种账目的社、队，则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一种适应会计人员业务水平并便于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看账、查账、监督财务收支的简便易行的会计制度。

为了适应民主管理财务的要求，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财务计划、财产管理、财务审批、定期公布账目等制度，也都需要建立和健全起来。

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应该有健全的财务计划。有了健全的财务计划，社员群众





就可以运用这个工具，把当年资金（实物和现金）的来源和用途，全年的生产收入和支出，以及收入分配，都掌握起来，通过财务计划来指导全年的财务收支工作。没有财务计划，社员群众对财务上的集体意志就无法体现出来，全年的财务收支中哪一项是合理的，哪一项是不合理的，财务会计人员也无法掌握。

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必须有严格的财产管理制度，保证集体的财产不被损失、浪费和贪污盗窃。因此，固定财产必须登记造册，严格保管责任，加强养护和维修，消除无人负责的现象。粮食和各种产品，必须在民主监督的基础上，实打实收，合理分配，加强保管，防止损失。对现金管理，要实行管账的人不管钱，管钱的人不用钱，用钱的人不存钱的相互制约的制度。除了保留一部分作为零星开支以外，其余的应该一律存入银行和信用社，任何人都不得擅自动用公款。各项财产都要在群众监督下定期盘点。对于某些财产的盘盈、盘亏和霉烂、损失等的处理办法，应该在查明原因后，由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讨论决定。

为了避免财务管理产生混乱现象，公社各级的财务审批制度也应该明确规定。凡是在财务计划范围内的开支，应该分别数额的大小，由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通过，或由主管财务的社（队）长批准。计划外的临时性开支，应该根据开支的性质由管理委员会集体审查批准，或者由社员代表大会讨论批准。

公布账目是社员群众监督财务收支，参

加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和财务计划是相辅而行的。财务计划是事先决定用钱的方向，公布账目是事后进行检查和监督。通过这个制度，社员群众可以了解财务收支的全面情况，并且便于深入查账。因此，所有产品、现金收支账目，预分和决分账目等，都要按期、按时公布。对于社员的劳动工分、劳动报酬和往来账目，还应该逐户核对清楚。公布的账目必须项项确实，并且做到清楚明了、简单易懂。对于不识字的社员，还要作口头解释。只有这样，才能使社员在监督财务管理工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党的组织，应当不断地教育干部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切实尊重和保障社员当家作主的权利，并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方面的民主程序，为社员群众民主管理财务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把调动社员群众对集体经济的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同发挥干部和财务会计人员的积极性密切结合起来，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财务管理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会更有成效地促进生产事业的发展。

### 更正

本刊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四期第十四页右栏第七行“五亿七千五百万”，应为“四亿四千九百万”；第八行“增加四倍半”，应为“增加三倍半”。



# 关于戏曲老艺人的艺术经验

曲 六 乙

我国传统戏曲艺术遗产，真是浩如烟海。其中有的已经整理和总结成文字，传诸后世，但更多的是保存在戏曲艺人的身上。他们毕生活动在舞台上，呕心沥血地创造出许多丰富动人的艺术形象。他们都是群众所熟悉和爱戴的艺术家。积累在他们身上的艺术经验，值得我们特别加以珍视。

每个老艺人的毕生艺术活动，实际上就是一部小的演剧史。把他们的艺术经验完整地记录下来，进行认真的整理和研究，不仅对当前戏曲艺术的实践和发展有着可贵的借鉴作用，就是对我们探讨美学和总结戏曲表演经验，也提供了生动的资料。

传统戏曲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许多好的美学见解。我们只要读一读名老艺人谈艺术经验的文字，就会突出地感觉到这一点。

一九六一年春，我国戏剧界展开了关于演员的矛盾的争论，它的中心问题是演员与角色的矛盾：在舞台上，演员应该忘掉第一自我，任情感倾泻呢，还是完全受第一自我

的理智支配？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列举了狄德罗、莱辛、布莱希特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艺术家的理论见解，这对我国戏曲遗产的整理和总结、新的艺术理论的建设，具有有益的借鉴作用。但从老艺人的艺术经验里，也可寻找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如著名表演艺术家盖叫天曾说：

“真”是生活，“假”是艺术。有“假”无“真”，就失掉了“基础”，艺术成了空壳，没有灵魂；有“真”无“假”，就像少了个“显微镜”，不能把“真”给“透”出来。所以，演戏得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来它个真假难分。<sup>①</sup>

这是讲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但对于探讨演员与角色的关系，也很有启发。演戏，演员塑造角色形象，并不真的就成了他所扮演的人物，但是，演员对他所扮演的人物的思想感情要有真正的深刻的体会。这也可以说是假戏要真做，不能太假，也不能太真，只有达到真假难分的化境，才算做到了演员与角色的矛盾的统一。这种见解，同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引的一副戏台对联，是

① 《真假难分》，《戏剧报》1961年第4期第39页。重点是引者加的。



一脉相承的：

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  
装誰像誰，誰裝誰，誰就像誰。

做为演員，是“看我非我”，扮上戏裝，又“装誰像誰”，这更是要求演員能够解决自己同角色之間的矛盾。

北方昆曲老艺人韓世昌說过：演員在舞台上演戏，既要想着观众，又要忘掉观众。盖叫天也說过：对于观众來說，演員是誰都冲着，又誰都不冲着。两位老艺术家是从观众与演員的角度，分析演員在舞台上的精神状态。“想着观众”，“誰都冲着”，这是要求演員在舞台上应该有理智的控制，有第一自我的存在；“忘掉观众”，“誰都不冲着”，这又要求演員能化入角色，生活在角色之中，以角色的情感为情感。做为活生生的角色，“他”当然不知是演戏，不知台下还有那么多的观众在欣赏、注視着“他”。对于观众，既要想着，又要忘掉，既要冲着，又不冲着，这看来是矛盾的；然而，真正的艺术家是善于处理这种矛盾的。过分強調演員的我——第一自我，不是“真中有假”，而是表演演員自己，以演員自己的思想情感代替角色的思想情感，这样就塑造不出活生生的戏曲人物形象；过分強調角色的我——第二自我，不是“假中有真”，而是要求演員完全忘掉自己，那就不成为演戏了。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程硯秋塑造的赵艳容、宋江、武松、張慧珠等戏曲人物艺术形象，所以能达到高度和諧、炉火純青的境地，就是因为他們通

过毕生的艺术磨练，掌握了把演員与角色的矛盾統一起来的本領。

活在老艺术家口头上的类似的精辟見解，可以說俯拾即是。它們虽然只是一鳞半爪，却是长期艺术实践的結晶，包含着丰富的內容，有时还含蘊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它对于整个戏剧艺术（包括話剧、歌剧、舞剧艺术）以及美术、音乐等姊妹艺术，都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反映了艺术的共同規律。拿“看我非我”、“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來說，它同美术家齐白石說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間。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有異曲同工之妙。它們从不同的艺术的角度，認識和把握了生活与艺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而这种辩证关系在各种艺术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长久流傳于戏曲界的一些諺語、口訣，也常常閃爍着艺人們的劳动与智慧的光輝。例如，梅兰芳談的掌握艺术表現手法的三个阶段：“少—多—少”，认为达到最后的“少”，才能进入“以少胜多”的造詣深度；周信芳談的“一着鮮，走遍天”；苟慧生談的“熟戏三分生”（即对熟戏要始終保持三分生的感觉，避免“油滑”，精益求精。这同“生戏演得熟，熟戏演得生”同一道理）；程硯秋談的“要做好唱戏的，不做唱好戏的”（即做优秀的演員，不做只会唱人家的好戏而没有什么創造性的演員）；蕭长华談的“一台无二戏”；郝寿臣談的“十戏九不同”；錢宝森談的“拿神不許拿勁”（既要肌肉松弛，又要神采奕奕），等等，都概括或归納了表演艺术中的某个方



面。我們要总结戏曲表演經驗，搜集和整理这些諺語、口訣，是不可少的工作之一。

## 二

在中国戏曲艺术中，不仅蕴藏着許多有益的美学思想，还有它一套独特而又比較完整的表演体系。但是，在过去，由于反动統治階級对我国傳統戏曲的鄙視，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有計劃的、深入的探討。現在，这个任务就自然落在新中国戏剧工作者的身上。在这方面，解放以来已經做了許多工作，虽然这仅仅是个开始。

优秀剧目的表演經驗，是研究和总结表演体系的最具体、最系統的活的資料。在这方面，已經記錄整理了不少材料。我以为，《梅兰芳舞台艺术》、《周信芳舞台艺术》、《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等书的記錄整理工作，是比較好的。从这些书里，我們不仅看到艺术家們的精辟見解，也看到了他們形成自己流派的艺术特征和在演出的代表剧目中的表演輪廓。

周信芳对《烏龙院》的表演經驗，談得相当精采。他叙述了自己为什么以及如何把过去人們对宋江性格的歪曲端正过来，把一个养外室的市井形象，改造成被逼为保卫梁山和自己的正义行徑而杀人的英雄形象。关于梁山送給宋江的信以及招文袋的处理，他告訴讀者自己是怎样一再埋造伏綫，让观众逐次加深印象的。宋江急忙回到烏龙院寻找招文袋的哑剧式的描写，那是脛炙人口的。宋

江以为閻婆惜不会輕饒了他，但当閻婆惜把招文袋扔給他之后，宋江的极度緊張的心情陡地平息下来：

剧情分明要往高潮发展，却先挫一挫，这样再发展下去就更有力。这也是傳統的表现方法。宋江一边說，同时用手去摸，但并不直接把手伸到招文袋里去摸，而是由下往上一托，袋子很輕，金子沒了，嘴里正說到（日后对閻婆惜）“另眼看待”的“看”字，配上一繃，宋江臉上有点变色。<sup>①</sup>

接着宋江便试图从金子的失落慢慢轉到书信的問題上去，这也是傳統的欲揚先抑，欲高又低的手法，使剧情更有波折、跌宕，人物性格的描写更为深刻复杂。宋江听說金子被她扣下，并不放在心上，他这时：

再用手去摸（招文袋）。不要一下子把招文袋翻开，那样太直綫太平淡，并且低头去翻，观众就看不清演員的臉了。而且这时宋江唯恐里面沒有书信，所以不敢拿眼睛去看，因此就平視前方，把手伸进袋內，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不能太快，要让台下看明白。臉上越来越着急；后来索性手在袋內揉起来，臉上的肌肉也随着顫抖起来。<sup>②</sup>

从两段話可以看出这位艺术家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深刻体会，这里有人物形体动作，有逐次往高潮发展的舞台气氛，并且在夹述中告訴讀者一些傳統艺术手法，怎样动作（內心和形体的統一）才能更有层次、更

<sup>①②</sup> 《周信芳舞台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33—134 頁。



合理、更曲折地交代出人物的特定心理，怎样才能更好地让观众欣赏演员的表演艺术，怎样才能让观众始终洞悉人物的内心的秘密。

戏曲表演艺术，在形体锻炼上有着一套完整的程式。《荀慧生的舞台艺术》中，有篇叫《眼睛的运用及其他》，对眼睛的训练、运用，做了精采的叙述。他以《杜十娘》为例，当杜十娘听到自己被李甲偷偷卖给纨绔子弟孙富时，扮演者荀慧生并不按老法子“哎呀”——来个抖袖、气椅，而是随着锣鼓经，配合着身段，运用了一连串的眼神，借以描写此时此地的心情：

眼睛先是一直：“真的，假的？——真的？难道说这就能是真的？”接着眼睛往上翻，不是要背过气去的那种翻，而是“天哪，天哪，我怎么挑来挑去挑到这么一个坏包呢？”最后，把眼皮一搭拉，闭上了：“既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人是我挑的，当是我上的，千怪万怪都怪我自己命薄运蹇，又悔，又恨，又伤心，可我是刚强人，宁愿哑子吃黄连，也不在这个小子面前落泪。”闭上眼是忍住泪，忍住恨，忍住悔。<sup>①</sup>

当李甲无耻地向她寻求最后一欢时，杜十娘从闭目忍泪转到狠狠地瞪他。李甲变脸说：“妓女无情，卖之不差。”这时，她气到尽头，反而不怒了，而是一个苦笑，眼睛含泪不下，在叹五更的唱腔中，“眼神是茫无所主，四肢发抖，悲恨交加”。突然又听到李甲在梦中呼唤自己的名字，她一楞，眼神

中露出一丝希望，幻想李甲能有悔意。细细一听，原来李甲在梦中还是爱的白花花的银子。这时她的眼神有些直：失望、无告，一切希望都完了，非死不可了。但是，自己不能不明不白地投江，要揭露李甲的负心无义，孙富的为富不仁。想到这里，便边唱边把眼睛睁得从小到大，表示她从悲痛到愤怒，从无告到横心的复杂心情。

耍眼睛是有一套技术的，也是一种程式。荀慧生在这里不是卖弄技术、套用程式，而是结合剧情的发展，人物心情的变化，运用眼神来帮助他塑造出戏曲人物的艺术形象，并通过这扇“心灵的窗户”，让观众窥见杜十娘的精神世界。

我国传统戏曲的表演程式，常常善于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如唱念做打的高度结合等），运用观众的联想，引导观众一起完成艺术的创造，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为观众提供最充分的美的享受。

钱宝森在《京剧表演艺术杂谈》中谈到，演员在舞台上要“眼随腰走，不离三条线”。这是说，头部往上下左右看时，下巴颏儿不离三条线：向右看时，下巴颏儿随着头部转移到与右乳成一条线为止；向左看也是以到左乳为限；上仰下俯时，下巴颏儿要对着胸口那条线。老艺人告诉我们，头部如果左右转动得过火，下巴颏儿的垂直线越过左右两乳的限度，不但“脖子感觉别扭；观众也只能看到你半边脸，姿势既不好看，身段也不好使”。

<sup>①</sup> 《荀慧生的舞台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版，第57页。





当然，头部上仰下俯时，下巴颏儿离开胸口，眼也会走斜，脑袋就歪得更难看，与整个身段、亮相，都不和谐、匀称。这既照顾了舞台艺术塑形的美，又能让大多数观众充分而又舒适地欣赏演员的哪怕一招一式的身段动作。老艺人说出了为什么这样做的道理，这就使得后学者不仅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

盖叫天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认为在台上正面要坐成“子午像”：胸部朝着正面观众，好比钟表上的大针，正指着十二点；脸偏右，好比小针，指在十一点上，当脸转向左边时，又好比小针走到一点。以《击鼓骂曹》中翩衡的四句定场诗来说，念头两句时头朝十一点处，念后两句时头转到一点处（有时也有变化）。中綫是轴，脸部的转动有一定限度（恰似左右不出乳綫），尽管左右活动——这是为了照顾各方面的观众，都始终离不开中綫这根轴——能够集中观众视綫最多的地方。这都是在“想着观众”、“谁都冲着”的艺术原则下产生的程式规则。此外，像他常举的武松打虎势：眼神似在注视跨下老虎，但又并不低头，使尽可能多的观众最大限度地欣赏到武松打虎时的面部表情和眼神。所有这些程式规则，都是在不影响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原则下，为大多数观众的艺术欣赏着想的。

这一类经验介绍，有的比较系统，有的比较零碎，但只要了解到它们的目的和作用，就会发觉它们并不是僵死、刻板的套子，它们不会限制演员的表演天才；只要能创造性

地灵活地加以运用，就会有助于艺术天才的成长。我们概括和归纳这些具体经验，就会抽象出一般的表演规则，更进而总结出具有民族风格的表演体系。

### 三

从目前已出版的十数种谈戏曲表演艺术经验的书来看，在内容和叙述的方式方法上是各有长处的：《梅兰芳舞台艺术》、《周信芳舞台艺术》、《萧长华先生谈表演艺术》、《我演昆丑》（华传浩）、《生旦净末丑的表演艺术》（白云生）、《昆剧表演一得》（徐凌云）等书，大都是以谈代表剧目的表演经验为主；但后三者的主要部分是采取了身段谱的方式的。这一类书为后学者提供了较完整的演出程式；做为排戏的具体教材，它具有范本的作用。《粉墨春秋》（盖叫天）、《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程砚秋文集》、《徐兰沅操琴生活》等书，比较更为广泛地记述了艺术家的艺术生活和从表演中概括出来的艺术见解。这一类书比较更多地接触了美学和表演体系以及其他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因此读者面也比较广泛些。《川剧旦角表演艺术》（阳友鹤）、《京剧表演艺术杂谈》（钱宝森）等书，则着重基本功（毯子功）、把子功、形体锻炼和程式动作的介绍。在叙述方法上，有的是记录者撇开自己的身份，以口述者的口吻写的，这种方法能保留更多的原始生动材料；有的则是从记录者的角度来写的，这比较偏重于分析。此外，也有的是艺术家自己动手写下来





的。在记录工作中，多种多样的风格，各有各的作用，不一定强求一律。

老艺人的优秀表演经验，能否整理得好，我以为主要是看记录者抱着怎样的目的和态度；看他是否充分了解和喜爱老艺人的表演艺术；也决定于他同老艺人合作的关系是否融洽；以及他的艺术素养、鉴赏能力和文字水平。老艺人的生动叙述，在很大的程度上弥补了记录者走笔行文方面的缺陷；而高明的记录者，却可以使艺术家的口述锦上添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是如果记录者不虚心，或者抱着猎奇态度，不愿也不想“入乎其中”——钻进老艺人的艺术里，而只想“出乎其外”，高高在上地随意进行记录，不诚恳地求教于老艺人，把老艺人呼来唤去；或者按事先拟好的框框勉强扣套，你述我记，“挤牙膏”式地一问一答，然后以自己的主观见解，代替老艺人的见解，将老艺人的见解乱加发挥，这些，都不能很好地记录整理老艺人的表演经验。

我有机会同《舞台生活四十年》、《周信芳舞台艺术》、《粉墨春秋》等书的记录者接触，发觉他们同口述者都有着很好的关系。记录者虚心向口述者学习、请教，尊重和爱护他们，同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如《粉墨春秋》的两位记录者，如果没有较充分地研究过戏曲艺术，学过一些美学和古典艺术理论，就不可能把盖叫天的见解、心得，比较系统地准确地记录整理下来。记录《周信芳舞台艺术》的同志，也有志成为研究麒派艺术的行家。《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舞台艺术》的记录

者，愿意终生研究梅兰芳的艺术。这种精神是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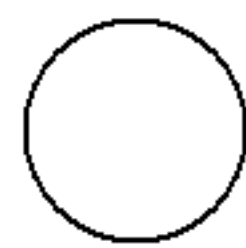
记录和整理老艺人的艺术经验，是一件细致、复杂、极有意义但又十分艰巨的工作，这需要双方对上“口径”。首先要尊重老艺人的不同脾性、习惯和兴趣。如盖叫天非常健谈，也喜欢谈心。他喜欢毫不拘束地扯东道西，也希望记录者是谈天的能手。有些同志缺乏对老艺人的热爱，不理解也不愿深入了解老艺人的艺术特征和表演风格，更缺乏应有的耐心来引导和启发老艺人，就必然产生简单化的偏向。你拿出真心，老艺人必定还你一颗真心。如果你来一番客套，老艺人也会还你一番客套，双方的关系就不能不“干”，不能不“生”。其次，谈话方式，不必限于室内，更不宜死限于一问一答的方式，而应随时随地，即景生情，引起话头，聊上一番。老艺人兴致高时就多谈一些，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在剧场看戏时可以请教，在老艺人教学或同别人谈话时，也需要随时记下值得记录的东西。日积月累，聚少成多，把零散的东西组织、串连、补缀起来，就成为比较完整的东西了。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要求剧作家有把生活素材编织成一件美丽衣服的本领。我想，记录整理者，不仅应该是老艺人表演艺术的鉴赏者、评论者，也应该是高明的艺术“裁缝师”吧！



#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2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

## 目 录

社 论 反对美国反动派  
 论 迫害美国共产党的暴行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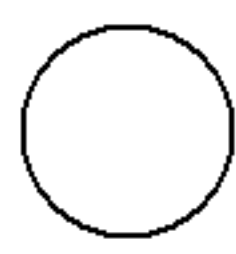
真理是具体的 ..... 張世英 (5)

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  
 若干问题 ..... 何祚麻 (13)

谦虚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 ..... 吳介民 (25)

关于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 李潤之 (33)

肯尼迪的命运(漫画) ..... 米 谷 (4)



☆ 一月十六日出版 ☆



## ——社論——

# 反对美国反动派 迫害美国共产党的暴行

美国統治集团正在援用臭名远揚的“麦卡倫法”和“史密斯法”加紧迫害美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全体党员和全体中国人民发表了声明，坚决譴責肯尼迪政府的法西斯暴行，坚决支持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美国政府迫害美国共产党人的野蛮行为，充分暴露了肯尼迪經常玩弄的“民主”、“自由”、“全民福利国家”等等口号的虛伪性和欺騙性。

在美国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社会里，美国共产党和其他一切进步力量本来就没有多少活动的自由。在美国政府的种种限制下，美国共产党实际上早已被剝夺了参加竞选的权利，不能自由地宣傳自己的主張。美国共产党人选择职业的自由也受到极大的限制。杂志、报纸、电台、剧团等与宣傳有关的各项行业都不允許共产党员就业，共产党员也不許充当教授和教員；許多进步的教授和教員，仅仅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就遭到解职。現在，肯尼迪政府援用“麦卡倫法”和“史密斯法”加紧迫害美国共产党，实际上是把美国共产党宣布为非法的組織，并且可以任意地对美国共产党人和其他一切正直的美国人判处很重的徒刑或永远付不完的罰款。这样一来，美国共产党人和其他一切进步人士原来仅有的一点点自由，也就被剝夺淨尽了。

美国共产党和其他一切进步力量在美国沒有活动的自由，但是像“三区党”、“約翰·伯奇协会”这样的法西斯組織，却可以自由地进行猖狂的活动，甚至“納粹党”也可以自由地存在。在美国已經形成了一个法西斯网，它肆意侵害人民的安全。不只是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而且所有正直的美国人，都一貫受到法西斯势力的迫害和威胁。誰只要对壟断資本集团的反动政策表示一点不滿，就会被随便加上罪名而判处徒刑和罰款，甚至于受到特务的暗害。美国宪法上規定的保障言論、出版、集会和請願等等民主权利，完全是一些空話。实际上，美国宪法上一些虛有其表的关于民主权利的規定，早已被国会所制訂的各式各样的法西斯法律所代替了。美国人民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反动政府的特务監視和控制下，随时有丧失工作甚至被逮捕和被杀害的危險。例如，“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这个所謂“防范外国間諜”的特务机构，就可以随时随地对他们所怀疑的人进行傳訊，甚至用“藐視国会”的罪名加以拘禁。任何人一旦



被这个委员会傳訊，就往往意味着失业和困苦，因为許多企业和团体，不願留用或拒絕任用有过“非美活动”罪名或者是具有“非美活动嫌疑”的人。据“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一九五七年的报告，美国就有一百多万人、二百多个組織在所謂参加“顛复活动”的罪名下受到迫害。据不完全的統計，被“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列入所謂“顛复性”团体名单之中的团体有六百多个。由此可見，肯尼迪吹嘘的美国式“自由”，就是掌握政权的美国壟断资本集团任意剝夺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的自由，就是美国反动派迫害美国进步力量的自由。

在这个所謂“全民福利国家”里，一小撮财政寡头控制着全部生产资料和整个国家的財富。他們以无止境的剝削从劳动人民身上每年榨取几百亿的金元。据《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的材料，一九六〇年美国的公司利潤就高达四百五十亿美元。这些壟断资本家，过着驕奢淫逸的寄生生活，例如，美国八大財团之一的梅隆財团的头子保罗·梅隆，为了把他的继女介紹給社交界，竟花费一百万美元的巨款，举行了一次号称“世界历史上空前豪华的”宴会。广大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而且經常面临失业和飢餓的威胁。正是在这个“全民福利国家”里，美国統治集团自己也承认，完全失业的人数，有时候达到五百七十万以上，即使在所謂“繁荣”的一九五九年，也有三百八十万人完全失业。肯尼迪竟然认为，保持百分之四即三百万左右完全失业的工人是“合理”的。正是在这个“全民福利国家”里，一方面，积存的“剩餘”农产品总值达一百亿美元之巨；另一方面，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却要忍飢受餓。肯尼迪在一九六一年的“农业咨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在十戶美国家庭中，有一戶的饮食不足，甚至低于标准营养需要的三分之二”。正是在这个“全民福利国家”里，据美国报刊的报道，有众多的家庭收入不足以維持普通水平的生活，有百分之六十八的家庭負債。截至一九六一年底，美国消費者的債務总額已高达二千九百亿美元。一九五五年以来，負有分期付款債務一千美元以上的家庭的数目增加了一倍。由于还不起債而宣告个人破产的案件，一九六一年便有十三万一千起之多。肯尼迪所謂“全民福利国家”的鬼話，絕不能掩盖美国社会貧富极端悬殊的真实情况。

总之，一小撮亿万富翁实行残酷的統治，广大劳动人民处于奴隶地位，这就是号称“民主”、“自由”、“全民福利国家”的美国的真相。共和党和民主党，不过是出现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的一对孿生弟兄，它們无论那一个执政，都忠实地执行着美国壟断资本集团的意志。肯尼迪的民主党，尽管标的是“民主”的牌号，却絲毫也沒有民主的气味。人們只要稍为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到：民主党在負責鎮压美国革命运动方面，比起共和党来絲毫沒有逊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于反对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美国人民的大規模的鎮压，是在民主党执政时期进行的；“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是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成立的；“史密斯法”、“麦卡倫法”的通过，也是在民主党执政的时期；而肯尼迪政府上台后不久，美国反动派又利用这两个法西斯法案，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证明，民主党的“民主”牌号，只不过



是垄断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用来欺骗美国人民掩盖它的丑恶活动的一块破布而已。无论肯尼迪用什么漂亮的言词来加以粉饰，都不能改变这个所谓“民主”的党的坏名声。民主党政府同共和党政府在压迫和奴役美国人民这一点上，从来没有有什么区别。福斯特同志说得好，“美国政府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久以前所说的‘资本家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这是全人口里一小撮人的资产阶级的专政”，“它唯一的目的是扩大那已经多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华尔街利润，是推进大资本控制世界的法西斯和战争的疯狂计划”。

肯尼迪居然还厚颜无耻地要把美国的这种“自由”和“民主”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最近以来，肯尼迪在一系列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所谓“自由选择”社会制度的问题。他在今年一月十一日的“国情咨文”中，又一次地吹嘘这个“自由选择”的原则。一个在国内实行暴力专政疯狂迫害共产党和其他进步人士的帝国主义者，难道在对外政策上真的能够尊重别的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么？不难看出，肯尼迪的所谓“自由选择”，就是颠覆以卢蒙巴为首的刚果合法政府，就是破坏老挝的独立和中立，就是要扼杀自己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古巴，就是要消灭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而消灭社会主义阵营。一句话，就是由美帝国主义自由地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去反对各国人民真正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

肯尼迪政府为了摧残美国共产党，硬给美国共产党加上所谓“外国代理人”的莫须有的罪名。这完全是恶毒的污蔑和捏造。美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美国从它建国一开始，由于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就进行着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现在还在继续着，并且越演越烈。在资产阶级的镇压下，在血的教训之中，美国工人阶级懂得了，要打碎资本主义的剥削枷锁，必须团结自己的力量，组成自己的战斗司令部，这样，也就产生了美国共产党。

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复灭的命运，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寄生性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论断的正确。美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切合美国工人阶级和美国人民的斗争的需要。美国政府想从这里找到美国共产党是“外国代理人”的“根据”，这只能是徒劳的。革命思想的传播从来是没有国界的。在历史上，美国独立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的政体，就是法国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启蒙运动者的学说影响下的产物，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反过来又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火焰，美国的独立宣言成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起草人权宣言的指南。如果按照肯尼迪政府的逻辑，那末，岂不是就要把华盛顿和杰弗逊说成是“法国的代理人”？岂不是就要把法国的大革命说成是“美国代理人”制造的“暴乱”？这显然是荒谬的。

肯尼迪政府对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力量的迫害，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希特勒曾经采用过





的手法。一九三三年一月，在德国各方面矛盾极端尖锐化的情况下，希特勒被德国大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拥上了台。希特勒一上台，就制造了所谓“国会纵火案”，对德国共产党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把德国共产党打入地下。随后，便以反共为口实，疯狂迫害德国的民主力量和广大人民。工人和进步人士成批成批地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其中许多人惨遭杀害。在反共的幌子下，希特勒使德国变成了一个恐怖世界，放手地进行扩军备战和对外侵略，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肯尼迪政府迫害美国共产党的暴行，表明美帝国主义正在步希特勒的后尘。因此，全世界人民必须提起高度的警惕。



肯尼迪的命运

米谷

现在，世界斗争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世界人民绝

不能容许美帝国主义再像希特勒那样任意横行霸道了。如果说，二十多年以前，世界上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希特勒还可以猖狂一时，那末，今天的时代已经和二十多年以前大不相同了。美国反动派迫害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力量，并不表明它的强大，反而说明它的虚弱。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已经十分衰朽，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它有无法解脱的经济危机，它与世界人民为敌使自己陷于极端孤立的地位。美帝国主义貌似强大，实质上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它所推行的内外反动政策，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肯尼迪要向历史的潮流挑战，只能是像唐·吉珂德向风车作战一样，将落得一个惨败的结局。不管在人民革命事业的面前，会出现怎样的曲折和困难，但只要世界人民加强团结，向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得到胜利。美国的未来绝不属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而是属于美国工人阶级和美国人民大众。



# 真理是具体的

·張世英·

“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所再三強調的这一真理观，是馬克思主义認識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理。可以說，我們認識的目的就是要把握具体真理，并运用它来指导实践。

什么叫做“具体”呢？这里所謂“具体”，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济学批判》一书的《导言》中所說，是指的“許多規定的总结”或“多样性的統一”。与这里的“具体”相对立的“抽象”，是指孤立、片面、割裂、空洞的意思。

真理之所以是具体的，是因为客观事物是具体的。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具体性，經過一个認識过程，在人的头脑中再現出来，就成为真理的具体性。

馬克思曾以研究資本主义社会生产是否可从分析人口着手的問題为例，來說明事物的具体性。他指出：人口是“一个丰富的、由許多規定和关系形成的总体”<sup>①</sup>。人口是由階級构成的，如果抛开人口所由以构成的階級，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不認識階級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資本之类，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这些因素又以交换、分工、价格

等为前提。譬如說資本，如果沒有雇佣劳动，沒有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必須具体分析构成人口的这一切因素，弄清它們之間的內在联系，那么，人口这一“渾沌的表象”才能变成一个丰富的、由許多規定和关系形成的总体。如果我們抛开了人口所由以构成的这許多复杂的規定，那么，它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东西。人口如此，其他任何具体事物也莫不如此；它們都是“許多規定的总结”或“多样性的統一”，都是“一个丰富的、由許多規定和关系形成的总体”。絕對單純的、孤立的東西是抽象的，因而在现实界是不存在的。

具体的东西虽然具有許多方面、許多規定，但这許多方面和許多規定并不是紛然杂陈的，它們实际上是許多彼此对立的方面；具体的东西就是由这許多对立面构成的。因此，具体的东西既可說是“多样性的統一”，又可說是“对立面的統一”。列宁說：“事物（現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統一。”<sup>②</sup>“任

① 《政治經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2頁。

② 《哲学筆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8頁。



何具体的东西、任何具体的某物，都是和其余的一切处于相异的并且常常是矛盾的关系中，因此，它往往既是自身又是他物。”<sup>①</sup>列宁这段话实际上就是把“具体的东西”规定为“自身”与“他物”两个对立面的统一。所谓“自身”，是指一事物的现存状态或性质。毛泽东同志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sup>②</sup>所谓事物的“自身”，也可以说，就是指这个规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谓“他物”就是指该具体事物的否定的、与“自身”相反的、不对该具体事物的性质起规定或决定作用的方面。

列宁关于具体的东西既是自身又是他物的定义告诉我们：一个具体事物的否定方面，是该事物自身内部的不可缺少的构成环节。形而上学不理解这一点，它总以为世界上的事物只能是单纯的：自身就是自身，他物就是他物，“非此即彼。”辩证唯物主义令人信服地证明，现实界并没有“非此即彼”、自身排斥他物的抽象事物，而只有“亦此亦彼”、自身包含他物的具体事物。

懂得了上面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要具体地、深刻地理解一个事物，就必须在该事物自身同它的对方的矛盾统一中去理解它；离开了该事物同它的对方的矛盾统一，而单纯地从它自身去理解它，则我们对它的理解只能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没有和它作对的另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例如，“生”和“死”是两个明显对立的现象，但两者又是互相关联的。“没

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sup>③</sup>“生”这个现象，并不是单纯的“生”，生物体的新陈代谢过程包含着一部分衰老细胞的死亡，所以“生”是包含自己的“他物”（对方）——“死”在自身之内的，“死”是构成“生”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要具体地、深刻地理解“生”，就要从“生”和“死”的矛盾统一中去理解，否则，我们对“生”的理解就是抽象的。又如，要具体地、深刻地理解资产阶级，也得从它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统一中去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个在本质上根本相反的阶级，决不可以混淆两者的界限，但它们又是互相关联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之为资产阶级，就在于它既需要无产阶级的存在，又需要剥夺无产阶级的生存权；所以，脱离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这种又斗争又统一的关系，而单纯地就资产阶级本身去看资产阶级，便不可能对资产阶级有具体的、深刻的理解。

总之，具体真理就是对客观事物的“许多规定的总结”或“对立的统一”的如实的反映。毛泽东同志在论述认识过程时说：“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

①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4页；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0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6页。



去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sup>①</sup>毛澤東同志在這里所說的論理的認識，也可以說，就是對於具體真理的把握。

\* \* \*

真理是具體的，是“多樣性的統一”；但是，要達到把握具體真理的目標，決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經過一個漫長曲折的認識過程。

客觀的具體事物，作為“一個豐富的、由許多規定和關係形成的總體”，擺在認識的主體——人的面前。人在實踐中必然要對它進行認識活動，它是認識的出發點；沒有它，就談不上認識，認識正是對它的反映。人在認識過程中，首先通過生動的直觀，看到它，聽到它，觸摸到它。所以馬克思說，這個作為“多樣性的統一”的具體事物，“在現實中是出發點，因此也是直觀和表象的出發點”<sup>②</sup>。

但是，通過生動直觀所能認識到的，還只是關於這個具體事物的表面的、現象的東西，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它還只是關於這個具體事物的總體的“渾沌表象”<sup>③</sup>；具體事物還遠未能作為“多樣性的統一”，即未能作為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的東西呈現於人腦之中。這時，人對具體事物的認識，還只是處於感性階段。

為了使我們的認識向着把握“多樣性的統一”這一目標接近，就不能停滯在生動直觀的感性階段，而必須發展到把握住事物的全體、本質、內部聯繫的理性階段。這

首先就需要進行“抽象活動”，也就是說，需要對生動直觀中所得到的“關於總體的渾沌表象”加以分析，以便把它分解為個別的、簡單的部分或方面，單獨地、逐一地加以考察。還是以馬克思所舉的人口一例來說明。馬克思指出，我們對人口的認識在開始時只有一個關於它的總體的“渾沌表象”，至於對人口所由以構成的各種規定性，如階級、雇傭勞動、資本等等，則尚無所知，這時，我們對於人口的認識便是很空洞的。為了使我們的認識向着把握人口這一作為“多樣性的統一”的具體事物的目標接近，我們就得進行“抽象活動”，對人口的總體的“渾沌表象”加以分析，分析出構成人口的上述各種規定性；隨着這種分析活動的進行，我們所把握到的事物的諸規定就越來越淺顯，越來越簡單。

但是，僅僅停留在這種“抽象活動”的階段，還不可能達到把握具體事物的目標。因為任何一個具體事物，決不是一些簡單規定的偶然堆集，而是作為“許多規定的總結”的總體，而“抽象活動”則不過是從這個總體中逐一地抽取其一部分，使它脫離和該總體其餘部分的錯綜複雜的聯繫，單獨地對它加以考察。當然，我們所進行的“抽象活動”，與形而上學意義下的“抽象”是有區別的。形而上

①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5頁。

② 《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3頁；中譯本未將這兩句譯出。

③ 同上書，第162頁。



学意义下的“抽象”是把事物看成为孤立的、片面的、互相割裂的东西。而我们则是把“抽象活动”当做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如果我们停留在“抽象活动”的阶段，即是说，只是对具体事物进行分解，将其各个规定或方面分别地、单独地加以考察，那么，我们不仅不可能对具体事物的整体具有全面的、深刻的认识，而且，由于尚未从这一方面与别的方面的联系与关系中去考察某一方面，因而也就难免对一个方面在整体中所处的地位认识不清，也就难免产生某种程度的形而上学见解。所以，为要把握具体事物，我们还必须再进一步把“抽象活动”中所得来的诸简单规定，按照它们在客观事物中本来的复杂关系，如实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即进行综合，使具体事物的整体呈现于头脑之中；可是这次呈现于头脑之中的整体，不再像认识开始时那样只是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丰富的、由许多规定和关系形成的总体”了。至此，我们就可以说达到对于具体事物的深刻的、具体的认识了。

我们的认识之从抽象到具体——从最简单的规定到具体事物作为“许多规定的总结”呈现于头脑之中，乃是一个逐步进行的过程。在“抽象活动”中所得出的最简单的规定（方面），是和具体事物的整体中的其余诸规定隔离开来的，因而也是最抽象的。以后，我们便逐步地使一个规定或方面与越来越多的其余的规定或方面，按照它们在客观事物中实际存在着的复杂关系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这样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的方面愈多，我们对

该具体事物的概念就愈具体。

关于这种从抽象一步一步地走向具体的思维过程，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具体事物的把握，就是从“商品”这一简单的、抽象的规定开始的。从“商品”出发，然后，《资本论》就进入到“货币”的概念，“货币”包括“商品”在内，但“货币”这个概念包含着“商品”和其他规定性的联系和关系，“货币”这个概念的内容比起“商品”来较为复杂，因而它也是一个比“商品”较为具体的概念。在论述了“货币”之后，《资本论》就进入到“资本”的概念，“资本”包括“货币”在内，但“资本”这个概念包含着“货币”和其他规定性的联系和关系，“资本”这个概念的内容比起“货币”来又较为复杂，因而它又是一个比“货币”较为具体的概念。《资本论》由“商品”到“货币”，由“货币”到“资本”，以至最后到达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把握；这样，资本主义这一作为“多样性的统一”，作为“一个丰富的、由许多规定和关系形成的总体”的具体事物——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便如实地呈现于我们的头脑之中了。

上面所说对直观中的“混沌表象”进行分析的活动，以及将分析所得出的简单抽象规定加以结合和统一的活动，即综合的活动，都是思维活动。我们所说的理性认识阶段，实际上也就是包含这两种活动在内的思维活动。思维活动，从一方面来说，不像生动直观那样与客观具体事物发生直接接触，而是“离开”



了具体事物；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思维活动使我们接近和把握具体真理，使具体事物呈现于人脑之中。所以这种“离开”，乃是以一种迂迴曲折的方式向具体事物接近和前进。列宁说：“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①

列宁这里所说的“抽象”，是指相对于生动直观的整个思维活动，亦即相对于感性认识阶段的整个理性认识阶段；他所说的“科学的抽象”，就是指的不脱离实际内容、不抛弃多样性的抽象。与“科学的抽象”相对立的还有形而上学的抽象，即把分析和综合割裂开来，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观察事物的方法。这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是认识真理的障碍。列宁之所以强调“科学的抽象”，就是要我们在思维活动中，把分析和综合结合起来，对许多不同的规定加以总结，从多样性中抽引出它们所固有的统一性。所以，只有科学的抽象才能更加接近具体真理，而不是“离开”具体真理，才能使具体事物作为“许多规定的总结”呈现于头脑之中，从而让我们“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 \* \*

具体事物虽然客观地存在于我们之外，但要如实地精确地认识它，要获得一个关于它的具体概念，却需要经过上述的过程。所以，具体事物决不是一开始时就呈现于思维之中的；具体事物之呈现于思维，乃是思维的过程和结果。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在思维中它（指具体事物——引者注）表现为总结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出发点。”② 那种以为具体真理可以在认识开始时就一下子把握住，而不需要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和综合的观点，是错误的。

简单接受了一个现成的正确的原则和结论，并不等于就算是真正把握了具体真理。黑格尔曾经举了文法做例子：文法本来寓于具体语言的“多样性”之中，但对于初学一种语言的人来说，文法乃是一个脱离了“多样性”的“统一”，是脱离了具体内容的结论和原则。因为他还没有学具体的语言，文法对于他是很抽象的，不过是些僵死的、空洞的骨骼。但是等到已经学习了该种语言之后，如果再回头来温习一下初学时老师所教的同样一些文法，那时，他就会对这些文法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就会觉得这些文法很具体。为什么同样的文法在初学时觉得它很抽象、很陌生，

①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1页。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3页。





而在学习了具体語言之后，又觉得它很具体、很亲切呢？这就是由于，在前一种状况下，它是脱离了“多样性”（具体語言）的“統一”，或者說是沒有经历过“多样性”的“統一”，而在后一种状况下，它則是包含了“多样性”在内或者說经历了“多样性”之后的“統一”。

黑格尔在举上述这个比喻时說道，真理（他把真理唯心主义地看成是“絕對理念”）“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包含着特殊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sup>①</sup>。列宁在《哲学筆記》中称赞黑格尔的这个比喻“微妙而深刻”，并且称赞黑格尔关于多样性的統一的概括是一个“絕妙的公式”。从列宁的这些摘引和批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們平常說的对某一个論断理解得很抽象，那就是因为我們还不知道这个論断（普遍性、統一性）所包含的实际內容（特殊性、多样性）；当我们說对某一个論断理解得很具体时，那就是因为我們已經知道这个論断所包含的实际內容了。

常常被大家提起的列宁讀拉薩尔的《爱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的事，也說明了这个道理。原来在列宁以前，馬克思已經讀过拉薩尔的这部著作，馬克思把它叫做“‘小学生的’作文”，认为“不值得一讀”<sup>②</sup>。但尽管馬克思的結論本身是从拉薩尔原书的实际內容中抽取出来的东西，当列宁尚未讀原书时，馬克思的結論对他來說，就是一个脱离多样性的統一，脱离了特殊性的普遍，列宁对这个結論的理解还是很抽象的。因此，当他认为在思想战綫上有必要时，

他便不辞劳苦去仔細閱讀拉薩尔那本又臭又长的书，并作了摘要。尽管他在讀完这本书之后所得的結論和馬克思的一样，即认为“拉薩尔的这本书不值得一讀”，但这个結論現在对列宁來說，已經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经历过多样性的統一，一个包含着特殊性的普遍，一个包含着具体內容的結論。

\* \* \*

在关于如何把握具体真理的問題上，有一种看法是极端錯誤的，这就是抓住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而无視那貫穿于其中的統一性、普遍性或总的原則；只不过看到事物的一个片面，甚至一个极細小、极不重要的片面，就把它当做全部真理。这只能叫做抽象看問題，不能叫把握了具体真理。

黑格尔在《誰在抽象地思維？》一文<sup>③</sup>中，曾經举了一些生动的例子來說明什么叫做具体的真理，什么叫做抽象的思維。我們挑其中一个例子來說說。一位女顾客对一个女商贩說：“喂，老太婆，你卖的是臭蛋呀！”女商贩恼火了，就大罵这位女顾客一頓：“什么？我的蛋是臭的？！你自己才臭哩！……你爸爸吃了虱子，你媽媽跟法国人相好吧？你奶奶死在养老院里了吧？……像你这样的女人，只配坐监牢！最好你还是补补袜子上的窟窿去吧！”总之，她把这位女顾客罵得一无是处。

① 轉引自列宁著《哲学筆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8頁。

② 参看上书，第385、402頁。

③ 見《学习譯丛》1957年第2期。



黑格尔认为，这位女商贩就是一个抽象思维的人，因为她不知道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具体的，都是多方面的统一；她对顾客的一切情况并不了解，仅仅因为顾客说了一句她的蛋是臭的，就抽象地把顾客当作一个坏人，从头到脚，从本身到亲属骂得全都沾上了臭蛋的气味；这位女商贩的思想方法，正是一种以一概全、抓住一个片面就认为是全部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就是“抽象思维”。

我国古代战国时期，魏将庞涓领兵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派著名军事家孙臆领兵救援。孙臆施了一个计策，命令齐兵进入魏地后，第一天做十万个灶，第二天减为五万，第三天又减为两万。庞涓看了，以为齐兵害怕魏兵，所以进入魏地三天就逃亡过半，于是猛追齐兵。追到马陵，中了孙臆的伏兵计，被打得大败，庞涓也自杀了。庞涓落得如此下场，就因为他仅仅看到减灶这个实质上并不重要的变动，即匆匆得出结论，认为“齐兵畏魏，入吾地三日，逃亡者已过半矣。”庞涓完全不考虑减灶这个变动在大的军情判断中起什么作用，有多大意义，只抓住一点，就轻率地做出大的结论。庞涓之智就在于他作了“抽象思维”，没有对具体事物做具体分析。

上面的例子说明了：不知道从整体看问题，从多样性的统一中看问题，抓住事情的一个方面，或者一种现象，就以为是事情的全部，这正是抽象思维，是片面看问题。我们平常所说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也就是这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当然是

不可能说出或把握任何真理的。

列宁所规定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是把握具体真理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列宁写道：“帝国主义是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上，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已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球领土瓜分完毕。”<sup>①</sup>“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sup>②</sup>。列宁所规定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这一具体概念，就是由这个定义中所包含的许多主要规定彼此有机地联系起来的一个整体。在这个概念中，列宁正是从各个方面、各个规定的统一和相互联系中，而不是从某一个片面来说明帝国主义的。反之，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考茨基所下的帝国主义的定义，就是片面的，因而也是抽象的。考茨基说：“帝国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愈来愈多地吞并或征服农业（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sup>③</sup>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这个定义是根本要不得的。因为它片面地、武断地单单强调了一个民族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就其本身以及它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武断地、错误地把这个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9页。

②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3页。

③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0页。



問題單單同兼并其他民族的那些國家的工業資本聯繫起來，又同樣武斷地、錯誤地強調了兼并農業區域這一點”<sup>①</sup>。從列寧對考茨基的定義的批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理的具體性就在於它的全面性；片面性是與具體性不相容的。

任何總的、普遍的原則，都是從具體事物中概括出來的具體真理。人們對具體事物進行概括，得出某個總的、普遍性的原則，也就是得出了某個具體真理。這個總的、普遍性的原則又可以指導我們去認識具體事物。當我們運用這個原則時，必須結合當前特殊的、具體的情況和條件，對具體事物作具體分析，使總的、普遍的原則具體化；如果不顧當前特殊的、具體的情況和條件，生搬硬套這些總的、普遍的原則，那就是把普遍原則變成不可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就是抽象地對待具體真理。這當然是不對的。但是，在聯繫當前特殊情況和條件來運用總的、普遍的原則時，也一定要從多樣性的統一中看問題。客觀事物中所包含着的許多方面並非都居于同等地位，都具有同樣意義。它們中間總是有些方面對於總的原則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具有本質的意義，這些方面如果有了改變，總原則也要隨之加以修改；可是另外也有許多方面對於總原則只有非本質的意義，其所起的作用並不重要，它們的改變並不影響總原則。我們說對具體事物要作具體分析，這就是要我們從多樣性的統一中看問題，看看當前特殊的具體情況和條件在總體中占居什麼地位，具有何種意義。如果它們是起決定性作

用和具有本質意義的方面，那誠然要適應當前特殊的、具體的情況和條件，對舊的原則作適當的修改；不這樣做，不能算是認識了真理的具體性。但如果當前特殊的情況和條件在總體中並不具有本質的意義，那麼，儘管表現總原則的形式可以有所不同，却並不因此而影響總原則的現實性和有效性。如果因為一點不重要的特殊情況和條件的變動，就據以改變總的原則，這也只能叫“抽象思維”，決不是什麼對具體事物作具體分析。

一切新老修正主義者對帝國主義的觀察，就犯這種“抽象思維”的毛病。他們總是看到帝國主義發展中的某些變動，就作出或者實際上作出帝國主義的本質、本性已經改變，帝國主義的根本規律已經改變的結論，並且按照這種觀點去制定策略。列寧說，修正主義者總是“把資本主義發展的某種特點或某一‘教訓’加以誇大，發展成片面的理論和片面的策略體系”<sup>②</sup>；自以為把握了真理的具體性，實際上這是對具體真理的嘲弄。

總之，要想把握具體真理，必須在多樣性中發現其間的統一性，必須從一個方面與其他諸方面的錯綜複雜的聯繫和關係中看問題。根據一個片面便遽爾得出普遍結論，看到一個細小變化便據以改變總的原則，這種方法，貌似具體看問題，實際上是形而上學的“抽象思維”，是我們應該避免的。

①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0頁。

② 《歐洲工人運動中的分歧》。《列寧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7—348頁。



# 論自然科學研究中 有關實踐標準的若干問題

·何祚庥·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實踐在人的認識活動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社會實踐是人的認識的源泉，是實現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這一飛躍的基礎，也是檢驗認識是否正確的標準。社會實踐有各種各樣的形式。毛澤東同志指出，“人的社會實踐，不局限于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各種其他的形式，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sup>①</sup>。對於自然科學的發展起着直接影響的是生產活動和科學活動。生產活動不只是向自然科學的發展提出種種需求，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提供物質基礎，而且也直接地影響認識自然界的過程。毛澤東同志寫道，“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係”<sup>②</sup>。在古代社會中，自然科學知識的積累，大多數是通過物質的生產活動而獲得的。只是當“工業巨大地發展起來，並產生了很多力學上的（紡織、鐘表製造、磨坊）、化學上的（染色、冶金、釀酒）、以及物理學上的（透鏡製造）新事實，這些事實不但提供了大量的可供觀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給與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實驗工具，並使新的儀器的製造成為可能。可以說這時候才第一次可能有真正

的系統的實驗科學”<sup>③</sup>。

從生產活動中分化出專門以系統研究自然界為直接目的的科學實踐活動，是社會分工進一步的發展，也是人類對自然界認識的一種進步。因為這類活動得以更系統、更深入、更精細地研究自然界，從而擴大了人類實踐活動的範圍。自然科學的實踐活動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科學實驗，另一類是科學觀察。科學實驗的特點在於它能挑選出生產過程或自然界中的典型現象，安排在人工所能控制和改變的條件下，尽可能地強化所要研究的有關現象，排除那些次要或無關的因素，使用實驗儀器、測量工具等，對不同條件下的自然現象變化規律進行精細的研究。科學觀察也是實踐的一種。列寧曾特別指出實踐“應當也包括天文學上的觀察、發現等等的實踐”<sup>④</sup>。科學觀察的特點在於它在不改變自然條件的情況下，挑選出自然現象中的某一部分，有時使用若干輔助的設備，按照一定的目的，系統地對這些現象進行觀

①②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1—272、271頁。

③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0頁。

④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頁。



察、記載、描述或把它拍摄下来。由于这类科学观察活动是有系統有目的地进行的，并有科学仪器作为輔助，因而較之人們的一般观察更能深入一步，更能发掘出現象的内部联系。当然，科学实验和科学观察这两类科学活动实际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在实验过程中，必然要对实验中产生的现象进行观察。在观察活动中有时也要用某些实验仪器作为輔助的工具。总之，这两类科学活动都是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在有些部門中，实验研究的比重大一些，如物理学和化学。在有些部門中，科学观察的成分較多一些，如天文学、解剖学方面的研究。

科学活动在发现和发掘事物的規律性方面，比起生产实践确有便利的地方。但在解决实际生产中的技术問題时，如果只依賴实验活动所积累的知識，却是不够的。特別在較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各种实际因素較多，在实验活动或科学观察中，常常不能对这些具体因素一一进行詳尽无遺的研究，因而由科学实践得出来的具体結論，便不一定能够直接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也就是說，科学活动仍有局限性，它并不能代替生产活动本身。人們在具体解决这类問題时，还常常需要把生产活动和科学活动結合起来。

### 社会实践是自然科学中 檢驗真理的客观标准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判断真理的客观标准問題是很早就提出来的了。然而直到馬克思主义出現以后，这个問題才第一次真正科学地得到解决。馬克思主义第一次提出社会实践是檢驗自然科学理論是否符合于客观实

际的标准。离开了这种实践标准，就很难判断自然科学理論是不是客观真理。毛澤东同志指出，“許多自然科学理論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們創立这些学說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sup>①</sup>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坚持应用馬克思主义所主張的实践标准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唯心主义者常常散布这种或那种不可知論的观点，宣揚科学真理是不能被認識的。例如，在有机化学发展初期，曾广泛流行有机化合物是不能人工合成的观点，认为有机化合物是有机体的产物，而有机体的生命现象是不能認識的。在天文学上，唯心主义者孔德曾断言星球上的物质成分不能被人認識，因为人們无从获得进行化学分析的材料。在物理学上，又有若干馬赫主义者否认原子的实在性。甚至在现代的心理學文献中，有时也还出現心理活动規律不能被人認識的論点。对于唯心主义者的这种不可知論，恩格斯曾指出，“把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謬論駁斥得最彻底的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对于有机化学上的不可知論，他又駁斥道，“例如拿茜草的色素——茜素來說，我們現在已不是从生长在田野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簡單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sup>②</sup>。实际上，原子論已經为现代物理学的实践所充分证实。天体上包含的物质成分已由光譜分析所

①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1頁。

② 《费尔巴哈与德國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版，第15頁。





判明，并发展了天体化学这一門科学。至于大脑神經活动，正是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現在虽只是初步地了解到它的若干規律性，但人們經過科学实践也将最終地闡明它的規律。自然科学每前进一步，总是把这种“自在之物”轉变为“为我之物”。彻底駁斥自然科学中唯心主义者的不可知論的最好办法，便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实践。

馬克思主义者所主張的实践标准，和馬赫主义者所主張的“只有效果才能区分認識与謬誤”、实用主义者宣称“有用即真理”等等观点，存在着原則的區別。对这类錯誤观点，列宁进行了有力的批評。列宁指出：对于唯物主义者，人的实践的“效果”证明着我們的表象与我們所感知的物的客观本性之符合。对于唯我主义者，“效果”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正因为馬赫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把“效用”理解为他們的主观效用，因而，在他們看来，自然科学的真理，是随着他們的主观效用而轉移的。这样就完全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标准。

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一方面坚决反对不可知論，另一方面又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划清界限。不可知論者否认人們有認識客观真理的可能，从而完全取消了自然科学探討客观真理的职能。实用主义者宣揚真理的主观性，从而否认了判断自然科学是否为真理有客观标准。只有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才能提供正确的真理观，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

### 实践标准是邏輯证明的基础

“辯证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实践提到第一

的地位，认为人的認識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認識离开实践的錯誤理論。”<sup>①</sup>判断自然科学的理論是不是客观真理，同样也要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但是在自然科学工作中，有一类工作看来并不是直接由实践来檢驗它們是否正确，而是用邏輯方法或演繹方法来证明。特别是在数学、理論物理和理論天文学中，常常从一些定义、定理、公理或已知的基本定律出发，运用邏輯推理而导出某一理論系統。那末，这种研究方法是否脫离了实践标准，違反了“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的論点呢？

应该指出，在所有的自然科学理論中所使用的一切概念，不論它是由实验事实总结出来的定律，或是在科学证明过程中所下的定义等等，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不論这些定义、定理、公理和人們的日常經驗距离得多么远，甚至有些乍看起来还和人們的日常經驗相矛盾，然而它們总是一定的现实关系的反映。离开了社会实践，这些定义、定理、公理也就不能形成。

在数学里面，这种邏輯推理的方法运用得特別突出，因而唯心主义者总爱从数学中举出例子，以便证明科学并不是实践的产物。例如，唯心主义者康德认为“严格的数学命題都永远是先天的判断，而非經驗的判断，因为它们具有不能来自經驗的必然性”<sup>②</sup>。

唯心主义者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錯誤的。恩格斯曾就数学和实践的关系，作了充分的

①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3頁。

② 《純粹理性批判》。《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学》，商务印书館1960年版，第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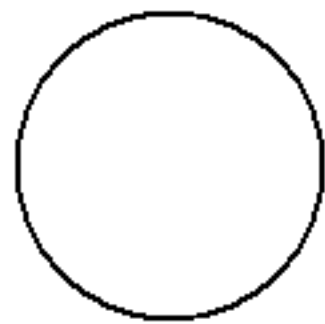
論證。他指出，“和數的概念一樣，形的概念也完全是從外面世界得來的，而不是在頭腦中從純粹的思維中產生出來的。要能達到形的概念，先應當存在具有一定形狀的物體，而且應把這些形狀拿來比較。純數學是以現實世界的空間的形式和數量的關係——這是非非常現實的資料——為對象的。這些資料表現於非常抽象的形式之中，這一事實只能表面地掩蓋它的來自現實世界的根源。可是為要能夠在其純粹狀態中去研究這些形式和關係，那麼就必須完全使它們脫離其內容，把內容放置一邊作為不相干的东西；這樣我們就得到沒有面積的點，沒有厚度和寬度的綫， $a$ 和 $b$ ， $x$ 和 $y$ ，常數和變數；……甚至在數學上的量的相互演算似乎是先驗的，也並不證明它們的先驗的來源，而只是證明它們的合理的相互關係。矩形以其一邊為中心而旋轉得到圓柱形，要得到這樣的觀念，那麼先就須要研究一定數量的現實的矩形和圓柱形，雖然是形式極不完全的矩形和圓柱形。……和所有其他的思維領域一樣，從現實中抽象出來的規律，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就和現實世界相脫離，並且作為某種好似獨立的东西，好似從外面來的規律——世界應當與此規律相適合——而與之相對立。在社會和國家如此，在純數學上也正是如此，而不是別的樣子，它也是往後被應用於世界上來的，雖然它是從這一世界得來的，並且僅僅反映世界聯繫形式的一部分——僅僅因為如此，數學才能被一般地應用。”<sup>①</sup>

在討論到數學中的數學公理為什麼會帶有“不證自明”的性質時，恩格斯曾深刻地分析道：“現代自然科學已經把全部思維內容起

源於經驗這一命題擴展了，以致把它的舊的形而上學的限制和公式完全推翻了。因為承認了獲得性的遺傳，近代自然科學便把經驗的主體從個體擴大到種：每一個體之必須親自去經驗，現在不再是必要的了；它的個別經驗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由它的歷代祖先的經驗的結果來代替。如果在我們中間，例如，數學公理對於每個八歲的小孩都似乎是不證自明的，都無須用經驗來證明，那末這只是‘積累的遺傳’的結果”<sup>②</sup>。

在以上這兩段論述中，恩格斯對於數學上的概念、定義、定理或是公理和客觀現實世界的關係，它們的經驗基礎等等，都作了透徹的說明。他還特別指出，數學公理之所以似乎帶有不依賴於自身經驗的“不證自明”的性質，也只是“積累的遺傳”的結果。

在數學證明中常使用的邏輯推理方法，也有和數學中定義、公理等相類似的情況。列寧指出，“邏輯形式和邏輯規律不是空洞的外殼，而是客觀世界的反映”<sup>③</sup>。實際上，任何一個邏輯推理過程，都是自然現象中客觀聯繫在思維中的一種有條理的復寫。所謂邏輯關係，就是事物的客觀聯繫中某種帶有普遍性質的聯繫的反映。這也就是說，這種聯繫不只是在某一個別現象中才具有，而且是在很多的現象中，都存在有類似的聯繫。這樣，人們在思維中便以邏輯的形式反映出這種帶有普遍性質的聯繫。例如，三段論式就是反映了事物的種和屬的包含關係這種聯繫，而以一系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38頁。

② 《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4頁。

③ 《哲學筆記》。《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2頁。



列的特称判断、全称判断的形式组合起来。这种逻辑格式是在千百万次的实践中形成的，而且也是由实践证明它的正确性。列宁指出，“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sup>①</sup>。从逻辑学的教学过程中，可以看出逻辑格式确是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逻辑的格式，由于它比起初等数学中的公理更抽象一些，所以初入学的儿童是难于领会的，这是因为他们自身还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也还没有来得及从父兄那儿去继承这种经验的缘故。黑格尔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逻辑对于刚开始研究逻辑以及一般地刚开始研究各种科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而对于研究了各种科学又反过来研究逻辑的人说来则是另一回事。”列宁称赞黑格尔的这个说法是“微妙而深刻”<sup>②</sup>。逻辑学的教学经验表明，只有当人们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才能深刻地了解这种逻辑格式的正确性，并且只有在思维活动中反复运用，人们才有可能正确掌握这种三段论的格式。

从以上说明可以看出，不论是在使用逻辑证明方法中作为前提的定义或公理，或者是演绎逻辑本身，都是以经验为基础，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在这里，所有的证明仍要归结到实践标准，实践仍然居于第一的地位，只是它们以一种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进行论证的前提是正确的，并且逻辑推理的运用是严密的，那末所得到的结论就一定是符合现实的。

然而，在实际科学研究活动中，并不能常常完满地实现上述逻辑推理的过程。因为

在逻辑思维过程中，由于经验材料的不足，论证的前提并不容易保证它一定正确；由于思维能力的限制，逻辑的推理也不容易立刻就做到周密，所以在实际的认知过程中，总是采用了实践——认识——实践的形式。否则，研究就不能深入，思想也不会丰富。即使在数学的研究中，数学家在研究量的问题时，也仍然要采用实践——认识——实践的形式，只是最后叙述它的结果时，才以较简练的逻辑推理的形式表达出来。当然这也不排斥在对一个较简单的事物或对其中某一片段的认知过程中，由于经验材料十分充分，因而有可能直接运用这种推理方法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或者对于某些演绎推理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当经验材料也是十分完备时，对某些较复杂的事物，有时也能运用推理方法而直接写成为数学证明的形式。

数学科学的证明和经验科学的证明，都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数学证明中不需要把直接的经验材料吸收于证明过程之中，而只是通过科学的基本概念、定义和公理中所概括的经验总结来实现它的证明。在经验科学的证明中，除了它也要运用基本概念、定义中所包含的经验总结以外，还必须把直接的经验材料吸收到证明过程本身中去，有时还需要直接返回到经验材料。实际上，这两种证明方法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经验科学中，常常会包含或部分地包含有类似数学证明的演绎推理，这在物理学和力学中是相当普遍的。而在数学中，有时也直接引用经验的事实（当然

①②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3、97页。



只是数学上的“事实”)，如数学归纳法。特别是在早期的数学证明中，严格的公理化体系尚不能立刻建立，因而在证明中便常常包含有直接反映实践基础的“直观”的成分。但不论科学证明采用哪一种形式，实践始终是科学证明中第一的和最基本的标准。

### 实践标准在自然科学的证明中的具体运用

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研究工作中具体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基本原理。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又说，“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sup>①</sup>。

举例来说，达尔文在研究生物进化论的同时，提出“从猿到人”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正确还是错误，应该由实践来判明。当然，由实践来重复这个进化史上的“从猿到人”的过程，是做不到的。但是达尔文却提出这样的预见，假如“从猿到人”的假说是正确的，那末在地下发掘的材料中，便应当发现有中间过渡现象，即有所谓“类人猿”遗骸的存在。后来，地下发掘材料果然证实了这一点。这就是说，把达尔文的“从猿到人”的理论，应用于地下发掘的实践，而实践果然“达到预想的目的”，因而证明了“从猿到人”的理论是正确的。

上述这个例证说明了实践检验自然科学理论的一般原则。但是在科学工作中，有时

却会发生一些复杂情况。例如，在科学工作中，有些人也希望通过一些实验，来推翻一些现在公认为正确并且经过大量实践证明的理论，如能量守恒定律、量子力学的定律等等。甚至从初步的实验结果看来，似乎已经得出和这些定理、定律的预测不相符合的结果。那末，是否实践已经证明这些理论观念包含着错误呢？怎样来解释这些“实验”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实验之间的矛盾呢？这涉及在科学证明过程中运用实践标准的若干较具体的问题。

实际上，这里的问题是在于实践“证明或驳倒”某一科学理论时，要求满足一系列严格的条件，而在不满足这些条件时，所谓“证明”或“驳倒”便常常是一种假象，因而有时便产生一些看起来是矛盾的现象。

首先，在应用实践标准于科学理论的检验时，必须要求科学实践，具体说来就是科学实验和科学观察，不包含有科学上的错误。只有当科学实验或科学观察进行得正确的时候，才能做出可靠的结论。实际上，在一两次没有经过科学分析和检验过的“个别”的实验结果或对“反常”的事例的观察中，往往可能包含着科学上的错误。在科学工作中，我们是非常重视这种反常的例外事件的，因为这类事件里含有新的发现的可能。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反常”事件其实是并不反常的，它往往是由于实验工作中某一方面的疏忽而造成的结果。因此，在处理这类事例时，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然而即使对实验工作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态度，仍可能产生

<sup>①</sup>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1—28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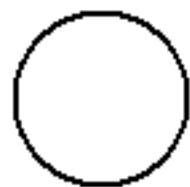
錯誤。在科學史上，常發現有錯誤的實驗。舉例來說，在前幾年從 $\pi$ 介子對核子散射的實驗里，發現實驗結果和由微觀因果律出發所預期的實驗結果有所不同。因而有一些人就由此做出微觀因果律不適用於微觀世界的結論。然而曾幾何時，卻發現原先賴以作為根據的實驗做得不夠準確，而新的、更準確的實驗卻證明微觀因果律仍是正確的。但是，當時確有一些人在上述錯誤實驗結果的影響下，作推翻微觀因果律的嘗試。當然，這類企圖不僅在科學上缺乏根據，從哲學上講也是不正確的。以上這個實例可以提醒理論工作者，對於實驗材料應採取批判的態度，必須以可靠的實驗材料作為理論工作的出發點。

第二，有時科學實驗和科學觀察雖作得很正確，也還不一定保證能判明某一科學理論是正確還是錯誤。在科學史上也有由正確的實驗做出了錯誤結論的例子。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原子核物理的研究里，發現由 $\beta$ 衰變產生出來的電子能量要小於由原子核釋放出來的能量。這個實驗結果是經過小心檢驗過的，是正確的。於是有一些理論物理學家便據此而做出了能量守恆定律在微觀世界裡被破壞了這樣一個重大的結論。這個結論當然是十分“驚人”的。能量守恆定律不僅僅在宏觀世界裡有深厚的實驗根據，在微觀世界領域內也有大量實驗的證明，而且它還是哲學上運動不滅定律的科學基礎。為什麼在 $\beta$ 衰變的過程裡會產生這種“反常”的現象呢？進一步的研究表明，原來這裡並不是能量守恆定律受到破壞，而是由一個中性的不帶電的中微子帶走了能量。只是在當時的

實驗條件下，很難直接觀察到這個看不見、摸不着的中性粒子。由此可見，由實驗事實來“證明或駁倒”一個理論，並不是一件直截了當的事情，中間常要包含若干複雜的過程，特別是在引用實驗材料來檢驗理論的過程中，一定要把實驗事實和理論的分析結合起來。

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標準中，要求把實驗事實和理論分析結合起來。這當然不是意味著脫離了實踐標準而走向“理論標準”。馬克思主義從來是主張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這也就是說，理論必須聯繫實踐，而實踐也必須以理論為指導。實踐要以理論為指導，這一點正是馬克思主義和經驗主義相區別的地方。事實上，一個科學實驗的進行，總是為了解決某一自然現象中這個或那個弄不清楚的問題。具體說來，它總要驗證有關這個自然現象的各種可能的假說中哪一個是更接近於真實的。為了弄清楚這些問題，必須在實驗安排上照應到不同觀點，而這就必須同時進行理論分析。只有當科學實踐和理論分析結合起來，才能充分發揮實踐驗證真理的作用。

第三，在引用實踐材料來檢驗自然科學理論時，除了要把實驗事實結合理論分析以外，還必須要求由實驗結果到引伸出科學結論之間，在邏輯上是完整而沒有漏洞的。形式邏輯的知識告訴我們，由大前提和小前提可以導向新的結論。假如導向結論的推理過程是正確的，而實踐卻證明結論是錯誤的，那末它所依據的前提必有一個是錯誤的。但假如實踐證明結論是正確的，那末即使在推理上沒有錯誤，却並不能由此就作出兩個前



提都是正确的結論。因为也有可能由其他前提导出这一个結論。因此，在引用經驗材料来证实某一理論时，必須看到其中在邏輯推理上能否提供这种确切的判断。

相傳在十九世紀上半叶在法国科学院的某一次年会上，数学家泊松和物理学家佛累涅尔之間，就光的波动和微粒的学說展开一場爭論。佛累涅尔是光的波动学說的奠基人之一，而泊松却是微粒学說的拥护者。在年会上，两人各自提出他們的論据。泊松用来反駁波动学說的一个重要論据是：如果由佛累涅尔的波动学說出发，应该做出下面的一个推論，就是利用波动学說的数学公式，可以計算出一个点状光源所放出的光可以繞过一个小圆盘而焦聚在圆盘后面暗影中的中央；但在泊松看来，这个推論，是和光的沿直綫进行的現象相矛盾的，因而便据此指出波动学說的錯誤。然而不久，佛累涅尔却按照泊松所指出的这个推論，做了一个实验，实验結果表明圆盘暗影的中央果然存在一个亮点。看来，波动学說已經取得了胜利。然而，泊松并不因此就承认波动学說的胜利。因为这个現象也可以用微粒学說来解释。按照微粒学說的原理，光的微粒在走过圆盘的边缘时，将受到圆盘边缘的吸引力，而改变了前进的方向，因而最后也将焦聚在某一亮点。圆盘衍射的实验固然說明波动学說是正确的，但它却并不能排斥微粒学說的正确性。<sup>①</sup>由此可见，即使某一实验結果已經证实了由某一理論引伸出来的預想的結論，但在邏輯的分析上，由另一个理論也可以解释这个現象时，

实践仍难从两种理論之中肯定哪一个理論是正确而无誤的。

初看起来，由实践来推翻一个定理或定律，可能比证实某一定理、定律要容易一些。形式邏輯的知識告訴我們，证明一个全称肯定的命題要考虑到所有的实际情况，而推翻一个全称肯定的命題却只要一个简单的“例外”就行了。但实际上問題并没有这样的简单。因为要推翻一个全称肯定的命題，就必须肯定一个新的和这个命題相对立的实验事实。而在肯定一个新的实验事实过程中，仍然必須要清洗有关这个实验事实的各种假說。例如，我們在前面举出的对于 $\beta$ 衰变放出电子能量测量的实验中，解释这类現象最简单的假說便是：电子由于碰撞或輻射等等原因，损耗了能量，因而实验上所观察到的能量不守恒只不过是能量的轉移而已。为了要排除这种假說，当然就得重新設計实验，重作測量。直到后来，实验上采用了直接測量 $\beta$ 衰变过程中放出的热值的办法，也就是說，把所有电子的能量，包括它轉移为別种形态的能量，都測量在內，这样，才把上述这些简单的假說排除了。但是它仍然不能排除最后一个假說，即可能存在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中性粒子。进一步的实验却证明这个假說是对的。由此可见，由新的实践来推翻一个全称肯定命題时，也同样要求邏輯上的完整性和排它性，在这里，只运用形式邏輯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

<sup>①</sup> 参看庫德耶符捷夫：《物理学史》第1卷，国家教育出版社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12頁。





第四，在运用实践标准于科学证明时，有时还会遇到不同的实验结果似乎是相矛盾的情况，就是这一类实验支持这一个理论，而另一类实验又支持另一个相反的理论。例如，在光的波动学说对于牛顿的古典的微粒学说取得了胜利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光的量子学说。在波动学说和量子学说并存的时候，一方面有光的干涉、衍射、折射等实验支持光的波动学说；但另一方面又有光电效应、光在自由电子上的散射、联合散射等一套实验支持光的量子学说。现代的原子的理论也有类似的情况，一方面在满壳层原子核附近有一系列实验支持所谓“壳层模型”，另一方面大变形原子核附近却又有一堆实验支持所谓“综合模型”。此外，也还有其他核模型，如“超导模型”、“集团模型”、“非轴向对称模型”等等，都各自有它的实验基础。这样，由实验来判明理论正确与否的课题，就变得很复杂了。

此外，不论实验或是理论，都是在不断发展中的。在科学史上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形，初看起来一个实验已能驳倒某一个理论，但由于科学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在这个理论中又发展出新的因素，从而又能完满地解释这个实验事实。有时一个实验结果看来是支持某一理论的，但进一步提高了实验精确度以后，却又发现这个实验原来是反对这个理论的。

正因为存在着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在科学史上才出现了那么多的“笔墨官司”。甲说，“我的实验如何驳倒了那一个理论”；乙说，“不行，你的实验中有一些因素考

虑得不周全，或理论上的根据不充足”，等等。这类争论是极多的，有的争论甚至延续了上百年。所以，由实践来判明某一理论的正确或错误，必须照顾到种种复杂情况。把科学证明的任务简单化，就只会导向错误。事实上，当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各种矛盾现象将进一步展开，理论和实验材料之间的尖锐冲突进一步明朗化。这时，常常会找到若干“确证”，提出一些足以肯定地判明是非的实验，或者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它能概括所有相矛盾的那些实验事实。例如，在早期的光的波动学说和微粒学说的争论中，佛累涅尔在科学问题的辩论上虽然取得了优势，但波动学说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只是到后来，佛累涅尔又进行了一个由两面镜子同时反射一个光源而发生干涉现象的实验，这种现象已不能用牛顿所主张的微粒学说来解释，这样，由于实验上提出了这种“确证”，所以波动学说才对微粒学说取得了胜利。对于后来的光的波动学说和量子学说之间的矛盾，一直到量子电动力学发展起来以后，才从理论上统一地加以解决。在量子电动力学的理论中，它一方面吸收了量子理论中的重要精髓，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波动学说中的合理部分，统一地用一组算式来处理光的量子的和波动的性质，因而它不仅能解释上述所有各个实验，而且能定量地计算出各个实验结果，预言新的现象。这样，光的量子学说和波动学说，就发展到更高的理论阶段。然而在原子核理论方面，直到现在还没有能结束上述各种模型争鸣的状况，尚





有待于原子核物理学家的努力。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科学工作者常常喜爱从事一些足以进一步尖锐地揭发理论和实验之间的矛盾的实验工作和理论分析，或者进行足以肯定地判明是非的实验，和结束纷争局面的理论研究，这是一种推动科学研究前进的重要方法。这类工作有较大的科学价值，常常能使自然科学的理论走向新的更高的水平。

### 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列宁在论述实践标准时，首先肯定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同时，他强调指出：“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sup>①</sup>他一方面指出实践标准有绝对性，足以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不可知论之间的界限，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实践标准有相对性，告诫我们不要把实践验证过的知识看作是“绝对”的。

认识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是有重要意义的。

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是说：科学研究工作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确证只是相对的，它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的近似程度内，一定的意义上，确切地证明某一理论是正确或是错误，或理论中的哪一部分是正确，哪一部

分却含有错误。

为什么实践标准具有这种相对性呢？任何理论都只是客观实际近似的反映或模写，任何实践总是在一定空间、时间和一定条件下的具体实践。具体实践是要随着整个社会发展的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因而由具体实践概括出来的普遍理论就并不一定具有那样的“普遍性”，它要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变化，而在每一阶段上的理论认识只能是近似地反映着现实的相对真理。

科学史上有不少理论随着实验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生变化的事例。例如，在化学元素论的发展上，普洛特曾提出一切元素都是由氢做成的假说，并认为它们的原子量都是氢原子量的整数倍数。在当时确有若干实验事实支持这一论断。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却发现有很多元素的原子量并非是氢的整数倍数。因而普洛特的假说，就被搁置在一旁了。但是，后来又发现原来所谓化学元素的这些原子，实际上并不是单一的，它包括好多个化学性质相同但重量不同的同位素，而这些同位素的重量却是氢原子的整数倍数。这样，实验又转回到支持普洛特的假说。但是，更精确的实验又表明，这些同位素是氢原子重量的整数倍数也只是近似的，实际上，它们有微小差异。其原因是因为组成这些同位素的，除了有氢原子核以外，还有中子，并且它们有不同的结合能。因此，近代关于原子

<sup>①</sup>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2—143页。



结构的学說，又进一步发展了普洛特的假說，但是它的具体形态比起普洛特的原始模型大大地不同了。

由普洛特假說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出，自然科学上理論观念的变革，常是很激烈的。在不同水平的生产实践基础上，便建立起不同的自然科学理論。每一种理論都只是近似地反映着客观实际。不过，仔細分析起来，可以看出，早期有关原子量测量的化学实验并没有能充分证明或駁倒普洛特假說。因为那时对于一个元素究竟只包含一种原子或几种原子的問題，还没有弄清楚。可以說，这方面理論观点变化得如此激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科学研究不够深入（实际上是当时实践水平的限制）而引起的。但是就拿已有充分科学根据的理論来說，仍然可以发现这些理論只是相对正确的。例如，牛頓力学在人們日常生产实践中、科学实验和科学观察中，确实得到大量的实践证明它为正确。但到了人們能处理那些速度能接近于光速的粒子以后，却由新的实践表明，在高速运动下牛頓力学要作相应修改而发展成为相对論。而过去实践所证明的牛頓力学仍然只是在一定条件下近似正确的相对真理。由此可见，对于那些已有大量科学实践证明它为正确的理論，我們仍应持批判的态度。問題在于人們的实践总是具体的实践，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尽有可能出現新的实践条件，在这种新的实践条件下，原来的理論就可能显得陈旧。因此，我們在科学工作中必須看到实践标准的这种相对性，不应抱迷信

的态度。

当然，这并不是說，实践根本不能证明或駁倒任何理論。实践标准仍然有绝对性的一面。实践仍然是判断自然科学理論是否为客观真理的标准。这种判断，仍然可以和不可知論及相对主义划清界限。凡是經過实践檢驗的科学理論都是客观真理，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特别是那些已有大量的科学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論，所包含的绝对真理的成分也就越多。这种已經有大量实践为基础的绝对真理的成分，是不会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消失的。新的实践只会丰富或发展这一科学理論或者进一步給这个理論划定它所能适用的界限。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論固然代替了牛頓力学，它指出牛頓力学中不足之处，但它同时又证明了牛頓力学在物体运动速度比光速小很多的条件下，仍是客观真理，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相对論只是更精确地为它規定了适用的范围。

由牛頓力学发展为相对論的这个事例，可以用来很好地說明自然科学理論中的继承关系。相对論并不是简单地廢除了牛頓力学，相反地，而是把牛頓力学概括在内，作为它的一个特殊情形。当物体的运动速度变成緩慢时，相对論就自动地还原为牛頓力学。也就是說，在速度較緩慢的条件下，牛頓力学仍然作为客观真理而被保留了下来。可以說，那些經過大量实践檢驗过的自然科学理論的变化和发展，常常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原因是在于这些理論确实有实践的根据，它虽然只是近似地反映着客观实际，但其中却包



含有絕對真理的成分。自然科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必須把這部分繼承下來。因此，當我們對前人的工作進行批判的審查時，必須對它的實踐根據有充足的估計。假如我們的科學實踐仍然處在前人的實踐所達到的範圍以內，那就不可能期望在這個範圍內推翻任何自然科學上的定律（除非前人工作包含有錯誤）。例如，在原子光譜、分子光譜的領域中，在一定的實驗精確性的範圍內來推翻量子力學的定律，在有限世界內“創造”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永動機等等企圖，是不可能實現的。實際上，這就是企圖否認實踐標準的絕對性，否認實踐檢驗過的相對真理中包含有絕對真理成分，而這將導致從根本上否定客觀真理的存在，從而陷入不可知論和相對主義。

在自然科學上，看來也確有一些基本定律曾被“推翻”過，如宇稱守恆定律。但是，宇稱守恆定律之所以被“推翻”，並不是因為過去的實驗曾經證明它正確，而現在的實驗卻證明它是不正確的；實際上，這裡並不是宇稱守恆定律被推翻，而只是看起來似乎是在弱相互作用過程中被“推翻”。經過仔細的理論分析，發現過去表面上似乎證實的“宇稱守恆定律”，在弱相互作用過程里卻並沒有實驗的根據，也就是說，實踐從未證明過“宇稱”在弱相互作用過程里守恆。而相反，當時卻有一些不太確定的實驗現象似乎說明弱相互作用過程內宇稱可能不守恆。這樣，一些理論家就建議進行足以確切證明它守恆與否的實驗，來加以檢驗。而實驗的結果却

表明弱相互作用過程內宇稱是不守恆的。因此，所謂宇稱守恆定律被“推翻”，實際上恰好是由新的實踐為宇稱守恆定律規定了新的應用範圍。曾經由大量實踐證明的如在電磁相互作用過程內，宇稱卻仍是守恆的。至於包含奇異粒子在內的強相互作用過程，宇稱是否守恆的問題，由於現有實驗材料尚不夠充分，暫時還不能作出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判斷。弱相互作用過程內宇稱守恆定律被破壞的這個事例，說明進行科學理論工作時一刻兒也不能脫離實踐標準。切不可把已經有實踐證明的理論當作是還沒有證明的，也不可把未經實踐檢驗過的“假說”，當作已有實踐證明的理論。如果離開了實踐標準這個工作中的指南針，那末我們在理論上將得不到任何可靠的結果。

總之，科學理論是在實踐不斷豐富和變化的基礎上發展着的。實踐不斷地批判那些陳舊了的科學理論和學說，新的理論又在繼承舊理論的基礎上不斷從實踐中吸取營養資料。如此不斷地循環不斷地創造，科學也就日新月異。而自然科學每前進一步，都離不開實踐，都要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在引用實踐標準於自然科學理論的檢驗時，必須注意到實驗材料和觀察材料的可靠性，和理論分析在邏輯上的嚴密性和完整性。實踐標準有相對性和絕對性。經過實踐檢驗過的客觀真理，仍然只是近似地反映現實的相對真理，但在相對真理中卻包含有絕對真理的成分。隨着實踐的新的進展，自然科學理論也向前進展而達到新的高度。



# 謙虛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

吳介民

共产党人是阶级斗争的勇敢战士，他们代表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立场。他们在争取人民大众解放事业的斗争中，是英勇顽强的；在和反动的、腐朽的势力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在克服一切困难、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共产党人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普遍真理。他们在为实现真理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当仁不让，明确地对各种错误的意见表示态度，而不是模棱两可，吞吞吐吐。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但是，另一方面，在追求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在人民群众的面前，共产党人则是十分谦虚和谨慎的。无产阶级的谦虚绝不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那种待人接物中的表面的客套和庸俗的虚伪，而是一种对真理的严肃态度。

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是以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为前提的。根据唯物主义观点，思想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只有正确地反映了

客观实际，使主观思想和客观外界相符合或大体上相符合，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行动起来，才有可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

人们的思想反映客观世界，是通过作为思维器官的头脑进行的。人脑好比一个加工工厂，它的原料只能来自客观外界。要使我们的主观思想和客观外界相符合，就必须首先向客观外界取得丰富的原料，然后才能进行科学的加工，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如实地认识它们。也就是说，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这里，就有个谦虚的问题。

一个谦虚的人，在和客观实际接触，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他总是“虚怀若谷”，对客观事物不带任何主观成见，他就能够在客观材料的面前，敞开着头脑这个加工工厂的大门，让客观材料通畅无阻地源源不绝地进到里边去。“山以虚则能受泽，心以虚则能受人。”谦虚的人的头脑有足够的地方容纳来自客观外界的东西。这样，他就能够客观地观察外界的情况，能够详细地占有材料，使头脑这个加工工厂完成加工过程，对客观材料作出科学的判断，从而使思想正确反映客观实际，订出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



法。相反地，如果一个人骄傲起来，让他的头脑为主观的成见所充塞，把接受客观材料的门户关闭起来，就会耳不聪，目不明，对客观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失去敏锐的辨别能力，甚至对客观外界的东西加以排斥或者加以主观的歪曲。结果，头脑这个加工工厂就会因为没有原料，或原料不足，或原料不好，而做不出成品，即使勉强制造出来，也是蹩脚的东西。

谦虚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真正的谦虚就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谦虚既不是对客观事实加以夸大，把一分说成二分；也不是对客观事实人为地缩小，把二分说成一分。而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多不少，恰如其分。恩格斯说，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sup>①</sup>，也就是这个意思。总之，尊重客观实际，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于客观实际，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谦虚。

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参加革命实践斗争的主体。所以，尊重客观实际，从实际出发，从根本上来讲，也就是尊重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出发，恰如其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意见和要求。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是正确反映人民群众意见的基础。要做好这一点，必须有坚强的群众观点。这里特别重要的是：

一方面，要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重

视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在我们国家里，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决定因素。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是我们制订方针、政策、计划和方案，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sup>②</sup>

另一方面，要清醒地估计自己，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不要以为什么都懂得了。不懂的东西就要承认不懂，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共产党人的责任是领导人民群众胜利地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但要领导群众，首先必须向群众学习。只有先做好群众的学生，才能做好群众的先生。当然，人民群众的意见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它需要我们加以整理、分析、概括和提高。但是，离开了向人民群众学习，离开了对人民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绝不可能有正确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共产党员应当“成为学习的模范”，应当“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

①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3页。

②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0页。





途有远见卓识”<sup>①</sup>。毛泽东同志还告诉我们：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sup>②</sup>。这一切都十分明白，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不向实际学习，不向群众学习，是最大的骄傲；老老实实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乃是最大的谦虚。

## 二

服从真理，坚持真理，承认错误，修正错误，这是共产党人必须采取的态度。

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它包含着不依赖于人或人类的客观内容。人们的认识按它的本性来说，是能够掌握客观真理的。但是，要掌握到真理，要得到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必须和错误的认识进行不断的斗争，真理才能确立和得到发展。毛泽东同志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sup>③</sup>。我们必须自觉地适应这个真理发展的规律，坚持正确的东西，修正错误的东西，力求使自己的认识符合于客观实际。

对真理的态度不是人人一样的。在还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和态度的正确和错误，往往和他们的阶级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在分析对同一事物持有不同的态度和发生不同或相互对立的意见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阶级立场，不能不注意到阶级意识的影响。历史上一切反动的没落的阶级，由于他们阶级利益的局限，往往对客观事物不能取得或不能完全取得正确的认识，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往往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来歪曲真理，抹杀真理。这就是一切反动的没落的阶级，不是骄横自大，就是盲目无知的原因。只有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最先进的无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才最能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为真理的实现而奋斗。

人们对事物的不同认识，除了阶级根源以外，还有认识论的根源。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不断发展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但常常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到客观事物的本质一时不可能充分暴露的限制。因此，站在同一阶级立场或同一政治立场上的人们，由于工作地位不同，实践经验不同，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0—511页。

②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0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页。





掌握材料不同，認識水平不同，对一件事情也会产生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認識。这是充滿矛盾的客观现实的反映，不足为奇。认为对一件事情只能有一种看法，不能有別一种看法，只能有一种意見，不能有別一种意見，是不切实际的。

各种不同意見的出現，在一般的情况下，都各自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各个不同側面，有的甚至只是对某一个側面的歪曲的反映。認真地听取这些意見，就能够帮助我们比較全面地認識客观事物。即使是那种对某一个側面的歪曲的反映，也能促使我们注意这一个側面的存在，正确地加以認識。列宁說：“辯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認識”<sup>①</sup>。我们把各种不同的意見集中起来，就可能避免陷入片面的認識，把几种不完全的認識加以比較、分析、取舍、补充，就可能得到较为完全的認識，从而求得客观真理。如果对不同的意見充耳不聞，就容易只見局部，不見全体，只見树木，不見森林，使我们的思想僵化起来，犯主观片面的錯誤。所以，在我们工作中，在我们向群众进行調查研究过程中，認真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見，就是十分必要，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傾听別人的意見，不能摆起架子，而必須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現，真理在哪里，就倒向哪里，誰有真理，就贊成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人民的內部，人和人之間的关系是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們在职务上有分工的不同，但他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

貴賤之分。一切共产党员和工作干部，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員。一个人的职务只是标志着他的工作責任，而不能先天地帶給他任何知識和經驗。因此，我們要謙以待人，要有服从真理的精神。对于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的人，不管他是誰，工人也罢，农民也罢，你的同級也罢，你的下級也罢，**先进分子也罢，落后分子也罢，你喜欢的人也罢，你不喜欢的人也罢**，只要真理在他手里，他說出了真理，我们就应当毫不犹豫地贊同他。

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們的喜、怒、好、惡为轉移。人們不能把真理說成是錯誤，也不能把錯誤說成是真理。一切顛倒是非的說法，最終将会被客观的事实所駁倒或糾正。因而对真理的認識不能掺杂着个人的成見。毛澤东同志說：“共产党人必須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須随时准备修正錯誤，因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sup>②</sup>这就告訴我們，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探求真理，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战斗。同时这也告訴我們，不要把認識絕對化，要随时根据人民群众的經驗，檢驗已經得到的結論，要随时反复考虑各种不同的意見，对已有的認識加以审查，当我们一旦发现自己的見解不符合实际，真理在別一方面的時候，而能够以

① 《哲学筆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1頁。

② 《論联合政府》。《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6頁。



人民利益为重，毫不躊躇地向真理低头，进行自我批評，修正自己的錯誤。

客观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同样，作为对客观实际反映的人的認識，也是一个无限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因此，我們永远不能穷尽对于客观事物真理性的認識，永远不能满足于已經得到的真理。毛澤东同志說过：依社会运动來說，真正的革命的领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有錯誤时須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經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轉变的时候，須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观認識上也跟着推移轉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真理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的認識从来都不可能到头。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从不以自己的認識为极限。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們的学說不过是提供了一些基本原理、原則，并不是說这种認識已經穷尽了真理，除了加以复述和赞叹以外，就沒有事情可做了。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許多新的事物，新的問題不断涌現出来，等待我們去認識、去解决。因此，不論我們已經掌握了多少真理，不論我們已經获得了多少經驗，不論我們已經积累了多少知識，也不应当驕傲，在新的事物面前，在新的問題面前，在新的任务面前，仍然必須采取謙虛的态度。事事謙虛，处处謙虛，时时謙虛，永远謙虛。这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規律对革命者提出的要求。

### 三

謙虛和驕傲是相互对立的。

驕傲和自滿是學生的东西。驕傲必然带来自滿自足。有驕傲情緒的人，往往自以为了不起，容易因工作上的一些成績而冲昏头脑；往往自以为什么都懂得，为自己的一孔之見所障蔽。于是，就不再願去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了。其結果，就是脫离了实际，脫离了群众，使思想一天天僵化，革命意志一天天衰退。这无异于自己筑一道籬墙，把自己孤立起来，堵塞了自己前进的道路。毛澤东同志教导說：“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极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我們应当永远記住这个真理。”<sup>①</sup>

驕傲是一种对自己盲目的过高的估計。驕傲必然自高自大，排斥別人。有驕傲情緒的人，往往夸大个人作用，不把群众和別人放在眼里，不重視群众和集体的力量。他們往往自視特殊，固执己見，甚至把自己工作的单位变成独立王国，不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批評和監督。他們在工作有成績的时候，把功劳全挂在自己的賬上，在工作出毛病的时候，把錯誤全推給別人。在驕傲情緒支配之下，上級和下級之間，部門和部門之間，同志和同志之間，就不可能結成統一的整体，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詞》。《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獻》，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10頁。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毛泽东同志教导说：“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sup>①</sup>

骄傲还和轻率相联系。一个人骄傲了，自以为什么都懂得了，什么都能行了，什么都不在乎了，那末，他在处理工作或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没有弄清楚情况而轻率从事。由于主观意图和客观现实对不起头，结果非碰壁不可。这必然会给予革命事业造成损害。

谦虚和谨慎是伴随着的。我们这里所说的谨慎，当然不是指那种只热衷于小事、忘掉重大的政治任务的谨小慎微态度，也不是那种犹豫不决、前怕狼后怕虎的优柔寡断态度，而是指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一种高度责任感。我们所说的谨慎，就是要求对革命工作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多谋善断。具有这种态度的人在沒有进行调查研究，沒有弄清楚情况时，不随便下决心。他们总是十分尊重群众的意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考察情况的时候，力求做到详尽、仔细、确切；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力求做到全面、周密、深刻。这样，使主观思想、意见、计划和办法尽可能准确、完备地反映客观实际，使工作胜利得到较多的保障，少犯或不犯错误。

今天我们党是处在全国执政党的地位，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都和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我们工作做的好或不好，都会给国家人民带来直接的影响。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力戒任何虚夸和骄傲，对工作要更加谦虚谨慎，踏踏实实，深思熟虑，慎重从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谦虚谨慎和骄傲是不相容的。骄傲是一种落后的因素，是一种不利团结的因素，是一种导致失败的因素。不去掉它，就有碍于我们革命队伍的团结，不去掉它，就无法使我们继续进步，不去掉它，就不可能把我们工作推向胜利。

#### 四

谦虚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高尚品质。这种高尚品质，鲜明地体现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革命活动中，也鲜明地体现在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活动中。

在这里，我们略举几个事例。从这些具体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最善于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精神同对待真理、对待人民的谦虚态度结合起来的最好的典范。

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谦虚态度贯穿在马克思的毕生活动中。在对待知识的问题上，他从不以不懂装懂，冒充内行，而总是正视自己知识上的缺陷，虚心地勤奋地进行学习。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编辑的时候，对于所谓物质利益问题，认为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但是，他感到自己对经济问题缺乏知识。对此，他丝毫不加以掩饰，在和《奥格斯堡报》的一次争论中公开承认“我以往所学，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

<sup>①</sup>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4页。



身作什么判断。”<sup>①</sup>为了弥补知識上的不足，为了在經濟問題上取得发言权，馬克思决心要“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sup>②</sup>，悉心研究政治經濟学。自一八四三年开始，一直到逝世，馬克思沒有一天停止过对經濟問題的研究。正是由于他掌握了大量的事实材料，并进行了长期的辛勤劳动，终于写成了科学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規律的《資本論》这样偉大的著作。还在资产阶级統治全世界的时候，馬克思就敢于向资产阶级挑战，宣称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是社会发 展不可抗拒的客观規律，給全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斗争的出路和树立了斗争的胜利信心。

馬克思从来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就，永远严格要求自己，但对于别人任何一点成就都充分加以尊重。馬克思曾认为自己最好的东西对于工人也还是不够好。他对于每一种准备发表的作品，从內容到形式，都极力求其完备，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他的稿本。关于总结巴黎公社經驗教訓的《法兰西内战》这本书，他就曾修改、重写过三次。馬克思絕不抹杀别人的功績，对于那些对发现真理有贡献的人，他都給予应得的重視。在《資本論》里，馬克思引用了許多不出名作家的話，由此而使这些人的贡献和他們的名字得为世人所知曉。馬克思认为，指出第一个发表某种思想或把这种思想闡述得比任何人都更精确的作家的名字，是他的义不容辞的責任。

从恩格斯处理他和馬克思关系問題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他那种恰如其分地估計自己

同别人的作用的当仁不让和谦逊为怀的精神。恩格斯在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他和馬克思共同創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說的事实，和他对这个革命理論創立所起的作用。他說：“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从德意志唯心哲学中挽救了自觉的辯证法并且把它轉为对于自然与历史的唯物理解的唯一的人。”<sup>③</sup>又說：“我与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个时期以前和这个时期以内，無論在創立这一理論方面，或特别是在闡发这一理論方面，我都作过某些独立的参加。”<sup>④</sup>但是，在另一方面，恩格斯始終把自己放在配角的地位。恩格斯說：“我一生所做的都是我預定要做的事情——我演的只是配角——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錯。我高兴我有馬克思这样出色的主角。”<sup>⑤</sup>恩格斯认为，在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理論体系上，冠上馬克思的名字是有理由的。恩格斯这些意見，并不是什么客气，而正是如实地反映了他和馬克思的关系。正如列宁所說：“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馬克思之后，这一般說来是十分正确的”<sup>⑥</sup>。恩格斯总是认为人們給予他的榮譽，主要应当归功于馬克思。

列宁一向反对自高自傲，故步自封。他說：“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們总还懂得一

①② 《政治經濟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頁。

③ 《反社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頁。

④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版，第32頁。

⑤ 《恩格斯傳》，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5頁。

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頁。



点什么”<sup>①</sup>。又说：“要是知道自己懂得太少，那就要设法使自己懂得多一些”<sup>②</sup>。列宁是最谦虚的人，也是最善于学习的人。他不只是善于向书本、向马克思、恩格斯学习，在实际斗争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和马克思商量”；同时他又善于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列宁周密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人民群众斗争的新经验，而把马克思学说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制定了适合于新条件的革命理论和策略。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打破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摧毁了世界反动势力的重要堡垒，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无数的事实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战斗的一生中，始终不懈地同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他们是寸步不让的。而同时，他们在创立自己的学说、在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制定政策和策略的时候，表现了最严格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总是反复地在实践中检验自己所提出的理论、政策和计划，使之不断地完善起来。

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活动中，同样表现着这种战斗精神和科学态度。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制定了引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方面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这也是和他的谦虚谨慎作风分

不开的。在这里，我们重读一下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所说的一段最朴素、也是令人最感动的話，就会更加深刻、具体地了解革命领袖那种虚怀若谷、谦虚质朴的崇高品质。他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sup>③</sup>毛泽东同志这种高度的谦虚，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最高的榜样。

今天，我国人民正在辛勤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其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必须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继续发扬大无畏的精神，另一方面不断发扬谦虚谨慎的作风。我们既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藐视敌人，又要在战术上兢兢业业，慎重从事，来不得丝毫的自以为是，粗心大意和轻率任性。只有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和干部都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发挥干劲，奋力上进，才能使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胜利。

- ①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2页。
- ②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5页。
-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1页。





# 关于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李 潤 之

一

我国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吸收广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执行这种制度，可以把集中领导和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统一起来，既加强自上而下的集中领导，又实行自下而上的严格监督，保证全面地完成生产计划，不断地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水平。

在国营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属于全民的财产；生产规模、产品方案和各项重要的经济、技术指标，也都是由国家或经济领导机关确定的。因此，企业的一切生产活动，必须受国家计划的支配。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不能像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代表大会那样，行使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的职权，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但是，这并不妨碍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相反的，办好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必须依靠职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企业中，职工代表大会是具有一定权力的机构。它可以听取和讨论厂长的工作报告，审查和讨论企业的生产、财务、技术、劳动工资计划。它可以审查和讨论企业的奖励基

金、福利费、劳动保护经费、工会经费以及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经费的开支，在不违背上级机关指示的条件下，还可以就上述范围的经费开支作出决议。它可以对企业的任何领导人员提出批评，和向上级建议处分或撤换某些严重失职、作风恶劣的人员，必要时越级控告。在对上级机关的决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它也可以提出建议，但是，如果上级机关经过研究，仍旧坚持原有决定的时候，就必须贯彻执行。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必须按期由工会主持召开，不能以干部扩大会议代替。职工代表大会在闭会期间，日常工作由工会主持。只要职工代表大会认真地和恰当地行使上述权力，并由工会加强日常工作，它就能在解决企业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中发挥作用，保证企业在职工群众参加管理和监督下，切实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与企业的生产计划。

## 二

吸收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是社会主义企业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标





志。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劳动者是资本家的雇佣奴隶，“资本主义压抑了、扼杀了、蹂躏了工人和劳动农民中的大批天才”<sup>①</sup>。劳动者根本没有权利参加企业的管理工作。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劳动的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企业中，工人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的主人。吸收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具体表现。

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实行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企业全体职工积极性相结合。刘少奇同志指出：“我们的企业管理制度是高度的集中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一切企业必须服从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并且以严格的劳动纪律来保证千百万人的意志和行动的统—；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扬职工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吸引群众参加企业管理”<sup>②</sup>。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是党的依靠职工群众办好企业的方针的体现，也是企业实行高度集中和高度民主相结合的管理原则的一个好办法。全国解放初期，在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它成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以后，我们党就根据依靠职工群众办好企业的方针，在国营企业中建立起了职工代表会议制度。职工代表会议，在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生产改革以及恢复和发展生产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在企业

中贯彻群众路线，并且将职工代表会议制度改为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适当地扩大了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权限，实行了代表的常任制。最近几年，在许多企业中，职工代表大会都起了促进生产和改进企业管理的作用。

实践证明：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中的一项具有生命力的制度。认真执行这个制度，可以加强企业管理，促进生产发展，健全企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且有助于提高职工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丰富生产经验和解决职工群众的生活福利问题。

在企业中，一切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工人群众的生产实践。工人的生产实践，是提高生产技术和改进企业管理的源泉。只有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最广泛地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集中职工群众的经验，并且根据来自群众的正确意见和先进经验，不断地改进企业的管理工作，才能够把企业办好。职工代表大会正是反映职工群众意见和集中职工群众经验的重要场所。认真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把企业各个方面的力量调动起来，依靠群众来解决企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水平。同时，在职工代表大会的推动下，解决了职工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密切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加强了企业内部的协作，增进了职工群众的主

<sup>①</sup>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

<sup>②</sup>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祝词》。载1957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人翁责任感，职工群众就会更加关心企业生产，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完成生产任务。

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对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有着积极作用。在国营企业中，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实行职工群众的监督，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化的企业，要求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的生产过程更加复杂，企业内部的分工更加细密，如果没有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就不可能保证整个企业协调地进行生产。所以，企业必须建立一个厂长负责的、统一的、生产行政的指挥系统，必须保证企业行政领导在生产行政管理方面，有效地行使指挥权力。但是，我们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建立在群众基础之上的。“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sup>①</sup>只有经常注意吸取群众的意见，把群众的智慧同领导者的经验结合起来，领导干部在考虑和决定问题、行使指挥职权的时候，才能够减少或避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开好职工代表大会，让群众把各种意见充分地表达出来，经过分析研究，使群众的正确意见同领导意图结合在一起，这样，领导上决定问题就更符合实际，凡是应当办而又可能办的事情就可以办好；凡是办不到的事情，也不致因为勉强去办而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企业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就可以由于领导和群众的密切结合，而更加健全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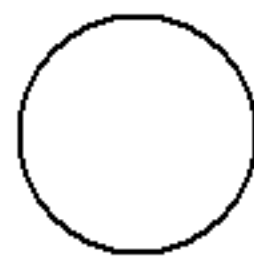
在企业中贯彻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对提高职工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丰富生产经验，也有着重要意义。不断提高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和丰富职工群众的生产经验，既是生产发展所需要的，也是职工群众切身利益所需要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经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就企业生产来说，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越高，生产经验越丰富，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企业生产的发展也就越快。所以，社会主义的厂矿企业不仅要负责生产产品，而且要负责“生产”新的人。在职工代表大会上，通过职工群众的自我教育和对干部的表扬、批评，有利于提高职工群众的思想觉悟，同时，通过讨论改进企业管理工作，提出和研究合理化建议，也有利于丰富职工群众的生产经验。

改善职工群众的生活福利工作，是职工代表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在职工代表大会上，群众对这项工作从多方面提出建议和批评，对于企业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是一个有力的督促，在领导干部和职工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企业生活福利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会更快地得到合理的解决。

### 三

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事在人为，企业必须从各个方

<sup>①</sup>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01页。



面創造條件，保證每一次職工代表大會都成為真正解決問題的大會，而不要使它流於形式。否則，形式上雖然轰轰烈烈，但內容却空空洞洞，即使開了會，也不能充分發揮職工代表大會的積極作用，真正體現出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從當前許多企業的經驗來看，开好職工代表大會，需要注意和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生產是企業的中心任務，企業中的一切工作，都是密切結合生產來進行的。能不能促進生產的發展，是衡量企業一切工作的尺度。從這一要求出發，職工代表大會，應該把保證國家生產計劃的完成作為根本目的和主要任務。職工代表大會，應該成為密切結合生產和直接推動生產的大會。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一般說來，職工代表大會的內容首先要以生產為中心，把生產中的主要問題，作為大會的主要議題。在社會主義企業里，生產是群眾最關心的事情。根據調查，在許多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的提案中，生產方面的提案占多數。由於職工群眾對企業生產全面情況的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交給職工代表大會討論的生產議題，無論是生產定額、技術措施、成本管理、責任制度等等，企業領導都必須向職工群眾說明具體情況，以便群眾展開討論，提出合理的修改和補充意見。為了不影響生產，職工代表大會的會議時間不宜過長，活動不宜過多。這就要求充分做好準備工作，使職工代表大會既開得緊湊，又解決問題。

第二，強調職工代表大會密切結合生產

和推動生產，不是說不要去討論同群眾切身利益有密切關係的生活福利問題。關心群眾生活始終是我們的政治任務。在加強社會主義教育的前提下，安排好群眾生活，使群眾的生活條件不斷獲得改善，對於調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是十分重要的。在我國農業連續三年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的情況下，更需要注意職工群眾的生活福利工作。因此，職工代表大會應該切實地討論生活福利工作，並且根據需要和可能做出決議，交有關職能部門去執行。

第三，在企業中，職工代表大會是具有廣泛的群眾性的會議，它應該全面地反映企業各个方面、各種人員的意見和要求。這一特點，決定了开好職工代表大會必須廣泛發揚民主，無論是分配代表名額、選舉代表，或者是確定大會議程和組織大會的活動，都要嚴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離開了發揚民主，職工代表大會就失去了意義。代表的廣泛性和群眾性是發揚民主的首要標志，做不到這一點，就不能反映出各个方面、各種人員的意見。因此，要保證新老工人、技術人員、科室幹部和女工等等，都有自己的代表，而且還要保證代表們能夠把企業各類人員的不同意見反映出來，而不只是反映少數先進人物的意見。切實組織代表討論報告和提案，是發揚民主的中心環節。在這裡，企業領導應該把企業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問題，提到職工代表大會上討論和解決。同時，也要討論和解決群眾所普遍關心的其他問題。無論是討論生產問題或者生活問題，都要充分發揚



民主，不能只是“干部做报告、群众提保证”，使讨论流于形式。群众在职工代表大会上批评领导干部，是监督行政的一个重要方面，领导上要保证群众畅所欲言，干部要虚心地听取群众意见和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出现某些错误的意见是难免的，只要加强领导，经过充分讨论，正确意见是可以说服那些错误的意见的。

第四，企业领导干部，必须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对待职工代表大会，自觉地认识到开好职工代表大会，是完成企业生产任务的重要条件。有人借口生产任务繁重，不愿意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把开会当成负担，或者以干部扩大会议代替职工代表大会，这是不对的。生产任务繁重，不能成为不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理由。因为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正是为了更好地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企业生产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不发动群众讨论解决，生产任务就不容易完成。而开好职工代表大会，发动群众把问题解决了，就具备了更好的完

成生产任务的条件。这已经是为许多企业的实践所证明了的。

贯彻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企业中一项长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企业党委要加强对企业工会的领导，督促工会按时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且做好职工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一方面，教育职工群众在认真监督行政的同时，要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另一方面，教育干部在正确对待职工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的同时，要在生产中大胆指挥，在行政上严格管理。职工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同企业一定时期的工作方向有着直接关系，为此，企业党委要提出明确的方针，指导开好职工代表大会。对职工代表大会已经通过的决议，企业党委要督促行政领导和职能部门去执行，从而使职工群众进一步重视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更加积极地参加企业管理。这样，我们的企业管理工作水平就可以不断地提高，我们的企业就可以办得更好。



# 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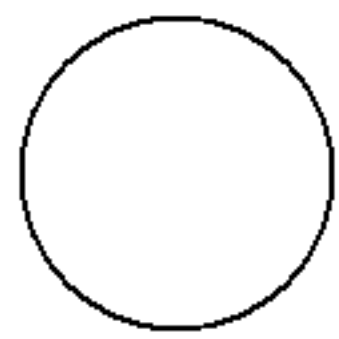
HONGQI

一九六二年 3·4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一期 ★

## 目 录

社 論	鼓足干劲, 争取社会主义 建设的新的胜利 .....	(1)
	欢呼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 .....	郭济洲 (6)
	当“败狗”翘起尾巴的时候 .....	袁先祿 (15)
	现代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 .....	陈元暉 (18)
	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权威问题 .....	海波 (27)
	做好人民公社的财务工作 .....	朱光福 (32)
	关于戏曲老艺人的艺术经验 .....	曲六乙 (36)

☆ 一月一日出版 ☆







# 加强党的战斗力

共产党是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它具有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革命、最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因为它是由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因为它同自己阶级的广大群众和其他一切被压迫的、要求革命的人民群众建立了最密切的联系，并且最彻底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这样的党不仅能够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战胜反动派，夺取政权，而且能够在取得政权以后，继续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同一切老修正主义者一样，竭力降低无产阶级政党的水平。他们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党的组织变成一般的群众政治团体。他们实际上是要使共产党由于丧失自己的全部战斗力，而蜕化为向资产阶级投降的社会民主党。

中国共产党在它诞生的时候，就是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贯地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一贯地同一切降低党的水平，削弱党的战斗力的倾向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战斗的历史。在开始领导革命的时候，我们党的力量是很小的，而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却是强大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走过了曲折复杂的道路，英勇地克服了重重困难，机智地绕过了无数暗礁，经过了二十八年的斗争，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绩。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我们党不是一个具有英勇战斗精神的党，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比起革命事业来，甚至是一个更加艰巨复杂的任务。在革



命中，在对敌斗争中，需要不断地加强党的战斗力，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有些人觉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加强党的战斗力，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了。这种想法，无疑是错误的。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团结全国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全国总人口中占百分之九十几，他们都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在我国总人口中只占百分之几。但是，不能认为，这百分之九十几的各阶级、阶层的人是自发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也不能认为那百分之几的人在任何情形下不会扩大他们的影响。很明显的，在这里，必须有一个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真正把这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团结起来，把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动员起来，从而使那百分之几的人彻底孤立，使他们不能乱说乱动，并且强迫他们改造。我们党的战斗力越强，就越能紧密地团结全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这是符合于全国人民的愿望的。

我们的任务是要使一个具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根本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很长时期的斗争。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必然要克服许多困难，要解决许多复杂的问题，要经历各种曲折的道路。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我们党能够成为人民群众中的不可缺少的领导核心，就因为我们党既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又具有无产阶级的最坚韧的斗志。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曾经这样说：“我们一定用全副精力来进行这一工作。有耐心，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改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无产阶级的这些品质就是无产阶级一定胜利的保证。”<sup>①</sup>这段话对于我国当然也是完全适用的。

在革命斗争中，敌人常常用他们的行动向我们发出警告，提醒我们必须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也还有阶级斗争，但是，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中，我们党已处于执政党的地位，这种情形很容易使人思想麻痹。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经常注意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要求，经常注意提醒自己，把不断地加强党的战斗力当做十分重要的事情。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且形成了一套

<sup>①</sup>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6页。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風。这是我們党的优良傳統。我們必須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发揚这些傳統。經過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的努力，我們党已經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設的初步經驗，已經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并且正在逐步制定为貫徹执行这条总路綫所必要的各项具体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更好地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进一步改进我們的工作作風，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

加強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是同提高党的战斗力密切相关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党员个人必須服从組織，少数必須服从多数，下級必須服从上級，全党必須服从中央。一切党员和党的組織，都要自觉地无条件地維護党的集中統一，执行党的決議，遵守党的紀律。任何忽視党的紀律的現象都会給党造成巨大的危害。列宁曾經指出：“誰要是把无产階級政党的铁的紀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別是在无产階級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資产階級，反对无产階級。”<sup>①</sup>社会主义經濟是計劃經濟，它要求高度的集中和統一。任何妨碍党的集中統一的分散主义行为，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的任何松懈，都会使党涣散无力，都会損害社会主义建設事业。

党的集中統一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的。这就是毛澤东同志所指出的：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脱离了党的集中领导的极端民主，会損害党的利益，是无产階級所不需要的。同时，只有在民主基础上，把群众的智慧、力量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才能形成真正的集中。也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紀律，才会成为群众自觉的紀律。沒有民主基础的集中，必然造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不以民主为基础的紀律，也不可能是巩固的紀律。因此，在我們党内，广泛地发揚民主，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并不是同加強組織性、紀律性相矛盾的，而恰恰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毛澤东同志說，我們的思想，我們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也应该打扫和洗滌。“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广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无則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sup>②</sup>深入地正确地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充分发揚民主，会更有利于党的集中統一，有利于加強党的战斗力。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頁。

② 毛澤东：《論联合政府》。《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97頁。



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必须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群众路线的作风。我们要做好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努力认识并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不这样做，就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实事求是的重要关键又在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才会有力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党的各个领导机关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各级党委的负责人，应当认真地调查一两个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以便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于指导一般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总是要求一切党员干部必须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不是对群众的利害漠不关心，而是密切地关心群众的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而是把党所提出的政策和任务详细地向群众交代清楚，在群众中做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每一个党组织都应当按照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要求，注意建立经常工作，在经常工作中积累经验，联系群众，而不应当抛弃这种经常工作，只热衷于某些突击工作。这种扎扎实实的、密切联系群众的经常工作，乃是党的巨大战斗力的源泉。

由于我们全党绝大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坚持了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和方法，使我们的工作由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有些同志没有把工作做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党的这些优良传统。他们往往以主观想像代替调查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以个人的意见代替群众的意见，以华而不实的作风代替深入细致的作风。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使工作速度加快”，这就是“战斗性”，其结果恰恰相反，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那就只能是削弱党的战斗力，给工作造成损失。这种错误做法是必须克服的。

我们的党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我们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我们的许多老干部经历过战争和革命烈火的锻炼，许多年轻的干部在党的优良传统的影响下，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成长起来。我们的党是一个符合于人民需要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全党认真彻底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进一步加强党的战斗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使我们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大的胜利！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

李 維 漢

本文分以下五个问题来谈：

- 一、争取领导权的两重斗争；
- 二、正确地区分敌友，率领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 三、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利用矛盾，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
- 四、区分主要同盟者和非主要同盟者，依靠工农联盟，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
- 五、区分领导者和同盟者，发展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力量，把同盟者提高到当前革命纲领的水平。

## 一 争取领导权的两重斗争

领导权问题，是革命统一战线最根本的问题。哪一个阶级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决定了革命走那一条道路，从而也就决定了革命的成败，以至革命的前途。

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唯一能够走得通的康庄大道。中国人民已经胜利地走过了这条道路。中国人民所以能够胜利地走过这条道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争取了最广泛的同盟者，实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从阶级关系上讲，带有两重性质，表现为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 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经过这个联盟，争取和实现工人阶级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领导。一个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经过这个联盟，争取和实现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领导。在这两个联盟中，工农联盟是基本的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工农联盟愈巩固、愈强大，就愈有力量去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 其他劳动人民，其中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本文所称城市小资产阶级，一律指独立工商业者，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和广大青年学生。

\*\* 本文所称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它们的知识分子。



和其他爱国分子，就愈有力量去孤立和分化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愈有可靠的保障。所以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从基本上说来，就是争取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壮大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问题。这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只能是非基本的、辅助的联盟；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联盟。工人阶级必须积极争取这个非基本的联盟，才能掌握全部的领导权，而使工农联盟获得辅助力量，使大资产阶级完全陷于孤立，使革命的胜利获得完全的保障。中国革命的经验充分证明，工人阶级必须在巩固和壮大工农联盟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团结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才能有强大的和完全的领导权，使敌人完全孤立，取得革命的胜利。

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既同大资产阶级代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作斗争，又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道路作斗争的过程。而同旧民主主义道路的斗争，归根到底，也是同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的斗争（这一点，后面还会加以论述）。

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道路作斗争，主要是为了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时也是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如同我们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具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sup>①</sup>。事情很明显，或者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善于带领和教育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帮助他们脱离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影响，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这样，就在政治上取得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或者相反，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不善于带领和教育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至不能帮助他们脱离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样，就在政治上让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而使工人阶级被迫处于孤立地位。

在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他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现代工业，形成了民族市场，同时传播了资本主义的文化，造就了一批新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一个民主革命的政治力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在二十世纪之初，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纲领，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反对和孤立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想，并且举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最后终于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50页。





实现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它的历史意义是伟大的。但是，辛亥革命没有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的和中国的历史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尤其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进入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结束了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伟大的孙中山和他的一部分战友，在一九二四年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把国民党改组为民族民主的政治联盟。这是中国国民党本身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它对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人民大革命，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可是，在孙中山逝世以后不久，当工农群众运动广大发展、革命走向深入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就表现了很大的动摇。当革命开始向土地革命发展，北伐军队进到帝国主义势力的生命线长江流域及其心脏上海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终于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就这样，民族资产阶级再一次用自己的行动向中国人民宣告，他们早已完全丧失了革命领导者的资格。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失败，说明了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旧民主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革命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只允许他们走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日益成为强大的独立政治力量，它同样不允许中国走旧民主主义道路，而要力争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十分软弱和动摇的阶级，而又处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你死我活的斗争之间。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矛盾，不愿意中国殖民地化；同时又害怕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获得彻底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人民共和国。所以，在中国进入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他们长期地摇摆于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不能成为真正的独立政治力量，更不能独立地实现其政治主张。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而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却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中华民族处在危急存亡关头，民族资产阶级又转向抗日，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分子靠拢共产党，右翼分子依附国民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则在国民党顽固派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亦即在工人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长期地采取了摇摆不定的中立态度。直到一九四八年，人民革命接近最后胜利，而国民党统治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接近最后崩溃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才开始正式转到人民革命方面来。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的两重性，使得这个阶级在一九二七年的历史条件下，背离工人阶级，跟随大资产阶级；中间经过长期的中立和动摇，到一九四八年以后，在另



一种历史条件下，轉到跟随工人阶级。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二六年的論断：

“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sup>①</sup>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民族资产阶级丧失了革命领导者的资格，旧民主主义已经过时了，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天性却驅使他們长期地固执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要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因此，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就在统一战线内部和外部，长期地存在着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存在着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幻想，曾经形成了一条所谓“中间路线”，或者叫做“第三条道路”。在日本投降以后，所谓中间路线，曾经喧嚣一时。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当时，抗日战争既已取得胜利，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课题，就是建国和建什么国的问题。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要在中国继续保持和恢复他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广大人民，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按照当时的具体条件，争取建立一个能够保证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的各阶级的联合政府，以便逐步过渡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民族资产阶级，则想使中国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当时，国内的形势是这样：（1）蒋介石集团因为参加抗日，在人民中保有一定的影响；又因为只是消极抗战，并取得美国的援助，保存了反动武装力量；在日本投降后，又接收了大部分日伪军和敌占区，并且继续得到美国的犬量援助，增强了反动武装力量。（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人民解放区，经过八年的英勇抗战，已经空前强大起来，但是还处于分散的状态，还居于相对的劣势。（3）各民主党派，因为参加了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作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已经形成起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发言权；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为了孤立共产党，又极力拉拢他們，暂时在政治上对他們作了某些让步，如同意他們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允諾他們参加联合政府等等。这种情况，使得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人陷入幻想，认为国民党消灭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消灭不了国民党，中国非搞资产阶级民主不能得救，甚至幻想会获得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幫助。他們中的一部分政治代表人物企图站在国共两党之间，一方面利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来逼迫国民党向民族资产阶级让步，开放一些政权，实行一点民主，另一方面又利用国民党来限制人民革命力量，不使这个力量的发展超过他們所允许的范围。有些人甚至以为可以利用国共两党相持不下的局面，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有人就幻想要国共两党都把军队交给他們管理，实行所谓“军队国家化”和“文人掌军”。民族资产阶级的这部分政治人物，就是企图和幻想用这样的办法来达到使中国

<sup>①</sup>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5頁。



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的。

中間路綫或第三条道路，不但一般地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在当时条件下，在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中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在一部分民主党派中更占了上风。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中間路綫具有两面性。中間路綫分子們要求和平、民主，不赞成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这是积极的一面。但是，他們又对国民党蒋介石，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很大的幻想，要求共产党作牺牲人民根本利益和根本陣地的让步，来向国民党换取和平、民主。他們害怕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而在人民群众中散布无原则的和平主义的幻想。他們不仅企图影响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企图影响农民。他們說，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两个极端，都是少数，只有中間路綫能够代表一切处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間的中間阶层，即占全民族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中間路綫不但表现了很大的軟弱性，而且表现了很大的反动性。针对着这种情况，我們党在旧政协期間，一方面积极地团结和带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一道，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在斗争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欺騙；另一方面，对中間路綫分子的妥协性和反动性，則进行耐心的反复的說服和批評。經過这样的又团结又斗争，教育了国民党統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使他們識破了美蔣所謂和平、民主的画皮；同时也争取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多数，在他們当中增强了左翼力量，縮小了右翼分子的影响。这样，也就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欺騙人民、拉攏中間势力、孤立共产党的企图，使美蔣反动派陷于孤立。

随着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的发展，中間路綫的积极一面愈来愈縮小，而消极反动一面則愈来愈突出。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由防御轉入进攻，国民党統治区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也已經起来。“这是一个历史的轉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轉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統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轉折点。”<sup>①</sup>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其他民主党派也同时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不能在国民党統治区公开活动。各民主党派如果不願意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就只有轉到人民革命方面来，再不能幻想有所謂第三条道路了。同时，在我們党的影响之下，全国許多大城市都公开地进行了批判中間路綫的辯論。所有这些又都推动和帮助了民主党派中的左派的斗争。一九四八年一月，在左派的推动之下，民主同盟在香港举行了三中全会，国民党民主派也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它們和其他民主党派都先后轉到新民主主义方面，都声明反美反蔣。一九四八年五月，我們党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組織沒有反动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迅速地获得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响应。至此，中間路綫已經完全宣告破产。少数右翼分子还不死心，还繼續兜售这种貨色，但这已經不折不扣地成了美

<sup>①</sup> 《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3—1244頁。



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用来阻止革命前进、保存反革命势力的反动货色了。是一些什么货色呢？其一，是“新三国”阴谋。这就是妄想由共产党、国民党和各民主党派实行“天下三分”，划区而治，以便阻止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保存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同时乘机捞一把。其二，是组织反对派。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主力已经消灭，人民的一统江山很快就要实现。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军事斗争的方法来阻止，他们就一天天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这就是：一方面由国民党政府出面搞“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利用既同革命势力有联系又同反革命势力有联系的某些民主党派的右翼分子，到革命阵营中来组织反对派，配合美蒋的“和平”阴谋，以便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就要尽可能带上温和的色彩，不要过多地侵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中间路线已经完全破产之后，美蒋反动派却动员他们的御用政客和御用文人，装作所谓自由主义人士，在一九四八年，又唱起“第三条道路”的调子来。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揭破了这种阴谋。毛泽东同志当时指出：“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sup>①</sup>

中间路线，实质上，就是早已过时的和行不通的旧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路线。它的结局，再一次地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如果幻想坚持这条路线，自以为这是以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运动，那他们就必然要落到最不独立的地步，同一九二七年附和蒋介石反革命一样，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助手，走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所以，我们批判中间路线，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进行斗争，归根到底也就是同大资产阶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的斗争。我们党必须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才能帮助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脱离旧民主主义的影响，巩固工农联盟，也才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将革命进行到彻底的胜利。

大资产阶级，因为是一个卖国的阶级，是凶恶的敌人，在人民中不可能有多少威信。但是，大资产阶级从来不放弃其欺骗人民的手段，特别是当革命已经到来，他们不能照旧控制局面的时候，便摇身一变，同革命者讲妥协，甚至混入革命队伍，以便利用革命队伍中的动摇的阶级和人们，从内部破坏革命，夺取革命的果实。所以大资产阶级又是篡夺革命领导权的能手。远在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立宪派，即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就和封建豪绅互相

<sup>①</sup> 《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82—1383页。



勾結，以各省諮議局为陣地，利用革命派的軟弱性，在半路上篡夺了革命的領導，以致这次革命的結局，政权落到了資產階級立宪派和封建地主階級手中。在这个基础上，袁世凱窃国得以成功。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期間，大資產階級以蔣介石为工具，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并且利用中国共产党內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的統治，篡夺了北伐战争的領導权，把中国拖到了絕境。在抗日战争时期，以蔣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不但积极地拉攏民族資產階級，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农民进行欺騙，而且竭力限制进步势力的发展，力求削弱工人階級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独立性，以便夺取抗日战争的領導权，作为对日投降、对内分裂的准备。只是因为我們党在毛澤东同志领导下，采取了正确的路綫和政策，大大地发展了进步势力，爭取了中間势力的多数，并同頑固派进行了針鋒相对的斗争，大資產階級的这种企图才沒有得逞。

为什么大資產階級在历史上能够一再篡夺革命領導权，破坏革命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較重要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爭夺中国的矛盾，以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某些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集团，在一定时期內，往往以某种革命的姿态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对某一个或某一派帝国主义和国内另一派反动势力的斗争。例如：辛亥革命期間，資產階級立宪派参加收回权利运动以至附和反清运动；辛亥革命以后南方的某些大資產階級分子参加孙中山反对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斗争，以及后来参加北伐战争；蔣介石集团参加抗日战争，等等。这使得他們有可能从內部篡夺領導权，破坏革命。

第二，中国資產階級分化为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不是一次完成的；它們之間的界限不是絕对的，而是常常有新的分化。这种分化过程，随着政治和經濟的发展，經過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實踐，逐步地显露出来。偉大的五四运动揭露了北洋軍閥統治中的买办階級；五四运动以后揭露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投入了大資產階級的怀抱；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上海工商界分化为大資產階級掌握的总商会和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各馬路商界联合会；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国民党的叛变，更是一次明显的分化。就国民党說，这一次叛变，把继承孙中山革命政策的民主派压下去，而使这个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政党，变成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动統治的工具。所以，中国資產階級分化为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处在两部分資產階級之間，并且由这一部分轉到另一部分，人民一时摸不清他們的底細，所以容易被他們蒙混过去。

第三，大資產階級的統治是有两手的：一手暴力鎮压，一手政治欺騙。蔣介石在这两个方面，可以說是集大成者。他把反动的武装力量发展到空前的地步，在統治中国的二十二年間，就打了十几年反革命內战。同时，他又耍了許多政治欺騙，特别是在人民革命力量强大或者他自己的統治发生危机的时候。一九二七年以后，蔣介石彻头彻尾地背叛了孙中山的主





張和事业；但是他在表面上，始終把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旗帜抓在手里，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继承人。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卖国政策的怒潮，蔣介石見人民怒潮难当，宣布“下野”；一旦避过了風头，又重新上台，再把人民运动镇压下去。抗日战争时期，蔣介石为了維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一党专政，在表面上站在国内各階級矛盾之上，口口声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把自己装扮成“民族領袖”；但实际上却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日本一投降，蔣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就下定决心并且积极地准备发动大規模反革命內战；但是他又假情假意地連发三个电报，邀請毛澤东同志去重庆談判，表現得那么“迫切”，随后还和我們一道开了政治协商會議，达成了一些協議。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蔣介石实际上已經发动了全面內战，但是同时又演出改組国民党政府的把戏，企图把中間势力拉过去。淮海战役以后，蔣介石統治眼看就要复灭，他又重演“下野”和“和平”談判的故技。蔣介石这一套欺騙做法，在沒有被彻底揭穿以前，确实能够欺騙一些人，尤其能够吸引民族資產階級中的許多人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使他們对他存有幻想。

大資產階級在施行政治欺騙方面，还有帝国主义撑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历来也是采取武力进攻和政治欺騙两手。英、美帝国主义就是政治欺騙的老手。英帝国主义不但首先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門，而且在一九二七年用分化革命陣綫的办法，策动了蔣介石的叛变。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更加注重文化和精神方面的侵略，它在中国办了許多学校、医院和教会，吸收了許多中国留学生。就是政治上，美帝国主义也善于把侵略說成是友誼。后起的美帝国主义，为了取得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同等侵略中国的权利，提出“門戶开放、利益均沾”的政策，口口声声說是“尊重中国行政和領土的完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了对付日本，也为了扶植走狗蔣介石，以便在战后独占中国，它給了国民党政府一些錢，但它却大肆宣傳，把这說成是“援助中国抗战”的恩惠。美帝国主义的这些活动和宣傳，并不是沒有效果的。在一部分中国人民中，尤其是許多知識分子中，曾經造成了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这种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投降后的一段时间，曾經发展到最高峰。正是仗恃着这种影响，美帝国主义在日本投降后，进行了所謂調停国共两党的活动，企图欺騙中国人民，軟化中国共产党，帮助蔣介石不战而統治全中国。这个把戏沒有能够欺騙中国共产党，但在当时，确实有許多中間人士受了騙。

第四，帝国主义和中国大資產階級的欺騙做法，在中国人民中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主要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中間势力。他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又有联系和依賴的一面。正是这些人，曾經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英美帝国主义，存有很多幻想。民族資產階級参加抗日运动和抗日战争，一般是比较积极的，但是許多人却抱有濃厚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民族資產階級的多数不滿意蔣介石的反动独裁，但是許多人又不願拋棄对蔣介石的幻想，更不願根本推翻国民党反动統治。至于土地制度的彻





底改革，那更是許多人不能贊成的，因為他們同封建土地制度有密切的聯繫。所以，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九年《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還着重指出，國內外反動派給予中國人民的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並將在長時期內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滅”<sup>①</sup>。

以上幾點說明了，工人階級為要爭取和鞏固自己的領導權，特別是為了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人士，不僅要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道路進行堅決的鬥爭，更必須同大資產階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進行堅決的鬥爭，徹底地揭露和打除其反動影響。

工人階級對於大資產階級，根本地說，不可能有領導權，因為他們是革命的敵人。即使在某種歷史條件下，大資產階級暫時參加到統一戰線中來（如蔣介石集團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同工人階級之間，仍然存在著尖銳的對立。這個時候，只有工人階級和共產黨採取正確的政策，進行堅決的鬥爭，才能夠孤立他們，逼迫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就範。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逼迫蔣介石留在抗日統一戰線之內，直到日本投降為止，就是一個範例。就這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種領導作用。

關於爭取領導權的鬥爭，說到這裡為止。下面，我們將從四個方面，來研究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經驗。這四個方面就是：正確地區分敵友，率領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並且一步一步地取得勝利；區分主要敵人和非主要敵人，利用矛盾，集中力量反對主要敵人；區分主要同盟者和非主要同盟者，依靠工農聯盟，團結城市小資產階級，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分子；區分領導者和同盟者，發展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力量，把同盟者提高到當前革命綱領的水平。

## 二 正確地區分敵友，率領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敵人 進行堅決的鬥爭，並且一步一步地取得勝利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一開頭就這樣指出：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sup>②</sup>

首先要正確地區分敵友，認清敵人，確定革命對象。

中國民主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個命題，是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逐漸明確、逐漸完備起來的。

<sup>①</sup>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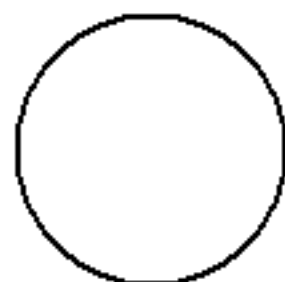
<sup>②</sup>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頁。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基本的任务。这个革命，早在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就开始了。但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整个时期中，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辛亥革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孙中山和他的战友在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民主革命必须是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孙中山虽然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但是在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前，不能在人民斗争的基础上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向前发展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事业。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这两个口号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代表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因此，能够动员和团结最大多数人民进行长期的持久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这样明确地和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和纲领，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数十年如一日地高举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旗，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共产党就能够贯彻始终地把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

如上所述，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大资产阶级，依附帝国主义和勾结封建势力，属于民主革命的对象；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一面，又有妥协性一面，是能够参加民主革命的动摇的同盟者。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能否正确地地区分资产阶级的这两个部分，对于分清敌友，对于革命的胜败，对于领导权的得失，都具有严重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五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以前，由于政治经验不足，尤其是由于某几个时期中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很多时候都没有能够正确地地区分资产阶级的这两个部分。右倾机会主义者笼统地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力量。“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反对整个资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当成革命对象，并且强调反对富农。毛泽东同志区分了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把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作为三大敌人，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完整的革命口号。关于富农，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旧式富农一般地带着封建和半封建性质的剥削，对于旧式富农的这种封建和半封建性质的剥削是应当消灭的，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废除富农经济，不应当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这样，毛泽东同志就完全正确地解决了团结谁和反对谁这一决定革命胜负的首要问题，给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

正确地地区分敌友，确定了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之后，党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率领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工人阶级要实现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就必须自己最坚决最勇敢，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头；就必须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决不可把民主革命看作资产阶级的事情，袖手旁观，或者甘心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和苦力。同时，工人阶级决不可孤军作战，而必须善于争取和率领同盟者一道，去向敌人作斗争。并且必须正确地掌握战略和策略，逐步地取得胜利，才能巩固群众的斗志和信心，争取最广泛的



同盟者，把革命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

根据中国革命的經驗，为要在同敌人斗争中取得胜利，第一必須在战略上藐視敌人，在策略上和战术上重視敌人；第二必須熟悉一切斗争形式，尤其要善于掌握武装斗争和非武装的政治斗争两手；第三必須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和瓦解敌人。这几点是我們党同敌人作斗争的重要經驗。如果我們党不是这样正确地进行对敌斗争，也就不可能把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争取过来。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澤东同志曾經反复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異常强大的，敌人对革命的镇压是极为残酷的，中国革命必須經過长期的和残酷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革命力量如果不能在长期的残酷的斗争中鍛炼和發揮自己的頑强性，就不能坚持自己的陣地和夺取敌人的陣地，就不能聚积和鍛炼成足以最后战胜敌人的力量。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間就可以組成，中国革命斗争頃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們必須充分地估計到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反对革命急性病和冒險主义傾向。同时，毛澤东同志又反复地指出，敌人的基础是虛弱的，他們內部分崩离析，他們脱离人民，他們已經腐爛，沒有前途。从长远的观点看問題，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动派，而是屬於人民。我們有信心和有把握战胜中国的一切內外敌人，必須反对过高估計敌人力量和害怕敌人的傾向。所謂反动派不能打倒的神話，在我們的队伍中不应当有它的位置。后来毛澤东同志又把这两方面的估計概括起来，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又是真老虎，和在战略上应当藐視敌人，在策略上战术上应当重視敌人的思想。毛澤东同志說：

“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須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紙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們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們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sup>①</sup>

“如果我們在全体上过高估計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們，不敢胜利，我們就要犯右傾机会主义錯誤。如果我們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問題上，不采取謹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爭取一切应当爭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階級，学生、教員、教授和一般知識分子，一般公務人員，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紳士），我們就要犯‘左’傾机会主义錯誤。”<sup>②</sup>

毛澤东同志的这个思想，概括了在中国革命中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成功的經驗，又概括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的錯誤的和失敗的經驗，是这两方面的經驗的綜合。也就是說，它和毛澤东同志的其他思想一样，是在中国革命实践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是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① 參看《和美国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一文題解。《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0頁。

②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問題》。《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67—1268頁。



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对革命力量估计不足，不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而是害怕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这是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共同特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陈独秀主义。陈独秀主义者不相信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力量，在革命的紧急关头，被反革命的气焰所吓倒，对于反革命的进攻，不敢率领千百万农民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幻想用对反动派让步的办法来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结果是更加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也更加助长了同盟者的动摇，使得工人阶级完全丧失了领导权；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陷于孤军作战，败退下来。他们不懂得，“谁想帮助动摇者，自己首先应当不动摇”<sup>①</sup>。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是最先进、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阶级和政党，如果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敌人的面前表现退缩和动摇，不敢率领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向敌人作坚决的斗争，那么，处在工人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其他阶级、阶层，就必然更加要动摇，以至离开工人阶级。中国和外国的一切经验证明，只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敢于率领和依靠可靠的同盟者坚决顶住敌人，并给敌人以打击，才能支持同情的同盟者，坚定动摇的同盟者，而孤立敌人。

另一方面，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左”倾冒险主义，最突出的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路线。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在策略上战术上轻视敌人。他们打倒一切，一切斗争，不照顾群众的觉悟，不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特别是不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不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不讲究斗争艺术，不计斗争的后果，所以愈斗争愈孤立，当然也谈不上领导权。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我党的领导经验充分证明了，只有既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又在策略上战术上重视敌人，才能既避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避免“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

为了战胜敌人，还必须善于选择最有利的斗争形式。工人阶级政党必须熟悉一切斗争形式，像列宁所说的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把自己全身都武装起来，以便适应情况的变化，及时地变换斗争形式。斗争形式又有主从之分，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条件下，主从是不同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必须善于抓住当前历史条件下的主要斗争形式，并且把其他的斗争形式同主要的斗争形式适当地配合起来，才能打中敌人的要害，也才能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在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近代中国一切反革命统治，尤其是帝国主义、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都是武装到了牙齿。而一切从事革命运动的先进人物和团体，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也都懂得要拥有武装，都懂得只有革命战争才能解决一切。所以，在中国，在民主革命中，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所

<sup>①</sup>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2页。



以，对武装斗争和对军队的领导权，就成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重要部分；对军权和战争领导权的争夺，就成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部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手里没有武装力量，就不能独立地领导人民革命，就不能取得和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而在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就可能随时被资产阶级一脚踢开。这是一个经过革命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我们党是从国内外敌人压迫和同盟者叛变的痛苦教训中，逐渐地认识了这个真理，并且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完全正确地掌握了这个真理的。事情的确是，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sup>①</sup>。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到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內，对这个真理的认识是很不够的。那时还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意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民众运动，其结果，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篡夺了北伐战争的领导权，一脚踢开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使革命半途而废。而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仍然有许多同志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直到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内还发生过第二次王明路线。当时被这个路线所影响的地区，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战，不敢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开辟抗日根据地，而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用在帮助国民党抗战上。这样，他们就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而国民党一旦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们就陷于束手无策，不能不遭到严重的打击。

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总的说来，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其他斗争形式都是为着武装斗争的。这不排斥在某个方面，在某个时期，和平的政治斗争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高涨。我们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各方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且主动地争取同蒋介石国民党停战议和。在人民抗日运动和我党的抗日主张影响之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国民党内赞成抗日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领导下发动西安事变，拘禁了蒋介石和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人员，要求停止内战，进行抗日。西安事变，时人称之为“兵谏”，是一次义举。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则阴谋利用这个事变，组织南京亲日政府，讨伐张、杨，扩大内战，以利于实现日本灭亡中国的阴谋。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同情和支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爱国行动，同时坚持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击破亲日派扩大内战的阴谋。党的政策被张、杨等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所接受，西安事变终于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放弃内战政策，接受人民的要求。这样，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就成为由内战到抗日的转换时局的枢纽。这是毛泽东同志的统一战线思想在历史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关头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接着，自七七事变起，实

<sup>①</sup>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34页。





现了对日抗战，展开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新的和胜利发展的时期。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对外进行和坚持抗日民族战争，我们在国内阶级斗争中，就必须以和平的政治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只有善于进行这种政治斗争，才能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反“武装摩擦”的武装斗争，只是在必要时才使用，并且注意适可而止。不这样，就不利于团结抗日。又如日本投降以后，到一九四六年七月全面内战爆发之前，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而美蒋由于没有作好全面内战的准备，并且迫于广大人民的强烈愿望，暂时不得不打起和平的幌子，作为欺骗人民、准备内战、孤立我们党的手段。因此，在这期间，我们同美蒋反动派的斗争，就是在确保人民已得阵地的前提下，以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这场斗争是争夺人心之战。谁赢了理，谁就获得人心，就能打胜仗；谁输了理，谁就失去人心，就要打败仗。这场斗争的结局，是我们打了胜仗，而美蒋反动派打了败仗。这次政治斗争的胜利，实际上是在全国广大人民中，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为尔后的解放战争作了政治的、精神的准备。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高涨，主要是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同时也是同这个精神的、政治的准备分不开的。

总之，工人阶级政党要争取和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准备和平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两手，并且熟悉这两手，以便依据情况，确定以哪种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把其他斗争形式同主要斗争形式配合起来，并且善于依据情况的变化，从这一斗争形式转变到另一斗争形式。我们党从长期的曲折的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武装斗争经验，既善于进行武装的军事斗争，又善于进行和平的政治斗争，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领导革命到达胜利。

以上，我们论述了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策略上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经验，又论述了必须熟悉一切斗争形式，尤其善于掌握武装斗争和非武装的政治斗争两手的经验。还有一点重要的经验，即必须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分化和瓦解敌人，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善于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利用矛盾，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一节里，单独地加以论述。

### 三 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利用矛盾，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基本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成为整个民主革命的对象，一律都要打倒，不能打倒一个，不打倒一个，也不能打倒一部分，不打倒一部分。同时，旧中国又是一个被世界上各主要帝国主义所统治的国家。这样，就使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面对着以下两种情况：敌人很多、很强大，不可能一次都打倒，只能各个击破。这是一种情况，是敌人的强点。另一方面，各派帝国主义利害又不一致，各扶植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实力集团，相互之间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又一种情况，是敌人的弱点。这后一种情况，常常使敌人的营垒发生冲突和破裂，有利于革命方面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敌人。这后一种情况，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国人民同各部分敌人之间的矛盾处于不同的地位，有的突出起来，成为主要矛盾，有的暂时退到次要的地位（当然，矛盾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使一部分敌人成为主要敌人，另一部分敌人暂时处于非主要敌人的地位；这又有利于革命方面利用矛盾，首先集中力量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每一次主要矛盾和主要敌人发生变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阵线也随着发生变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动，从而使中国整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的变化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北洋军阀，又分为以英国为后台的一派，主要在长江流域；以日本为后台的一派，主要在东北和华北。一九二七年，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分化中国革命阵营，以蒋介石为新工具，从内部破坏革命，建立反革命统治，接着进行了十年残酷的反革命内战，造成了中国人民和蒋介石统治之间极端尖锐的矛盾。在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由吞并东北进而要灭亡全中国，使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日本投降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日本的地位，以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为工具，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又使蒋介石统治和美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上述各个时期中，除了当时的主要敌人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则成为当时的非主要敌人。这些非主要敌人，在革命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又分化为几种情况。有些非主要敌人暂时处在中立地位，例如在解放战争时期，英、法帝国主义由于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削弱，无力东顾，而中国又成为美帝国主义独占的势力范围，所以英、法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大体上站在中立的地位。有些非主要敌人转为暂时的同盟者，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还有些非主要敌人则在革命的打击、分化之下，实行倒戈起义，转到革命方面来，成为长期的同盟者。这在解放战争后期达到了不小的规模，又以原来同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为多。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sup>①</sup> 必须正确地地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才能正确地确定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中国和外国革命经验都证明：“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应该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sup>②</sup>。对于非主要的敌人，则应当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力争中立他们，以至在可能条件下联合他们，同时孤立他们的反动方面，以便集中力量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我们党在毛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4—315页。

②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页。



澤东同志领导下，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正确地解决了区别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反对当前主要敌人的战略、策略问题。当日本帝国主义要吞并全中国，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党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已于一九二七年退出了统一战线），改变为直到包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使它同包括英、美帝国主义在内的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结合起来，以反对当时的最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解放战争时期，美蒋反动派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时，我们党通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般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团结广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及其他爱国分子；又通过分别对待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和对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采取有步骤有区别的政策，争取他们之中某些爱国上层分子的起义，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此外还采取了中立英、法帝国主义的政策。这就使我们空前地壮大了革命势力，孤立和瓦解了敌人，从而迅速地打倒了最主要的敌人——美蒋反动派的统治。这样，中国革命的敌人虽然很多很强大，但是直接和我们作战的，在每一个时期，却只有一部分敌人。因此，我们就能够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如果不区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不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当前主要的敌人，那又会产生怎样的局面呢？这我们也有过经验，并且是痛苦的经验。这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所实行的打倒一切的冒险主义政策。尤其是这个时期的王明路线，不仅不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甚至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也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这种中间势力，结果是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自己陷于孤立。直到党把工农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原来拥护王明路线的同志中，仍然有某些人没有觉悟过来。毛泽东同志对这些同志的关门主义思想作了有力的批判，指出他们“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sup>①</sup>。

下面我们专门来考察一下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和蒋介石反动集团合作抗日中所进行的斗争及其主要经验。

<sup>①</sup>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49页。



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最主要的部分，是中国人民在国内的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要吞并全中国这件事，使这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暂时退居次要敌人的地位，并且在我們党和全国人民的逼迫和争取之下，参加了抗日，成为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翼顽固派。蒋介石集团拥有统治全中国的政权和几百万军队，代表英美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有主子作后台，当时争取他们，对于停止内战、实现抗日有决定的作用，对于争取英美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也有重要作用。历史证明，当时一切反对联蒋抗日、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见，都是错误的。但是，蒋介石集团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的是控制抗战，限制人民，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以保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后台老板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所以，他们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拥有一部分革命武装和人民政权。党依靠这支革命武装和人民政权，在敌后动员和组织人民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成为整个抗日战争的中心支柱。赖有这个中心支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到最后的胜利。但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和人民政权，在抗战开始的时候还很小，不但在党外，而且在党内，都有一些人看不起它，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这样，两个阶级，两个政党，两支军队：一个坚决抗日，一个消极抗日；一个坚持团结，一个制造分裂；一个依靠人民，实行人民战争，一个反人民，限制人民抗战；一个小且无外援，一个大且有外援。两者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一切中间阶层，中间党派，都鼓起眼睛望着这两个阶级、两个政党、两支军队，注意着他们之间的上述各种对立因素的斗争。在工人阶级、共产党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之间，从来没有存在过和进行过这样鲜明、这样尖锐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胜利谁属？属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才能把抗日战争引导到最后胜利，并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直到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历史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胜利的取得，经过了八年之久的极其严重和复杂的斗争。从这个斗争中，我们党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基本的和主要的有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实现抗日，我们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又主动地向国民党建议，要求国民党放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实行抗战和民主。在此条件下，我们党保证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将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改名为统一国家的特区政府，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党并且建议以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作为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另一方面，我们党又始终不渝地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方针。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和反复地说明了这个方针，并且指出这个方针的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毛泽东同志说：

“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路綫，必須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須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則。我們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綱領这个基础上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則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則的說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sup>①</sup>

“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脚，……我們的方針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統一，又独立。”<sup>②</sup>

这个独立自主的方針，給统一战线的內部关系，規定了一个民主的原則，給发展进步势力，爭取中間势力，孤立頑固势力，提供了一个銳利的武器，也就是給爭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提供了一个銳利的武器。

工人阶级政党在同其他党派的统一战线中，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严格保持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独立性。在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中，強調这个独立自主原則，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国民党頑固派从来不愿絲毫放棄其独裁統治，就是在抗日时期，頑固派也是要求一切統一于它，一切服从于它，不允許其他的阶级和党派有任何的独立性和民主权利。在统一战线中，国民党的态度是唯我独尊，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根本不容許有任何民主协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才能抵抗頑固派的独裁統治，冲破其控制、限制，把人民发动起来，把抗战推向胜利。当时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一切經過统一战线”的主張，实际上就是一切經過国民党，一切等待頑固派的点头，頑固派不点头，就什么事也不能干。这是一种把自己手脚捆起来、听凭宰割的投降主义。党和毛澤东同志严正地批判和克服了这种投降主义的錯誤思想，貫徹执行了独立自主的方針，才保证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在统一战线中，代表中間势力的民主党派，在頑固派面前更加沒有地位，更加沒有发言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統一，又独立的方針，同时代表了中間势力和民主党派的利益，引导他們向頑固派进行爭取民主权利和合法地位的斗争，帮助他們从斗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并且逐步地提高其政治的認識和信心。应该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沒有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針，沒有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各民主党派的成长和发展，是很困难的。

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針，最主要的是为了发展进步势力。在国民党統治区，党在这个方針之下，利用一切可能发展了进步势力，影响和爭取了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知識分子在內的广大群众。在敌后，党在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則下，冲破頑固派的限制，超越国民党限制的范围，不靠他們委任，不靠他們发餉，独立自主地发动和领导人民抗日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地組織人民团体，认真地加强

①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84頁。

②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問題》。《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8頁。



党的建設。党的建設，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中国人民手里的这三个主要法宝，三件主要武器，在敌后抗日战争中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內，空前地发展和强大起来，以至能够停止日寇的战略进攻，担負起抗击日伪軍主力的任务。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們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目的，总的說来，就是毛澤东同志指出的：“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經取得的陣地。这是我們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這個陣地就一切无从說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陣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sup>①</sup>正因为坚持了这个方针，我們才保持了党和工人階級的独立性；空前規模地发展了党和进步力量，很大程度上爭取了中間势力和民主党派，基本上孤立了頑固派，大大地发展了陣地。

由此可見，只有既統一，又独立，才能在工人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爭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孤立和战胜大資產階級。

第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又联合，又斗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解决矛盾，在新的基础之上，继续团结前进，这是我們党领导統一战綫、处理統一战綫內部关系的一般原則，一般政策。在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中，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因为情况特殊，又有其特点。有些什么特殊情况呢？就是：蔣介石集团虽然被迫参加抗战，但只是消极抗战，并且阴谋妥协投降；虽然被迫承认統一战綫，但没有放棄独裁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并随时准备分裂。实际上，国民党軍隊的主力不是用在抗日，而是用来封锁和牵制八路軍、新四軍，一有机会就挑起反共战争，并暗中勾結日寇，借刀杀人，阴谋消灭八路軍和新四軍。这就是說，同蔣介石国民党的統一战綫，乃是一种带有很大对抗性的合作。其原因，在于蔣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我們对蔣介石集团的投降、分裂阴谋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必須針鋒相对地进行严正的斗争。只有針鋒相对的严正的斗争，才能迫使他們不敢公开投降，不敢公开破裂，而有利于合作抗战，才能抵制其反动政策，和縮小其反共反人民的范围，而有利于发展进步势力，爭取中間势力。針鋒相对，以斗争求团结，这就是同蔣介石頑固派又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的兩面政策。毛澤东同志对这个革命兩面政策作了明确的說明和指示，他說：

“对于反共頑固派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頑固派又有兩面性，我們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結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頑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兩面性，因此我們的政策也有兩面性，即在他們尚不願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們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軍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sup>②</sup>

①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85頁。

② 《論政策》。《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61頁。





“有理，有利，有节”，是我們同頑固派作斗争的基本原則。有理，有利，有节，三者不可分离，不可缺一，但理是第一。在一切斗争中，理在我手，就能在政治上掌握主动权，取得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拥护，而使对方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地位，从根本上孤立起来。我們党是最先进、最能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們提出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先进最完整的路綫和綱領，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和文化上，制定了切合当时情况的一般政策和具体政策，并且把这个路綫、綱領和这些政策，在敌后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中付诸实施，給全国人民作出了光輝的榜样，同頑固派在政治上形成了鮮明的对照，道理完全在我們这边。这里所說的有理，是每一个具体斗争中要有理。有了理，还要有利，就是要在形势对我們有利，并有胜利把握的时候才斗。但斗，又不能一直斗下去，因为我們的方針是以斗争求团结，所以又要有节，适可而止，并且在斗争告一段落时，主动地同对方讲团结。把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則用来对付頑固派的軍事进攻，就成为“自卫原則，胜利原則，休战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于頑固派的軍事进攻，必須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但是不打无把握之仗，要适可而止。

在同頑固派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是一项重要的策略。国民党是一个成份复杂的政治集团，虽然頑固派占着統治地位，但不是全部。除了頑固派以外，还有許多中間派，也有一部分进步分子，这使我們有可能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在頑固分子里面，也是派系林立，利害不一，在不同时候和不同条件下，他們的态度和行动不尽一致。这使我們有可能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在每一次斗争中，不同时打击許多頑固派，而选择其中最反动的一部分，集中力量打击之。

在同頑固派斗争时，要注意争取中間派。我們同頑固派作斗争，是依靠进步力量，并且是为了保护进步力量的发展。但同时必須进行争取中間派的工作。中間派同頑固派有矛盾，因为他們經常地处于頑固派的压迫之下，我們同頑固派作斗争，同时也是保护了中間派的利益。我們同頑固派作斗争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則，又能使中間派認識到道理在我們这一边，感到我們是仁至义尽，不能不同情我們。所以争取中間派是可能的。但中間派总是动摇的，并且包括着各种不同的力量，我們必須在每一次斗争之前、之中、之后，都注意向他們做說服教育工作，对他們的錯誤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批評，才能争取他們中有些人中立，有些人同情，有些人参加，而把他們中的右翼分子孤立起来。我們党就是这样不断地向中間派进行争取、教育工作的。

第三，坚持国共合作，同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准备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內战天共，这是蔣介石国民党的根本方針，被迫接受国共合作，只是它的权宜之計。他的內战天共的根本方針从来不变。这就是蔣介石“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党和毛澤东同志看准了蔣介石国民党的这个不变的根本方針，在抗日时期，在不遗余力地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而斗争的同时，总是指示全党全軍提高警惕，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日本





投降以后，在不遗余力地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的同时，又一再指示全党全军提高警惕，准备以自卫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也只有向着最坏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才能在突然事变到来的时候，不致陷于手足无措。无论在抗日时期，或是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的军事政策是自卫的，又是坚定的，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并且对于敢来进犯的敌人，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正因为有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全党全军有了充分的准备，有了坚定的军事政策，所以在抗日时期，我们能够打退蒋介石国民党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制止其全面分裂的阴谋，把抗日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而在一九四六年，蒋介石集团敢于实行全面分裂，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以后，我们能够胜利地进行解放战争，最后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 四 区分主要同盟者和非主要同盟者，依靠工农联盟，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参加这个革命的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劳动人民为主体。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定。这个规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问题，也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主体和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军问题，从而也就明确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问题。

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的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谁能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问题，谁就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履行这个任务，只有工人阶级能够充当农民的领袖。“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sup>①</sup>。孙中山逝世以后，到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真正有可

<sup>①</sup>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076页。



能来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一到真正要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就感到恐惧了，并且终于背离工人、农民，附和了大资产阶级反革命。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最困难的环境中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现在的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般是赞成减租减息的，而真正赞成耕者有其田的却只有少数人。（解放以后，他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的制定，赞助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历史的记录正是这样：“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sup>①</sup>

农民问题也是我们党内区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一个分水岭。历史上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左”倾机会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认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不懂得工农联盟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右倾机会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看作主要的革命者和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例如陈独秀，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因此，他主要不是依靠同农民联盟，而是依靠同资产阶级联盟。抗日战争初期，第二次王明路线又重复了这种错误，他们认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而不是依靠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只重视工人运动，而轻视农民的革命毅力和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甚至害怕农民势力超过工人势力。他们不承认由农村革命根据地包围城市、到夺取城市的道路，而坚持城市中心论和由城市到农村的道路。这两种人既然都不能正确地解决农民问题，即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同盟军问题，他们也就无力正确地解决辅助同盟军问题。因此，他们也就都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只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热情地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并且提出了农民运动的正确路线。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土地革命运动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辟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又继续正确地解决了农民运动的一系列问题。这样，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就在中国造成了旋转乾坤、转换时代的工农联盟，就能够依托农民革命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组成雄偉的革命力量，夺取被反革命长期强固地占据着的城市。这样也就能够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有力地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对于农民运动可以有三种立场、三条路线：“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

<sup>①</sup>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076页。



們呢？还是站在他們的对面反对他們呢？”<sup>①</sup>毛澤东同志的路綫，就是站在农民运动的前面坚定地領導他們前进的路綫。这条路綫的根本点，一是坚定地相信农民群众是要革命到底的，他們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一切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将被他們葬入坟墓”<sup>②</sup>；二是坚定地相信党和工人階級是能够領導农民群众前进的，“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败，沒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sup>③</sup>。我們党贯彻执行了毛澤东同志的这条路綫，所以既能始終同农民群众站在一起，和他們同呼吸，共命运，又能給他們以工人階級的領導，帮助他們認識长远的利益和正确的方向，引导他們一步一步前进。

在这条路綫的指导下，我們党成功地領導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解决了农民問題，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經驗。这里，讓我們列举民主革命时期領導农民战争和建設农村根据地的几項主要的經驗：（1）武装农民，进行革命战争，建設革命軍队。（2）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发展革命根据地。（3）实行依靠貧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別地消灭封建剝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綫和总政策。（4）实行坚决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組織力量，发动农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綫方針，反对把土地“恩賜”給农民的錯誤方針。（5）在土地制度改革之后，領導农民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根据自願和等价交换的原則，組織互助合作，以利发展生产，限制农民在經濟地位上的新的分化。（6）建設根据地，发展生产，发展經濟文化事业，支援革命战争。（7）建立工会。建立青年团。解放妇女和青少年。（8）建設共产党，保证党的核心领导作用。（9）实行团结城市小資产階級、爭取民族資产階級和其他爱国分子的統一战綫政策。我們的經驗证明，以上这些是解放农民的必由之路，也是教育农民，在政治上把农民，主要是貧农群众，逐步提高到接近工人階級水平的必由之路。

城市小資产階級，是人口仅次于农民的一个广大的人群。他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压迫，大多数有很大的革命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工人階級的可靠的同盟者。在城市斗争中，小資产階級群众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們中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鋒的和桥梁的作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一九四五年的一二一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可以說，工人階級和城市小資产階級的联盟，是城市斗争的基础。应当扩大和巩固这个基础，以爭取和联合民族資产階級以及其他的爱国分子，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

城市小資产階級又是一个过渡性的階級，包含着許多的阶层，构成了从工人階級到資产階級之間的整个阶梯，他們經常处在資产階級影响之下。他們不是革命的主力軍，不可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更不可能有独立的出路。他們只有在工人階級领导下，并且只有同农民

<sup>①②</sup> 《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14頁。

<sup>③</sup>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06頁。



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发挥重要的革命作用，并获得自身的解放。毛泽东同志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sup>①</sup> 知识分子是这样，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也是这样。

我们党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团结他们，组织他们参加城市革命斗争，并输送力量参加农民战争。我们大量地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政府工作，加入我们的学校和其他文化工作，并将具备入党条件的人吸收入党，带领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地克服自己的弱点，同老党员老干部打成一片，融合起来，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融合起来。毛泽东同志说：“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sup>②</sup> 我们党成功地执行了这个政策，培养了大批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久经锻炼的党和非党的干部，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项宝贵财产。

在我国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已经一再分析过）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地动摇于工人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不但丧失了革命领导者的资格，而且不再是民主革命的进步力量。“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sup>③</sup>。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只能成为工人阶级的辅助同盟者。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又在政治上有相当影响，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有相当的重要性，而且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和足够的力量，他们的多数以至大多数就可以被争取到革命方面来，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又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的辅助同盟者，我们有必要和可能对他们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政策。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增加了革命的力量，有利于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且有利于争取在民族资产阶级影响之下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所以，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争取领导权的一项重要任务。

争取开明绅士也是重要的。开明绅士，即从地主富农阶级分化出来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个别人士，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民族资产阶级大略相同。开明绅士在政治上没有民族资产阶级那么大的影响，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没有民族资产阶级那样的作用。但是，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于实行减租减息，曾经给我们相当的帮助；在抗日战争后，又表示赞助土地制度的改革。这对于分化中小地主和中立富农，对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多数同土地有联系）和知识分子（他们多数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起了相当的作用。这些，又都是有利于我们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因此，我们对于开明绅士，也必须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政策。毛

①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46页。

②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11页。

③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6页。



澤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經指出：

“爭取中間勢力是我們在抗日統一戰綫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須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們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們的利益；（3）我們对頑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間勢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頑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軍；因为頑固派也正在极力爭取中間派，以便使我們陷于孤立。在中国，这种中間勢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們同頑固派斗争时决定勝負的因素，因此，必須对他們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sup>①</sup>

毛澤东同志在这里指出的爭取中間勢力的条件，也就是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条件，因为民族資產階級是当时中間勢力的主要角色。我們在抗日时期，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凭着这些条件，爭取了这个階級的大多数。

毫无疑问，爭取民族資產階級是經過了反复的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的，但这又不同于同大資產階級的又联合又斗争。民族資產階級没有大資產階級那么多的反动性和对抗性，并且基本上没有掌握过政权和武装力量。因此，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基本上没有武装力量的联合和斗争，而主要是政治上的联合和斗争。斗争的主要手段是批評和教育，而批評也是为着教育和团结。这在前面已經反复論述过了。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关于在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照顾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策問題，主要的有以下兩項：

（一）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經濟，公私兼顧，劳資两利”的經濟政策，一方面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他們发展生产、繁荣經濟的积极性，使他們有利可图；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国营經濟和合作社經濟，适当改善工人生活，不使私人資本壟断国民經濟和过分剝削劳动者。这对于私人資本，是又保护又节制其发展的政策，也就是在有利于国計民生的条件下，允許和保护私人資本的发展。这个經濟政策，是我們对整个民族資產階級，包括这个階級的右翼分子在內，所实行的政策。毛澤东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指出：“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少数右翼分子，他們也是革命的敌人”<sup>②</sup>。“当着他們的反动傾向尚能影响群众时，我們应当向着接受他們影响的群众进行揭露的工作，打击他們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們的影響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經濟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們就要犯錯誤。”<sup>③</sup>为了达到爭取这个階級的多數、孤立其少数的目的，我們对这个階級的經濟地位“在原則上采取一律保护的 policy”<sup>④</sup>。这个政策，一直实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經過国家資本主义基本上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止。

① 《目前抗日統一戰綫中的策略問題》。《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42—743頁。

② 《关于民族資產階級和开明紳士問題》。《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6頁。

③ 《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4頁。

④ 《关于民族資產階級和开明紳士問題》。《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7頁。





(二) 实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权。在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的条件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包括开明绅士，参加人民政权，并且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这种政权的人员分配曾经采取三三制，即大约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他们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占三分之一。这个政权，经过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民主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都是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统一战线工作，都必须依靠工人运动。工人运动，任何时候，都是党的一项根本工作，离开了它，就不能争取其他阶级。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构成整个的城市工作和城市斗争。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就走了由农村到城市的道路，总的说来，农村斗争处于主要地位，城市斗争是配合农村斗争的。“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sup>①</sup>。在农村工作和农村斗争成为中心的长时期中，党和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放松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并且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中，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形成了一条正确的策略路线。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条件不同，特别是由于敌人集中力量控制大中城市和交通要点，城市斗争显然和农村斗争不同，不能采取农村斗争和农民战争的策略，而应当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sup>②</sup>的方针。在这里，不是公开的红色组织，而是要善于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非法活动和合法活动。党的组织必须精干；必须极端秘密，善于荫蔽自己；而同时又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群众工作，并且打入各种群众团体，如黄色工会、学生会、教育团体、文艺团体、工商业团体、宗教团体等等，在这些团体中荫蔽自己，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群众。在这里，不可能像在农村根据地那样宣传和实行党的纲领的全部要求，而是要“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sup>③</sup>。在这里，阶级关系十分复杂，资产阶级的影响很大，必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30页。

② 《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62页。

③ 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转引自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35页。



須把下层群众工作中上上层統一战綫工作适当地結合起来，尽可能爭取中上层人士对斗争的同情、贊助和参加，以便团結他們和在他們影响下的群众，孤立主要敌人。这些，就是我們党在城市工作中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策略路綫的几个要点。我們党的城市工作，曾經长期地被“左”傾机会主义所統治。“左”傾机会主义者的主要特点是冒險主义和关門主义，反对刘少奇同志代表的正确策略路綫。他們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繼續坚持中心城市起义論，拒絕必要的退却和防禦，拒絕利用公开合法的可能，不顾一切地发动群众甚至强迫群众进行冒險的斗争，并且一定要斗争到底，“决不妥协”。他們拒絕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对于别的派別反对敌人的斗争，只要綱領、口号和他們不完全一样，就不給以支持，甚至加以反对；对于在群众組織中有影响有威望的其他派別的人士，一定要驅逐出去，直到只剩下“清一色”的“布尔什維克”，或者把这些团体“轉变”成紅色团体为止。这种冒險主义和关門主义的策略，在第三次“左”傾路綫統治时期，曾經使我們在城市中的力量差不多损失了百分之百。一九三五年以后，在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糾正和克服了“左”傾机会主义路綫，在城市工作中采取和執行了刘少奇同志所代表的策略路綫，城市工作才又获得很大的成功。这样，就从正面和反面证明了这条策略路綫的完全正确。

### 五 区分領導者和同盟者，发展工人階級的独立政治力量， 把同盟者提高到当前革命綱領的水平

在統一战綫中，工人階級要影响和爭取别的階級、阶层，别的階級、阶层也要影响和动搖工人階級。毛澤东同志在抗日戰爭初期曾經这样尖銳地指出：“在統一战綫中，是无产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还是資產階級領導无产階級？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問題即是說：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張的抗日救国十大綱領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資產階級专政和片面抗战？”<sup>①</sup>这个誰吸引誰、誰領導誰的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体的内容会不同，尖銳性的程度会不同，但这无疑是統一战綫中任何时候都存在的斗争。实现无产階級領導权的斗争，实际上，就是要在政治上把同盟者尽可能提高到当时革命斗争所要求的水平。工人階級在統一战綫中，不但决不可以被其他的階級、阶层所影响和动搖，以至把自己降低到同盟者的水平；而且相反，必須积极地影响和吸引其他階級、阶层，尽可能提高他們的政治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必須发展工人階級的独立政治力量，从根本上說，就是必須有一个成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又区别，又联合；先区别，而后联合。为了在統一战綫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政治上逐步地把同盟者提高到接近自己当前政治主張的水平，工人階級和它的先鋒队必須首先同一

<sup>①</sup>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势和任务》。《毛澤东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82頁。



切同盟者划清阶级界限，——既要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也要同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而后在一定条件下同他们建立共同行动。这在政治上说，主要地就是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纲领和口号，而后在这种纲领、口号的一部、大部或者全部的基础上，同其他阶级或者派别找到共同点，建立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同时在一切实点上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主张和行动，并且逐步地提高同盟者的水平。不这样，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就必然要在统一战线中犯投降主义或者尾巴主义的错误。

两个以上的阶级、两个以上的党派结成统一战线，一定要有共同的政治纲领作基础，才能有统一的行动。共同纲领，一般说来，总是反映当时历史条件下各阶级的力量对比和共同要求，而不可能反映各阶级的全部要求，各阶级还会保持他们自己的独立的要求。共同纲领表现统一，独立的要求表现矛盾，所以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就是对于共同纲领，各阶级各党派的态度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也就不可能不既有团结，又有斗争。所以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既必须有自己的独立纲领，这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纲领，又必须善于同别的阶级和党派达成共同的纲领，并经过共同纲领，又联合又斗争，逐步地把他们提高到自己最低纲领的水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的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经过了一个复杂的曲折的过程。

中国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孙中山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原来是反映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旧三民主义。一九二四年，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采取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更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这个政策和宣言，对外主张联合苏联和其他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在国内，主张联合共产党，唤起民众，扶助工农，建立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实行民族平等。这就是新三民主义。作为一般的政治纲领，新三民主义的这些主张，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的相应的主张基本上相同，因此成为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共同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纲领，在国民党内，实际上只有左派即革命民主派是坚决拥护的，除了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右派坚决反对以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多数的中间派是动摇的，要把他们提高到这个纲领的水平，还需要经过严重的斗争。当时，依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紧密合作，对右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曾经坚决地实行了这个纲领，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把革命推进到一个空前未有的高潮，这就是以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为标志的第一次大革命。这种形势，使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中间派则表现更大的动摇。同时，这种形势，又很有利于依靠和发展革命群众的力量，来稳定和争取中间派，彻底孤立和分化右派，贯彻实行新三民主义。很可惜，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放弃斗争，竟至形成完全相反的结果。



一九二七年以后，蔣介石国民党完全背叛了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們所实行的一切政策，基本上仍然是符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但是，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前，党内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放棄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特别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正在逐渐成为赞成抗日的各阶级、阶层和派别的共同要求，而“左”倾机会主义者仍然坚持自己的孤立政策，不善于在这些适合当时革命要求的口号上同其他派别达成共同纲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进一步教育和提高同盟者。这样，他們就在实际上放棄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

遵义会议以后，党和毛澤东同志在理論上和政策上大大地发展和完备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毛澤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論》、《論联合政府》和《論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在理論上和政策上闡明新民主主义纲领的經典著作。另一方面，党和毛澤东同志又善于同别的阶级、派别达成共同纲领，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正式声明願以新三民主义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纲领。党在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彻底实行了这个纲领，同时向反对和破坏这个纲领的国民党頑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此空前地壮大了进步势力，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間势力的左翼提高到新三民主义的水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也把他们の中間分子提高到接近这个水平，孤立了他們的右翼，更孤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頑固派。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革命高潮已經到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接近最后胜利，不仅新三民主义，而且全部新民主主义纲领就要完全实现。因此，我們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間势力的统一战线，已經不只是要把他們提高到新三民主义的水平，而是要进一步把他們提高到整个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水平。这当然更不能不经过尖锐的斗争。斗争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关于推翻蔣介石为首的整个反动统治，关于耕者有共田，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这个斗争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我們在前而分析过的中間路线问题。整个斗争的結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間派别的大多数，宣布拋棄中間路线即旧民主主义道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全国解放以后，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分子、城市民主改革、三反五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几大运动，进一步比較彻底地清算了在这些問題上的中間路线思想。

为什么說不仅要把民族资产阶级提高到新三民主义的水平，而且要逐步把他們提高到全部新民主主义的水平？因为我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不仅同新三民主义有基本相同之处，而且存在着根本性的原则区别，这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孙中山主張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誰来联合和扶助呢？孙中山主張实现“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政权，誰是这个政权的领导者呢？孙中山的意思显然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我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則明确规定由工人阶级領



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达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讲到人民民主专政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关系时，曾经这样指出：“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sup>①</sup>

(二) 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工农联盟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三) 把革命进行到底，即革命的彻底性。这就是放手发动和武装平民，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用马克思所说的“平民手段”，彻底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和土地革命。这是不承认工人阶级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不承认农民为革命的主力、不承认工农联盟为统一战线的基础的三民主义者，一概做不到的。

(四) 准备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从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具体分析出发，提出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规划。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分作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混淆两个阶段的不同任务。而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互相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这样，我们的全部纲领就包括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和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两个部分，并且在新民主主义纲领中就包括着由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这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建立和巩固，工农群众的彻底发动和武装起来，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合作社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革命的彻底性等。在这个问题上，最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例如孙中山，也只是抱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以为只要实现了三民主义，就可以使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就不需要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

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这些区别，来源于不同的世界观。这是共产党同一切革命民主派在政治上发生原则区别的根本出发点。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和我们共产党人共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条件下，面临着共同的革命任务，在几个基本点上，达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又由于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而同我们发生原则的区别。

以上，我们论述了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又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之间的共同点和区别，同时也论述了我们党怎样一步一步地提高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的政

<sup>①</sup>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2页。





治水平。总的說来，我們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不但必須把民族資产階級从旧民主主义提高到新三民主义的水平，而且必須把他們逐步提高到工人階級最低綱領即新民主主义的水平。这个历史任务，我們經過二十八年的斗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基本上完成了。近十年来，又在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这个階級的人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使他們在政治上能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跟随工人階級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现在看来，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經過长期的努力也是能够逐渐完成的。由此可见，把民族資产階級的人們在政治上提高到工人階級的綱領的水平，这是，也只能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逐步发展以至曲折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是有同有異，有联合有斗争，在同样的方面合作，在異的方面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把他們提高一步。派別不同，同異的内容和程度不同，联合和斗争的内容和程度也就有所不同。这样又联合又斗争，把同盟者逐步地提高到自己的綱領的水平，就把原則性和灵活性、把工人階級的独立性和广泛的統一战綫結合和統一起来了。

工人階級同小資产階級划清界限，把他們逐步地提高到自己的水平，这在中国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不仅表现在統一战綫中，而且还表现在党内斗争中。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城乡小資产階級极为广大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有强大的小資产階級政党。中国工人階級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真正代表全民族利益，特别是在全民族人口中占最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階級利益的唯一政党。因此，不仅广大的小資产階級群众能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并且有大批小資产階級革命民主分子到工人階級的队伍中来寻找出路。中国工人階級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資本主义三重压迫，沒有社会改良主义的經濟基础，并且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沒有社会民主党的傳統，所以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决性。但是工人階級人数較少，年龄較輕，多数是破产农民和其他劳苦群众出身，同农民和其他小資产階級群众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这种历史条件，在一方面，不仅便于工人階級同广大的小資产階級群众結成亲密的联盟，而且使中国共产党有必要和可能吸收大批的小資产階級出身的先进分子，把他們改造成为工人階級的战士，建成一个能够联系最广泛的劳苦大众的群众性的党。另一方面，这又使我們党不仅在党外处在小資产階級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也是小資产階級出身的党员占了多数，他們或多或少地带着小資产階級思想的尾巴。即使是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这种条件下，也容易沾染小資产階級的色彩。

我們党已經证明自己有能力改造和溶化小資产階級的先进分子，使他們成为工人階級的坚定战士。我們党的大批优秀的干部和党员，大都是从小資产階級分子改造过来的。但是，这种改造是不容易的，根据我們党的經驗，需要經過长期的实践和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同志的小資产階級思想必然要在党内反映出来，表现为右的或者“左”的錯誤。尤其在他們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階級的階級觉悟，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的时候，他們往往以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維克”，不仅不接受党的改造，而且要按照自己的面



貌来改造党。“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 and 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sup>①</sup>。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右的或“左”的路綫錯誤，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篡党的表现。

我们党又长期地处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者同他们分裂的环境中。由于这种环境，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有时向右边发展，有时向“左”边发展。历史經驗表明，在我们党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在这种时期，由于联合，就容易有一些同志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原則界限，而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綱領、政策、思想、实践看成一样的东西；由于强调团结，就容易在不同程度上忽视斗争。特别是党内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在这种时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表现出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王明路綫，就是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接受自由资产阶级思想以至大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在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的历史时期，党内则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在这种时期，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容易激起同敌人拚命的急躁情绪；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容易激起忽视同盟者的情绪。特别是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反映着小生产者在经济上的不稳定性和孤立性，对于长期残酷的革命斗争缺乏顽强性和坚韧性，在这种时期容易表现为打倒一切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綫，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左”边的发展。

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必须特别注意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防止党内右的偏向；而在同资产阶级分裂的时期，则必须特别注意同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划清界限，防止党内“左”的偏向。

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右的和“左”的錯誤路綫，从思想方法上說，来源于他们的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識而缺乏感性知識，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們前面所說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識，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們前面所說的經驗主义”<sup>②</sup>。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經驗主义者往往成为教条主义者的俘虏，因为教条主义者能够背誦馬克思列宁主义詞句，借以諱众取寵，吓唬經驗主义者；同时教条主义者如果没有經驗主义者的合作，也不易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51—52頁。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52頁。



流毒全党，因为經驗主义者一般担任实际工作，他們接受了教条主义，就把它贯彻到实际中去。不論教条主义，或者經驗主义，都是主观主义，都違反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则。这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就是中国历史上右傾路綫和“左”傾路綫的思想根源。右傾机会主义者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下，抄襲西方资产阶級革命的旧套，用一座万里长城隔斷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把民主革命和統一战綫的领导权送給资产阶級，他們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完全丢掉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陈独秀主义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左”傾机会主义者往往抓住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語句当作教条，并且机械地、生硬地搬用外国无产阶級革命的某些經驗，而不顾中国的具体特点。他們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統一战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三次“左”傾路綫，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

所以，在党内克服这一切主观主义思想，树立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思想，是建設共产党的最根本的問題，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只有这样，只有在党的骨干中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右的和“左”的錯誤，而有一个政治成熟的党。只有这样一个党，才能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級的领导权，保证中国革命到达胜利。

我們党走过长期曲折的道路，到一九三五年遵义會議，終于結束了錯誤路綫的統治，确立了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在全党的领导。在遵义會議以后的十年間，党在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又进一步在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中，逐步地从思想上和实践上克服主观主义，树立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方向和作風。毛澤东同志一方面引导党的干部在工作中实行調查研究、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并亲自作出了良好的范例；另一方面，引导干部学习党的历史，从党的正确和錯誤、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的历史經驗中吸取教訓，把历史經驗提高到理論的水平。毛澤东同志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实践論》、《矛盾論》、《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等著作，就是这方面的光輝范例。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毛澤东同志又发起和領導全党整風运动，对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集中地进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并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結同志”的方法，彻底地清算了历史上历次路綫錯誤及其思想根源，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害最大的第三次“左”傾路綫及其思想根源——教条主义。这样，从一九三五年起，經過十年的時間，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終于使全党在毛澤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团結。这是我們党的建設上一个重大的历史轉折点，是我們党成熟的标志。毛澤东同志在党内树立的調查研究、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则，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党的团結，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不但决定了尔后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而且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在今后，將繼續保证我們党无往而不胜。



# 肯尼迪的裁軍童話和大炮預算

張 振 亞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美国統治集团的首脑人物散播了很多关于“緩和緊張局势”、爭取建造一个“实行裁軍的秩序井然的世界”之类的好話，以表示他們对和平的“向往”。不管他們做的是什么事情，这类好話是他們一有机会就要讲的。

“美国认为裁軍問題非常重要”，“必須不断努力以寻求一种切实可行和可靠的办法来削減軍备和限制軍备竞赛”。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月七日在广播节目中作了这样的宣布。

“我們必須繼續不断地寻求和平——自由的人們能够获得安全的光荣的和平”。美国副总统約翰遜最近也在叫嚷。

“我們的最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每个国家不論大小都可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和平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实现一种有保证的裁軍或裁減武器的制度。”肯尼迪政府的国防部长麦克納馬拉一月十九日在参議院軍事委员会會議上也这样說。

至于肯尼迪本人，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讲得更为聳人听闻。他說什么“只有在全

世界放下这些似乎为目前提供了安全但是却使我們将来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武器的时候，世界秩序才会得到保证”。他还假仁假义地叹息道：“这个地球上的广大資源正在越来越多地用于毁灭人类生活而不是用来丰富人类生活的手段。”

肯尼迪和他的閣員們在編造什么他們願意“裁軍”、“和平”和“放下武器”的謊話方面，的确有着出色的本領。他們显然想把全世界二十几亿人都当作幼儿园里天真的儿童来加以欺騙，以为只要天花乱墜地胡吹一通，就可以使他們乖乖地落入自己的圈套。

可是，謊言終归是謊言，戴着“热爱和平”的假面具的肯尼迪之流，不但不能用行动哪怕是暂时地支持一下他們的漂亮謊話，而且这出西洋景，很快就为他們迫不及待的各战行动戳穿了。

反映肯尼迪未来政策的实质的一九六三财政年度“預算咨文”出籠了。同肯尼迪的“和平”謊言相反，这个預算竟有五分之四的开支被用于軍事或同軍事有关的项目。其中所謂“国防开支”的直接軍費，据估計就是五百二十七亿美元，比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一



九六一财政年度的龐大軍費又增加了五十二亿美元。这个預算不仅費用更大，火药气味更濃，而且它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对战略核武器和常规軍备双管齐下，都給予大量撥款：以九十四亿美元发展远程轰炸机、洲际彈道導彈、“北极星”導彈潛艇等战略武器，以一百八十四亿美元加強既能打大战又能打有限战争的常规部队，以十三亿美元提高海运和空运能力，以五十七亿美元用来研究和發展某些特定武器……。

“战争預算”，这就是新預算一露面便取得的头衔。連《紐約时报》也不得不說，这是一个大炮預算。

当然，在这个加緊备战的預算中，任何“裁軍”的鬼話都被吹得无影无踪了。但是，事情到此并未結束。原来这份預算，还只是肯尼迪政府在它拟訂的“五年防御計劃”中迈出的第一步，未来的扩軍备战的規模比这还要大得多。据麦克納馬拉透露：一九六六财政年度美国的“国防开支”，估計将从目前的五百多亿美元增加到六百七十亿美元。

肯尼迪的新預算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倒不用人們去費心猜想。据美新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狄龙一月二十一日在美国全国无綫电——电视节目中，已就新預算所反映的“开支哲学”的变化作了介紹：“現政府不仅強調全面核战争的問題，而且更加多得多地強調打有限战争的能力。”

肯尼迪在战争問題上要使美国成为多面手：既要打全面核战争，又要打所謂有限

战争和次有限战争。用肯尼迪的軍事顧問泰勒的話來說，就是“美国必須准备对付一切形式的战争，不論是以原子武器，以常规武器，还是以游击战术进行的战争。”这位所謂有限战争的“专家”还透露了做出这个决定的經過。他說：“只是在去年，我們最后才开始重新制訂我們的战略，以便符合国际生活的冷酷的事实。在那个时候里，我們采取了重大步驟，来改善我們的常规战争的能力”。

什么是泰勒所謂的“国际生活的冷酷的事实”呢？美国为什么有必要准备打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而且要“更加多得多地強調打有限战争的能力”呢？請听一下麦克納馬拉最近在美国参議院軍事委员会为新的軍事預算作证时談到的美国“軍事需要”吧！

这位前福特汽車公司總經理列举了“柏林危机”和“为南越的前途进行武装斗争”的种种“需要”之后，就念念有詞道：“老撾的主权仍在未定之天。共产党人一直設法在剛果获得立足点。他們已經控制了离我們自己的海岸只有九十英里的古巴。”他还叫嚷：“世界其他地区的极其不稳定的局势可以为共产党人提供其他的机会来扩大斗争地区。在非洲新兴国家、东南亚比較新的主权国家和那些現在和将来將經歷巨大的社会改革时期的南美和中美国家中，这个问题特別尖銳。”

在“反共”的幌子下鎮压民族解放运动，已經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老手法了。这位国





防部长口中讲的虽然是“防共”，但是，骨子里是在耽心遍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怒火会越烧越大。显然，肯尼迪强调打有限战争的动机正是在这里。

发展核战略武器准备打世界大战，用常规武器和所谓“反游击战”来镇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人民革命风暴，这就是肯尼迪的全球战略部署。肯尼迪准备的常规武器，当然不会仅是为了用来镇压民族解放斗争，他还企图用它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挑

衅，同样也能用它来对付老牌殖民国家。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用武力在刚果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且同那些老殖民主义者不断厮杀，不就是一个实例吗？

希特勒分子曾叫嚷“大炮代替牛油”，狡猾的丘吉尔则宣称“武装起来进行谈判”，形式不同，好战的实质则一。而肯尼迪一面喧嚷全面裁军，一面大规模地全面备战，他的凶狠和狡诈，比起他的这些“前辈”来，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美帝国主义会放下武器吗？它会全面裁军吗？这当然是童话。对此，肯尼迪的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早在一九五七年《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就说得很明白：“如果事实上诉诸武力不可能，外交也可能失去效力。”麦克纳马拉最近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也说：“我们切不可迟疑不拿起武器来捍卫自由和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

肯尼迪政府执行对外侵略政策，是由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不执行这种外交，帝国主义就不能生存；而没有武器，这种外交就寸步难行。帝国主义不要武器是无法想像的。

因此，肯尼迪的裁军童话不可信也不能信，这才是“国际生活的冷酷的事实”。



平 衡 方 成



# 美国式的“自由”

陈 原

## 一、誰的“自由”

肯尼迪在今年的“国情咨文”里，一連用了二十几次“自由”的字眼。这个踐踏自由的政治騙子，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如他自己所吹播的“自由的偉大捍卫者”。他不知羞耻地大談其“自由的經濟”、“自由的制度”和“自由的社会”等美国式神話，并且推而广之，要人們通过所謂“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什么“自由的国际大家庭”。真是好听得， “自由的气氛”一时似乎瀰漫整个华尔街了。

就是肯尼迪大肆吹嘘“自由”的时刻，在美国每分钟所发生的事件，却給这位总统所贩卖的“自由”究竟是什么货色作了注脚。最近，美国联邦法院正忙于准备“审讯”美国共产党员，而国务卿腊斯克更加急躁，他宣布立即吊銷美国共产党人的出国护照。肯尼迪的“先驅者”希特勒，在三十年代演出过名为“审讯共产党员”实即加紧法西斯化的丑剧，而今肯尼迪公然走上这条老路。如果說三十年代的美白宮，曾因共产党合法存在而标榜过“民主”“自由”，那么，现在連那一点点裝門面的“自由”，也給取消了，現

在只剩下挂在肯尼迪嘴边作为釣餌的所謂“自由”了。

从字典里檢出动听的字眼来裝飾自己、欺騙別人，那是政治騙子擅长的慣技。反正动听的字眼多得很，它們在肯尼迪之流的心目中，本来不值几文錢；但是将这些动听的名詞变成现实——而不是騙局，那就决非政治騙子們所願意或所能做的了。例如，肯尼迪在这次“国情咨文”里，又一次吹嘘“自由的制度”下的“自由”权利，說什么美国的公民都有“不受任何障碍越过州界旅行的权利”——仿佛这是“自由”得无以复加，簡直是身在天国了。可是神經正常的成年人驟然一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美国公民从这个州跑到另一个州，恰如一个屋子的主人(假如他是真正的主人)从这个房間跑到那个房間，难道这也值得自我吹嘘地說：瞧，我是多么自由呀！这岂不要叫人笑破肚皮。可是事情还不止此：甚至肯尼迪所吹嘘的“不受任何障碍越过州界旅行的权利”那种“自由”，究其实也不过是写在紙上的东西，对于一般人永远是不会兌現的。不管話說得



多么漂亮，事实终究是事实。举个例子说，去年五月和十一月里，美国一群黑白青年组成的“自由乘客”，就为着“不受任何障碍”通过州界旅行（当然也包括通过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州界），在蒙哥马利城和麦克康城遭到法西斯暴徒的“自由”殴打，伤亡累累。人们不禁要追问：写在纸面上的“自由”，究竟是誰的自由？肯尼迪们、洛克菲勒们、胡佛们乘着汽车去作竞选旅行时，或去镇压罢工时，或去海滨避暑时，他们倒确是有“不受任何障碍”地通过州界的自由。他们有自由。普通的百姓呢，即使标明是“自由乘客”，也并没有自由。举一反三，由此可见美国式的“自由”的秘密。

秘密就在于：在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私

有制统治下的美国，自由总是跟财产并列的。你有多大财产，你就能有多大自由。对于美国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他们除了有受压迫、剥削和失业、穷困的“自由”外，又能获得什么自由呢？肯尼迪之流奢谈“自由”，完全是愚弄人民的鬼话。事实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人民最容易得到的，只能是《纽约时报杂志》有一期报道过的这一类自由：——纽约一个母亲将两个儿女留在百货公司，留下了一张字条：“我十分爱他们，但是我沒有钱，沒有吃的，也无路可走。请大家可怜可怜他们吧。”写到这里，不免想起列宁的名言：“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①

## 二、所謂“最巩固”的“自由社会”

肯尼迪还在“国情咨文”里吹嘘美国这个“自由的社会”将成为“人类所締造的”“最巩固的组织形式”。但是，正如谚语所说：“纸包不住火”。前不久，美国特务头子胡佛在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谈话时，对这种所謂“最巩固”的“自由社会”作了露骨的自供。他说，按一九六〇年统计，在那么“文明”并且那么“自由”的美国，“平均每五十八分钟就发生一桩杀人案；每三十九秒钟就会有一桩夜盗案；每隔六分钟出现一次搶劫案；每分钟都会有一回大盗窃案；隔三十四分钟就发生一件强奸案；每四分钟出现一次凶杀案；而盗案案則每两分钟有一次。”胡佛还一再说明，很多案件都是青年入

干的。

美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当然不能过分相信。但是哪怕是缩小了很多的上列数目，也可以让读者从中看出所謂“自由的社会”里“最巩固的组织形式”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原来只不过是盗窃、搶劫、谋杀、强奸……。

人们说，这都是社会渣滓干的。不错，但是在资本惨重剥削下和在黄色文化“教养”下的“自由”美国，正是社会渣滓产生的沃土。受害的是誰呢？不是洛克菲勒们——他们出入有避弹汽车，有私家偵探，屋子内外装了铁门和警铃电网，而他们的财产大批变成资

①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6页。



本，正向国内或国外进行着剥削；也不是肯尼迪们——他们是垄断资本的忠实走狗，凡是资本家有的保卫武器，他们全有。受害的是手无寸铁、而且只有仅剩的生活必需品和廉价生命的普通美国人民。提起生命，在胡佛们的眼中本来是不值钱的，因此统计里没有这一项。胡佛只说，美国男女老幼——从婴儿一直到老太婆在内——每年因为偷窃、抢劫等等而损失的，平均每人要付出一百二十八元。以四口之家来计算，每户每年得为此损失五百一十二元——这对于一个年薪收入不满二千五百元的劳动人民来说，就意味着每个家庭每年得因此被夺去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收入！按

照胡佛的说法，这些损失是公民们对于自己的安全“漠不关心”所造成的，这与“最巩固”的“自由社会”没有关系。

美国人民由于被偷窃、抢劫等等而受到的损失固然不小，但使他们受害最大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被垄断资本所“自由”吞噬去了的难以计算的剩余价值。我们在这里利用胡佛的材料，将这“自由”的社会加以揭穿，只不过是因为肯尼迪厚颜无耻地提到“最巩固的组织形式”罢了。问题还不仅限于在美国国内。在发表胡佛谈话的同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还刊载了一则加拿大消息，据说大批美国罪犯涌向美加边境，在那里缔造“最巩固的组织形式”，大肆抢劫、贩毒、



### 为 篡 者 釣 米 谷

卖淫、强奸和伪造文件……。这些罪犯一方面在麻醉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一方面又夺取他们被资本剥削所剩下来的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财产”和不值钱的生命。这样的现象已引起了加拿大公众的忧虑——其实这何止加拿大一国呢？美元所到之处，例如日本、西德，都在“缔造”着肯尼迪所谓的“自由的社会”。上举那条消息的标题说：“犯罪成为美国的输出品”。不错，对得很。但是在肯尼迪所谓“对自由(!)有所帮助”的输出中，区区几个罪犯，只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一点点小意思。打着“自由的国际大家庭”的旗帜，进行压榨、剥夺和吞并，这才是肯尼迪们最大的输出品。



## “神圣”的祈祷和肯尼迪的谎言

岑 桑

据说，当美国国会举行会议时，国会议事堂的圆顶下，便会出现御用牧师的祈祷的声音。

“不要让我们落入迷途，你哀怜我们，你用自己奇妙的智慧教我们去反对自私自利，并在对一切人自由和公正的基础上支持我们的共和国。”牧师总是如此这般地开始他为会议而向上帝做的祈祷。

御用牧师每背诵一次诸如此类的经文，自由神的脖子上就多加上了一条绞索。一九四〇年，上帝“哀怜”了议长大人和议员先生们，于是“史密斯法”立了案；一九五〇年，上帝又以他“奇妙的智慧”使“麦卡伦法”顺利通过。……今天，也许又是“万能的主”慈悲为怀的缘故吧？他“在对一切人自由和公正的基础上”，再一次“支持”了白宫那些刽子手们履行自己的职责——向美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开刀。

在那整个空气都为压榨和欺瞒所窒息的美式“自由社会”里，在国会会议前如此装模作样地作一次祈祷，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用上帝的名义来掩饰那些垄断寡头们残害人民的罪恶行径罢了。

用连篇的华丽词藻和诳人的鬼话打扮自己，肯尼迪可算是个能手。这个美国百万富

翁的忠实奴僕、扼杀美国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刽子手，在两三年前，为了要捞取政治资本为他爬进白宫做准备，曾经喋喋不休地大谈什么“公民自由”，甚至煞有介事地激烈抨击过艾森豪威尔政府，指责它“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不能保障人民的权利；认为那是像凶猛的恐龙一样“愚笨”，呼吁人们“不妨想想它（恐龙）的下场”。肯尼迪引用美国“建国祖先”的话慷慨陈词：“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认为造物者赐予他们以某些不可或缺的权利，其中包括维护生命、维护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他还说什么“自由是为安全服务的”，“自由与安全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矛盾；这是我们对于美国传统所抱的坚持不懈的信念”。好一个美国人民自由权利的维护者！肯尼迪说尽这些美妙动听的话，无非是想使人相信，他可以充当美国“自从林肯任总统以来最有能力的领袖”，如果让他当上总统，将会给予美国人民充分的自由。

然而，这一切都只像国会会议前牧师所做的祈祷一样，完全是一些骗人的鬼话。你看，当这位肯尼迪当上了总统以后，他所做的并不是什么维护“公民自由”的事业，而是拼命扩军备战，进行着妄图奴役全世界的“本世





纪的最大的冒险事业”。美国人民不但没有获得什么新的“不可或缺的权利”，相反，他们却被要求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冒险计划作出“更大的牺牲”。肯尼迪政府在反共的招牌下，更大规模地剥夺美国人民本来已经被剥夺得支离破碎的权利，这个政府比曾被肯尼迪激烈抨击过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还要残暴地蹂躏着美国的公民自由。

“神圣”的祈祷已经做过，肯尼迪此刻正在为所谓“美国安全”而声色俱厉地振臂高呼。从他的语调听来，“自由”与“安全”之间，显然已决不是“没有真正的矛盾”了，他公开把所谓“对于美国传统所抱的坚持不懈的信念”打下了十八层地狱。他在维护国家

“安全”的借口下，正在把美国的“公民自由”一笔勾销掉。但是，事情也很清楚，肯尼迪之流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往前走，他们的凶残的本质也就在美国人民面前越加暴露出来了。肯尼迪虽然冒充着维护“公民自由”的样子，抨击过他的前任不能保障人民的权利，可是他却干着比他的前任更多更坏的坏事。从前他说什么“不妨想想恐龙的下场”，而今他却只能继续走着恐龙的老路。历史对于美国统治集团就是这样决定着。亿万美国人民决不能永远任凭少数垄断寡头们压迫和奴役，他们在美国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中，终将会得到教训，学会更好地进行斗争的本领，争取他们应该享受的一切权利。



临刑前

官克

——神父：懊悔吧！我的孩子。



# 增产更多更好的日用轻工业品

· 孔祥楨 ·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輕工业占有重要的地位。毛澤东同志曾經把重工业、輕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問題，看作是我国工业化的道路問題。他說：“我国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須肯定。但是同时必須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輕工业。”<sup>①</sup>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決議也指出：“……必須根据原料、資金的可能和市場的需要，积极发展輕工业。采取这个政策，才能够有更多的消費品来供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繼續保持物价的稳定；才能够有更多的日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在經濟上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够更快地积累資金，来帮助重工业的发展。”<sup>②</sup> 实践证

明，这些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广大人民对輕工业品的需要量很大。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需要

量将日益增加。解放以来，輕工业产品的生产，已經有了很大的增长，目前，由輕工业（包括手工业）所提供的社会零售商品数量，約占整个零售商品总额的一半。輕工业在滿足城乡人民日常生活需要中，起着重要作用。

輕工业对扩大城乡物资交流，从經濟上加强工农联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現阶段，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資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由于工业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农业主要是集体所有制，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經濟联系，必然要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进行。城市和工矿区居民，吃的基本上来自农村，穿的和用的很多也是以农产品作为原料制造的，这就要求农村供应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原料。而农村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也要求城市供应更多的工业品。因此，多生产一些輕工业品供应农村，就有可能从农村换得更多的农产品，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发展輕工业可以为国家建設积累更多的資金。毛澤东同志指出：“……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輕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滿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頁。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1頁。

③ 《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4頁。



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③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国家的积累基金和财政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轻工业提供的。

重工业的发展，也必须以轻工业的发展为条件。重工业不仅依靠轻工业提供一部分资金和日用消费品，而且依靠轻工业提供一部分生产资料。轻工业发展了，可以从多方面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当然，轻工业的发展决不能离开农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物质生产部门，它们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轻工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农业，同时，也必须依靠重工业。只有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才能够保证轻工业更好的发展。

## 二

轻工业部门同其他工业部门一样，在一九六一年认真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取得了初步成效。轻工业的各项产品，除了受农业歉收影响的以外，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经过广大职工群众的努力，许多轻工业产品不仅数量有了增加，而且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一九六二年，轻工业部门的中心任务是：继续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增加生产；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品种；厉行节约，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计划任务。

完成这些任务，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国由于农业遭受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暂时困难，正在逐步地

克服着。由于坚决执行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整个工业战线上的形势必将越来越好。在几年大跃进中，轻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由于加强了党的领导，企业广大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也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尽管当前还存在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前进中的困难，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政策，鼓足干劲，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继续前进。

要完成一九六二年新的生产任务，从物质技术条件来说，关键在于组织轻工业的原料、材料的生产和供应。轻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材料，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与日俱增的。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来自农业的原料，同时，也要积极开辟新的原料来源。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经验来看，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发展和充分利用来自农业的原料。在轻工业原料中，农产品占相当大的比重。除纺织工业以外，轻工业部所主管的六十三种主要产品，有十八种是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这些产品的产值占六十三种产品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为了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要正确安排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比例关系，保证经济作物所必要的播种面积，并且切实贯彻各项有关政策。这是当前解决轻工业原料问题的主要途径。种植一定比例的经济作物，不仅对国家有利，而且也有利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 and 社员个人收入的增加。同时，



只有农村为轻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城市才能供应农村更多的轻工业品。

为了取得更多更好的来自农业的工业原料和固定原料的供应关系，有的地区建立了原料生产基地。原料生产基地最大的好处是，产品的商品率高，同加工工业的发展相适应。食品行业有些企业所建立的原料生产基地，对于解决它们的原料来源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北京葡萄酒厂，在一九五六年建立原料生产基地以前，葡萄的收购量只有二十多万斤；建立原料生产基地以后，一九六一年就收到了三百五十多万斤，葡萄酒的产量也从一九五七年的四万多斤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一千多万斤。

轻工业原料生产基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轻工业部门自办农场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农场一般的是侧重于生产小配料、辅助材料和培育良种，带有试验的性质，还不可能大面积地种植经济作物。

其次，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使用来自工业方面的原料。目前，在轻工业原料中，农产品占很大比重，但是，仅靠来自农业的原料，还不能满足轻工业发展的需要。轻工业必须扩大新的原料来源，更多地采用来自工业的原料。来自工业的原料的生产，一般说来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大，生产比较稳定。特别是用合成方法制成的原料，对于保证轻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扩大品种，有更大的作用。同时，轻工业更多地使用来自工业的原料，是合乎节约原则的。例如，一千万斤合成脂肪酸，可以代替生产三千万条

肥皂所需的油料，即抵六、七十万亩土地生产的油料。每一立方米木材所制成的人造纤维，抵六、七亩土地所生产的棉花。每生产二千斤从石油废气中提炼出的合成酒精，可以代替六千斤粮食。

轻工业生产采用来自工业的原料，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但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而且，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轻工业一个部门的事情，还必须以重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化学、冶金、石油等工业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把轻工业所需要的来自工业的原料的生产，分别纳入有关部门的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充分发掘轻工业的内部潜力，最节约最合理地使用现有的原料、材料。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某些原料、材料还不能充分满足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原料、材料在使用上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浪费。拿同一产品的原料、材料消耗定额来说，不同企业有很大差别。例如，每制造十万支铅笔的椴木木材消耗定额，有的铅笔工厂是三点四立方米，有的是四点四立方米，相差近百分之三十。如果消耗定额都达到先进企业的水平，一年内就可以为国家节约几千立方米木材，增产上亿支铅笔。原料、材料消耗定额的高低，同技术装备和原料、材料的好坏有一定关系，但是，如果企业管理工作做得好，节约原料、材料仍然是有很大潜力的。有些工厂由于加强了对职工的思想教育，进行技术革新，改进企业管理，在相同的条件下，他们就节约了更多的原料、材料。



### 三

努力提高輕工业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是輕工业部門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产品质量的高低和品种的多少，是国家工业技术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志，也是决定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条件。对輕工业生产部門来说，则是考察企业为广大消费者服务得好坏的一个重要尺度。

一九六一年下半年，輕工业产品的质量比上半年有了提高。在日用工业品中，縫紉机、自行車、钟表和搪瓷制品等的质量，提高得比較显著。例如，上海对一百一十一种产品进行檢查的结果，上半年质量合格、用户满意的有九十五种，即占百分之八十五；下半年上升到一百零六种，占百分之九十五。但是，有些产品的质量仍然不好或不稳定，这是需要认真解决的問題。

在輕工业生产中，必須正确处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有的同志认为，要完成产品的数量任务，就不能保证产品的质量。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我們认为，在积极完成产品数量任务的同时，必須保证产品达到規定的质量标准。如果不重視质量，产品达不到規定的质量要求，降低了使用效果，即使完成了甚至超額完成了数量任务，也不能算真正地完成任务。比如，一双胶鞋可以穿六个月，如果只穿三个月就坏了，那末这双胶鞋就不是原来意义的“一双”胶鞋了。有些产品要求质量更严，离开了規定的质量标准，就沒有数量可言。例如，钟表的走时誤差超过了規定的标准，就沒有使

用价值，食品的生产不合卫生条件，只有报廢。

质量不好的产品，如果是消费者使用，就会使他們蒙受經濟上的損失；如果是企业和机关使用，就会影响这些单位的生产和工作；如果在本企业内部返修或报廢，就会影响企业生产計划的完成，造成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的浪费。因此，产品质量的好坏是一个涉及到全局的問題，是一个同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有着密切联系的問題。重視产品质量，是对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負責的表現。刘少奇同志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現在我們的經濟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現在它的质量上面。”<sup>①</sup> 保证和不断提高輕工业产品的质量，是企业 and 每个职工的重大任务。

有些同志认为，輕工业产品质量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原料、材料的质量不稳定造成的。我們认为，原料、材料的好坏，固然会影响产品的质量，但是，决不能过分強調客观条件，放松主观努力。許多企业的經驗证明，只要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教育，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进行技术革新，改进企业管理，健全責任制度，即使客观条件差一些，也是可以保证和提高輕工业产品的质量。例如，有些火柴厂使用同样的质地較硬、紋理歪斜、易于折断、含脂較多的松杂木作为原料，但是，由于他們采取了技术措施，对木材进行蒸煮脫脂和軟化的預处理，并且严格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頁。





执行操作规程和检验制度，因而就保证了火柴的质量。

在增加产品数量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还要增加产品的花色品种。社会需要是各种各样的，产品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当国家建设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时候，要求产品品种更加丰富多采。

近年来，轻工业产品的花色品种是不断增加的。例如，各地生产了许多塑料制品、合成洗涤剂、新型号的钟表、自行车和各种型号的缝纫机，等等。仅上海一地，一九六一年投入生产的新产品就达三百多种，增加了三千多种新花色，并且注意了大、中、小号各种规格产品的生产。一九六二年国家在产品的品种规格方面，对轻工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轻工业部门的职工还要作更大的努力，保证完成国家的品种计划。国家的品种计划，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和生产的可能，全面地统一地安排的。如果有些企业不按国家的品种计划进行生产，就会打乱国家计划，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强调完成国家的品种计划，并不排除各地尽力生产自己需要而又可能生产的产品，特别是某些传统的名牌产品。这些传统的名牌产品的共同特点是，质量好而稳定，为广大消费者所喜爱。例如，食品工业中具有独特风味、驰名海内外的各地名酒；清洁卫生、易于溶解、为广大母亲们所称道的“红星牌”奶粉。又如家庭用品中享有盛誉的“固本”肥皂、“五洲”药皂、“白玉”牙膏，等等。在轻工业生产园地里，有着成千上万质量优良、

风格独特的地方传统名牌产品，只要我们作出必要的安排，这些产品的生产，完全有可能很快地发展，更好地供应市场需要。

轻工业部门还要注意产品的使用说明、包装和装潢。在使用说明书上把产品的配方、性能、使用和保管方法以及出厂批号等，加以介绍，既便利消费者使用，又能够吸收广大消费者监督产品的质量，在某些方面还有普及科学知识的作用。产品的包装，对产品起保护作用。目前，有些产品在出厂后由于包装不善，在运输过程中破损率很大，造成很大浪费，这是必须切实改进的。产品的装潢，可以给予消费者一种美的感受，好的装潢设计，还能够表现我国民族的风格。

增产产品修理所必需的零件，也是轻工业部门的一个任务。轻工业产品中许多是耐用消费品，例如，钟表、自行车、缝纫机和自来水笔等等。这些消费品经过长期使用，一部分零件就会磨损。因此，生产一定数量的零件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对消费者有利，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有利。为了增加零件的产量，经济领导部门应该尽量保证必需的原料、材料的供应；企业要努力改进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某些零件的收购价格过低，要经过生产部门和收购部门协商，求得合理的解决。

总之，摆在轻工业部门管理机关和广大职工面前的任务是很繁重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鼓足干劲，埋头苦干，千方百计，采取切实措施，争取生产更多更好的日用轻工业品，充分发挥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 新 与 旧

## 公 盾

新与旧的问题是人們经常会遇到的。“除旧布新”、“送旧迎新”，这是人們熟悉的老話头。一部人类历史，充满着新与旧的斗争。没有新与旧的斗争，人类社会就变成一潭死水，不会有进步。

就社会生活的领域来说，真正的新事物代表着不断成长、壮大、前进的进步力量，是符合于历史发展方向的。它們像新生的婴儿，初升的紅日，具有无比旺盛的生命力，是不可战胜的。而旧事物則与此相反，它們代表着开始衰亡或正在衰亡的东西，必然要被新事物所代替。

在新与旧斗争的过程中，新的东西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上升为支配的力量；旧的东西由大变小，由强变弱，以至灭亡。这是基本趋势。当然，历史发展的行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切新的社会力量，从它初生开始，总是要经历許多曲折，克服許多困难，才能一步步发展起来。一切社会腐朽势力，即使到了最后的死亡阶段，也不会自甘灭亡，而总是千方百计地作垂死挣扎。可是，从长远来看，古往今来，新陈代谢，后来居上，是誰也抗拒不了的历史发展规律。

在新与旧的斗争中，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总是站在新事物方面，坚决支持新事物，促进新事物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认真研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

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因素，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从而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学会辨識新事物的嫩芽，加以爱护和扶植，并尽力帮助它們成长；同时还必须学会把真正的新事物同那种冒充“新事物”的旧事物区别开来。

在社会生活中，新与旧的斗争和它們的表现形式，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当然不能认为，凡是自称为“新”的东西，就是真正的新事物。旧事物往往采用某种新形式，或者打出“新”旗号，冒充新事物出现。

在思想领域内，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将旧的、反动的东西，打出“新的”、“先进的”旗号来騙人，这是常常见到的事情。例如，被列宁严厉批判过的馬赫主义者，曾經采用各种新名詞、新术语，作为自己販运资产阶级旧貨的假面具。他們冒充“最新的自然科学哲学”，妄图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新成就，来证明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錯誤的。而实际上，正如列宁所指出，他們是在歪曲地利用科学上的新材料，販运早已被



科学推翻了的貝克莱、休谟、菲希特等人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的旧貨，跟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毫不相干。

反动沒落的资产阶级甚至用“新”字牌号，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学术思想中某些带有进步倾向的东西统统拋棄，而将其中落后的反动的东西，发展成为更落后、更反动的东西。例如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康德的哲学，本来是唯物論同唯心論的調和，是二者的相互妥协；而被反动资产阶级教授学者加上了“新”字号的“新康德主义”，却完全地拋棄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把康德哲学中最恶劣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硬拼凑成为一个体系，百般宣揚。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的体系，具有保守性和反动性，而包含在其中的辯证法，是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可是被反动资产阶级教授学者加上“新”字号的“新黑格尔主义”，却完全擯棄了其中一切优秀的东西，大大宣揚和进一步发挥了黑格尔哲学中反动落后的东西。这种“新黑格尔主义”成为维护帝国主义反动統治，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辯护的学說，以至于給法西斯匪徒奴役人民和种族虐杀提供“理論”根据。

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反动派也常常把它們变本加厉的殘暴統治，說成是什么“新”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希特勒匪徒曾把他們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說成是建立什么“新秩序”；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曾把他們对我国的侵略暴行，美其名为“建立东亚新秩序”；蔣介石匪帮在統治中国的期

間，为了推行其愚民政策，大事宣揚封建的旧道德、旧思想，然而他們却把这些标榜为“新生活运动”。所有这些“新”招牌，都不能掩盖他們最殘酷的反动統治，最野蠻最血腥的民族压迫和掠夺的罪行。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嘲笑过那些企图用假面具掩盖封建主利益，喊着“社会主义”口号的封建貴族，說他們屁股上还盖有旧的封建印章。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反动派不管怎样标“新”，他們屁股上的旧印章也是有目共睹，永远擦不掉的。

资产阶级愈腐朽沒落，就愈在各方面玩弄“新”花样。现在，在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艺术中，各种騙人的“新”花样，真是层出不穷。如美国的一些“新”画家；在身体上蘸顏料，在画布上打滾作画，甚至驢子的尾巴、猩猩的巨掌胡乱塗出来的东西，也当作了了不起的美术創作；在倫敦，举行过用眼睛瞧而不用耳朵听的所謂沒有声音的音乐晚会；在西德汉堡，举行过所謂“一无所有”的展覽会，展出一些空白画紙，当作艺术品，用一些不成形的泥团，当作雕塑品，放映只有黑白斑点的电影，等等。这些“新花样”的背后包藏着，恰恰是一些最沒落最反动最腐朽最墮落的东西。

我国宋代評論家呂祖謙說得好：“外观其辞，日新日巧”，“内观其实，日薄日頹！”<sup>①</sup>看来，这句话也可以作为垂死的帝国主义的“新”“尊容”的写照。

<sup>①</sup> 呂祖謙：《东萊博議·楚子問鼎篇》。



历来的修正主义者，为了散布跟资产阶级妥协调和的思想，替自己的叛变行为辩护，也常常爱标榜“新”。远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所写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著作，就是以“探新”的面貌出现，说什么只要通过阶级调和，让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议会里携手合作，不需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使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斯坦把这一套叫做工人阶级的“新”道路。考茨基所提出来的修正主义的各种“新理论”，实质上也都是重弹资产阶级和伯恩斯坦之流的旧调。

修正主义者这一套挂着“新”招牌的陈腔滥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是从资产阶级字纸篓里拣来的，没有什么新奇。甚至伯恩斯坦的名句“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也是从资产阶级学者舒尔泽—赫维尔尼茨那里抄来的。他们跟在反动资产阶级教授学者后面，举起双手赞成“新康德主义”，赞成“新黑格尔主义”。他们高喊“回到康德那里去！”并且也像反动资产阶级教授学者一样，将黑格尔当做“死狗”来打，大喊大叫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妨碍对事物的一切合于逻辑的观察的圈套”<sup>①</sup>，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一股脑儿地看作是经院哲学的残余加以否定，而他们自己却在宣扬比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的东西。

列宁对于修正主义者的整旧翻“新”的恶

劣行径，非常厌恶。早在一八九九年，列宁在《我们的纲领》等文章中，对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俄国“经济派”的整旧翻“新”的勾当，作了极其猛烈的抨击。列宁说道：

“我们现在要问，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伯恩斯坦周围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导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抓住一些零零碎碎的落后理论，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不倦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让步的理论。”<sup>②</sup>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同样也标榜他们那一套“理论”是“最新”的。他们把帝国主义国家看作是超阶级的东西，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看作是“社会主义因素”，并且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已经“降至最低限度”，它们正在日益联合起来；这种论调，实质上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翻新，都是为着取消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和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一样，宣扬只要通过议会斗争、通过社会改良，而不需要经过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就连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6页。

② 《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2页。



他们自吹为富有“创造性”的所谓“直接民主制”，也不过是老修正主义者的旧观点。这个所谓“直接民主制”，自称采取所谓“工人自治”的形式，企图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相对立；他们诽谤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把它诬蔑为“官僚主义”。而考茨基在一九一九年写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文中，恰恰也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企业的管理和委派企业领导人，诬蔑为“强加于工人”，是“独裁者的暴力”。

请看，几十年前的老修正主义者和今天的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调子，是多么合拍啊！

修正主义者把他们自己的旧货色标榜为新东西，把真正的新事物，诬蔑为已经过时的旧东西。老修正主义者叫嚣“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叫嚣“列宁主义过时了”！

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适应于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的新形势而出现的新思想，它同一切腐朽的、没落的旧思想立于对立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者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批判地审查和检验了人类思想史的全部遗产，因而使这种学说真正继承了以往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在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中，越来越显出其新的生命力，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不

断地被实践所证实而越来越生气勃勃。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在新的情况下会得到新的结论，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会改变的，它在实践中越来越证明其正确性。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要密切注意新环境、新情况，永远保持对新生事物的敏感，但是重要的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环境、新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决不能对任何新情况做出正确的恰当的判断，不可能得出任何新的正确的结论。

修正主义者只是借口某些新情况，企图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事实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陈旧了”、“过时了”，而是这些老的和新的修正主义者自己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陷入了发着陈腐臭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泥坑里，把只能受到人民唾弃的肮脏的渣滓当做什么新鲜事物来玩赏。

善于区别新事物和旧事物，在新旧斗争中积极支持新事物的成长，这是革命者的经常任务。对于我们革命的人民来说，树立对新生事物必然胜利的坚韧不拔的信心，尤其重要。“真金不怕火来烧”。真正的新生事物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而那些自吹自擂为“新生事物”的旧东西，由于他们代表的是没落腐朽的力量，终究是要心劳日拙，遭到彻底失败的。





# 論 伯 恩 斯 坦 修 正 主 義

肖 述 馬 群 兵

在历史上，还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的学说这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如此巨大的推动作用。今天，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占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且在全世界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是在战斗中产生和发展的。在它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充满了对于资产阶级思潮和工人运动内部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斗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已战胜了其他一切思想体系，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趋向便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斗争的形式和原因已经改变，但是斗争还是继续着。”“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溃了。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的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sup>①</sup>

步发展，预示着巴黎公社以后的“和平”年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政治动荡和革命高潮即将来临。阶级斗争尖锐起来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宣扬阶级合作、社会改良的妥协路线的机会主义者之间的斗争，重新激化起来。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例如德国的伯恩斯坦派，法国的内閣主义派，英国的费边派，俄国的批评派，都联合起来，攻击所谓“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斗争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但它首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展开。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其代表人物就是伯恩斯坦。伯恩斯坦主义是当时帝国主义发展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同时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十九世纪下半期，德国工人阶级站在国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即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时期。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

<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15页。



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前列。一八七五年由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而统一起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下，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聚积和准备革命力量、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这个党从它合并的时候起，就在自己纲领（即《哥达纲领》）中对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作了原则性的让步。其后，在长期的和平、合法环境中，在这个党内，虽然曾个别地发生过“左”的倾向，但右倾机会主义始终是主要的实际存在的危险。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十九世纪末，它的工业资本的发展，迅速地超过了英国和法国。当时的德国帝国主义者强烈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极力推行掠夺殖民地的政策。在国内，德国的统治阶级在残酷迫害无产阶级的同时，也实行一些欺骗性的措施，收买工人上层分子，从内部瓦解工人运动。一八九〇年，统治阶级采取让步和怀柔的“新方针”，废除了一八七八年颁布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某些“改革”，党的合法活动的机会增长了。这样，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就活跃起来，他们认为政府的“新方针”是“对工人真正友好”，把反动统治者的怀柔欺骗看作是真正的“善意”，认为政府能够“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他们用这种观点肆意美化资产阶级的国家，散布只走和平道路、只走合法道路的幻想，而把任何谈论武装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人都诬蔑为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一八九一年恩格斯在批

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弗特纲领草案的时候，曾指出这个党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当时党内有些领袖成为十足的“议会迷”，他们颂扬资产阶级民主，认为工人阶级只应当去从事各种细小的社会改良和经济改良。另一些党的领袖则对这种机会主义采取无原则的调和立场和纵容态度。这样，随着统治阶级策略的改变，随着党从事合法活动的可能性的增长，在第二国际处于领导地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终于逐渐形成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在理论上由伯恩斯坦主义最完全地表现出来。

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年）出身于德国一个铁路工程师的家庭，青年时代受到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一八七二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但他并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之前，伯恩斯坦主张与机会

\* 甚至当时党内的有威望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也发表这种论调。他向恩格斯解释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开和政府发生尖锐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会使社会民主党失去刚刚争得的合法地位。恩格斯坚决地驳斥了这种论调，他在1890年3月9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你痛斥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武力，我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一则，任何敌人不会相信你这种说法，他们不致于蠢到这种程度；再则，根据你的理论，我和马克思也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们从来不打算像善良的教友派信徒那样，如果有人想打我们的右脸，我们就把左脸也挨上去给人家打……”（参看叶·斯捷潘诺娃著：《恩格斯传》，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0—221页）



主义的拉萨尔派妥协；后来他又成为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在“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颁布之后，伯恩斯坦认为这是“我们不大乖的行动给自己讨来的一条鞭子”，他离开德国，跑到瑞士苏黎世。在苏黎世他和赫希柏格、施拉姆合作办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这三个人一起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宣称工人阶级不能靠自身的力量争得解放，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给工人造福的一切东西。文章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工人阶级只需关心最近的实际任务，只需“一站一站地”进行改良，而不必谈论什么最终目标，说什么“太高的要求”会吓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sup>①</sup>这实际上就是后来伯恩斯坦所宣布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一公式的最初版本。马克思恩格斯严厉痛斥了这个“苏黎世三人团”，指出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参加工人运动，但并没有接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们在纸上承认阶级斗争，实际上害怕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所提出的道路无非是想用微小的改良来补缀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把这些“异己分子”清洗出党。<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最后通牒式”的批评，迫使伯恩斯坦暂时收敛了一下他的机会主义活动。一八八一年他担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之后，在恩格斯监督下，为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贯彻革命路线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伯恩斯坦没有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一八八八年该报迁移到伦

敦后，他又醉心于英国的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费边社1884年成立，恩格斯称之为自由党的一个支派）。伯恩斯坦在以后的活动中，越来越暴露出他企图摆脱恩格斯的约束，摆脱恩格斯对他的影响。恩格斯非常注意伯恩斯坦的种种行为，在晚年他曾这样写道：“他（按：指伯恩斯坦）仍然没有做到他所应该做到的那个样子。他现在热中于琐碎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像他那位在《国民报》工作的英明的叔父了。”<sup>③</sup>（按：伯恩斯坦的叔父是小资产阶级的《柏林国民报》编辑）

果然不错，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的态度就日益嚣张起来，他和福尔马尔、奥埃尔等机会主义领袖结成一伙，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进攻。从一八九六年起，他写了一系列“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求“审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策略。一八九八年，他向党提出一个意见书，公然宣称这个意见书的论旨“在许多重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中所表示的见解”。一八九九年，他根据这个意见书写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这本书集当时的修正主义“理论”之大成，成为社会民主党右翼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这个列宁称之为“叛卖变节的作品”中，伯

①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479—486页。

③ 转引自叶·斯捷潘诺娃著：《恩格斯传》，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1页。

\* 参看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版。以下引用伯恩斯坦言论，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参看此书。



恩斯坦为了隱蔽自己的背叛行为，竭力标榜他同恩格斯“有濃厚的个人友誼”，是受恩格斯“非常信賴”的人，把自己装成是“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他借口馬克思的学說远沒有完成，历史的发展又暴露了馬克思主义的“缺点和矛盾”，馬克思主义在許多方面已經“陈旧”、“过时”了。因此他提出不要把“老师的話永远重三倒四地反复着”，說“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发展与完成，必須以它的批判为第一步”。这样，伯恩斯坦就在“反教条主义”和“完成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幌子下，全面地篡改馬克思主义。

## 二

伯恩斯坦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論证和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借口經驗是科学的基础，认为任何“主义”都不能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是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一种学說，一种設想，一种傾向，工人运动本身并沒有“經驗”过，因此，它不可能是科学的。他說，馬克思的著作“希望成为科学的研究”，但同时又“預先确立了进化将招来的結果的公式”（指馬克思的社会革命学說，資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潰的学說），这是一种“空想論”或主观主义的表现。在伯恩斯坦看来，《共产党宣言》关于資本主义必然崩潰的論断是五十年前作出的，而后来“社会关系的尖銳化沒有按照《宣言》所描述的方式实现”，“那个論断，無論从哪一方面来看都錯誤了”。伯恩斯坦因此断定，馬克思学說的基础是不彻底的“二元論”，“看起来好像这个偉大的科

学精神終于做了教义的奴隶”。伯恩斯坦自称以“經驗”作根据，向“保守的傳統”、“教条”、“空想論”等等宣战，实际上是拿所謂“經驗”来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企图把馬克思主义說成是混杂着空想的东西。

在哲学上，伯恩斯坦提出用康德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他說：社会民主党“需要一个康德，他会十分犀利地批判那种傳統的教条”。同时，伯恩斯坦曲解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证法學說，硬說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沒有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辯证法，反而不知不觉地受了黑格尔的“概念的自我发展”的支配，用黑格尔辯证法的“命題来演繹地預断进化”。他攻击辯证法是馬克思学說中最致命的地方，是“妨碍对事物的一切合于邏輯的观察的圈套”。他认为社会只有逐漸的緩慢的进化，飞跃是不可能的，他說：“我确信，各民族发展上的重要时期是沒有飞跃的”。

在政治經济学方面，伯恩斯坦以帝国主义初期的某些新材料，主要是銀行的新作用和卡特尔、托拉斯等組織的出現，来攻击馬克思对資本主义的科学分析。伯恩斯坦根据当时資本主义生产的某些发展，（工人特别是熟练工人实际工資的稍微增加，工人階級經济和政治組織的发展，某些民主权利的取得，技术管理人員和知識分子等“中間階級”數目的增加等等，否定資本日益集中、大众日益貧困和日益无产階級化的事实，反对馬克思主义經济学說的一切重要原理。他說，馬克思对于价值形成的学說“純粹是思維的构成物”，剩余价值是“基于假設的公式”。伯恩斯坦认为資本主义已經有了“防



止經濟危机”的手段，而且愈来愈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不适用了。

伯恩斯坦根据他上述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日益消除它内部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愈来愈接近、愈来愈“相似”。他说，“我看见先进各国，无论何处，阶级斗争都采取比较温和的形态”，“阶级斗争本身具有愈来愈文明的形式”<sup>①</sup>。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个理论不适用于“真正民主”的社会。他说：“有着严格等级制的封建制度，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得不用暴力来破坏。近代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正是在它们具有伸缩能力、变形能力和进化能力这一点上同封建时代的制度迥然不同。因此这些制度不应加以破坏，而应使之继续进化。”很显然，伯恩斯坦的这种说法是要求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伯恩斯坦竭力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否认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暴力机器。德国党在一八九八年选举中获得的二百一十多万张选票和五十六个国会席位，成了伯恩斯坦颂扬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的证据。他说，普选权已经使“民主即使实际上还没有消灭阶级，但在原则上已经意味着阶级统治的消灭”，议会制民主“必然会导致消除资本主义的垄断，或导致除去它们的资本主义性质”<sup>②</sup>。所以他认为，议会制是实现无产阶级要求的“最有效手段”，社会民主党要“以普遍选举权和民主为基础”，力争获得大多数选票，争取在国会占得多数，以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否则就没有更好

的促进事业实现的途径”。

伯恩斯坦掩盖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美化资产阶级民主制，自然也就谈不到引导无产阶级把目标集中在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上，相反，他要求保存这个机器并使之“完善化”。列宁说：“伯恩斯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sup>③</sup>伯恩斯坦口头上有时也谈几句要求革命和夺取政权之类的话，仿佛他还是一个“革命者”，但这只是为了欺骗群众，实际上他所要证明的是，革命和夺取政权是完全不必要的。他认为对于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一般地实行暴力的剥夺，而应通过组织和法律实行渐进的赎买”。

伯恩斯坦坚决反对革命的暴力——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把革命的暴力、革命的剥夺咒骂为“布朗基主义”，“无谓的生存牺牲”。他说：“在过于重视革命暴力对近世社会之社会主义的变革的创造力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从未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观点。”还说：“《共产党宣言》之革命的纲领，彻头彻尾是布朗基主义的。”他

<sup>①②</sup> 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会主义》，译自1922年德文修订版。

<sup>③</sup>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9页。





认为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只需要和平地、有秩序地改革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现代各国的政治组织越是民主化,政治大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便越是减少。”在有了议会制、普选权这类东西之后,再谈论什么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他解释说:“这不是因为我满意了,我渴望安静,而是因为我相信伟大的成就已经取得,工人阶级自身有武器,这种武器可以和古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得下述这句话媲美,他曾说:‘给我一个立足的地方,我就要把世界翻过来’。工人阶级也可以说:‘给我普遍、平等的选举权,那末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sup>①</sup>

伯恩斯坦还以军事技术的进步为借口,认为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已经不再可能。为了证明这一点,伯恩斯坦恶意地歪曲恩格斯曾经提出过的关于军事技术的发展给城市街垒战带来更大困难的一段话。恩格斯自己指出,他“推荐这个策略仅仅是为了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很多附带条件。”“就是对于德国,明天这个策略也可能成为不能接受的了。”对于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断章取义地歪曲他的论点,恩格斯早就提出过强硬的抗议,说他们从他的著作中引证了凡是能为“无论如何是和平的而非暴力的策略辩护的东西”<sup>②</sup>,并且企图把他描绘成仿佛是“一个不惜任何代价乞求和平、遵守法律的人”<sup>③</sup>。伯恩斯坦不顾恩格斯的这些说明和抗议,硬把事情说成仿佛是恩格斯已经放弃了暴力革命的观点。他企图以恩格斯的名义来为自己的反对暴力革命的机会主义辩

护。他说:“在一个世代之前,人民群众保卫自己权利的最后手段是街垒战斗。这种手段已经由于现代城市建筑和现代枪炮技术而失去效用了。”<sup>④</sup>伯恩斯坦还用资产阶级的武力来吓唬工人阶级,说“和军队的大规模冲突,是妨碍社会民主党不断发展甚至是使它暂时退步的手段。”

伯恩斯坦因为害怕革命进而害怕无产阶级举行总罢工,他认为“发动一次总罢工,很可能也就是引起一次流血的革命”<sup>⑤</sup>。他只要一点一滴的、平静的、不“触动任何人一根头发”的改良,认为这种微小的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所以他认为,应当提倡在保存资本主义基础的前提下,组织工人的合作社,实现所谓工业的“社会化”,争取更“正确”的“公平分配”,以及制定“城市交通政策”、“住宅政策”、“市政工人政策”等等,要求工人阶级放弃政治斗争,去从事这些微不足道的经济改良。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之点,历来是机会主义者所竭力回避的。伯恩斯坦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并且竭力把它丑化。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时候,是把法国革命的恐怖时代当作典型的实

① 《什么是社会主义》,译自1922年德文修订版。

② 《恩格斯致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0页。

③ 《恩格斯致考茨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95页。

④⑤ 《政治性的群众罢工》,译自1905年德文版。



例的”。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在今天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他断言无论从经济的发展或知识水平来看，无产阶级都还不能“实行政治的单独统治”，如果无产阶级过早地夺取政权，则无产阶级的专政只是“意味着俱乐部的演说家和著作家的专政”。伯恩斯坦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广大人民正是实现最广泛的民主，而特别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的强力统治，说这是“恐怖的独裁政治”，“只有除去专政这一名词的事实上的意义，而赋予它以某种稍微缓和的意义，它才能同现实相一致。”

伯恩斯坦既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要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他否认党的领导作用，歪曲党的根本性质。早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中，他就攻击所谓“片面的”工人阶级政党，鼓吹应该有一个可以容纳“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他认为，党是“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经济斗争而成立的组织”<sup>①</sup>，党只应该从事经济斗争，不必进行革命的政治斗争。他要求党“抱定决心不去煽动任何暴力的冲突”，主张党应当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党，和平主义的党。他说：“如果社会民主党毅然决然地抛弃事实上已经过时的口号，而按照它今天的本来面目以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的姿态出现，那么它的影响定会远较今天更为强大。”

作为帝国主义发展的产物的伯恩斯坦主义，对内主张“阶级合作”，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对外则支持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伯恩斯坦硬把他的民族

主义说成是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尽管伯恩斯坦时常断章取义地摘引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片言只语，但他的露骨的沙文主义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当问题不再停留在理论的范围而直接关系到具体政策的时候，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

伯恩斯坦认为“国际主义在今天还过于辽远，而似乎是属于未来时代的东西。”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他表面上虽不敢反对，实际上是完全不同意的。每当问题涉及到德意志民族对外关系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他说：“国家是整个民族的连接者，是巨大的共同利益的捍卫者，就国家的这一职能来说，工人和国家是一致的。”<sup>②</sup>因此，无产阶级对于德意志帝国的“利害关系不能漠不关心”。伯恩斯坦故意混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界限，他竟说：“维护本国利益究竟到什么程度就不再是合理的并且转变成伪爱国主义，要定出这样的界限是很困难的”！

• 伯恩斯坦积极赞助德国的殖民政策。他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德意志帝国的殖民政策是完全没有忧惧的必要”，“不存在从一开始就把获得殖民地看做是应当深恶痛绝的事”。马克思恩格斯认定，民族压迫是阶级压迫的一种表现，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伯恩斯坦却认为，侵略和掠夺落后国家的殖民政策，既可以帮助

①② 《什么是社会主义》，译自1922年德文版。



## 三

“开发”落后国家，又可以促进帝国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积累得愈多，社会主义到来就愈快。他为这种殖民政策辩护说：“欧洲人占领热带国家，并不是一定会妨碍土人的生活上的享乐，而且这样的情况从来也不是经常的。”

一八九七年，德国帝国主义强占了中国的胶州湾。这个伯恩斯坦，首先表示不完全同意社会主义报刊对德国帝国主义的谴责，认为“取得胶州湾并不是德国外交政策上最坏的一手”，继而又说：“只要租借胶州湾过去和现在都只是为了使德国在中国的将来利益获得保障；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可以赞成这种做法，而不会丝毫损害自己的原则。”这充分表明了伯恩斯坦的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表明了他是帝国主义的忠实的辩护人。

伯恩斯坦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思想发展的最后结果，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站到了“保卫祖国”的立场，要求本国无产阶级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去残杀自己的阶级兄弟——别国的无产阶级。战争一开始，德国的修正主义者同德国资产阶级代表一起，在议会中投票赞成用于战争的拨款。伯恩斯坦无耻地把这种背叛行为说成是“德国人民的代表也就这样向敌国显示出一条统一战线”<sup>①</sup>。伯恩斯坦完完全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难怪列宁把这种最露骨的沙文主义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伯恩斯坦这一套修正主义理论实质上是什么东西呢？尽管他自吹是“从社会现象的探究而得来的观点”，标榜所谓“新原理”、“新见解”，但实际上丝毫没有什么新东西。列宁说得好：“这个派别，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sup>②</sup>，是“内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sup>③</sup>。伯恩斯坦主义是偷运到工人运动中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由于它具有社会主义的假面具，它就成为更巧妙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工具。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全世界资产阶级对他的交口称赞。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凶恶的敌人纳乌曼在《救济》杂志上写道：伯恩斯坦批判马克思主义，“他批判得很好，很巧妙，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他批判的。如果是我们批判的，那末这就是‘敌人’批判的，但如果这是他批判的，那末就是‘同志’批判的。”资产阶级从伯恩斯坦主义中认识到自己的深切利益，他们把伯恩斯坦当作一个救世主来欢迎，极力推荐他的著作。沙皇政府的警察局长祖巴托夫在血腥镇压无产阶级一切

① 《工人阶级国际和欧洲战争》，译自1905年德文版。

②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19页。

③ 《马克思学说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83页。



“越軌”行动的时候，也特意把伯恩斯坦的著作作为“工人讀物”，殷勤地推荐给俄国工人阶级。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傾机会主义的根源，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强烈影响。当时的和平环境和工人运动在合法斗争中获得的成績，使大批知識分子涌进工人运动，他们用各种各样方式在工人运动中傳播资产阶级思想，宣揚奴顏婢膝、馴良、柔弱和无骨气等庸俗习气。正在发展和向外擴張的德国资产阶级，用一部分超额利潤和祿位来收买工人上层分子，腐化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懂得，利用工人上层分子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比自己亲自出馬更为方便，更有成效。资产阶级所培植起来的一个享有高薪和特权的“工人貴族”阶层，在经济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經基本一致；他們的立場、观点、思想感情以至生活方式，也已资产阶级化了。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这批“工人貴族”千方百计为资产阶级效劳，他們和他們的主子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企图使工人阶级放棄社会主义革命，丢掉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就是直接反映了这种“联合”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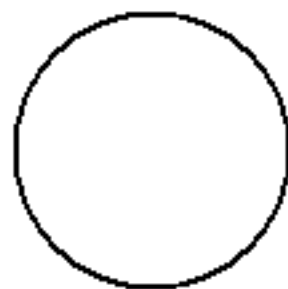
在伯恩斯坦主义出現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許多領袖虽然表示不同意，但是由于他們自己实际上采取了右傾机会主义立場，所以他們对于伯恩斯坦主义的批評是軟弱无力的。正像伯恩斯坦自己說的那样：他們虽然“对我提出了責难”，但实际上“他們自己就是这样行动的”。曾經在哲学上对伯恩斯坦主

义作了坚决斗争的普列汉諾夫，在一八九八年写信給考茨基說：“今天的問題就是誰埋葬誰的問題：是伯恩斯坦埋葬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斯坦？”<sup>①</sup>但考茨基仍多方庇护甚至“感謝”伯恩斯坦。后来考茨基虽然参加了对伯恩斯坦的批判，但他迴避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問題。由于他主張与伯恩斯坦調和，結果也完全演到修正主义方面去了。

当时德国和国际的有些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虽然对伯恩斯坦主义作了一些斗争，但对其危险性也曾估計不足。拉法格认为伯恩斯坦对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过是“理智疲劳过度”的結果。威廉·李卜克内西則說伯恩斯坦主义是智力发展的过程，可以不去理睬它。梅林則认为修正主义决不是工人运动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产生的，“除了修正主义的情緒外，在德国从来没有存在过修正主义。”普列汉諾夫也沒有能够把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坚持到底。

列宁在当时是捍卫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偉大旗手。从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本书出版以后，列宁就給了伯恩斯坦主义、首先是它在俄国的变种——“合法馬克思主义”、經濟派以严厉的批評。此后在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沙文主义和俄国的孟什維克、取消派的斗争中，列宁团结各国革命的馬克思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我們为什么應該感謝他？》，《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38頁。



主义者，对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并在当时条件下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在一个时期表现得十分嚣张。它不仅是德国一国的现象，而且是一种国际现象，它在许多国家的党、工会、合作社、议会党团内占据着统治地位；它不只是党的少数右派领袖的问题，而且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它不仅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而且在实践中贯彻其改良主义的路线；还有帝国主义作为它的靠山。但是，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确信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尖锐化，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广大劳动群众是要求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群众的这种革命意志迟早会得到实现，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所以列宁在斗争中满怀信心，坚定不移，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立场是唯一正确的立场，而修正主义最后必定失败。

列宁指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sup>①</sup>后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这个论断。伯恩斯坦修正主义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 \* \*

列宁经常指出，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仍然存在，帝国主义仍然存在，修

正主义就还有它的基础。伯恩斯坦主义是破产了，但它还会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表现出来。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就是伯恩斯坦主义的现代版。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获得了更大更辉煌的胜利，社会主义的理想已经成为伟大的现实，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新伯恩斯坦主义，要比它的前辈表现得更加凶恶、更加卑劣、更加狡猾，但它们在根本点上没有什么不同的。新伯恩斯坦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一样，在哲学上用诡辩论代替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为垄断资本辩护，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主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美化资产阶级专政，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歪曲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否认党的领导作用；以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新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反映了当前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尖锐化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在当前东风压倒西风的有利的形势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在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在斗争中获得更为蓬勃的发展。

<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页。







在毛主席身边 (人民美术出版社供稿)

刘文西



# 红旗

○  
HONGQI

一九六二年 5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五期 ★

## 目 录

刚果的形势说明了什么 .....郭济洲 吴 休 (1)

奴役, 还是进步? .....陈 原 (8)

肯尼迪与牛奶 .....岑 桑 (11)

关于认识中的肯定否定问题 .....樊育之 (13)

——谈太阳系学说的一段历史

我们的时代和卡德尔的“辩证法” .....吴 江 (17)

新老渔翁四钓鱼(漫画) .....华君武 (5)

☆ 三月一日出版 ☆



# 剛果的形勢說明了什麼

郭濟洲 吳休

美帝國主義打着聯合國的旗幟鎮壓剛果的民族解放運動，加緊對剛果進行侵略，使剛果形勢不斷惡化。一年以前，剛果民族英雄盧蒙巴慘遭美、比帝國主義殺害，現在，剛果民族主義領袖基贊加的安全又遭到嚴重的威脅。美帝國主義對它利用聯合國推行新殖民主義自以為很得計。肯尼迪在今年的“國情咨文”中，對美國利用聯合國扼殺剛果民族獨立作了一番無恥的吹噓。他說：“在十八個月以前，紛擾動亂的剛果向聯合國提出了它所遭到的最嚴重的挑戰。前景是一團混亂，或者是大國實行某些對峙，包含各種料想不到的危險。今天，在一個統一的剛果境內取得和平和解的希望增加了。這正是我們政策的一個目的。”肯尼迪對剛果形勢的描繪，完全是一派帝國主義的胡言亂語。但是，剛果的形勢的確可以說明美國利用聯合國做工具的政策實質，這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剛果人民從十五世紀以來，不斷遭受到殖民主義的侵略和奴役。近八十多年來，剛果淪為比利時的殖民地。多少年來，剛果人民為了祖國的獨立，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終於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宣告獨立。剛果的獨立並不意味着殖民主義勢力已經心甘情願地退出剛果。比利時殖民者雖然被迫同意剛果獨立，但是，它的殖民軍隊卻不願意

撤退，它在剛果的經濟利益仍然全部保持，它還千方百計地在剛果民族內部製造分裂，以便採取變相的形式，維持它在剛果的殖民統治。覺醒了的剛果人民要求實現真正的獨立，他們喊出了“由剛果人管理剛果”的口號。緊接着剛果宣布獨立之後，剛果的愛國軍隊和人民一起，展開了驅逐比利時軍官的鬥爭。當比利時殖民者對剛果人民進行血腥鎮壓的時候，剛果愛國軍民立即投入了反抗侵略者的武裝鬥爭，表現了英勇不屈的堅強鬥志。儘管比利時侵略軍出動了飛機，甚至使用了火箭，但是剛果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展開了英勇的抵抗，曾在許多地方擊退了侵略軍的進攻。當時，剛果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前景充滿了光明和希望。對於剛果人民有利的形勢，帝國主義者是不喜歡的。所以，肯尼迪的“國情咨文”把剛果當時的形勢描繪成為“紛擾動亂”、“前景一團混亂”。

美國在剛果有着巨大的經濟利益。在剛果淪為比利時殖民地的初期，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勢力就已經滲入剛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壟斷資本更加積極地向剛果進行擴張，到剛果宣布獨立的時候，美國在剛果的投資已達六億美元，僅次于比利時而居于第二位。美國幾乎壟斷了剛果戰略原料的全部出口，剛果出產的鈾礦砂的百分之九十以



上和钴矿砂的全部都运往美国。美国在刚果的利益是它决不願意放棄的。而且，由于刚果在非洲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美帝国主义一向把刚果当作重要的侵略基地。美帝国主义显然知道，刚果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必将对非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刚果获得真正的独立，新老殖民主义者不仅将丧失在刚果的殖民利益，而且它們在整个非洲的殖民統治，必将更加迅速地陷于进一步的瓦解。肯尼迪把十八个月前刚果的形势說成是“前景一团混乱”，正是反映了美国統治集团当时对美帝国主义在刚果的命运担忧的心情。

美帝国主义决不容許刚果的真正独立。因此，当刚果人民站立起来，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就制造各种借口对刚果进行干涉，决心扼杀刚果的民族独立。然而，美帝国主义对于直接出兵刚果不能不有所顾忌。美国《紐約先驅論壇报》供认：美国直接出兵这种行动“只能意味着恢复白人用赤裸裸的强力对付黑人的老办法”，将会引起“最可怕的反应”。于是美帝国主义采用了更为狡猾的手段，以帮助刚果“維持秩序”和实现“統一”为借口，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对刚果进行横暴的干涉。

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軍”是怎样帮助刚果“維持秩序”的呢？

“联合国軍”进入刚果，不但根本没有解除比利时殖民軍的武装，反而同比利时殖民軍达成共同占領刚果的協議。凡是刚果爱国軍队据守的陣地，都相继被“联合国軍”“接管”，并且迫使刚果爱国軍队放下武器。而比利时殖民軍却得到“联合国軍”的百般包庇和纵容。有些比利时殖民軍官因为进行挑衅

活动本已被刚果爱国軍队拘留，“联合国軍”却把他們釋放出来，让他們在刚果繼續为非作歹。联合国当局甚至还大批联合国的臂章发給比利时的伞兵和間諜，以掩护他們进行破坏活动。“联合国軍”和比利时殖民軍很快就勾結起来，一起镇压刚果人民。联合国駐刚果的代表美国人本奇公然宣称，只有“联合国軍”才有权对刚果的安全負責。接替本奇职务的达雅尔更狂妄地叫嚣：“我不能允許像刚果軍队这样一个沒有秩序的烏合之众来控制刚果这个国家。”联合国当局儼然以刚果的統治者自居，它不仅根本不把刚果合法政府放在眼里，而且把刚果爱国力量当做眼中釘，处心积虑要加以消灭。在刚果的許多地方，“联合国軍”多次制造流血事件，肆意屠杀刚果爱国軍民。刚果的爱国力量不断遭到严重摧残，刚果的合法政府被瓦解了。今天的刚果实际上已經处于“联合国軍”的軍事占領之下，刚果的重要城市、港口、机场和交通要道完全控制在“联合国軍”的手中。尽管美国还没有使用联合国托管刚果的名义，但是它实际上已經把刚果当作联合国的托管地。联合国当局一年半来在刚果所作所为，根本不是帮助刚果維持秩序，而是帮助美国在刚果建立新殖民主义統治的秩序。

肯尼迪的“国情咨文”表示，美国政策的一个目的是要实现刚果的“統一”，那么，让我们看一下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是怎样帮助刚果实现“統一”的吧！

刚果独立以前，比利时殖民主义者为了保持它在刚果的殖民利益，一向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挑唆刚果人自相殘杀。那时已經侵入刚果的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也都各自扶植自己的走狗，在刚果的封建部族之間制





造糾紛，破坏剛果的團結，以达到它們侵略剛果的目的。剛果人民对帝国主义在剛果长期制造紛乱和分裂的局面深恶痛絕，他們十分迫切地期望驅逐在剛果的殖民主义势力，使自己的祖国成为一个独立和統一的国家。剛果宣布独立后，以卢蒙巴和基贊加为首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展开了維護独立和統一的英勇斗争。剛果爱国军队曾攻下帝国主义走狗卡隆吉叛乱集团的巢穴巴克旺加，并且向帝国主义的另一名走狗冲伯控制下的加丹加展开勇猛的攻击。当时在剛果人民面前展现出一幅趋向統一的光明前景。

但是，在一九六〇年八、九月間，正当剛果爱国军队向卡隆吉叛乱集团进军的时候，“联合国軍”竟命令剛果爱国军队停火，在开赛省的“联合国軍”甚至强迫討伐卡隆吉叛乱集团的剛果政府军队撤走。因此，本来已經奄奄一息的卡隆吉集团的殘匪又重新集結起来，向剛果政府軍反扑。美帝国主义对于冲伯集团的分裂活动，更是极力支持。一九六〇年八月，联合国駐剛果代表美国人本奇进入加丹加以后，很快就同冲伯勾結起来。“联合国軍”同冲伯集团达成协议，共同鎮压加丹加省人民反抗冲伯集团的斗争，并且阻撓剛果政府軍向加丹加的进军。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还暗地里把它的走狗蒙博托同卡隆吉集团、冲伯集团串連一起，結成軍事联盟，共同抵抗剛果政府軍的討伐。在杀害了卢蒙巴之后，美、比等帝国主义分裂剛果的活动更加猖狂。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和四、五月間，先后在塔那那利佛和科基尔哈特維尔举行的两次“圓桌會議”，就是它們利用剛果內部各种反动势力制造分裂的突出事件。塔那那利佛會議通过了一个把剛果組成“邦联”的決議，实际上

是要把統一的剛果瓦解成为許多“独立”的小国家。在科基尔哈特維尔會議上，換了一个花样，又說什么要把剛果組成所謂“統一”的“联邦”。“邦联”也好，“联邦”也好，都要求变更剛果以省为行政单位的制度，把省变成邦，也就是变成便于帝国主义宰制的小国家，这都是帝国主义玩弄分而治之的鬼把戏。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美帝国主义打着帮助剛果实现“統一”的幌子，实际上干的是分裂剛果的罪恶勾当。

当然，美帝国主义的确也想要“統一”剛果，那就是要消灭剛果爱国力量，排除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势力，把剛果完全置于美帝国主义的統治之下。在美帝国主义看来，它要实现这样的“統一”的最大障碍是剛果的爱国力量，因此，美帝国主义派到剛果的“联合国軍”同在剛果的老殖民主义势力很快就勾結起来。为了鎮压剛果人民的斗争，美帝国主义者伙同老殖民主义者，采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法，首先是集中力量謀害剛果民族主义領袖卢蒙巴。最近美国出版的《中央情报局内幕》一书供认：蒙博托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务，卡薩武布也是傾倒于中央情报局的人物，美帝国主义顛复剛果合法政府和謀杀卢蒙巴的罪恶活动，就是由中央情报局策划，通过卡薩武布和蒙博托这些走狗去干的。这本书还吹嘘，蒙博托这样的走狗是中央情报局“在对头的时候所找到的对头的人”，并且說什么“卢蒙巴的死澄清了空气，并且造成了一种可以采取統一剛果的步骤的气氛。”这些供认，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在剛果的土匪行徑。

但是，杀害卢蒙巴，不但沒有扑灭剛果民族革命的火焰，反而激起了剛果人民更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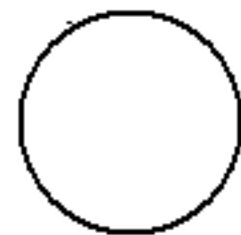
烈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转而采取了一手抓军队、一手抓议会的阴险手法：一方面操纵“联合国军”同蒙博托军队对当时刚果合法政府控制的地区实行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在“联合国军”的“保护”下非法召开刚果议会，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分化和瓦解刚果的民族主义力量，扼杀以基赞加为首的刚果合法政府。

美帝国主义勾结老殖民主义者镇压刚果人民，最终的目的为了鲸吞刚果，完全取代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地位，并不是为了帮助老殖民主义者巩固它们在刚果的势力。当美帝国主义自认为在刚果站稳了脚跟以后，它就利用一切机会，加紧进行排挤老牌殖民主义势力的活动，因而新老殖民主义者的矛盾就日益显露出来。

对加丹加的争夺是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最突出的矛盾。无论从经济上或战略上说，加丹加在刚果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加丹加是刚果最富庶的地区，矿藏不但极为丰富，而且种类很多。它的矿产占刚果全部矿产的百分之八十，它的收入占整个刚果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美国《纽约时报》就曾说：“加丹加对能够控制它的财富的任何人来说，是一个大家争夺的好东西。”美国如果控制了加丹加，就有了向中东非和南非扩张的据点；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如果能够保住加丹加，就可以遏止美国向邻近地区的扩张。美国这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大举侵入刚果以后，比利时殖民者感到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它在刚果的殖民利益已经不可能了，它宁肯被迫放棄其他地区，而要拼命保持它在加丹加的利益，因此极力支持冲伯集团的分裂活动。当联合国安理会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

通过出兵刚果的决议之后，一方面，比利时政府表示同“联合国军”“合作”，以共同镇压刚果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宣称保留单独行动的权利，不容许美国干涉加丹加的“独立”。随后，美帝国主义通过哈马舍尔德宣布“联合国军”进军加丹加，比利时殖民主义者表示强烈反对。一九六〇年八月间，美帝国主义在利用“联合国军”阻止刚果爱国军队讨伐冲伯集团的同时，从比利时殖民者手中“接管”了重要的军事基地，这也引起美、比殖民主义者之间的争吵。美帝国主义一直以“联合国决议”相要挟，但比利时殖民者却始终不愿把它的军队撤走。英国和法国等一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为了自己的殖民利益，对刚果也各有打算。他们很自然地同比利时殖民者站在一边，反对美帝国主义借“统一”之名，行攫夺加丹加之实。

以美国为一方、以比、英、法等国为另一方的新老殖民主义争夺加丹加的矛盾，在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发展到使用战争手段的地步。它们为争夺加丹加，已经打了两仗。出面打仗的一方是由比、英、法控制的冲伯集团和它的外国雇佣军，另一方是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第一次在一九六一年九月，打了八天，由比、英、法控制的冲伯集团在战争中取得了优势，迫使联合国当局接受了冲伯集团的休战条件。第二次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又发动进攻，打了十四天，冲伯集团和它的雇佣军遭到重大的损失，被迫向联合国当局让步。经过肯尼迪的私人代表美国驻刚果大使古利昂的撮合，冲伯答应放棄“加丹加国”的称号，承认利奥波德维尔政权为“中央”政权。这样，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在加丹加取得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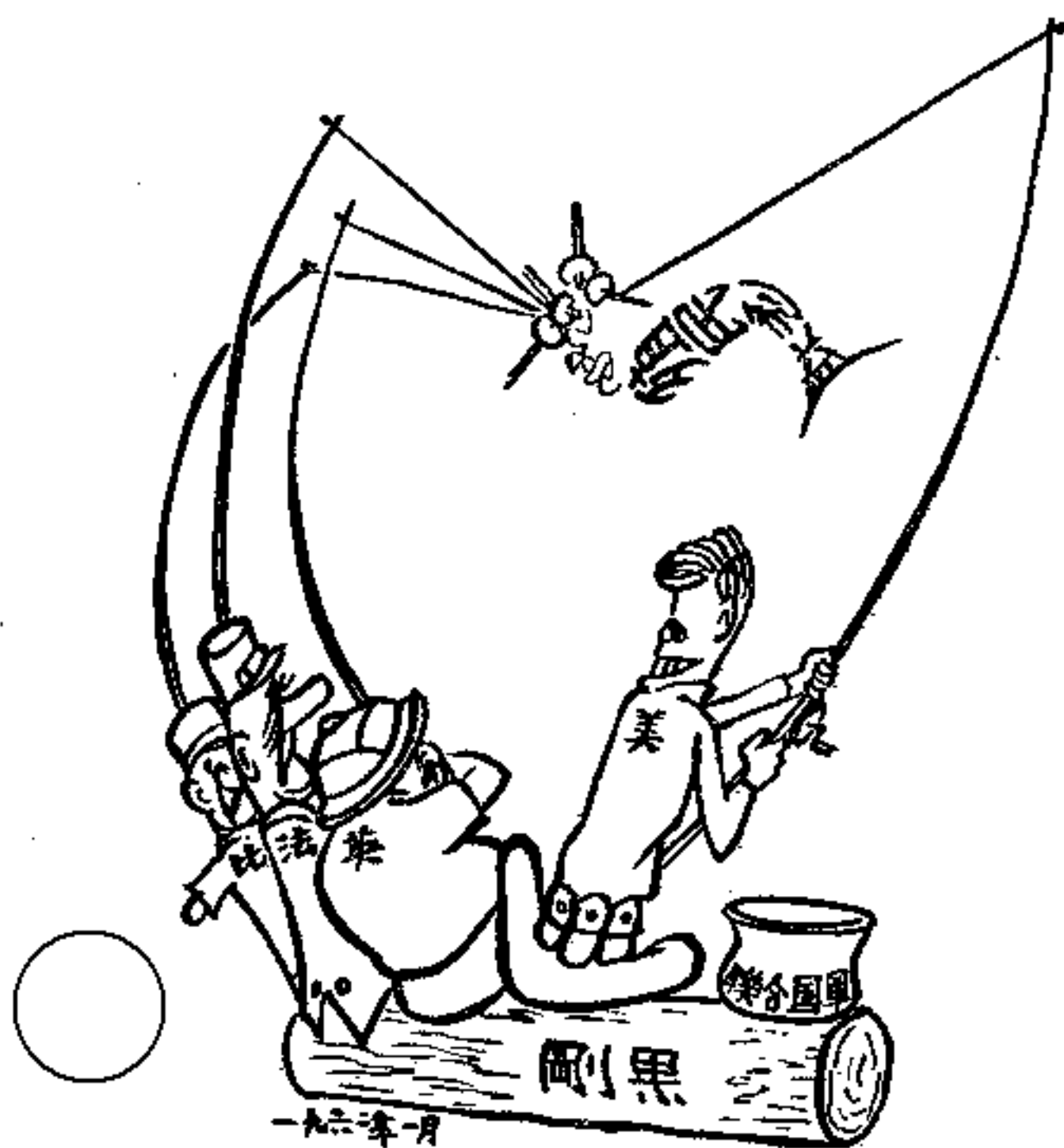


利的地位。这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排挤和反排挤的斗争，暂时取得了妥协，但矛盾并没有解决。

新老殖民主义者在镇压刚果爱国力量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们为了维护和争夺在刚果的殖民利益，彼此之间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可以取得暂时的妥协，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他们之间的矛盾又会重新尖锐起来。肯尼迪说什么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和平和解的希望增加了”，显然是自欺欺人之谈。

刚果人民是要求自己的国家的统一的。但是，在这里重要的问题是统一于谁，是统一于人民还是统一于某一个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如果刚果统一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那只是把刚果的民族利益统一出卖给美帝国主义，这决不是刚果人民所需要的统一。

对于美帝国主义叫嚷的“统一”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人民有过深刻的体验。中国人民曾经长期遭受好几个帝国主义的分割，遭受由各个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混战的痛苦。中国人民渴望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美帝国主义也曾以帮助中国实现“统一”为名，支持它的代理人蒋介石集团排挤和消灭其他帝国主义扶植的各个反动集团，曾经一度建立号称“统一”的局面。但是，这种“统一”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封建势力仍然各据一方，军阀混战还是连绵不断，人民



新老渔翁的钓竿 华斌

生活依然痛苦不堪。只是在中国人民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之后，才在中国大陆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即使到了这个时候，美帝国主义还通过蒋介石集团霸占台湾，并且操纵联合国的表决机器，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利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妄图破坏中国人民的统一事业。中国的经验和刚果的经验都证明，美帝国主义是人民统一事业的凶恶的敌人。

自从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帜侵入刚果以后，刚果的形势就发生了严重的逆转。本来是人民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刚果，变成了帝国主义及其傀儡集团镇压爱国力量的血腥屠场，变成了新老殖民主义者你争我夺的角逐场，刚刚取得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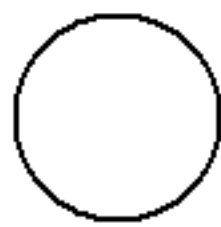
立的刚果人民，又被美帝国主义重新置于水深火热的深渊。回顾一年半来刚果形势的发展，人们可以确定无疑地得出一个结论：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只是美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个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一贯把持联合国，利用它作为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工具。早在十几年以前，美国就曾经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一年半来，它又在帮助刚果“恢复秩序”和“实现统一”的借口下，利用联合国干下了一连串的罪行。美帝国主义明明是卑鄙地利用联合国，来为它推行新殖民主义效劳，然而，肯尼迪却颠倒黑白，说什么其他国家需要联合国来“保护”。他说：“美国不是一个小国。我们可以保卫自己。我认为那些特别要依靠联合国的国家是较小的国家。”肯尼迪的这种说法，欺瞒不了世界各国的革命人民。但是，靠美帝国主义的赏赐过活的铁托集团，却把肯尼迪的话当作无价之宝。铁托曾经跟着肯尼迪学舌，说什么“没有联合国的坚定保证，殖民地人民获得充分独立就非常成问题了。”美帝国主义操纵着联合国所干下的坏事，揭穿了肯尼迪和铁托的这些谎言。

历届联合国会议讨论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问题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和破坏。就拿最近两年联合国会议讨论的情况来说，可以清楚地看出，肯尼迪和铁托所说的联合国“保卫”小国或者“保证”殖民地人民独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九六〇年，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讨论“关于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独立宣言”的时候，美国一开始就反对讨论这个问题。美国代表华兹沃斯说，许多民族“还没有作好接受（独立）的准备”，

不能“一夜之间把一个民族从殖民地附属地位转变到……独立的地位”。在最近一届联合国大会讨论殖民主义问题时，美国代表宾加姆竭力为老殖民主义辩护。他把现在仍在对阿尔及利亚和中非、东非人民进行血腥镇压的英、法殖民主义者，描绘成为“迅速地响应了改变的風潮，把权力移交给了殖民地人民”。他还把荷兰殖民者阴谋阻挠印度尼西亚人民收复西伊里安的活动说成是“采取了有远见和建设性的主动”，并鼓吹把西伊里安交给“公正无私的联合国的治理来统治”。一九六一年七月，当联合国讨论英国侵略科威特问题的时候，美国代表公然认为英国出兵占领科威特是“适当的行动”，并认为“这些行动将能使这个地区的和平得到维护”。由于帝国主义的阻挠，这次讨论没有任何结果。也是在去年七月，法国军队对要求收回比塞大军事基地的突尼斯人民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一暴行引起各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和抗议，但在八月间联合国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美国代表史蒂文森却说什么“突尼斯和法国都是美国的朋友”，叫嚷要突尼斯人民避免采取“强烈的感情”。最近，联合国讨论安哥拉问题，美国代表又为屠杀安哥拉人民的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辩护，说葡萄牙政府在“改变自己的政策”，鼓吹在安哥拉进行“和平改革”，并攻击某些坚持反对葡萄牙殖民政策的代表是“很少强调葡萄牙在非洲存在的积极因素”。

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里面总是用尽一切手段破坏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革命斗争。它有时操纵表决机器根本不让这类问题列入议程，有时在不得已要进行讨论的时候，它就千方百计地不让一些正确的提案得到通过，或者指使一些仆从国家提出有利



于帝国主义的“提案”或“修正案”。在美帝国主义操纵的表决机器失灵的情况下，它就用投票权票的方式进行抵制，以掩饰它维护殖民主义的凶相。当被压迫民族要求独立或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被提到联合国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总是保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利益的立场。铁托集团叫嚷联合国可以“保证”殖民地人民“获得充分独立”，无非是帮助美帝国主义散布对联合国的幻想，麻痹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的斗争意志。

虽然有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阻挠，联合国有时也通过了某些反映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提案。这些提案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道义上给予了革命的人民以鼓舞和支持。当然，这些决议代替不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绝对不能设想，只要联合国通过了决议，就可以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殖民地人民的独立就唾手可得。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决不会停止对革命人民的进攻，联合国的决议也束缚不了他们的侵略魔爪。例如，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等被压迫民族要求独立的问题，在联合国中讨论了多次，也多次作过决议，但是那里的人民仍在遭受着殖民主义者的血腥屠杀。帝国主义决不会因为联合国的一纸决议就给予被压迫人民以真正的独立。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的人民，正是坚决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际援助，同帝国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才使自己的民族解放斗争得到胜利的发展。

一年半来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侵略刚果的历史，十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告诉了人们一个真理：一切被压迫民族不能幻想依靠美帝国

主义及其控制下的联合国“给予”独立，而只有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才能赢得真正的独立。

美帝国主义是被压迫人民很好的反面教员。一年半来，它打着联合国的旗帜侵入刚果，给刚果人民和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又上了新的一课。已故刚果民族领袖卢蒙巴谈到刚果的教训时说得好：“我们非洲人，可能还是非常天真的，可是我们真心相信联合国宪章，并且希望凡是在这个宪章上签字的人都能够遵守它。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才请求这个国际组织来帮助我们。但是，结果如何呢？……可能这会使我们付出很高的甚至是非常高的代价，但是，非洲将得到教训。她会从这里面学到东西。她将了解，我们的朋友在哪里，我们的敌人在哪里，以及如何分辨敌人和朋友”。卢蒙巴被害以后，刚果的爱国力量继承了卢蒙巴的遗志，坚持着斗争。刚果人民已经进一步觉醒起来。最近，刚果农工工会联合会总联盟总书记阿里阿斯在谈到刚果的形势时说：“假如说，一年多以前在我们刚果还有人曾经把‘联合国军’看做是他们的‘救星’，而在一年多以后的今天，苦难深重的刚果人民已经开始认识到联合国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的工具，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刚果人民最凶恶的敌人。”阿里阿斯的这个谈话反映了刚果人民接受教训、继续斗争的决心。

目前尽管刚果的民族解放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今后他们的斗争还会经历曲折艰难的道路，但是，长期身受帝国主义残酷奴役和压迫的刚果人民要起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刚果的独立和统一，终究是任何反动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刚果人民要求独立和统一的愿望最后是一定会实现的。





# 奴役，还是进步？

陈 原

## 一、“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

“脚步要轻盈，巨棒手中擎！”

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以“挥舞巨棒”在拉丁美洲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著称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警句”。

看来，肯尼迪比他的先辈稍微不同些。肯尼迪手中不但擎着巨棒，似乎还举着一把火炬，要来照亮黑夜的道路。何以见得？原来这位总统制成了一个“新产品”，名字叫做“争取进步联盟”，他声称要慷慨地提供为拉丁美洲所需的二百亿美元外来资源的一半——旨在今后十年中“帮助”格兰德河以南两亿人口“自我改革”，“加速他们的经济、教育和社会进步”；或者如肯尼迪的负责亚非、拉丁美洲事务顾问鲍尔斯所说，帮助这些国家“向促进社会正义和有条不紊地政治成长的方向前进”，以便这些国家“可以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来“缔造他们自己的独立前途”云云。

中国有句老话：“听其言，观其行。”去年八月，在埃斯特角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泛美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会议上通过的“争取进步联盟”的“宪章”中，列举出了一些诱人的项目。例如，在拉丁美洲国家，十年间每年每人要增加百分之二点五的收入，每个孩子有

机会上四年小学，要有充足的清水可供饮用等等。对于美帝国主义用这些钓饵来引入上钩的手法，连纽约一家自由主义的周刊，也不免说：“联盟者，骗局也。”曾几何时，这个所谓“争取进步”的真面目就暴露得更加清楚了。今年一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把他的“盟友”找到还是那个埃斯特角去，这一回讨论的已不是多饮点清水、少喝点污水之类，却是用美元来施加压力，要大家跟着华尔街的指挥棒，唱起绞杀古巴革命的血腥进行曲了。正如《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所说，“美国殖民部长在关着门的令人作呕的秘密会议上用整天整天的时间来战胜某些外长的反抗和犹豫，玩弄美国国库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做起赤裸裸的买票勾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总共占本大陆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国家的一小撮寡头势力的代表不顾一切地作出了决议”，来反对革命的古巴。

难道古巴不正在进行自我改革吗？难道古巴不正在逐步消灭因帝国主义和寡头势力的压榨和迫害而产生的贫困和落后状态吗？难道古巴不是在自由选择自己的独立前途吗？……总之，难道古巴不正在争取进步吗？既然如此，以“争取进步”相标榜的肯尼



迪，为什么对革命的古巴又要大加反对呢？仅仅这一事实，就暴露了肯尼迪的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者，不过是从华尔街陈旧的殖民主义武库里搬出来的一根巨棒——只是巨棒的顶端安装上了几个金元而已。

写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美帝国主义所“创造”的许多政治术语，这些术语简直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什么“门罗主义”、“保护主义”、“泛美主义”，什么“金元外交”、“睦邻政策”，如今又加上了“争取进步联盟”。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变来变去，尽管每个政治术语的字眼并不一样，但是，它们无不发出一股血腥的味道。所有这些为了对付拉丁美洲人民所使用的政治术语，本质上总可以概括在美国一句流行的口号里。那就是，他们要实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究其实，也就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在华尔街老板们的眼中，美洲人就是美国人，而美国人则决不是随便那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而是指的美国垄断资本家们。懂得华尔街这套政治语汇学，举一反三，就可以知道，肯尼迪所创造的“争取进步联盟”，其含义不外是争取美国统治拉丁美洲人民的联盟罢了。

尝了一百几十年“巨棒”滋味的拉丁美洲人民，一下子就看出了肯尼迪这个什么联盟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肯尼迪两个多月前在南美之行中的遭遇就是证明。

尽管这个总统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故作“轻盈”之态，说什么在去年年底那次旅行中，居然发现了大陆南方许多国家对美国“产生了新的信任”。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看看那里的人民是怎样表达他们对肯尼迪的“信任”的吧。

事实是，在肯尼迪还没有到达南美之前，那里就爆发了人民群众的抗议行动。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各主要街道，出现了五颜六色的标语，写着“要卡斯特罗，不要肯尼迪”、“打倒美国佬”等等口号，那里的学生举行了抗议肯尼迪访问的示威；在波多黎各，大学生联合会谴责说，“波多黎各正在受美国殖民主义之苦”，“肯尼迪的访问主要是继续展开帝国主义向拉丁美洲渗透的运动”，这个组织宣布，肯尼迪是“不受欢迎的人”；在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也发生了反对肯尼迪访问的群众示威……。

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大为惊慌。例如，当肯尼迪将要到达委内瑞拉的时候，那里的政府为着避免人民向这位“北方邻人”过分热情地表达“信任”，就忙得不可开交——连忙调来了全国四分之三的陆军共计三万人，拱卫首都加拉加斯；海军陆战队和空军都下了动员令，束装待发；五千名警察全体出动，从机场到城内，每隔二十五呎就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军警。这还不够。所有飞机一律不准飞临城市上空，所有街道和广场一律不准三个人以上聚在一起，所有“可疑的”人物通通关在监牢里。这还不够。从“北方邻人”那里又来了大批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一夜之间，委内瑞拉首都的街头就充满了穿褐衫的特种人物。于是，肯尼迪总统和他的随从们才轻盈地（！）乘着几辆特地从美国运来的避弹汽车，在军警特务的围护下，被引导到了总统府。

历史的车轮在前进。四年前，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访问拉丁美洲时，头上脸上吃了



很多很多臭鸡蛋和烂番茄，这证明他那时还敢在人群中“招摇过市”；肯尼迪先生呢，他比尼克松幸运些，没有吃到臭鸡蛋之类的东西，只是他坐的避弹汽车挨到无数石块的撞击而已。至于沿途张贴着的标语，尊贵的总统先生坐在避弹汽车里，不曾看见，这样，他就没有福气去充分享受委内瑞拉人民怎样表达对他的“新的信任”了。

肯尼迪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吗？在这

里，不妨借用《马太福音》中的一段话：“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当然，“争取进步联盟”这个新殖民主义的“新产品”，不仅是不结果子的树，它还是美帝国主义用以伤害拉丁美洲人民的“荆棘”和“蒺藜”。多谢上帝，人们正在按照肯尼迪所信奉的上帝的格言去办事呢。

## 二、从丰饶到贫困和从贫困到丰饶

当肯尼迪打起“争取进步联盟”的幌子，声称要“援助”拉丁美洲各国“解除普遍的苦难”时，美国《新闻周报》对这个大陆的贫困情况作了这样的描绘：“拉丁美洲的两亿人口差不多有一半是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的；百分之四十五是文盲；百分之五十四缺少清水饮用；百分之四十的城市人口住在破房子里。”

但是，这个贫困的大陆，却是资源丰饶而富足的地区。十多年前，巴西著名的营养学家约瑟·德·卡斯特罗说，拉丁美洲可算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区域之一，因为人少地多，而且土地肥沃；占全世界百分之六的人口住在占全世界适宜居住的百分之十六的沃土上。十五世纪从欧洲来的“探险家”，记录下南美洲“黄金国”的传奇，吸引了许多冒险家到这里来染指。欧洲殖民主义者从中美洲一带肥沃的甘蔗田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有人说，这财富比他们从东方掠夺来的利润还要多。

今天，美国的垄断资本家们在这个贫困

的大陆上所攫取的财富，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殖民者所掠夺的财富都大得多。纽约出版的西班牙文刊物《展望》，曾经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证明了拉丁美洲各国给美国提供了巨量的原料，例如，铜、碘、硝石（智利）、铀、钨、铀（巴西）、铋、铅、羊毛（秘鲁）、石油（委内瑞拉）、硫磺、锡（墨西哥），……都占了美国全部掠夺物的很大一部分。至于咖啡、香蕉、可可、糖，这些热带和亚热带产品，几乎供应了北美洲绝大部分需要。

为什么丰饶的土地却又落到这样贫困的境地呢？美国垄断资本家和他们的辩护士当然不敢据实回答这个问题。在美国国务院做了多年高级官员的一位“学者”——布朗大学名誉校长里斯顿就说过，拉丁美洲的贫困是几乎不能相信的贫困。那么，和谁有关呢？他在题名《革命的时代》的那篇论文里说，拉丁美洲的贫困是因为那里的人民“长年累月的苦恼”所造成的结果。这个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不承认拉丁美洲人民的贫困同美帝国主义有关，编造出这套奇谈怪论，真是抵赖



得太笨拙、太无耻了。

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制造了贫困、饥饿、死亡，是他们能用任何花言巧语所能掩盖得了的么？听听《第二个哈瓦那宣言》的控诉吧：“在这块半殖民地的大陆上，饿死、并非由于不治之症而病死或未老先衰而死的人每分钟约有四个，每天有五千五百个，每年有二百万个，每五年有一千万个。……与此同时，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抢走我们的一千块美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的价格。”肯尼迪无耻地声称他那个什么“争取进步联盟”是为了“援助”拉丁美洲人民摆脱贫困状态，而其实，这不过是将掠夺来的利润拿去做本钱，利上生利，循环不已，更狡猾地对拉丁美洲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罢了！

拉丁美洲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斗争书写自己的历史，争取摆脱由于被美帝国主义的奴

役和掠夺所造成的悲惨境遇。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争取进步联盟”之类的工具来推行它的新殖民主义，都阻挡不了这个历史进程。古巴不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吗？

英雄的古巴人民，不仅以自己的顽强斗争，砸碎了美帝国主义和巴蒂斯塔反动统治套在他们脖子上的锁链，而且，他们正在自己自由的国土上，创造着繁荣、幸福的生活。在短短的三年中，古巴的十多万小农变成了土地的主人，所有的农业工人获得了全年工作的保障，还建立了人民农场和合作社；古巴人民已经把美国在古巴的垄断企业全部没收，实现了大企业的国有化；去年一年，文盲在古巴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已由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下降到百分之三点九；医疗机构增加了三倍……。尽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扼杀古巴，但是，这个英雄的国家仍然在昂首前进。

从古巴人民那里，拉丁美洲人民已经开始看见了这贫困大陆黎明的曙光。贫困终究会变成丰饶的。

## 肯尼迪与牛奶

·岑 桑·

一月二十三日，肯尼迪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牛奶业和营养大会，并且发表了演说。他向牛奶业巨头们许愿，保证今后在白宫的每一顿餐宴上，都将供应牛奶。这个总统说了许多话，而戏剧性的高潮则是出现在演说快要结束的时候；据美联社报道，这

个总统当场“举杯向听众喝下一杯牛奶。这就是他上台演说的目的”。

原来，美国全国的牛奶消费量，去年又有显著的下降。——“过去一年中牛奶的消费量出人意外地下降了将近三十亿磅，……现在还没有迹象证明，这种消费量下降的情况



在今后这一年将会扭轉过来。”肯尼迪在今年的“农业咨文”中这样說。为牛奶公司老板們的利潤着想，于是，肯尼迪就以总统之尊，做起他們的活广告来，好像別的紳士淑女們在电视台客串什么“我爱可口可乐”、“我爱潘沛依美容霜”、“我爱……”那样。而总统这次表演的是“我爱牛奶”。

本来，美国的牛奶消費量为什么每况愈下这一問題，早就由事实作了解答：由于生活水平下降，有些喝牛奶的人不得不削減掉他們生活中的这个項目。但是，那儿的一些慣于掩耳盜鈴的官員們，却偏偏忌諱这个事实，硬要把牛奶卖不出去的原因，归咎于人們害怕牛奶里沾有放射性微粒云云。肯尼迪总统就是力主其說的。可是，总统的这个有关牛奶問題的答案，到底可以打上几分？在他蒞临美国牛奶业和营养大会演說后的一天，就有了分曉——

一月二十四日，在肯尼迪举行的記者招待会上，一个記者向他提出了問題：“你昨天說应当有更多的人喝牛奶。据我了解的年輕夫妇中沒有一个由于放射性而停訂牛奶的，他們停訂牛奶是由于他們为他們的孩子买不起足够的牛奶，而不是由于放射性。牛油的价格高得已在餐桌上絕迹，而牛奶的价格也是如此之高，因此他們都买不起，可是我們却有剩余产品要我們买来送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肯尼迪显然被这番問話弄得大为尷尬。

他一会儿說，他并不认为包括牛奶在內的消費品銷售量的下降，“可以先由价格来解釋”，一会儿又說，“虽然价格显然是一个因素，却并不是全部解釋”；他一会儿說，自己“不能肯定”牛奶的銷售量“在过去十二个月內下降得很劇烈的整个原因是什么”，一会儿又咬住“放射性”这个答案不放，硬說在牛奶問題上，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人們害怕那里面的“放射性”。为了肯定这一看法，肯尼迪还說：“我正在設法在放射性問題上重新使人放心”；他并举例說，白宫新聞秘书“塞林格先生今天上午喝了牛奶，并没有不良反应”。这样一来，肯尼迪就把那个使他狼狽不堪的难题，支吾其詞地打发掉了。

单在牛奶問題上，就有不少妙事可以归入西方《笑林广記》里去。請看，那些有資格在“每一頓餐宴上”都可以喝上牛奶（而且惠及猫儿和哈叭狗）的亿万富豪，为了榨取高額利潤而千方百計使广大劳动人民陷于赤貧；但是当他們为“过剩”的商品而发愁时，又只好挖空心思幻想赤貧的人們忽然有大把金錢来买这些商品。当他們拚命扩軍备战，需要制造战争恐怖的时候，他們就要让人为的“恐核病”大肆流行，宣傳什么放射性已經如何如何“威胁”到“美国的正常生活”；但是，当他們要大卖牛奶的时候，却又不得不“設法在放射性問題上重新使人放心”了。……以无法解决的矛盾为其特征的資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不产生这一类笑話的。





# 关于认识中的肯定否定问题

——谈太阳系学說的一段历史

· 龔育之 ·

新旧事物之間、新旧認識之間，总是存在着两重关系：肯定的关系和否定的关系。两重关系，缺一不可。

自然科学的历史，就是人們对自然界的認識，經過无数的肯定否定的环节而向前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絕不可能仅仅是經過單純的肯定的环节来实现的。因为，自然科学的历史，絕不可能仅仅是正确認識的簡單积累和不断被证实的直綫过程，而是充滿着正确的認識和錯誤的認識、全面的認識和片面的認識、深入的認識和表面的認識、普遍的認識和局部的認識等等的不断斗争的曲綫过程，是一切不正确的和不完全正确的

的認識不断被克服、即被否定的过程。沒有矛盾和斗争，沒有否定，就沒有科学的前进，就不会有科学。同时，这个过程，又絕不可能仅仅是經過單純的否定的环节来实现的。因为，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不仅有許多应该被克服的不正确的認識，而且有許多应该继

承下来和积累起来、即被肯定的正确的認識。列宁說：“人类思維按其本性是能够給我們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絕對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給这个絕對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点滴……”<sup>①</sup>。所有这些“新的点滴”，在科学的发展中，都不应该拋棄，而必須統統继承和积累起来，并且包含到以后发展阶段的科学內容中去。沒有继承和积累，沒有肯定，也就沒有科学的历史，也就不会有科学。

毛澤东同志說：“对于任何問題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又說：“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願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sup>②</sup> 对于自然科学发展中的肯定否定問題，我們也必須有全面观点，必須有“两点論”，避免片面观点，避免“一点論”。

根据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我們对一切学术文化遗产和成果都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既有否定，又有肯定。对于自然科学來說，就是以实践作为檢驗一切科学理論的标准。凡是經過实践的檢驗证明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自然現象和規律的，就加以肯定，反之，凡是經過实践的檢驗证明是錯誤了的，就加以否定。

新旧事物、新旧認識之間的肯定否定关系，具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我們不仅要認識肯定否定規律的普遍性，而且要研究各个具体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頁。

② 《学习和时局》。《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42、943頁。



发展过程的肯定否定方式的特殊性。忽视肯定否定方式的特殊性，机械地把肯定否定的某一种方式当作适用于一切过程的方式，是不正确的。

多种多样的肯定否定方式，又可以概括为几种基本的类型。肯定否定方式的基本类型的划分，是一个值得提出来专门加以探讨的理论问题。

研究肯定否定方式的特殊性、区分肯定否定方式的基本类型，对于实践，例如，对于怎样正确地去批判继承自然科学的历史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里，我们仅就太阳系学说的一段历史，来分析一下肯定否定方式的多样性及其基本类型问题。

从太阳系说的历史来看，有两种类型是必须加以区别的。第一种基本类型是，新认识推翻（否定）旧认识的基础，代之以新的基础，同时又继承（肯定）旧认识中个别的、局部的正确原理。第二种基本类型是，新认识保存（肯定）旧认识的基础，同时抛弃（否定）其中局部的错误的原理，代之以新的正确的原理；或者克服（否定）旧认识的片面性、表面性、局限性，使之发展到更为全面、深入和普遍的新阶段。从旧认识到新认识的无论那一种类型的肯定否定方式，都是认识发展中的质变和飞跃，但是，却是属于不同类型的质变和飞跃。

关于太阳系的科学学说，是由哥白尼所创立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玫关于地球是宇宙的不动的中心的错误学说。他指出，并不是太阳同其他行星一道围绕地球转动，而是相反，地球同其他行星一样，

围绕太阳作周年的转动，并且绕自己的轴作周日的转动。

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曾经经历过艰苦的斗争。这个斗争，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科学的宇宙观同宗教的宇宙观的斗争。亚里士多德和托勒玫的学说，当时是反动封建宗教势力所利用和支持的官方科学。反对这种学说，就意味着向教会在自然事物方面的权威挑战，从而会招致残酷的摧残和迫害。所以，恩格斯把哥白尼著作的出版，称为伟大的“革命行为”（《自然辩证法》）。

撇开这一方面的斗争不谈，仅仅从科学认识的方面来说，哥白尼学说也具有深刻的革命性。它打破了人们以直观感觉为基础的传统谬见，从根本上推翻了统治着人们头脑千百年之久的权威学说，还太阳系行星运动以本来面目。在认识发展史上，这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

哥白尼学说对亚里士多德—托勒玫学说，是一个否定。

但是，亚里士多德—托勒玫学说，在它的时代里，仍不失为一种具有某些相对正确的内容的学说。例如，亚里士多德在科学史上最先确立了地球是球形的科学学说。他曾经指出，月食是月球落在地球阴影以内的结果，月食时月球上暗区的圆形，乃是地球球形的证据。他还指出，在地球表面南北移动时，人们可以看出恒星位置有很大变动，在南方能够看到的某些恒星，到了北方却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就看不见了。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地球不但是球形的，而且对于宇宙空间来说，还是不很大的。

亚里士多德的地球球形学说及其论据，



不仅哥白尼在自己的著作中继续加以引用，就是在我們今天的教科书中，也仍然引用着。

亚里士多德为了反駁地动学說，还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論据：如果地球在运动，那么，从地球上看到远处两颗远近不同的恒星，它們的相互位置应该发生变动。如同我們从行駛着的車輛上看远处两棵远近不同的树，就会發現它們的相互位置发生变动一样。这个現象叫做視差动。人們从来没有看見过恒星的視差动，可見地球是不动的。亚里士多德的結論，我們知道是錯誤的。但是，他所用的論证方法，却是科学的方法。視差动問題成为地动說的拥护者必須加以解决的难题。哥白尼对此作了一个說明，他說，由于恒星离我們太远，这种視差动就观测不出来了。在哥白尼逝世将近三百年以后，亦即亚里士多德逝世大約两千一百多年以后，由于技术的发展，人們终于观测到了恒星的視差动現象，从而最后駁倒了地球不动說的一个有力論据，证明了地动說的正确。

在这个問題上，哥白尼和他的学說的后继者，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結論，但却肯定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論证方法。

由此可見，即使是哥白尼学說同亚里士多德—托勒玫学說之間，也不仅有否定的关系，还有肯定的关系。它們之間的肯定否定关系，属于我們前面提出的第一种基本类型。

在哥白尼之后，开普勒发现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标志着太阳系学說发展的新阶段。

哥白尼的貢獻，主要在于把地球和太阳摆在它們同諸行星构成的天体系統中的正确位置上。但是，关于地球和行星圍繞太阳运动的軌道形状，哥白尼却因襲了从托勒玫以

来的傳統观念，以为正圓形的。而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

托勒玫学說根本歪曲了地球、太阳和行星間的关系，因此，在解釋从地球上看到的行星运动图象方面，遇到极大的困难。为了勉强湊合观察到的材料，在他的理論中，設計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本輪和均輪”系統。哥白尼学說正确地反映了地球、太阳和行星間的关系，从而从根本上克服了这个困难，使行星运动的图象，得到了很自然、很簡單的說明。

但是，由于哥白尼仍然因襲着正圓形軌道的錯誤观念，在解釋行星运动的时候，他还不能够完全摆脱托勒玫学說的“本輪和均輪”系統，只不过把它們的数目大大减少了而已。

根据哥白尼学說編制的星历表，仍然同观察到的材料有頗大的出入。

列宁說：“無論在自然界或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我們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的情形”<sup>①</sup>。在認識領域中，也是这样。

开普勒經過长期仔細的研究，发现行星圍繞太阳运动的軌道，原来并不是正圓形，而是橢圓形。开普勒的这个发现，以及他关于行星运动規律的其他发现，是以哥白尼学說为基础，又克服了哥白尼学說中局部的錯誤原理，使它彻底摆脱了托勒玫学說的陈腐观念和人为的“本輪和均輪”系統的残余，并且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学說，使之臻于更为完善的境地，取得了理論計算和观测之間的一致。

开普勒学說同哥白尼学說之間，也存在着肯定否定的关系。这种肯定否定的关系，

<sup>①</sup>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8頁。



与哥白尼学說同亚里士多德—托勒玫学說之間的肯定否定关系不同，而属于我們前面提出的第二种基本类型。

从开普勒到牛頓，关于太阳系的学說，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是描述性的定律。它們完善地描述了行星的运动，但是还没有說明行星运动的本质。它們闡明了行星怎样在运动，但是还没有回答行星为什么这样运动。

从伽利略开始到牛頓来完成的力学学說，特别是牛頓的万有引力学說，进一步闡明了行星运动的本质，回答了它們为什么这样运动的問題。原来，各天体之間，乃至任何物体之間，都是根据万有引力定律相互作用着的。人們知道了太阳和各行星的质量，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距离，就可以依据万有引力定律得知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力。知道了这些相互作用力，就可以依据牛頓的物体运动定律，如同計算投石的运动一样，計算出这些天体的全部运动，推知它們的过去，預測它們的未来。这样，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就得到了統一的解釋。它們可以从牛頓的普遍力学定律推导出来。正如恩格斯說的：“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定律，而牛頓則从物质的一般运动規律的观点把它概括起来了”<sup>①</sup>。

牛頓的力学学說，是比开普勒学說更为深入的、具有更为普遍的概括性的学說。

牛頓学說同开普勒学說之間，也存在着肯定否定的关系。在这里，被否定的，并不是某种錯誤的原理（开普勒学說并不是錯誤的，只是对于事物本质的不甚深刻的認識），

而是旧学說的局限性。这种肯定否定的关系，也属于前面提到的第二种基本类型，虽然它又不同于也是属于这种基本类型的、开普勒学說同哥白尼学說之間的关系。

上面我們簡略地分析了太阳系学說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頓的发展历史。当然，牛頓也只是代表太阳系天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最后阶段。由无数肯定否定的环节联接起来的認識的发展，是没有尽头的。

从这些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間，肯定否定的关系，是普遍存在着的，每一次从旧阶段飞跃到新阶段，肯定否定的方式又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每次对旧学說的否定，都需要有足够的科学上的理論上的勇气。斯大林說过：“在科学发展史中有不少勇敢人物，不管有何等障碍，都能不顾一切地打破旧說，創立新說。”<sup>②</sup>哥白尼、开普勒这些为科学发展开拓道路的勇士，是我們学习的榜样。

但是，要做真正的科学勇士，不仅要敢于打破旧說，創立新說，而且要善于打破旧說，創立新說。这就是說，不能是凭空的，而必須是牢牢地立足在实践之上的，不能是盲目的，而必須是能够掌握科学发展中破旧立新的規律的。学习馬克思主义辯证法，克服絕對肯定和絕對否定的片面性观点，仔細地研究各个具体发展过程中肯定否定方式的特殊性，注意到肯定否定方式的不同基本类型，克服不作具体分析、不会区别对待的简单化观点，就能够更好地推进科学的发展。

①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頁。

② 《在克里姆林宮招待高級学校工作人員时的演說》。《論列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3頁。



# 我們的時代和卡德爾的“辯證法”

吳 江

列寧說，修正主義者談論辯證法，只是為了用“詭辯來閹割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sup>①</sup>，只是為了“取悅於資產階級而無恥地歪曲了辯證法”<sup>②</sup>。過去的老修正主義者是這樣做的，現在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者也正是這樣做的。

可以拿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的主要宣傳家卡德爾在一九六〇年八月出版的小冊子《社會主義與戰爭》來做個例子。卡德爾這本小冊子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迎合當時帝國主義組織世界範圍的反華反共反人民運動、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需要，同時力圖賦予現代修正主義的叛賣言論以某種理論的形式。卡德爾在這本小冊子中高談辯證法。他

企圖證明，站在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立場上的人，由於“違反”了列寧的辯證法思想，結果不能不陷入“主觀主義和靜止的教條主義”<sup>\*</sup>；而卡德爾等人則是十分“忠實”於馬克思的“劃時代的科學方法”，特別“忠實”於“列寧整個的思想”，僅僅反對“像斯大林一樣站在反辯證法立場上”的人。卡德爾儼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捍衛者自許，說什麼反對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拖入“骯髒的政治攻擊中去”，因此覺得“必須在哲學方面來談一談”。

這樣，卡德爾的小冊子也就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來看一看，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者如何地歪曲辯證法而替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服務。

## 所謂“通過量的對比的變化”達到“質的對比的變化”

卡德爾企圖加給譴責現代修正主義的人一個罪名，說他們看不到“社會力量在量的對比上的重大變化，他們斷言，這些變化沒有給現代世界帶來任何新的東西”。他在哲學上用了這樣一種特有的表述：“質的對比的變化過程正是通過量的對比的變化進行的。”“對立關係的量變不可避免地反映在這些矛盾各個方面內部的質變上。同時，這些質變又產生新的量的對比。這就是矛盾統一性本

身和對立面內部的鬥爭手段和形式的經常變化過程。”

在這裡，卡德爾把自己裝成是從力量對比的分析出發，並且是用量變和質變的辯證

① 《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1頁。

② 《第二國際的破產》，《列寧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5頁。

\* 本文中凡引用卡德爾的話未注明出處的，均見卡德爾的《社會主義與戰爭》一書。





法来看问题的。

馬克思主义认为，量变不可避免地要引导到质变，量变到达一定点就会引起事物的根本质变；但量变和质变是有区别的，量变不能代替质变。并且事物变化的根据总是在其内部，而不在外部，外部条件通过内部因素而起作用。就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来说，不会仅仅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增强，而不需要经过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决定性的变革，就引起帝国主义状况的根本变化，使帝国主义不再成为帝国主义。同时，在帝国主义内部，也不会仅仅因为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经过革命的飞跃，就能达到帝国主义制度的变革。卡德尔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混淆了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混淆了量变和质变。他所谓“质的对比的变化过程正是通过量的对比的变化进行的”，“对立关系的量变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这些矛盾各个方面的内部的质变上”等暧昧的说法，正是说，在外部关系的变化中就有内部的根本变化，在量的变化中就有质的根本变化。这不是辩证法，而是反辩证法的观点。

从反辩证法的观点出发，卡德尔力图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向人们证明，仿佛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已经引起了資本帝国主义世界的根本变化；仿佛由于帝国主义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化，已经引起了壟断資本主义的根本变化。尽管卡德尔之流用辩证法的术语，特别是用“量变质变”、“相对绝对”、“可能性现实性”等范畴来装饰自己，现代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这个精制的

观点，是和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对立的。

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声明》对于这几年的主要总结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它的国际影响的急剧增长；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迅速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阶级搏斗日益加剧；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更加衰落和腐朽。在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这也就是说：东风日益压倒西风。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帝国主义的日子已经不长了。但是，《声明》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帝国主义仍然是帝国主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还在实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还力图保持旧的殖民障地，并用新的形式推行殖民主义，对内则加重剥削和推行法西斯化。帝国主义决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实际生活迫切地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阶级、反帝民族运动、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和平战士日益紧密地把力量联合在一起，采取坚决的行动，以防止战争和保障人们的和平生活。实际生活迫切地要求一切革命力量进一步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这样观察当前的时代的，就是这样估量帝国主义的状况和命运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怎样呢？在卡德尔等人看来，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认为，今天由于



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世界正从两方面发生质变：“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他們所說的社会主义方面的变化，我們留到下面再談。这里先說资本主义方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卡德尔就是这个《綱領》的报告人）关于资本主义的变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力量在許多国家的新胜利和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由于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影响和作用，已“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变化”，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变”。帝国主义仿佛已經变得馴良、和解、理智，“很容易受到劳动人民和民主群众的压力和社会影响”，不断“向工人阶级妥协和让步”。按照卡德尔的說法，所有这些虽然是被迫的，“但是，‘被迫’或者‘不被迫’——历史效果是相同的。正是这种类型的‘被迫’是历史的法则。”

遵照这种“历史的法则”，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南共綱領》判定，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倾向的加强”。这个所謂“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国家壟断资本主义。卡德尔在关于《綱領》的报告中，除了特別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現象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典型特征”这一点以外，还解釋了为什么要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来代替“国家壟断资本主义”的概念，据說是由于“国家资本主义”这东西既存在于帝国主义国家，也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概念可以“把所有这些过程都能概括起来”。卡德尔就是这样“应用概念上的灵活性”来誣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

义”），美化帝国主义的国家壟断资本主义，把两种本质上全然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談。我們請讀者注意，在同一个《綱領》中，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断言：近几十年来馬克思主义思想“在闡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規律和矛盾方面”“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这也就是說，他們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所說的一切，意义何等重大。他們厚顏无耻地自称要从这方面来填补馬克思主义理論的“空白”。

既然如此，就讓我們来看一下《綱領》中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所說的一些主要論点。卡德尔认为，有些批評家不怀好意，故意歪曲他們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因此看一下《綱領》中的有关論点，就自然更有必要了。

《綱領》中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这样写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遭受着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关系领域中施加的經常的自觉和自发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本身的压力”。这一切“引导社会将某些社会经济职能和生产資料日益国家化”，“国家把經濟中的重大作用夺取过来”。而“由私人資本轉給国家的某些經濟职能愈多，經濟中的新的、社会物质因素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压力就愈大”（《綱領》草案修改稿曾指出經濟中新的社会物质因素“就其客观趋向來說是社会主义的”）。——請看，资产阶级国家居然把資本家的經濟职能和生产資料夺取过来！！私人資本則把权力轉給了国家！！

\* 本文中凡引自《南共綱領》和卡德尔的小册子、报告中的一些話，其中的着重号均系引者所加。



《綱領》中又說：“在承担起重大的經濟职能的同时，国家和国家机器也就获得其独立的經濟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国家机器的社会作用”。这个国家机构，“为获得其独立职能，为了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正在采取各种办法“限制私人資本的作用”，不断地“提高經濟民主发展程度”。

这样一来，我們终于看到了一种从未看到过的，独立的、超然于社会各阶级利益之上的、对各阶级一视同仁的、全民的资产阶级“国家”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他的一九六二年《国情咨文》中曾特别提到，他的国家是“公民的仆人，而不是公民的主人”。原来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早已为这种說法作了“理論”的准备。照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說来，这种“国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都表現出了它的不可思議的神奇力量。

在国内方面。(1)国家就可以采取种种干涉措施，一方面，“部分地限制私人管理資本主义财产的权利”；另一方面，“生产者通过各种組織和或多或少的权利，影响企业管理和整个經濟管理机构”。(2)可以“通过限制管理私人資本和監督利潤分配，并在此条件下，加入一定的計划經濟的因素”。(3)“国家在劳动关系和财产关系、社会权利和社会服务以及其他社会关系方面的(調节者的)作用也得到加强”。总之一句話：資本主义“通过某些經濟职能的国家化来改变其制度，从而使这一制度的私人資本主义基础日益削弱”。“典型的資本主义社会制度已經成为过去”了。

在国际方面。“国家直接参与的、区域性的和广泛的国际經濟組織的出現，是經濟

合作和协同一致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同私人壟断資本过去在这方面的排他性活动不同，但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用来作为建立强者、发达者对于弱者、不发达者的經濟和政治霸权的新手段。”关于这一点，卡德尔在小册子中重申：不能“把典型帝国主义形式的‘資本輸出’同对不发达国家的有組織的国际援助混为一談”。讀者当然都能懂得，这里所謂“有組織的国际援助”，除了指美国直接組織的用来控制其他国家的“美援”和为美国壟断資本所控制用以推行其新殖民主义的机构，如世界銀行、国际货币基金組織、国际金融公司，以至美洲国家組織、爭取进步联盟、非洲經濟委员会等等，还能够是指什么呢？

最后，我們在《綱領》中讀到了这样的結論：“資本主义世界蓬勃发展的国家資本主义趋势极其明显地证明：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徑不可阻擋地深深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就是这样，“通过量的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政治理論家和实践者的头脑中”，竟已达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质变”：这里完全是“新的”、“独立的”（超乎社会各阶级利益之上的）国家上层建筑，和同样“新的”、（对于私人來說）“独立的”經濟基础，——这那里还是原来的資本帝国主义？这至少应当說已經是“人民資本主义”，或者簡直已經是“社会主义”了；而在对外方面呢，帝国主义則至少已是“国际援助主义”一类的东西了。

自从資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起，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之間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帝国主义的命运



等等問題，不断地进行了爭論。資本主义在它自身範圍内会經歷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某种变化。帝国主义就是資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种变化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并不是資本主义本质、本性的改变，“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資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的繼續而成长起来的”。但修正主义者往往对这种变化持相反的看法。我們都还记得老修正主义者考茨基提出的所謂“超帝国主义論”。考茨基不承认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他认为这只不过是“財政資本的一种政策”（用来征服和吞并农业区域的）。他用这种說法来抹杀帝国主义所以为帝国主义的經濟基础，即割裂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它的經濟之間的关系；按照这种說法，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就只要去反对帝国主义的某种政策，而不必去变革决定帝国主义政策的經濟基础（即帝国主义的社会經濟制度）。同时他又认为帝国主义作为各种政策中的一种政策，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就会出现“各国財政資本間的相互斗爭为联合起来的国际財政資本对世界的共同剝削所代替”。这就会引起資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变化。这就是所謂“超帝国主义”。考茨基确信：这种超帝国主义时代到来，帝国主义至少可以避免“道义上的破产”。列宁指出：这种說法掩飾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說得好像头头是道，“实际上却等于更巧妙更隱蔽地（因此是更危險地）宣傳同帝国主义妥协”<sup>①</sup>。

現在，考茨基的所謂“超帝国主义”时代，

在現代修正主义者眼中，不仅已經完完全全地实现，而且远远地超过了。在卡德尔等人的眼中，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別由于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的經濟基础已經自动地发生了变化，資產階級国家成了反壟断資本的力量，帝国主义对外擴張的必然性也已經不存在了；由于社会主义世界和資本主义世界的激烈矛盾，現在全世界資產者已真正联合起来，帝国主义列強間的矛盾已經如此被削弱，以致我們在實踐中甚至可以不必去重視它。因此，《莫斯科声明》中所謂随着資本主义不平衡性的发展，各个帝国主义之間特別是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間瓜分資本主义世界的搏斗更加尖銳化等等，不过是神話！不仅如此，过去的考茨基是說“联合起来的国际財政資本对世界的共同剝削”，这里还承认“剝削”；然而現在，卡德尔之流向我們指出的却是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有組織的国际援助”，而不是什么剝削。在卡德尔之流的眼中，显然已不仅出現了“超帝国主义”，而且还消失了其剝削的性质，成为“无剝削的”“超帝国主义”。——这一点，即在看待帝国主义的变化方面，現代修正主义者无疑比老修正主义者走得更远了。

“人民資本主义”加上“无剝削的”“超帝国主义”，——这就是卡德尔根据新的世界力量对比向我們展示的資本主义社会发生“奇異质变”的一幅美妙图景，这也就是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对于現代帝国主义特征所作的基本的描述。

<sup>①</sup>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3頁。



## 在“过渡”的掩盖下

卡德尔从上述的基本描述出发，向我们提出斗争策略、斗争形式的问题。他在关于《纲领》的报告中说，帝国主义状况的变化，向我们“指出工人阶级和一般社会主义力量在这样情况下利用来为夺取政权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而斗争的各种各样形式和方法”。

据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卡德尔之流是很重视斗争形式的，是很注意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的；但是可恶的“教条主义者”，“歪曲”列宁关于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这个论点的含义。“列宁认为绝对的东西，就是运动”；而“教条主义者”所理解的绝对的东西，却“是在力量内部对比中发生各种量变时的矛盾的要素和形式的不变性”。

不对，尊敬的卡德尔先生！关于绝对的东西，列宁自己是这样说的：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sup>①</sup>。请问，没有矛盾斗争的绝对性，怎么会有运动的绝对性呢？至于斗争的绝对性，当然不等于斗争形式的绝对性。矛盾的斗争是无条件的、永久的、绝对的，而斗争的形式则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形式总是随斗争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一切都是极简单明了的。卡德尔为什么像害怕火一样害怕说出斗争的绝对性呢？卡德尔在这方面和我们纠缠，难道果真是为了重视革命斗争的形式问题吗？果真是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上的灵活性吗？

卡德尔的小册子和《南共纲领》以及卡德

尔关于《纲领》的报告，都以大量的篇幅谈到在“与列宁时代完全不同”的新条件下社会主义力量的斗争形式问题。他们所说的新条件，主要是指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变化。这里有必要指出，卡德尔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称作“过渡时期的典型现象”，这是想玩弄一个小小的手法。列宁曾经说过：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制度进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过渡”<sup>②</sup>。列宁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列宁是说：帝国主义的垄断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充分的物质前提，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这里，“过渡”的前提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由一般垄断进入到国家垄断的客观形势，更要求无产阶级加强这种革命斗争。但是，根据现代修正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特征的描述，事情却完全不是这样。在这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被认为“可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在这里，好像是由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资本主义已经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资产阶级“国家”已经为人们安排好“过渡”的一切成熟条件了。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来谈论所谓“一般社会主义力量利用来为夺取政权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而

①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8页。

②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2页。





斗争的各种形式和方法”的。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纲领》，关于这种“斗争形式和方法”写道：

“在目前，除劳动群众为解决有关他们日常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的问题而进行的直接日常斗争外，也提出了下列问题：国有化，以及生产资料和经济职能社会化的其他形式，企业管理和自治的各种形式，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民主的发展，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社会中的地位，工人、劳动人民和消费者参加经济管理机构和对它实行监督等。所有这些问题，作为争取加强工人阶级的社会影响、争取工人阶级统一、争取提高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觉悟的斗争形式，以及作为争取政权的斗争形式，对于整个工人运动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里把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一切“诱人”目标都提出来了：去要求“国有化”吧！去设法把“生产资料和经济职能社会化”吧！去“参加企业管理和自治”吧！去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吧！去“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吧！去“参加经济管理机构和对它实行监督”吧！等等。卡德尔在关于《纲领》的报告中，把所有这一切叫做“革命和进化的统一”，也叫做“通过比较和平的进程进行的飞跃”，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范围内，“工人阶级和主导的社会主义力量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政权和社会生活方面逐步争取和取得领导作用，并且逐步地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好一个“和平的渐进的飞跃”！但是，他独独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革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独独没有提到使无产阶级革命区别于资产阶级改良的东西，这就是：打碎资产阶级

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以这作为目标进行革命斗争，并以这种精神训练、教育无产阶级群众。

让我们再读一读卡德尔小册子中所写的如下一段话吧！

“社会主义日益增长的力量、它的范例的说服力、社会主义关系对世界经济日益强大的物质影响，以及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再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都有力地加速着资本主义的崩溃过程，并不断迫使和刺激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力量向工人阶级妥协和让步。这同时也加强着工人阶级的地位，便于它比以往更顺利地利用议会斗争的手段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来加强其在社会上的政治影响和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要求和目标。最后，这也能使比各国共产党广泛得多的政治力量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接受下来。”

看，情形是多么美妙啊！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由于社会主义“范例的说服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力量（当然指华尔街老板们、肯尼迪、戴高乐、阿登纳等等）就会不断地“向工人阶级妥协和让步”。这些统治力量迟早会膜拜在“范例”之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完全不必要去进行什么革命斗争，完全不必要去准备打碎资产阶级反动国家机器，这一切都是无益的“冒险”，而只须等着资产阶级统治力量有一天在“范例”面前甘拜下风，自动退出统治地位就行了。同样由于这种“范例的说服力”，资本主义社会中“比各国共产党广泛得多的政治力量”（当然包括右



翼社会党人、各色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 统统都会“接受”社会主义纲领, 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奔向”社会主义!!

说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范例”, 毫无疑问, 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对于世界发展进程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革命和世界和平的堡垒。它们使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看到自己的希望和前途, 鼓舞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进行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 鼓舞他们以自己的革命行动去促使帝国主义制度垮台。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在斗争中能够期望愈来愈多地得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也极大地支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和建设)。一句话, 社会主义国家的范例当然不能够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但能够大大地鼓舞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但在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那里, 我们看到的却是: 社会主义国家的“范例”, 不成为鼓舞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志的东西, 而倒成了取消他们的革命斗争的一种借口; 帝国主义制度的垮台, 不是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果, 而是社会主义“范例”存在的直接结果, 因为据说“范例”能够“说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力量自愿让出阵地!!

卡德尔企图叫人们相信, 一方面, 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已使阶级力量对比、从而议会的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 议会中已聚集着比共产党广泛得多的已接受了社会主义纲领的各方面的政治力量。这样, 卡德尔就断言: 资产阶级议会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活力, 更有希望, 而工人阶级也就能

够比以往更顺利地运用议会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

我们在这里读到的东西, 对我们竟是如此之熟悉, 以致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 卡德尔等人今天向工人阶级推荐的, 究竟是新策略呢, 还是旧策略呢? 这里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工人运动历史中的某些事实。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那时还是“社会和平”时期, 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就说: “在所有先进国家, 资产阶级的特权在政治上正在不断向民主让步。”“现代各国的政治组织越是民主化, 政治大灾变的必要和机会便越是减少。”到了一九〇五年, 发生俄国第一次大革命,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直接行动开始了, 但伯恩斯坦在同年所写的《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一文中, 却认为: “总会到来这样的一天, 那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 对整个社会将起如此巨大的作用, 以致于可以这样说, 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阶级的压力了, 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稍后一点, 他又在《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这篇文章中说: 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影响的扩大, 只有在发展资产阶级民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它只是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结果。工人阶级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 必须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受良好的行政管理训练, 为此, 工人阶级应当去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 通过选举斗争, 展开“在公共的行政机构、合作社、市镇村、联邦、国家, 以及在他们自己的自由行政团体中的、标志着我们时代的特征的强大活动”。



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事实宣布了伯恩斯坦之流观点的破产。但这种观点并没有被最后埋葬掉。十月革命后，考茨基在《唯物史观》一书中提出了一条所谓“人道主义与民主的道路”，直接与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相对抗。考茨基把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民主和人道主义，看作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要求工人阶级在走向这条道路上代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他号召工人阶级要“靠投票箱中的选票”把“政治决战”进行到底，而把粉碎资产阶级反动国家机器的策略，称为无政府主义的策略。考茨基认为，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达到真正自由的观点，是错误的，是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了。他认为，应当对资产阶级民主抱有信心，应当相信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可以采取民主手段迫使资产阶级实行革命的措施，认为议会的权力不仅仅决定于经济，“资本家在经济方面越来越强大，而无产阶级在政治方面越来越强大”，因此，议会中的优势终必属于无产阶级。

在考茨基说了这些话以来，继十月革命之后世界上又有一系列的<sup>①</sup>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胜利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一次又一次地宣布了和十月革命道路相对立的一切机会主义、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但是，上述的观点仍然没有被最后埋葬掉，它们仍不断地在新的情况下以稍许改变了的形式再现。“古典”的东西，往往穿着现代服装出现。我们在《南共綱

領》和卡德尔的小册子中看到的所谓“斗争形式和方法”之类，以及所谓“多样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实际上就是这些东西。

有人似乎认为修正主义者是不崇奉“教条”的，他们是一切“教条”的反对者。其实不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正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教条。现代修正主义者对于老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表现了何等忠诚不渝的态度啊！

卡德尔等人也许要争辩说，他们不是也三番五次地提到“夺取政权”（或者叫做“夺取政治领导权”），并且把这一点提到重要的地位吗？是的，夺取政权之类的话，在他们的言论中是可以找到的。但是，这类语言不是同样可以在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论中找到吗？关于怎样夺取政权，考茨基在一九一二年所写的《新策略》这篇文章中就说过：“我们政治斗争的目标，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看，这是怎样一种“新策略”啊！列宁在批评第二国际领导人物王德威尔得时，也曾指出：“他同考茨基一样，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除了资产阶级完全不能接受的以外，除了区别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的以外，什么都引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话，他说过不知多少，因为这一点已由实际活动引进纯粹的议会斗争范围内去了。”但是，“工人阶级不能单纯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应当打碎这个机器。关于这一点，他却一字不提！”<sup>①</sup>一切新老修正

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1页。





得分子的折衷主义和诡辩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抹杀了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提出‘过渡’这个一般概念来掩盖（现在十分之九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

掩盖）背弃革命的行为！”<sup>①</sup>

列宁当年用来批评考茨基分子的这些话，今天拿来批评卡德尔之流，不是很恰当的吗？

### 如此“质的对比的变化”！

卡德尔等人一方面把现代资本主义描绘成仿佛已深深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或者简直已等于社会主义，而另一方面又把社会主义描绘成仿佛就是资本主义，或者甚至比资本主义更坏些。卡德尔哲学中的所谓“质的对比的变化”，就是指此而言。

卡德尔等人反对对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过于绝对”的论断。在他们看来，对立着的矛盾双方，这一方具有那一方的特征，那一方也具有这一方的特征，没有什么本质差别；资本主义未必坏，社会主义也未必好，一切都不是绝对的。本世纪三十年代，考茨基在《布尔什维克的死路》一文中，曾经攻击布尔什维克，说“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的结论为根据，却丝毫不理解马克思的方法。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的；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大农场对于小农场的优越性不是绝对的”。考茨基这话是用来攻击当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来的修正主义者，在哲学上往往借口“反对绝对主义”而兜售相对主义的诡辩术，并且往往只抓住了事物的某些外表的东西，而抽掉了事物的本质的东西，其目的是为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抹杀一切原则界限，抹杀事物的本质差别。

照卡德尔等人看来，虽然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是有区别的，但是，目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属于它本身以外的因素的压力”，这就是说它的发展已经从属于它内部正在逐渐积累的由国家壟断资本主义提供的“新的社会主义因素”；反过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则从属于包含于其中的“资本主义旧因素”。他们怎样来说明这种谬论呢？现代修正主义者一般是从国家政权着手。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成了保障一切阶级和全体公民的利益的东西，它具有“改革资本主义结构”的巨大能力，而这种能力又产生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巨大可能性，——资本主义的情形岂不美妙！而社会主义的情形恰好相反。按照修正主义者的描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简直是万恶之源，“国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因素，只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存在，那末，什么“国家雇佣关系”呀，“国家极权主义”呀，“官僚国家主义”呀，“霸权主义”呀，“个人迷信”呀等等东西，终必相伴而存在。

当然，诸如此类的诡辩，也并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所独创。过去的修正主义者，历来颂扬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把它当作社会主

<sup>①</sup>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4—305页。





义的发源地；而当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出现以后，他们又不断地咒骂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文（读者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猜出其全部内容），攻击列宁所提“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相一致”的论点，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意味着个别人对群众的无限权势”，“列宁企图玩弄手法使这种强制成为可以接受的东西”。伯恩斯坦在这个国家成立四周年的时候，在《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也做出结论说：“几乎没有第二个国家在国家和工业方面存在着这样多的官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实际上奴役无产阶级”。

十月革命缔造了一种“残酷的”“官僚统治制度”，然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在这种“残酷的”“官僚统治制度”下建立起来，——这就是十月革命以来，我们一直从新老修正主义者那里听到的他们的共同语言。

这次，卡德尔在他的小册子中运用同样的方法攻击社会主义，主要集中在战争问题上（当然又是和国家政权相联系的）。他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好战”。为了进行这种诽谤，他煞费苦心地歪曲现代战争的根源。

《莫斯科声明》关于战争的根源这样指出：“战争是资本主义的经常伴侣。人剥削人的制度和人屠杀人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两个方面。”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策的另一种’（即暴力）‘方式的继续’”<sup>①</sup>。现代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由于国际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依靠当代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联合斗争，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防止的，

不能说，世界大战在任何条件下都注定不可避免。但是，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也总是存在的，因此同样不能说，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已经过去。实际上，帝国主义仍在“顽固地准备着世界战争”。这里是两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可能性。这些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战争问题的基本论断。

卡德尔提出了什么论据来和这些正确论断相对抗呢？他在这里气势汹汹地反对所谓“过于绝对”的论断，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列宁从来没有明确提过现代战争的根源必须到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去找寻。他说：“当列宁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因素不可避免地‘产生’战争，因而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他所指的正是这样一种力量对比，在这种对比中，这些帝国主义因素无限制地占据统治地位，或者至少是占上风。”卡德尔企图由此证明，当“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战争的根源就不能再从帝国主义方面去找了。

卡德尔决意把战争根源问题搅混，这不是一件寻常事，他这样做是企图从一方面，即从帝国主义方面，掩盖战争的真正根源，而从另一方面，即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找寻“战争的根源”。

卡德尔是怎样到社会主义内部去探寻“战争的根源”的呢？

卡德尔公然抹杀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和平性质。他装作好像完全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会、绝不允

<sup>①</sup>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5页。



許放棄自己支持各国人民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絕不会、絕不允許把社会主义强加于別国的人民，因为任何革命总是各国内部发展的結果，革命总是由各国人民自主地进行的。卡德尔企图叫人相信，仿佛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一种企图，这就是“通过战争从外部把社会主义强加于其他国家的人民”。他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对一場反动战争負責。”卡德尔不仅作出这种恶毒的誹謗，并且从“理論”上作出如下的論断：现代侵略战争已不能简单地說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繼續了，它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企图“以战争的方法使社会主义征服世界的政策”的繼續，特別当“社会主义制度已經成为世界力量”的时候是如此。这里，卡德尔又把問題归結到“力量对比”上。他是这样說明問題的：在过去，由于“帝国主义无限制地占据統治地位，或者至少是占上風”，所以它們有发动战争的可能；現在，社会主义力量已日益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帝国主义已不是“无限制”的了，因此它們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它們只剩下了一个目的，就是“自卫”。而社会主义国家呢，因为它們在力量上日益占优势，它們自感力量强大，所以总想“以战争来促进世界革命”。因此，在目前來說，“战争已經不再只取决于資本主义的內部发展法則，而且也取决于社会主义的內部发展法則”，等等。

这个卡德尔，在作出这种惊人荒誕的編造以后，就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指責說，这是“托洛茨基主义”，是“現代形式的波拿巴主义”。这样一来，他自以为完成了一件不

朽的“理論”功业：从新的力量对比出发，他已創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根源”理論！

但是，这个自視甚高的卡德尔，居然沒有意識到他的这种苦心編造实在算不得什么“創造”，資產階級政治家和新聞記者編造这种謬言已經有四十多年之久了。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現时起，資產階級就沒有一天停止过宣傳“社会主义国家企图用强力輸出革命”，各国共产党是“外国代理人”等濫調。这里随便举个例子。一九五八年，美国資產階級政論家李普曼在訪苏以后，写了一本叫做《共产主义世界和我們的世界》的小册子，其中着重宣傳什么“在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是苏联“在对納粹德国作战时期由于軍事征服而强加給这些国家的”，并且是“由苏联的軍事占領”来維持的。我們如果把卡德尔的小册子和李普曼的小册子对照讀一下，就不难看出，卡德尔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只算是拾了李普曼等資產階級評論家的一点余唾，不过稍加一点“理論化”而已。

糟糕的是，正当卡德尔先生自以为完成了一項“理論”功业而洋洋得意的时候，他的主子却在一場談話中把奴才所苦心經營的不可告人的东西，全盘托出来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美国总统肯尼迪接見苏联《消息报》总編輯阿朱別伊。这个总统在談話中指出：現在的世界局势，“麻煩是由于苏联力图在某种意义上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所产生的”，正是苏联“那种把共产主义制度向一国又一国推行的努力，构成了对和平的巨大威胁”。这个总统还說：“我



們所反对的是企图用武力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人，……我們曾經以为，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为东欧人民提供了自由选择。照我們看来，今天他們并没有自由选择。”在这个总统看来，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苏联必須停止“用武力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人”，这样才能有世界和平。

肯尼迪这話当然完全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但他的意思倒是明明白白：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由苏联企图把共产主义从外部强加于人而引起的，要和平，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就不許革命；苏联如果有和平共处的誠意，就应当只顧“保护它本国的利益”，“保护它本国的安全”，而不許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且这样做还不够，还要为东欧人民提供“自由选择”，即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肯尼迪的談話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野心勃勃的全球战略計划，而这就向全世界泄露了現代修正主义者找寻“新的战争根源”的真情实意：原来他們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各国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阻撓世界人民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使人們

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政策面前屈服让步。新的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不利于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現代修正主义者肆无忌惮地誹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把它叫做“把社会主义强加于人”），并且居然把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看作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污蔑和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根据（而不是把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作为决定新的革命行动的根据）。所有这一切，都突出地表明了現代修正主义者如何死心塌地地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

这样，我們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卡德尔要特別咬牙切齿地誣蔑中国人民“好战”。如《莫斯科声明》所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給帝国主义在亚洲的障地以毁灭性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而且，“它給民族解放运动以新的有力的推动，給各国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巨大的影响”。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十分害怕这种影响，它們千方百計企图“遏制中国的影响”。現代修正主义者誣蔑中国人民“好战”，只不过是适应帝国主义这种需要而已。

### 現代政治的“絕对的”、“最高的”范畴

卡德尔毕竟是一个替帝国主义服务的老手，他在小册子中陈述自己的观点时，曾几次装作坦然地說：这样，你們大概以为“我又在美化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了吧？但一忽儿又故作惊讶，仿佛对于人們批評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的叛卖政策（特别是所謂“积极

共处”政策）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积极共处”政策“突然間获得了这般神奇的修正主义

- 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不仅害怕中国革命的影响，而且害怕古巴革命的影响，它們现在也正在大声叫嚣着“古巴企图把这个革命强加給其他国家”。



力量”？接着他又扮出一副哲学家教训人的面孔：你们只懂得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却忘记了列宁所说的：“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

卡德尔在这里显然是弄糊涂了，他完全不懂得在这个具体场合即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问题上，所谓“相对中有绝对”究竟是什么意思，他竟然没有理会列宁这段话在这里恰恰是反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自己的。

在这个问题上，卡德尔是这样提起话头的：“我们把自己的政策叫做积极共处政策的这个事实，是使中国的理论家得以区分‘修正主义’共处和‘非修正主义’共处的‘侥幸’情况。‘积极’一词竟成了关于南斯拉夫共处概念的修正主义性质有别于某种其他‘真正的’或‘正确的’共处政策的各种空谈的对象。”使卡德尔深感遗憾的是，甚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批评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某些批评家也参与了中国的这种歪曲”。卡德尔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他认为事实是，差别“不在于对共处的‘质’的理解”，而在于：在南斯拉夫，共处政策是“社会主义国际政策中持久的、原则性的因素”；在中国，共处只是“过渡性的和暂时的”。

完全不对，卡德尔先生！事情恰恰相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世界上只要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存在，和平共处的政策总是需要的，它总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不

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不管世界力量对比如何。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而且事实也不止一次地证明，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是没有障碍的，障碍从来是在帝国主义方面。因此，差别完全不在暂时性或非暂时性、策略性或非策略性上，差别恰恰在于卡德尔竭力回避的“对共处的‘质’的理解”上。《莫斯科声明》指出：“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棄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请看，人们对于共处的理解不是有着质的差别吗？由于人们对共处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的态度不同，因此实际上区分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处和修正主义的共处这两种原则上不同的共处政策来，这难道不是完全合乎逻辑（而决非“侥幸”）的情况吗？

卡德尔竭力为之掩饰的南斯拉夫共处概念的修正主义性质，恰恰在于：排斥阶级斗争，排斥革命，把和平共处同阶级斗争和革命绝对对立起来。这就是把两种本来处于对立统一关系的东西加以割裂，使两者都片面地绝对化起来，使一方排斥另一方，一个原则排斥另一个原则。这是一种典型的诡辩方法。黑格尔曾说过：“诡辩的本质乃在于承认孤立的片面的抽象原则本身即是对的，只要这原则能够适合个人当时特殊情形下的利益”<sup>①</sup>。这就是孤立地片面地抓住某个原则，排斥其他的原则，以替自己的某种特

① 《小逻辑》，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188页。



殊需要辯护。

在修正主义者那里，用这种方法反对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不乏先例。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等都曾把民主和专政绝对对立起来，提出排斥阶级斗争、排斥专政的所谓“純粹民主”。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借此否认资产阶级民主的专政实质（资产阶级民主对人口中的大多数、对广大劳动群众来说是反动的专政），同时抹杀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实质（无产阶级专政对人口中的大多数、对广大劳动群众来说是真正的最广泛的民主）。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也以同样的方法，倡导一种不要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所谓“积极共处”。在他们那里，“积极共处”是现代国际政治的绝对的、最高的范畴，它超越于斗争和一切革命之上，一切革命的利益都必须从属于它。所谓共处就是全面的、无条件的国际阶级合作和民族合作。这里没有什么国际阶级斗争（或者在这种斗争中只有意識形态方面的斗争而没有政治斗争），也没有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民族解放斗争。另一方面，当他们谈到斗争时，却又把斗争的概念歪曲得不成样子，仿佛只要一提革命斗争就是“想以武力解决世界革命问题”。这种绝对论，甚至把一切斗争都牵强附会地（因此也必然荒谬绝伦地）申引到能够破坏和平共处。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点斗争，甚至在远离帝国主义的地方发生反对帝国主义罪行的示威游行，如貝尔格莱德工人举行抗議美国主使謀害刚果民族領袖卢蒙巴的罪行的游行，他们都提心吊胆，唯恐得罪了帝国主义老爷，因此，也要加以“破坏共处”的罪

名。这种绝对论，实际上不可避免地把他们自己放在反对革命（因而也必然反对辩证法）的立場上。

修正主义者本能地厌恶辩证法。卡德尔虽然口头上反对“是——是和否——否”的公式（他为此引用了恩格斯的一长段话），但他看问题实际上浸透了这一公式的精神，即浸透了形而上学精神：要就是无条件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共处，要就是没有和平共处。他把事情說成这样：仿佛承认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揭露美帝国主义采取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这是同共处的概念对立的、不相容的，如果說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如果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那就等于說“共处就是不现实的臆造和幻想”，也就是“证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据说为了共处，为了增强共处的信心，就必须不反对和不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就必须用橄欖枝把美帝国主义当作“和平之神”装饰起来。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观点。无条件的和平共处是错误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不断迎合、不断妥协、不断让步，其結果只能使和平共处变成其自身的对立面（即不能真正达到和平共处）。当我们指出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卡德尔，总是悻悻然地向我們提出責难：你们把共处看成是“过渡性的和策略性的”！你们“要战争而不要共处”！你们不是“真诚的共处論者”！等等，等等。修正主义者习惯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对于一切問題都是从抽象的“要就是这——要就是那”的





观点来判断的，因此，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他们除了玩弄一般的、抽象的詞句和发出誣蔑性的責难外，提不出任何有严肃意义的結論或者論据来。

把辯证法原理应用于和平共处，必然而且只能像《莫斯科声明》那样得出結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是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間的階級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什么超階級斗争的东西。这里重要的是要找寻恰当的斗争方法，向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宣傳以斗争求和平共处的理論，而不是一味宣傳妥协让步的理論，不能一味制造幻想，磨灭階級斗争的鋒芒。《声明》說：“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現着有助于在資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階級斗争、殖民地和附屬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階級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粗暴干涉內政及战争政策，就不可能爭得真正的或者稍微巩固的和平共处。历史的辯证法就是这样的。是否用这种观点看問題，这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和平共处問題上的分水岭。这里无疑存在着质的差别。

卡德尔在书中对于他們的“积极共处”政策受到进步的世界輿論的指責一事，表示一种委屈心情。他竭力表白，似乎“积极共处”政策也是讲斗争的，也不主張在“国际关系中維持現状”，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无意排除“国际階級斗争”。一句話，他們是“真誠的馬克思主义者”，只是因为他們不承认“資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所以不公平地被人歧視了。多么

无辜啊！事情真是这样嗎？当然不是。階級斗争总是有具体的和确定的內容的。在今天这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我們在国际范圍内，为和平、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就应当：

- 加强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结和力量；
- 积极支持民族解放斗争；
- 积极支持資本主义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 爭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反对和不断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毫无疑义，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从我們时代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的全局及其基本內容，来規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或国际政策，来观察和处理作为这种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不是唯一內容）的和平共处問題。

可怜的卡德尔先生，只会喃喃地叨念什么“国际階級斗争”就是“把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一切社会內部过程統一和互相联系起来”这一类含糊不清的空洞的可疑的口号，却不敢絲毫触及这个斗争中的这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東西”。相反地，他們是站在这些東西的对面，来反对这些東西。

社会主义陣营国家的团结一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是和平的根本保障。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积极共处”，反对所謂“集团的排他性”，首先攻击的就是这个社会主义陣营。在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眼中，現时代的特点是：整个世界已进入



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统一过程”，并且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社会主义甚至“已经不再需要维护它自身的存在了”（卡德尔）。照铁托的说法：把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这就是破坏“统一的世界性过程”，“这将不是什么共处，而只是某种包含着各种新冲突的危险的休战”<sup>①</sup>。现代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看作眼中钉。最近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杂志（第五、六期合刊）所载《苏共二十二大》一文，再次露骨地攻击所谓“阵营”政策，说什么“阵营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是必须予以抛弃的“斯大林政策留给国际工人运动的范畴之一”。文章攻击共产党工人党两次莫斯科会议，认为用“内部会议方法”制订统一纲领，“阻挠更彻底地清算许多保守的、教条主义的主张和观点”，并且剥夺各国共产党人的行动自由。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向帝国主义献媚和乞求和平，不断地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内部颠覆等阴谋。无怪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最近在为美国“援助”南斯拉夫辩护时也公开承认，美国从铁托集团的“积极共处”政策中认识到“深切的利益”。

现代修正主义者卡德尔之流，口头上也说“不喜欢帝国主义”，但同时又以一种十几岁孩子的天真态度，企图叫人相信，仿佛我们揭露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说明必须对帝国主义抱有警惕性，我们就不能成为“真诚的”、“积极的”共处论者了；另一方面，又企图叫那些中立国家相信，仿佛他们把美帝国主义作为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共同敌人来反对，

他们也就不能成为“真诚的”、“积极的”中立论者了。我们请读者特别注意这件事：现代修正主义者这种奇怪的“逻辑”，恰恰产生在这样的事实面前：美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新的世界战争，核战争和常规战争，而且，正在加紧准备进行旨在对付民族解放运动的所谓“特种战争”，企图将这种战争强加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被压迫人民身上。这甚至是美帝国主义不止一次地公开宣布的政策。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群众的革命浪潮不断高涨这个事实，说明世界革命运动是阻挡不了的。这些地区的人口，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如此广大的人民站到反对帝国主义方面来，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寿命不长了。一切人，不管他们在口头上替自己宣布什么，都将在这个革命浪潮面前受到考验。在这个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面前，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扮演着什么角色呢？他们或者像怕火的毛毛虫一样蜷缩在一边，最多不过搭讪着附和几句口号，或者利用一切机会来替帝国主义及其各种代表人物散布幻想，企图叫被压迫人民妥协让步，竭力阻止革命斗争的发展。他们最惯用的手法，是用核战争的危险来对起来斗争的人民施以恫吓，企图叫被压迫民族放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为了这一点，近年以来，被美国报纸称为“一个小国的大人物”的铁托本人，曾不辞劳苦，仆仆亚非道上，为美帝国主义进行游说。

以上等等，就是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

<sup>①</sup> 铁托：《1958年新年文告》。



者所謂“斗争”的主要内容。

美国的进步评论家詹姆斯·艾倫，写了《原子帝国主义》一书，其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原子时代的世界帝国主义已被我们这一时代的社会主义的变革和殖民地革命大大地限制住了，不仅在地理上如此，而且在那些影响各地人民的思想的领域内也是如此。原子帝国主义就存在于这种特殊的情况中，这就是它的致命的弱点以及无法超越的困难的根源。就是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孤立的、贮满原子武器的堡垒也不能阻擋这种形势”。

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看得清楚的东西，对于自命为深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卡德尔先生，看来是不能理解的。

列宁的确说过：“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sup>①</sup>这段话应用到和平共处问题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可以解释一下，这就是说：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说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不是排斥阶级斗争的，不是无条件的，和平共处之中有斗争；而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共处就是共处，是排斥斗争的。

卡德尔高谈辩证法，并且企图借重于列宁。但实际情况恰恰是又一次证明了列宁所说的：修正主义者对于革命的辩证法是一窍不通的。

### 修正主义诡辩的两个特点

现在我们可以专就哲学方面，总括地说几句了。

列宁在批评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时，曾说过：在修正主义者那里，“辩证法正在变成最卑鄙最下贱的诡辩术！”<sup>②</sup>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帝国主义愈到后来愈衰落、愈凶暴，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修正主义的诡辩，也是愈到后来愈卑鄙、愈下贱。目前的形势是：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修正主义者要为帝国主义辩护，要阻撓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要颠倒事情的黑白，例如把垄断资本用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和国家资本主义，说成是反对垄断资本的东西，把社会主义国家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行动，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等等，自然就要采取各种下贱的手段，更卑鄙地践踏马克思

列宁主义各项原则。修正主义的哲学根源总的说来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否认真理的客观性，抹杀一切原则界限，认为好和坏、是和非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在有些场合，则又把某种相对的东西绝对化，在这种场合，他们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者。卡德尔用绝对相对、量变质变等范畴来和我们纠缠，不仅没有捞到什么，反而恰恰暴露了自己的丑恶的精神面目。

修正主义的相对主义诡辩，一般说来，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列宁说，修正主义政策的特点是：“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

①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8页。

②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1页。



动,忘記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sup>①</sup>。修正主义者需要有一种能够为他们这种政策作辯护的东西,在他们說来也叫做“理論”。这种东西或者这种“理論”,要能够做到:使人們的眼光不去注意根本的东西、作为长远目标的东西,看不到斗争的全局,忘掉世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只是在眼前利益中打轉,满足于眼前的某种现实利益,以某种自私狭隘的利益代替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并且以这些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准。当某种事物(或局势)稍有变动,或者出現了一些新条件(远不是决定本质东西的根本条件的变化),他们就赶忙宣称根本情况变了,“量的对比的变化”已引起“质的对比的变化”。当资本主义由一般壟断进到国家壟断,帝国主义在世界力量对比中日益居于劣势,他们就赶忙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变了。他们完全按照某种主观需要,某种一时的可以設想的利益,决定問題,要求政策能够迅速适应这种設想中的变化。今天适应这种变化,明天又适应那种变化。今天把一种东西捧上了天,明天又把同一种东西打入地狱。他们随波逐流,自称能够看到每一个稍微“新穎的問題”,只是不要原則,不要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理論”的任务是叫人相信;仿佛只有这样才是“灵活的”、“创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够真正表现真理的“具体性”(他们完全不懂得真理的具体性首先表现在真理的全面性上)。

为了达到这样一种目的,他们特別选中

了辯证法。但他们“运用”辯证法,不是为了对事物求得全面的本质的認識,不是去找寻事物的客观发展規律,不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而是为了利用辯证法的名义、利用“灵活性”的名义,偷換概念,玩弄字句,达到詭辯的目的。列宁說:“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問題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詭辯。”<sup>②</sup>在修正主义者那里,我們看不到邏輯的任何一貫性,他们有的只是前后矛盾。一切都是从他们的需要出发、从他们的方便出发。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只要能够适合修正主义者歪曲事实、歪曲真理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他们可以在这一場合是相对主义,装作好像是反对形而上学的,在另一場合又是绝对主义,装作好像又是反对相对主义的。总之,什么对他们方便,他们就利用什么。因为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沒有客观标准的。修正主义者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需要,也就是某种效用。这一点,修正主义是和实用主义相通的。所以一切修正主义者天生具有(用卡德爾的話來說)“实用主义的政治道德”。

修正主义詭辯的另一特点,就是折衷主义。修正主义者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馬克思列宁主义愈获得胜利,他们愈要这样),但他们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因此,他们总是把各种原則上不同的思想观点杂乱地糾合在一起,拌成一堆“大杂燴”,把一切弄成模糊的、曖昧不

<sup>①</sup> 《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頁。

<sup>②</sup> 《黑格尔〈邏輯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2頁。



清的、不具体的，借此偷运修正主义、唯心主义的货色。折衷主义的妙用就在于“混水摸鱼”。列宁说：“把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騙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各方面的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分析。”<sup>①</sup>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是玩弄这种折衷主义的能手。一方面，不主张在国际关系中维持现状，另一方面，反对任何触动帝国主义利益的革命。一方面，声言经济职能的国家化不触动资本主义基础本身，另一方面，否定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把它描绘成为关注全民福利、保证社会和谐、“超阶级”的独立机构。一方面，竭力证明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改变了它原来的对外掠夺的性质而成为一种“国际援助”的力量，另一方面，附带地也说到它也可能成为“强者对弱者建立政治霸权的新手段”。他们在总的方面宣扬资本主义制度自动改革论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但在个别地方也表示不同意把议会斗争形式绝对化。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但在《纲领》中仍写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诚如列宁所说，他们“谈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拒绝这个专政”）。他们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好战”，但在某种场合也谈到“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如此等等。修正主义者的这种折衷主义把戏，有人称之为玩弄“思想跷板”，它适合诡辩的需要。在卡德尔，他却一本正经地把这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因为竭力玩弄折衷主义的把戏，现代修正主义者卡德尔之流就活像狄德罗的哲学小说《拉摩的怪儿》中的主人翁一样，总是在同一段时间内唱着各种矛盾的曲调和扮演各种矛盾的角色。他把三十个曲子，意大利的、法兰西的，悲剧的、喜剧的，各种各样的，杂乱地混在一起，一忽儿唱着深沉的低音，好像一直降落到地狱底下；一忽儿又用假嗓高唱起来，好像把高空撕裂了一样。一忽儿是一个深受委屈的年轻姑娘，猩猩作态；一忽儿成了一个宣扬“创造性教义”的教主，神气十足；一忽儿又是一个奴仆，百依百顺。不同的是，拉摩虽然具有寄食者的一切恶劣品质：对主人卑躬屈节、阿谀逢迎，对别人神气活现、虚伪欺詐、挑撥离间，但同时他又非常痛恨这些品质。卡德尔则不然，他并不痛恨自己身上的这些东西，相反，他把这一切看成是“美德”。

在受美帝国主义豢养的各种走卒中，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对于美帝国主义有特殊的价值，所以美帝国主义给予了特别的奖赏。一九六一年九月三十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算了一笔账，说十多年来美国一共“援助”了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几十亿美元，结果怎样呢？“我们迄今为止已经获得了我们的金钱的价值”，同获得的好处比较起来，几十亿美元“并不算是太高的代价”云云。

真是一桩双方都有厚利的交易！在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地被拖入一个非常龌龊的政治交易中去！

<sup>①</sup>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7页。





#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6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六期 ★

## 目 录

共产党员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 杜 敬 (1)

从全局出发 …………… 陈展超 (8)

从信贷的偿还原则谈到银行的监督作用…… 李佐文 (11)

历史剧三题 …………… 戴不凡 (15)

古典文学理论中的风格问题 …………… 刘绶松 (21)

所谓“自由的臂膀”的真相 …………… 陈 原 (27)

在“全民福利”的幌子下 …………… 张振亚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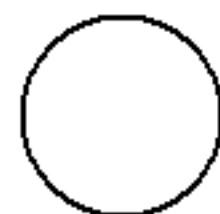
关于臭椿—蓖麻—蓖麻蚕—寄生蜂的

连串发展和综合利用问题的芻议 …朱 洗 (34)

漫画：美国之“鸚”(江 帆) 飞向更新的边疆(华君武)

木刻：韶山四月(刘彦明) 电灌站(莫 溯)

☆ 三月十六日出版 ☆



# 共产党员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

杜 敬

群众的好的领导者，应该是群众的真正的代表。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和意志，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能正确地领导群众前进。

我们党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忠实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sup>①</sup>刘少奇同志说：“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sup>②</sup>几十年来，我们党一直是这样做的。在同国内外敌人进行尖锐复杂的斗争的时候，在生产建设当中，在任何情况下，处理任何问题，规定每一项政策，我们党都是以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原则的，因而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和热诚拥护，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广大人民群众，根据几十年来的亲身体会，深信我们党是他们最好的代表，自愿地把自己的事业委托给党，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党。我们党所以能够成为人民群众爱戴的领导者，就是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真正代表，是人民群众自己选定的代表。

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十分珍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委托，十分珍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极高的威信。在我们的一切言论、行动中，应该具有对党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的高度自觉性和责任感，严肃认真，兢兢业业，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自己是受了党的委托、受了人民群众的委托做工作的，如果有丝毫的懈怠疏忽，就可能使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他又说：“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sup>③</sup>。这就是党和人民群众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提出的要求。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经常用这个标准来检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7页。

② 《论党》，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4版，第46页。

③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128页。



查自己，勉励自己，努力做一个人民群众的好代表。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以及国家的统一计划，集中体现了全国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志，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因此，认真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各项统一政策，认真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并且及时地、正确地反映执行政策、计划中的情况和问题，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这是对党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最基本的要求。在这一方面做得好，才能成为群众的好代表。

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就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因此，党员对党负责和对群众负责也是一致的。刘少奇同志说：“凡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即是对党有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尽力去作。凡对人民不利的事业，即是对党不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反对，必须避免。”他又说：“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即是对党不负责。”<sup>①</sup>党中央的统一的政策，国家的统一的计划，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单位、不同的情况下具体地贯彻执行，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项工作开始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群众由于对党的有关政策还没有很好的理解，因而还没有行动的决心。如果我们不进行艰苦的工作，去提高群众的觉悟，就由此得出结论说，对党负责和对群众负责是很难统一的，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人民群众需要忠实的代表，也需要

很好的领导。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要忠实地代表群众，同时也要很好地领导和教育群众，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逐步提高群众的觉悟。这样，群众就会认识什么是他们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就会懂得应该怎样正确地对待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就会接受党的政策而自觉自愿地行动起来。在革命时期是如此，在建设时期也是如此。

在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的时候，所以要对群众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这是因为，我们不仅要注意群众的需要，还要注意群众的自愿。如果没有群众的自愿，任何事情都不会成功，成功了也不会巩固，这归根到底还是对党没有负责，也就是对群众没有负责。毛泽东同志说：“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sup>②</sup>他又说：“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sup>③</sup>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强调指出，必须“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自愿，才能去实行改革。在实行某项改

① 《论党》，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4版，第46页。

②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11页。

③ 同上书，第1010页。



革的初期，先进分子往往只占少数，中间和落后状态的群众则占多数。我们不能把少数先进分子的觉悟水平看作就是广大群众的觉悟水平，不能把少数人有了自愿看作就是多数人有了自愿，否则就会脱离多数，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大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他说：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善于照顾多数。<sup>①</sup> 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之所以需要进行艰苦、耐心的工作，就在于必须把工作做到多数人的身上去，做到中间和落后状态的群众身上去，而且要做透、做好。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只有这样做，才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情况下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还需要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使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同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为当地的群众所接受。这是要做许多复杂、细致的工作的。如果采取一般化、简单化的方法去做工作，就可能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同当地情况相结合，机械地执行政策和计划，对群众实行强迫命令，结果，本来是符合群众利益的事情，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另一种是，工作没有做到，就认为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不符合当地情况，因而不认真执行或者随便修改，另搞一套违背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的东西，自认为是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实际上是违背了群众的利益。这两种做法的结果是一样的，都

是没有真正代表群众。因此，有了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我们在执行中并不是就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例如，在领导农业生产当中，必须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才能使生产得到发展，使国家和农民的收入得到增加。而对于农业生产中的耕作制度和技術措施等等，则必须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尊重当地群众的经验，做到因时因地制宜，否则仍然达不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目的。再如，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当中，必须认真执行党的按劳分配的政策。而在广大社员当中，有着家庭人口多和人口少的不同，劳动力多和劳动力少的不同，有劳动力和没有劳动力的不同，以及劳动力的强弱不同和技術的高低不同等等复杂的情况。必须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甚至一户一户地、一个人一个人地进行具体分析，才能从安排农活、支配劳动力、规定评工记分办法等等方面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具体措施，做到在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当中，周密地照顾到不同社员的利益，使大家都能增加收入，调动起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在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当中，注意随时听取群众的意见，发现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及时地、确切地向上级反映，使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我们缺乏这种自觉性和责任感，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4页。





就会不利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利于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说：“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sup>①</sup>足见党员的责任的重大。如果不去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不去了解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或者虽然听到了、看到了却置若罔闻，不及时反映，或者因为计较个人的得失而不愿反映或不如实地反映，这些都是对党没有负起责任，也是对群众没有负起责任。

听取群众的意见，必须听到群众心里的话，懂得群众的心，才能真正了解群众，也才能真正代表群众。因此，我们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当作群众的意见，不能把走马观花看到的一些现象，当作事物的本质，而应该深入群众之中，进行切切实实的调查。

到了群众当中，能不能真正听到群众心里的话，还取决于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如何，取决于干部把自己摆在群众中的什么地位，而不是任何一个人临时到群众中去简单地问上几句就能够听到的。群众心里的话，只会向知心人讲，向自己人讲，向和他们站在一起、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的人讲。我们必须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地站在群众之中，对群众采取谦虚恭敬的态度，热诚地关心群众的生活，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群众亲切地感到干部是他们自己人，是知心朋友，才会讲真心话。如果以“钦差大臣”的架子去访问群众，群众就会敬而远之。

如果只是听到群众把干部的意见复述了一遍，就认为是听了群众的意见，那只是无济于事走过场而已。如果听到不合自己口味的話就不高兴，不耐烦地听下去，甚至斥责群众，结果就会什么话也听不到。在群众中摆官架子，以领导者自居，自认为比群众高一等，那不是群众的代表和人民勤务员的老实态度，而是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是一种低级趣味，必然受到群众的鄙视，使自己脱离群众。

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如何，这是能不能成为群众的真正代表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仅仅在嘴上大讲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sup>②</sup>我们要做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要成为群众的真正代表，就必须正确处理自己同群众的关系。

群众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判断其正确与否，不应该简单地以我们自己的意见做标准，匆匆忙忙地做结论，而应该领导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由他们自己得出结论。我们应该坚定地相信群众中的多数，相信他们经过教育启发以后，经过认真的讨论以后，是能够分清是非的，是能够得

<sup>①</sup>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442—1443页。

<sup>②</sup>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55页。



出正确的結論的。对群众进行教育，也应该首先听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的意見，然后采取耐心說服的方法，民主地、平等地同群众进行討論的方法去教育群众。有各种不同的意見，經過反复討論，才能真正提高群众觉悟，糾正錯誤認識。先有不一致，再达到一致，才是真正的一致，这种一致才更加巩固。能够耐心地听取群众中的各种意見，特别是听和自己的認識不同的意見，是每一个干部所应该具有的民主作風。听了群众中的正确意見，对自己有帮助；听了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意見，对自己也有帮助。从对于正确和錯誤的分析比較中，会更加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認識。

听群众的話，要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意見，还要总结群众的实践經驗，虛心地向群众学习。我們的事業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依靠群众創造經驗。领导的經驗，要依靠不断总结群众的实践經驗才能逐步丰富。党的民主革命的总路綫和土地改革政策，就是經過了二十几年的实践，才逐步完备起来的。革命是如此，建設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設当中的許多政策、措施，同样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补充、修正。我們首先树立了这样的观点，才会重視群众的实践經驗。切不可被自己脑子里已經形成的定型了的观念所束縛，根本不去怀疑，不願打破那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观念。切不可认为自己的想法是不可改变的，是不能再发展的。列宁在談到怎样建設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經指出：“在这个偉大的事业中，我們从来不能要求，而且無論哪个談到

未来社会远景的有卓見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来不會想到，說我們能够根据某种預定的指示一下子就制定出新社会的組織形式。”“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社会的改造在历史上必然要經過一条偉大的路程，生产資料私有制已被历史判处死刑，……可是，改造的形式和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們都不知道。只有集体的經驗，只有千百万人的經驗，才能在这方面給我們以决定性的指示”<sup>①</sup>。我們领导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必須像过去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那样，随时总结群众的經驗，取得人民群众的“决定性的指示”。领导群众，要首先接受群众的指示，首先向群众学习，这是不容易的。必須自觉地承认群众的集体智慧、集体經驗比干部的智慧 and 經驗丰富得多，并且能够放下架子，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才能做到这一点。自认为自己比群众聪明的人，不会有真正的聪明。这样的人去领导群众，是不会有什麼真本領的，是不能切切实实地解决什麼問題的。

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計劃，又能虛心地向群众学习，我們就会做出許多符合群众利益的事情。过去我們許多同志这样做了，不愧为群众的代表。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过去有許多事情做对了，今后就一定不会做錯，过去代表了群众的利益，今后也一定能够事事代表群众的利益，因而就驕傲自滿起来，认为可以随心所欲了。过去的事情

<sup>①</sup> 《在国民經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  
第384頁。



做对了，应该想一想为什么做对了；基本上做对了，应该想一想还有什么不足之处。一个问题解决了，应该想一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发现，没有解决。情况变化了，新的问题出现了，新的任务到来了，就应该从头学起，从头做起，重新研究情况，寻找解决新问题、完成新方法。已有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但是，任何宝贵的经验，都不会给我们提供出一劳永逸的办法，使我们不再费脑子、不再下苦功夫就能够把事情做好。对群众严肃负责，必须永远保持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的态度。

我们的广大党员，都有代表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的愿望，都想为群众办成好事。过去，我们这些同志已经为群众办成了很多好事，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实现了这个良好的愿望。但是，我们所以能够真正代表群众，能够为群众办成好事，并不是只由于有一个良好的愿望，而是付出了许多艰苦努力的结果。有的时候，有些同志由于受到认识水平的限制，或者由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对头，或者由于工作没有做到，因而没有真正了解到群众的要求，没有真正搞清做什么和怎样做才符合群众的利益，结果，就可能做出自以为是符合群众利益的，实际上却是违背群众利益的事情。好人好心，也可能办出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事与愿违。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

的标准。”<sup>①</sup>我们不能以为只要有一颗好心，有好的动机，就一定能够为群众办成好事，不能以为自己想的就一定是代表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的，而必须根据工作的效果去检验是否真正符合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共产党员，群众的代表和领导者，这些称号是光荣的。但是，这些称号并不能自然地给我们带来什么本领，使我们不费力气地就可以想出为群众造福的妙计。恰恰相反，这些光荣的称号，给我们提出了很高的、很严格的要求。要使我们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行动都无愧于自己的光荣称号，都符合于群众的利益，就必须付出极为艰苦的努力。

作为群众的代表和领导者，责任是十分重大的。群众的幸福生活，固然要由群众自己动手去创造，但是，领导者的工作做得好一些或者差一些，对于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也有重大的影响。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领导者出一个主意，就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在一个公社，就关系到成万人；在一个县，就关系到几十万人。主意出对了，事情做好了，成万人或几十万人受益；主意出错了，事情没做好，成万人或几十万人的利益就可能受到或多或少的损失。关系如此重大，领导者的责任如此重大，就必须时时刻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心里，为了群众利益而不辞任何劳碌，不避任何艰辛，而决不能随随便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

<sup>①</sup>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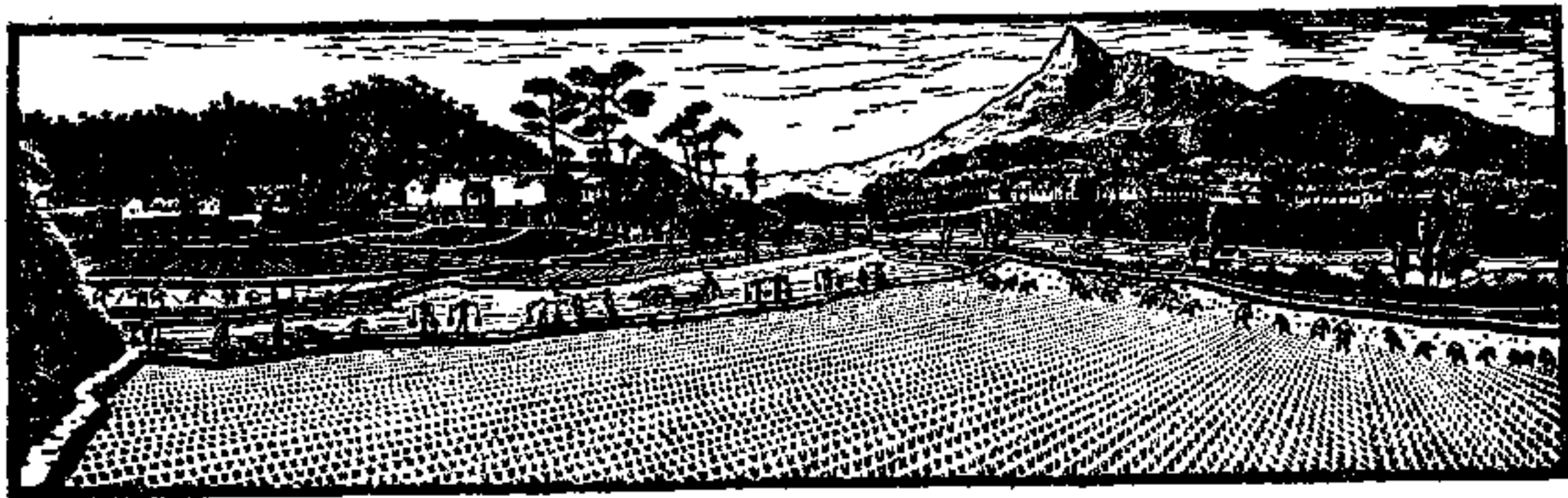


样做就怎样做。作为群众的代表，对多少万人负责，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采取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兢兢业业，甚至废寝忘食，而决不能马马虎虎，掉以轻心。

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个别的缺点或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敢于正视和修正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能够自觉地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风格和勇气，是对人民群众认真负责的表现。只有如此，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称得上是群众的真正代表。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关心的，是千百万群众得到了利益没有，而不是自己得到了什么没有。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担心的，是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失没有，而不是自己损失了什么没有。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个人的利害得失，不仅不应该计较，

而且应该忘掉。所谓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所谓忘我的精神，就表现在这里。不能忘我，就不能对群众全心全意，就不能真正代表群众。共产党员和群众有所不同，比群众觉悟更高，也是表现在能够为了群众的利益而不计较个人的一切，甚至忘掉个人的一切。如果为了个人的得失而不顾群众的利益，知道错了也不改正，或者发现了上级的缺点错误也不反映，甚至假借为群众谋利益的名义去图谋私利和个人荣誉，那就丧失了群众代表的起码条件。

我们党是人民群众最好的代表。一切为了党的利益，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我们要使自己的一切言论、行动，都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我们代表人民群众一定要代表得好。



韶山四月

刘续明



# 从全局出发

· 陈 展 超 ·

我們在任何崗位上做工作，总会遇到處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的問題。这里有两个不同的观点：一个是从全面情况或全局利益出发的全局观点，一个是从局部的需要或利益出发而不顧全局的片面的狹隘的观点。我們应当采取前一种观点，反对后一种观点。毛澤东同志經常告訴我們：“共產黨員必須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項意見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sup>①</sup>他又說：“要提倡顧全大局。每一个黨員，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項言論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許可違反这个原則。”<sup>②</sup>这个原則是我們在想問題、作計劃、办事情时應該遵循的。

照顾全局的观点，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无产階級的观点。革命的无产階級是干解放全人类的大事业的，他們沒有任何局部保守性，不图任何狹隘利益，反对一

切只顾自己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倾向。他們依靠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看到事情的全体，善于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决定自己的計劃和行动。也正因为这样，无产階級能够进行胜利的斗争。

任何事物总是由各个不同的方面和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构成的。这些方面和发展阶段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相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全局。我們要認識一事物的全局，就是要認識构成这一事物全局的各方面、各局部的相互联系，認識整个事物的发展規律。只有通观事物的全局，才能够认清各局部在全局发展中的序列、地位和作用，认清在一定具体情况下，何者是主要的、对全局起决定性的作用的，何者是次要的、起輔助作用的；何者应急，何者应緩；何者在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3—514頁。

② 《整顿党的作风》。《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23頁。





先，何者在后。任何一个局部，如果把它孤立起来，是无法理解的。某一局部究竟具有什么意义，起什么作用，居于什么地位，只有从这一局部和其他局部的关系，也就是从全局出发，才能看清楚。

处于局部地位、指挥局部工作的人，当然必须充分了解自己这个局部的具体情况，必须紧紧抓住自己这个局部的工作，而不能丢开这个局部，空谈全局。但是他们也必须懂得全局性的东西，善于照顾全局。如果只知道局部，而不懂得全局，是不能做好工作的。毛泽东同志说：“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sup>①</sup>

但是人们如果脱离了任何局部，要认识全局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说：“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sup>②</sup>这就是说，一方面，只有局部经验，而不用心思去想，是不能懂得全局性的东西的，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局部经验，而只是凭空地想，也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认识全局，需要做个别典型的调查研究；为了指导全局的工作，需要进行个别的典型试验，以取得具体经验。

当然不能根据上面这些得出结论，说全

局的东西和局部的东西是完全等同的，局部并不存在着自己的特殊情况；或者说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一致，没有矛盾。如果这样了解，那也是不正确的。

全局性的方针、政策、计划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是在分析综合各局部<sup>（局部）</sup>的情况、总结各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全局包括了局部。但是，任何全局性的方针、政策、计划，只不过是大致地包括了各个局部的情况和经验；任何局部的情况和经验，都不能完全地列入全局性的方针、政策、计划之中。在全局的范围内，各个局部的具体情况总是千差万别，各局部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局部的特殊性。调查了个别典型，了解了许多具体情况以后，还必须善于发现其中本质的东西，剔除其中特殊性的东西，这样才能上升到更高级的认识，所以说，必须用心去想一想。另一方面，把全局性的东西（统一的方针、政策、计划等）贯彻执行到某一局部中去，也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局部的具体情况，必须因地制宜。

局部隶属于全局，统一于全局，但局部和全局又有矛盾。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矛盾，往往表现为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68页。

② 同上书，第170页。



处理这种矛盾的原则，就是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使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集中统一和发挥局部积极性相结合。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局部（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来说，不但在全国统一计划和局部需要相一致的时候，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努力完成国家计划，而且在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发生某种矛盾的时候，也要有局部服从全局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在局部看来可办而在全局看来不可办的事情，就不办；在局部看来不可办而在全局看来可办又需要办的事情，就要排除一切困难，坚决地去办，而且办好。在后一种情况下，某一局部的需要暂时会得不到满足，看来好像是吃了一点点“眼前亏”。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局部吃了这点“眼前亏”，全局的事情才好办。而随着全局的发展，这个局部的正当需要也会逐步得到满足，而且是更好的满足。所以，从长远一点看，从最终结果看，这个局部是不会“吃亏”的。反之，如果当全局需要和局部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只考虑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而忘掉全局的长远的利益，以削弱全局为代价来满足局部，就会损害全局，结果也必然损害局部。

对于各个局部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分清两种不同的积极性。一种积极性是根据“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在全局统率之下，实

事求是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自己的一切有利条件，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积极性。另一种积极性则是只看到局部的需要，只顾眼前利益，在没有首先保证完成国家统一计划的情况下，去兴办国家计划以外的事情，分散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使有限的资金和物资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这既妨碍国家计划的完成，又使局部的事情办不好，是一种盲目的积极性。前一种积极性，对全局有利，对局部也有利，是我们所需要的；后一种积极性，对全局不利，对局部也不利，是我们所反对的。

从全局出发，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是不是限制了局部的自由和权力呢？局部是全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局部只能具有一定的权力和自由。就这个意义来说，局部的权力和自由是受到限制的。但是，认清了全局，并且认清了局部在全局中所占的地位，就能够正确地行使局部的权力，这样，就会有真正的行动自由。恩格斯说：“意志的自由，不是别的，只是由于认识事物而能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sup>①</sup>处于局部地位的人，越是能够了解全局，越是善于照顾全局，从全局出发，就越有自由，越有把握做好局部工作，就越能为全局的胜利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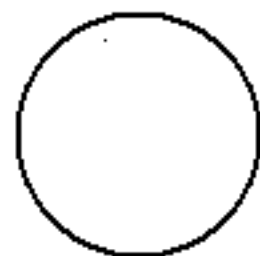
<sup>①</sup>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7页。



# 从信貨的偿还原則

## 談到銀行的監督作用

李 佐 文



社会主义的国家銀行，对整个国民經济，可以起“晴雨表”的作用，它是国家通过货币形式对国民經济各部門、各企业进行監督的重要工具。按照列宁的說法，它是“全国性的簿記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統計机关”，甚至是一个“絕妙的机关”<sup>①</sup>。銀行的監督作用，是通过信貨存放、結算和現金管理等业务活动来实现的。銀行通过这些活动，能够把整个經济情况如实地反映出来，使經济领导机关了解这些情况。因此，它又是經济领导机关的有力助手。这里，只談談銀行怎样通过信貨存放和及时反映經济活动情况来发挥監督作用的一些問題。

銀行信貨的最根本的一条原則，就是偿还原則，就是有借有还、按期如数归还。有借有还、按期如数归还这件事，看起来似乎很簡單，但是，实际上并不很簡單。

在資本主义社会里，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信用活动是自发的、盲目的。企业主借了銀行的錢，投到生产中去，如果产品不能及时卖掉，就不能按时如数还賬。破产还債、跳楼自杀之类的事，是屢見不鮮的。資本主义信用的破坏，最明显地表现在資本主义的周期性經济危机中。在这个时候，生产过剩

和信用危机往往交織在一起，其結果是助长了資本的集中，加深了劳动人民的苦难。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資料是公有的，生产和流通是按計劃进行的。信用机构由剝削人民的工具，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这样，信用活动按計劃进行，就有了客观基础。有了計劃的指导，有借有还、按期如数归还的原則，也就能够得到实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完全可能避免信用关系的破坏，当然更不会有什麼信用危机了。这是社会主义經济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

但是，这并不是說，社会主义社会中，任何一笔借款，都能够按期如数归还。社会主义生产的計劃性和信用的計劃性，是要通过人們的努力来实现的。当生产和流通的某些环节之间发生不平衡的时候，当主观安排同客观实际不完全符合的时候，有的企业借了錢，就不能按期如数归还。經過采取措施加以調整之后，才能达到新的平衡和主客观的一致，做到按期如数归还。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企业做到借了銀行的錢按期如数归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sup>①</sup> 《布尔什維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7—88頁。



拿生产企业來說，除了生产計劃积极可靠、企业保有必要的經常需要的自有資金以外，一般說來还需要有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企业借了銀行的錢，能够买到所需要的原料和材料，而且品种、規格、数量，都合乎要求；第二，把这些原料、材料投入生产，能够按期完成生产計劃；第三，能够按期把产品銷售出去，完成銷售計劃；第四，能够按国家的要求，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完成利潤計劃。一句話，信用計劃的實現，必須以生产和流通計劃的實現为前提。只有生产和流通的計劃實現了，錢出去，貨(原料)回来，貨(产品)出去，錢回来，企业得到了預期的銷貨進款，才能繳納稅款和計劃規定的利潤，并且有錢按期如数归还銀行的貸款。生产和銷售計劃沒有完成，固然无錢还賬；就是完成了生产和銷售計劃，如果成本过高，利潤計劃沒有完成，繳納了利潤，就沒有錢还賬，还了賬，就沒有錢繳納利潤。如果企业亏了本，不仅无錢还賬，还要向銀行申請增加貸款，才能維持生产。此外，如果有的企业借了銀行的錢，沒有用来购买原料、材料，投入生产；而是用于基本建設和其他財政性支出，把錢花掉了，这自然更无法按期如数归还銀行的貸款了。

由此可見，借了銀行的錢能不能按期如数归还，对于企业經營管理和經濟核算，是一个很好的檢驗尺度。从生产到流通，任何一个环节上发生了故障，都可以在这里反映出来。这个檢驗方法，簡便易行，一目了然，可以为发现許多复杂的經濟問題提供線索。銀行坚持按計劃貸放，有借有还、按期如数归

还的原則，就可以發揮很大的監督作用。

社会主义的国家銀行，是为发展国民經濟服务的。国营工商企业，除了国家撥給的固定資產和定額流動資金以外，季节性、临时性需要的資金，由国家銀行負責貸款，企业借錢比較方便。这对于生产的发展是一件大好事。但是，也有些同志产生了一种錯觉，认为自己的企业經營管理差一点不要紧，資金周轉不灵了，銀行可以貸款；到期还不了賬，拖几天沒有多大关系，橫堅銀行可以通融，总不能眼看着企业停止生产。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想法。

借了銀行的錢不按期如数归还，这在經濟上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国家計劃以外，多占用了資金和物資，使一部分資金和物資不能正常周轉，因而减少了增加生产的可能性；它意味着占用了一部分可以投入建設的資金和物資，影响了建設的速度；它意味着减少了一部分可以投入市場的商品，影响国家回籠貨幣，增加了市場貨幣流通量。不管你主观上是否意識到这一点，客观上必然产生这样的結果。

通常說，社会主义国家銀行发放貸款有三大原則，一是按計劃貸放，二是要有物資保证，三是要按期如数归还。偿还性，这是信用活动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原則。“欠債还錢”这个規矩，在資本主义社会，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是为維持資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是为維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的。目的和作用根本不同，規矩却是一个。



要做到有借有还、按期如数归还，首先要要求主管部門和企业安排好生产、供应和銷售工作，踏踏实实地改善經營管理，加强經濟核算，实现国家計劃規定的产品品种、数量、质量、成本、利潤等項指标。同时，銀行应当从信貸方面，加强对企业的監督。銀行要配合有關部門，深入企业，发现生产和流通中的問題，及时提請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門注意解决。銀行要利用自己联系面广的有利条件，积极帮助企业解决某些可以解决的問題，改善經營管理。大跃进以来，在这方面創造的一些良好經驗，要繼續坚持。銀行对那些違反信貸紀律的企业，要按照国家的規定，給予应有的信貸制裁，必要时停止发放貸款。这样，就迫使企业去寻找不能按期如数归还貸款的原因，根据这些原因，采取措施，从而推动企业改善經營管理，处理积压物資。

有人說，資本主义大銀行是凶神恶煞似的大老板，社会主义銀行是有求必应的“善心菩薩”。前一句話是对的，后一句話是不确切的、片面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銀行，服从党的方針政策，服从国家的統一計劃，同其他部門是分工协作的关系，是促进生产发展和流通扩大的一种工具。同时，社会主义的国家銀行，不仅有促进和服务于生产和流通的一面，还有監督的一面。必要的監督，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和流通的扩大。生产决定信貸，信貸反过来也影响生产，促进生产。把社会主义銀行看成是只讲服务不讲監督的有求必应的“善心菩薩”，那是片面的、錯誤的。上面所說的借了銀行的錢必須按期如数

归还，如果違反信貸紀律，銀行有权給予必要的信貸制裁，直至停止发放貸款，就是銀行实行信貸監督的一个重要方面。銀行放棄監督，就是放棄自己应有的职守。

銀行对国民經济各部門，各企业进行監督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就是及时反映它們的經濟活动情况。銀行要經常向領導机关提供資料，編送报表。报表不用很多，也不要很复杂。例如，一張工商貸款到期不还的单位名称和拖欠数字表，一張完不成利潤計劃和亏损企业的单位名称与有关数字表，一張各单位工資計劃数和实支数对照表，諸如此类，就可以說明很多問題。銀行是否起到应有的監督作用，是否取得各有关方面的支持和重視，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一个重要关键。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規模巨大、遍布城乡而又集中統一的国家銀行，是全国唯一的信貸中心、結算中心、現金出納中心和貨幣发行中心。全国的信用活动、結算和現金收支，都集中于国家銀行来办理。銀行按照生产和商品流轉的需要，把資金貸出去，收回来，再貸出去，再收回来，不断地流动和周轉。这种流动和周轉，反映着生产、采购、銷售、儲备等經濟活动的各个方面，反映着各地区、各部門、各企业每个环节的經濟活动。正如列宁所說，“只有实行銀行国有化，才能使国家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往来流动的去向，以及这种流动是怎样发生和在什么时候发生的。”<sup>①</sup>

<sup>①</sup>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1頁。





对經濟生活实行有效的领导和监督，必須注意利用銀行这个具有很大敏感性的“晴雨表”。例如，合理地分配劳动力是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一个重大問題。各个部門工資基金的增减变化，这是劳动力分配状况的主要指标之一，在銀行每月的現金收支表上，可以清楚地表現出来。又如，生产和消費是否平衡，通过銀行关于貨幣流通情况的报表，貨幣出籠和回籠的变化，可以及时地反映出来。再如，某个行业、某个企业供、产、銷是否协调，經營状况如何，通过銀行每月的信貸报表，通过各个行业、各个企业貸款的增减数字，以及是否按期如数归还的情况，便可知

其梗概，发现問題。来自銀行的报表，虽然还不能直接回答为什么会这样和怎样来解决，但是，它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察。如果銀行能够在报表之外，經常提供簡要的分析說明，那末，就可以使經濟领导机关更多地了解有关的情况，有助于問題的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千头万緒的經常变化着的經濟生活，从銀行这面“鏡子”里可以看出許多重要情况和問題。我們既然已經有了这样一个現成的观察經濟工作的“仪表”，那末，就应当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应当认真研究銀行的各种报表和資料，以便把我們的經濟工作做得更好，把社会主义建設推向前进。



电 灌 站 (木刻)

莫 測



# 历史剧三题

## 戴不凡

### 编演历史剧不能离开现实

写历史剧首先就有个取材问题。剧作家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要按照自己生活的时代和阶级的需要，到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中，选取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题材来写戏。当然，一个戏的成败，主要看它是否写出了深刻概括生活的典型人物；但是，看一看纪君祥在赵宋亡国以后写《赵氏孤儿大报仇》，孔尚任在清初写明朝亡国故事《桃花扇》，就可以看到满城争唱的历史剧，它的题材总是那个时期的人民群众最感兴趣、最为需要的。

今天观众对历史剧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大家喜欢看描写古人爱国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剧目，希望在舞台上更多地看到古代人民群众的形象，但是也喜爱看描写封建阶级杰出人物的好戏。封建阶级有它的上升和发展时期，在历史上也曾做过许多对国家、对民族有利的事情，出现过许多杰出人物；在舞台上实事求是地描写他们，可以从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中，吸取正面的或反面的教育，这也正是无产阶级尊重历史的具体表现。

我们要写历史上光明的事物，但过去那

些黑暗腐朽的东西，如果用正确的观点加以处理，不是让人看了迷恋而是厌弃它们，不是让人看了泄气而是增长斗志，这

又有什么不好呢？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固然需要写，但是类似民间传说《打金枝》那样的小故事，不也是很足以启发和娱乐我们么？正剧和喜剧是观众需要的，“起义戏”、“开国戏”固然可以鼓舞人心，但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时代的观众就不再需要看悲剧了。我们也需要历史悲剧。这不但是适应观众不同口味的问题，而且看了像《甲午海战》那样激动人心的历史悲剧，既可以激发我们对旧制度和帝国主义的仇恨，又可以激励我们去争取祖国的美好未来；既可以使后人从前人的悲剧中得到经验教训，又可以从邓世昌等人的昂扬斗争精神中收到鼓舞人心的效果。

历史剧题材的选取，在今天是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凡是能够鼓舞和教育人们前进的，向上的，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对人们的思想道德的修养、知识的丰富、美学趣味的提高等方面有益的，应当说，都是观众所欢迎的。

题材是重要的。但是同样的题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不同的处理。纪君祥写赵氏孤儿故事时强调大报仇；明朝人写这个题材变成了强调义气的《八义记》。时代不同了，剧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不一样了，观众的兴趣和需要也不一样了，今天的剧作家重



新处理这个题材时，就不一定把重点作同样的安排。秦腔《赵氏孤儿》不正是因为故事中的主人公那种舍己为人、坚忍不拔的英勇精神被强调出来，才分外使我们激动么？

历史剧要古为今用，这主要表现在究竟拿历史上的什么东西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服务。具体来说，就是选取什么样的题材和强调突出这一题材的什么社会意义来教育今天的观众。吴越相争的故事在二十四史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但它能成为今天各地竞演的剧目，正因为勾践那种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精神，能够砥砺我们前进。从这里来看，历史剧作家除了必须精通历史以外，积极地关心现实生活，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关心现实，关心政治，首先就可以帮助剧作家更好地考虑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强调其中的什么。

剧作家对自己时代的道德标准、生活风尚、美学观点和观众的心理有了深刻的理解，才能够作出打动观众心灵的艺术处理。剧作家只是一味去迎合、迁就观众，当然不好，但是，对观众的爱和憎恶茫无所知或知道得很少，要想观众看戏时为之动容，这是很困难的。剧作家认为可惊可愕可笑可乐的，不一定是观众认为可惊可愕可笑可乐的；剧作家认为非告诉观众不可的，不一定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大至于史实的剪裁取舍，人物、场面的处理，小至于一个上下场的安排，甚至于一句唱词中的平仄阴阳，莫不皆然。历史剧作家虽然写的是历史，但不能不考虑观众，因而不能不积极关心和了解现实生活。

历史人物俱往矣，却要把他们的音容笑貌在舞台上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这除了有赖于作家根据历史去研究、分析、体验，发

挥想象，惨淡经营以外，紧密地和现实生活相联系，将有助于克服创作过程的这个困难。历史不会一模一样地重演，今人今事和古人古事当然不同，但是，通晓今天的人情世态，将有助于深刻体验过去的人情世态。一个剧作家置身于今天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列中，比起苦思冥想百年前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怒情绪，其深刻和亲切的程度是不同的。生活是错综复杂的，单靠书本记载去分析、体验古人的生活，常常容易流于“书卷气”；单靠戏曲舞台上流行的套子去设想古代丰富的生活，也往往易入窠臼而带“科场气”。要在舞台上深刻表现古代各种各样人物的真实思想感情，写出容光焕发的饱满人物形象，剧作家除了“博古”以外，更需要“通今”。田汉同志曾经谈起：“我若没有在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搞戏剧运动的生活，就很难写出《关汉卿》的某些场面。”虽然，田汉同志这里所说的是参考他本人在旧社会的生活，去写更古老的旧社会生活，这是有其方便之处的。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情况与过去根本不同，但是，一个作家对今天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有比较丰富的生活经验，在创作时毕竟有利于开拓他的思路，勾起他的想象，帮助他的虚构，丰富他的文采。

### 为现实不能忘了历史

历史剧是向观众进行历史教育的一个有力武器。在历史剧创作中，我们强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是因为只有这种观点，才能够真正如实地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判明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揭示历史发展的真相。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我们只能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研究，而不能随意去改变它。在历史剧的创作中，只有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观察和描写历史，才能从其中得出对后人有益的东西，使历史的真实性和教育性得到和谐统一。我们看京戏《将相和》的时候，看了蔺相如那种不计私怨，团结同僚，共为国事的精神，以及廉颇知过改过的诚挚态度，不是能够获得很多启发和教育么？剧本没有去任意改动人物的阶级成分，也没有把人物的精神面貌写得超越了他们的时代；但是，它给人的教育却是意味深长的。不使历史人物丧失他们的时代特征，不要模糊古今人物的界限，在历史剧创作中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历史剧的教育作用只能是“历史”的。也就是说，一定要从刻苦钻研、分析历史现象出发，从其中得出足以教育后人的东西。离开了历史，那就很难发挥历史剧的教育作用。

我们主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真实地描写历史，但不是无目的地写真实。专门写一个戏去表现某个历史英雄人物也曾做过一些“缺德”的事情，比如写史可法打过农民起义军，这是没有必要的。一个戏是不需要也不可能把某个历史人物的毕生行事无分巨细地表现出来的，因此，表现他的哪一些，以及用俊扮还是丑演，应当看一个历史人物毕生行事的基本方面，这才会使得观众对他为人的好歹获得一个总的正确印象。在舞台上，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要力求做到恰如其分。不适当地美化古人，正和不适当地贬低古人一样，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之所以值得在舞台上歌颂，是由于他们在一定的历史

条件下，做了比他们同时代人或前人更多的好事情，而并不因为他们的一切方面都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剧作家看到了历史上杰出人物的进步性，也看到了他们的局限性，但在剧中却采用“取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描写方法，只去表现某些封建统治阶级的贤臣、良将如何为国为民，而不把他们的为国为民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和一定的阶级地位上去描写，那就难以写出完整生动的人物形象。譬如说，把史可法写成为心目中丝毫不把皇帝放在话下，并不忠于朱明皇朝，那么，不仅他一生的行为逻辑无法得到解释，而且，这个没有忠君观念、没有皇权思想的官员，势将仿佛生活于真空之中，使人难以相信他还是封建社会里的人。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描写了史可法对朱明皇朝的忠诚。在痛哭誓师的时候，他一方面“哭声百姓”，一方面却高呼“皇天列圣”，“哭声祖宗”；当我们看到他“哭的俺一腔血作泪零”的时候，感到孔尚任是把这位封建时代民族英雄形象具体地描写出来了。因为，在“北兵已入淮境”的时候，他所要保卫的那“明朝一座江山”，事实上正是当时人民的江山；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代，他忠于朱明的国家，事实上也是具体地表现了这位封建阶级英雄的爱国思想。不仅如此，孔尚任在描写史可法的时候，甚至还写出了他性格上的巨大缺点，但也并没有因此减轻这位民族英雄的砝码。以《争位》来说，剧本就写了江北四镇为抢地盘而打得唏哩嘩啦，可是作为督师的史可法却束手无策，最后只得出“一告示调停”。这正是这个历史人物不能“广集群力，善调四镇，不令生嫌”（张岱：《石匱书后集》）的生



动写照。但是，由于孔尚任是借以国事为重的史可法的无法调停，来突出四镇的骄横跋扈、不听节制，而不是自然主义地去写他的缺点，所以不仅不使人感到史可法不可爱，相反，却把这位忧国忧民的英雄人物的具体性写出来了，使人感到真实可信。史可法后来只能以三千孤军死战扬州，和他自己不善于节制的缺点，也多少有着必然联系。如果回避这些缺点，那么，史可法的悲剧性格是难以得到合乎逻辑的描写的。历史人物史可法一生的基本方面是好的，是爱国家爱民族的，但他毕竟是封建阶级的一位英雄人物，所以他身上有忠君思想和性格上的缺点，并不奇怪。因为三百多年前的这位英雄人物本来面貌就是如此。孔尚任面对着这种复杂的生活情况，并不回避人物的缺点，而是作了具体的描写，所以显得真实可信。他是把笔墨集中去歌颂史可法的爱国精神，所以才使这个人物令人可爱可敬；同时，他真实地具体地描写出史可法性格的时候，也未始不可供后人作为殷鉴：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不能太书生气，太软弱。

我们在历史剧的创作中，强调对历史作出科学的评价。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剧作家才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应该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舍弃什么，强调什么。但是，如果只拿着某种科学结论，例如某某历史人物有五条进步性和三点局限性，就认为可以捏合起一个生动的历史人物形象，这就是用科学结论来代替艺术创作方法了。要写出丰满动人的艺术形象，还必须具体地懂得古人是怎样生活的。要写出史可法的真实形象，就需要像孔尚任那样，抓住这个人物的行动逻辑，

看出他“心在明朝”。因为史可法一心为明朝江山，这就使得他和“心在崇禎”的左良玉及“心在弘光”的黄得功（所谓“南朝三忠”）有所区别，这就是他没有投入当时内哄漩涡中的原因，而显得他是南明真正的爱国将领。正因为他“心在明朝”，所以他虽反对迎立福王，但福王既立，他又忠于福王；因为他“心在明朝”，所以他忠于福王，却又不和为个人私利而拥立福王的马士英、阮大铖那一伙奸臣一样，反而被马阮所排斥。正因为他为的是明朝江山，所以即使被排斥，即使只有三千不愿战的孤军，他也要动员大家起来拚死一战。显然，如果他如此忠心耿耿地为着明朝江山，不是在“塞马南来”的时刻，而是在清军入关以前，那他很可能变成人所共弃的宁武关前的周遇吉；他是在清军南下力战以后沉江死节的，所以他才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位民族英雄。一个人做一件事，总是有他的原因的，总是按照他（由阶级地位和个性所决定）的性格逻辑，活动在一定的环境（由人与人所组成的社会关系）之中。如果要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那么，只有设身处地去研究他们的生活。“撰曲者不化其身于曲中之人，则不能为曲”（明·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序》）。这是一个困难的工作，但也是活古人于舞台的不二法门。

一个作家不懂生活，是很难写出好作品来的；一个历史剧作家如果不去认真研究历史现象，也很难写出好的历史剧来。孔尚任写作去他未远的南朝新事时，除了访问遗老以外，单是他自己列出的征引书目就达二十种；近年出现的众所公认的历史剧佳作如《关汉卿》、《甲午海战》等，剧作者也是阅读





和研究了大批典籍記載以后才动笔的。这些成功的經驗說明，要写出好的历史剧，就必须研究历史，熟悉历史。一位具有科学观点的作家，在精通历史以后，才能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去写出对观众有益的作品。

### 尊重历史不能否定艺术虚构

写历史剧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才能反映历史真相，才能使剧作真实动人。舞台可以起到某些普及历史知識的作用，但不可能把傳播历史知識的全部責任都由演員来担任。剧作家写历史剧是要用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来显示历史的意义，如果忽视了戏剧艺术的职能，去要求一个戏把某一段历史事实都写进去，这就很容易破坏作品的完整性。孔尚任在写史可法的时候，就没有把史可法晚期的全部行事都写进剧本里去。如果不是根据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把历史事实无分巨細地都写进去，其結果不仅会使作品橫生枝蔓，而且也会导致破坏人物形象和淹沒主題的后果。艺术作品总是需要进行剪裁，才能够更集中地深刻地反映生活。

历史上的許多真人真事能够流傳下来，并且能够引起剧作家的兴趣，总是因为它本身有足資談助之处，有的甚至于还是千載之后犹令人感到凜凜然有生气的事情。生活虽然是动人的，可毕竟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比较粗糙的，需要艺术加工才能发出光彩。剧作者之所以被誉为艺术家，他的本領也就在于能用生花妙笔，把这些动人的史事，通过艺术形象具体地加以描写，使它比原来的生活更真实动人，使人情不自禁地受到感染。

历史上文天祥从容就义的場面，本来就是感天地泣鬼神的。在周信芳同志編演的剧本中，大体上根据史实，又虚构了伯顏丞相到獄中劝降，接着，还把忽必烈前数日召文天祥入殿劝降的史实，改为忽必烈此刻亲蒞獄中劝降，而文天祥毫不为动。再加上文夫人探監的穿插，这一来就把文天祥临刑前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爱国家爱民族的英雄形象，更大地树立在观众面前。如果没有这种艺术渲染，如果要求剧作家拘泥于书本的記載，一切都按照真人真事去写作，在这里不运用集中、虚构等等手法，那么，文天祥的英雄形象，就很难如此动人地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剧作家如果只是“按史敷陈”，沒有艺术概括的工夫，是写不出深刻反映历史真实的作品。

戏剧艺术家为了更真实深刻地反映生活，显示生活的意义，免不了有艺术的虚构。一位严肃的历史剧作家从事創作的时候，总是由于他感到那段历史很有告訴給別人的价值，他决不会去更动历史的基本情节和人物的基本面貌。一位有識見、有理想的剧作家，为了要把自己的感受更鮮明生动地告訴給观众，他在写历史剧的时候，就不能不在不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人物的性格邏輯的原則下，运用集中、突出、夸張以至于虚构等等方法。在对生活进行概括的时候，艺术家完全应当張开想象的翅膀，大胆虚构。我們反对的只是那种离开上述原則的所謂“虚构”。而合情合理的想象和虚构，能够更集中更概括更深刻地反映历史真实，这对于优秀的剧作來說，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在戏剧創作中，从来不曾有一部真正成功的作品是被二十四史的記載捆住手脚的。即以《桃



花扇》來說，它也只是在大體上符合歷史，有一些具體情節和史實還是有所出入的。舉史可法之死為例：孔尚任在描寫中就更動了歷史上的實際日期，把揚州之失寫在福王從南京出奔之後，以便表現史可法在戰敗後還想去找福王。關於史可法之死的历史記載雖然很不一致，却從來沒有人說他逃出揚州後還想到南京去找福王。不過，對於這位劇中的英雄人物來說，他一心為着明朝三百年基業，在揚州戰敗後猶不灰心，却是情理中可能有的事；要找福王的史可法在路上聽說福王早已逃走了，才逼得無路可走，壯烈沉江，也是符合人物當時的行為邏輯的。而對於昏庸無能，荒淫縱欲的福王來說，在左良玉率師東下除奸的時候，又听得揚州連夜告急，因而就倉忙逃走，也是符合他性格的發展的。這樣處理，比起按照歷史記載的福王在揚州失守以後半个月才逃走，更突出了這個人物的本質。這種符合人物性格發展的处理，既突出了忠肝義胆的史可法的巨大悲劇，也進一步深刻地揭露了南明統治集團的腐朽無能。它雖然改動了歷史上的實際日期，也虛構了一些情節，却把歷史和歷史人物的面貌更真實深刻地揭露出來。如果拘泥於史實，不敢放手去寫，那麼，這裡顯然難有激動人心的藝術效果。

就某些在史書記載中缺少戲劇情節的歷史人物來說，如果要把他們搬上舞台，虛構一些事件那更加是必要的。話劇《關漢卿》的情節，幾乎全部出於劇作家的想象，但這個戲中所描寫的事件，既是那個歷史時期所可能發生的，又是劇中人物所可能做的，因此不能不使人信以為真。而通過這些虛構的情

節，歷史人物關漢卿“响当当的一粒銅豌豆”的真實性格，被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了。假如戲劇家不進行大膽虛構的話，可以說，類似關漢卿這樣的歷史人物，即使能對他作出科學評價，但也是無法編成戲的。

歷史劇原是借歷史來寫戲。要了解歷史事實不能不依靠文字記載。可是，在人民群眾處於被剝削的時代中，各種典籍包括當時最進步的歷史家的記載，都免不了有一些偏見和缺陷；對於歷史的某些傳統看法（包括大體上正確的，以及很多錯誤的看法）還往往深入人心。因此，劇作家在創作過程中，一方面要吸取歷史學家研究的科學成果，加以融會貫通；同時自己也還需要儘可能的掌握各種有關史料，運用科學觀點，發揮獨立思考的精神，審慎研究，辨其真偽，審其是非，對歷史人物作出實事求是的正確評價。只有在这种科學研究的基礎上，才能够出現面貌嶄新的歷史劇。當然，只有科學的分析研究，而忽視藝術創作的特點；只注重歷史事實的真實，而忽略藝術的真實，那也不一定能夠寫出動人的歷史劇來的。總之，為了戲而不顧歷史，那將不是歷史劇；為了歷史而不顧戲，那也將不是歷史劇。歷史和戲，在歷史劇中必須而且是可以統一的。

歷史劇的創作，是一個廣闊的領域。怎樣才能够寫出更新更美的歷史劇，這需要在實踐中經過各種不同途徑去探索，鼓勵劇作家們作各種不同的嘗試，並充分交換意見，進行實事求是的討論；同時，還需要善于總結這方面的創作經驗（包括傳統劇目的整理和新創作的歷史劇），以供大家學習借鑒。這樣做，對歷史劇的繁榮發展，是有益處的。



# — 古典文學理論中的風格問題 —

劉綏松

文學作品的風格問題，是文學理論中一項重要課題。在我國古代文學理論著作中，風格一詞雖出現不多，但風格在文學創作上的重要意義，却早就被重視和討論到了。

風格問題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的形成和發展關係到一系列比較複雜的理論問題，同時也因為我們的一部絢爛多采的文學史，乃是由不同時代、不同風格的作家和作品構成的。藝術風格的熔鑄，是作家創作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任務。

風格是什麼呢？風格是作品的風貌和格調，它是作品的外在的表現；但那是誠于中而形于外的，是作品的思想和藝術特征統一的表現。因此，不能也不應脫離作品的思想內容來追求獨特的風格，不應脫離作家的創作思想與作品的具體內容來研究作家和作品的風格。我國古代一些理論家，當他們論及文章風格的時候，常常是從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觀點來進行探索和闡述的。

早在漢代，王充就說：“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里，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論衡·超奇篇》）意奮筆縱，文見實露，這是對作家創作過程

的簡要概括；而“外內表里，自相副稱”的結果，則是作品風格的形成。這個道理，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得更充分。《體性》篇說：“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儻，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云譎，文苑波詭者矣。”

情與理是蘊藏在作家內心的東西，而言與文則是它們的表現。作家只有由於外界事物的啟示和影響而情動理發\*，然後才有創作的要求。就創作的過程來說，是“沿隱以至顯”，即把作家蘊藏於內心的東西化為顯露於外的文章；就作品的本身來說，則是“因內而符外”（即“外內表里，自相副稱”），也就是內容與形式的諧調與統一。作家對外界事物的感受和認識不同，作品所要表現的內容也會隨之而異，再加上藝術方法和表現形式的差異，於是就很自然地出現了不同作家、不同作品面目各異的藝術風格。同是登臨抒感，王粲的《登樓賦》與鮑照的《蕪城賦》異趣；同是摹寫山水的壯麗，謝靈運、謝朓的詩風不同。杜甫、岑參、儲光羲、高適都

\* 《文心雕龍·物色》說：“春秋代序，朔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蕩。”鍾嶸《詩品》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都是說外界事物對於作家情思的影響。



有登慈恩寺塔的诗，但是“岑、儲两作，風秀熨貼，不愧名家；高达夫（适）出之簡淨，品格亦自清堅；少陵則格法严整，气象峰巒，音节悲壯，而俯仰高深之景，肝衡今古之識，感慨身世之怀，莫不曲尽篇中，真足压倒群賢，雄視千古矣。”（仇兆鰲《杜少陵集詳注》）这真是“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異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蕭子显《南齐书·列傳第三十三》）。

刘勰超越前人的地方，就是他从作家的“情性”和“陶染”两个方面探索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情性”是作家的才能和气质，“陶染”是作家的学識和摹习。才气是作家的稟賦，学习是作家的艺术素养\*。作家才能的庸儻决定他的作品“辞理”的庸儻，气质的剛柔决定他的作品“風趣”的剛柔，作品“事义”的淺深取决于作家学識的淺深，作品“体式”的高下决定于作家平日摹习对象的高下。作品的風格正是它的“辞理”、“風趣”、“事义”、“体式”这四者統一的表现，所以说它是“情性所鑠，陶染所凝”。作家的情性和陶染各不相同，因而他們的風格就不能不“其異如面”<sup>①</sup>。如果一部作品沒有打上作者的情性和陶染的鮮明印記，是决不会具有独特动人的艺术風格的。

作家不同的才思决定作品不同的面貌，在刘勰之前的葛洪，就有过同样的看法。他说：“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屬文，参差万品。”（《抱朴子·外篇》）但刘勰却不把作品風格的形成完全归因于作家稟賦的情性（当然，形成情性的因素也是很复杂的；但在刘勰的那个时代，我們不能要求他对它作科学的解釋），他重視了作家的陶染，而且

还提出了“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的重要主張。学习的对象必須是前人的成功之作，因为始习不慎，就可能导創作于歧途；“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移”，便是很确切的比喻。善于学习，作家的創作个性和才能，才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发展，也才可能运用自如地創造自己的艺术風格。

在这里应当加以說明的是，“摹体以定习”，这只是說，在开始练习写作的时候，应该慎重选择学习对象以端正写作道路，为后来富有独创性的創作准备基础，并不是主張始終刻意摹仿，以致貌似神亡，沒有自己的特色。文学史上虽曾有过这样的现象，不同时代或者同一时代的某些作家，由于政治見解、生活态度和文学主張相近，互相影响和学习，因而他們的艺术風格很相类似，成为一种文学流派；但是同一流派的作家，也总各有其特色，而并不互相雷同。白居易和韓愈的诗都淵源于杜甫，但是韓則硬語盘空，白則平易近人。韓門諸子虽然都以“吐奇惊俗”为風尚，但是韓愈的诗風雄渾，而他門下的孟郊、賈島，則一“寒”一“瘦”，各有特点。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从作家本身来看，可以說是“賞好異情，故意制相詭”（沈約《宋书·列傳第二十七》），作家的艺术好尚不同，所以作品的构思和遣詞互異；就文学发展来看，則是“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蕭子显《南齐书·列傳第三十三》），作家如果陈陈相因，缺乏独创和革新，則后来的作品将永远不能

\* 《文心雕龙·素类》說：“才自內发，学以外成”，即是此意。

① 《文心雕龙·体性》。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見《文心雕龙》。



跨越前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刘勰又说：“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参伍相变，有因有革，这就是有摹习又有创造，有继承又有变革。只有这样，然后才可以推陈出新，发展无穷。“凡旧”是文章的大患。“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此中道理，是很值得思索玩味的。

## 二

形成文学作品不同风格的原因，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家看来，还有很重要的一面，那就是风格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文学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一个时代的政治隆替与民生苦乐不能不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从而影响和形成这一时代文学作品的特殊风貌。《毛诗·关雎序》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应该说已经接触到这一问题了。到了刘勰，他根据对历代文学现象的深刻研究，更提出了“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重要规律。在《文心雕龙》中，除了《时序》篇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而外，在其他各篇中论及文章风格的地方，也往往联系到作品产生的时代来加以考察。

文章风格与时代的关系，刘勰大致认为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文章的风格与世道的治乱有关。他是这样来观察周代的诗歌的：“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邶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离》哀。”由于周初的政

治“德盛”、“化淳”，所以便出现了“勤而不怨”、“乐而不淫”的诗风；到了平王东迁前后，民生雕敝，宗国残破的现实，又使得当时的诗歌有了愤怒和哀怨的情调。我们今天虽然不完全同意刘勰对某些诗的分析，但他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上来探讨作家作品的风格，却是应该肯定的。他是这样来论述建安时代的文风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志深而笔长”，“梗概（即慷慨）而多气”，是说诗人寄慨遥深，词气高亢。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短歌行》、《苦寒行》等诗以及当时其他诗人的一些作品，的确具有这样的风格，而这正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第二，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也会影响到这一时代的文学风格：“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这是说，老庄思想和清谈风气对于当时的文风有影响，“因谈余气，流成文体”，即指此而言。钟嵘《诗品》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看法完全相同。又如：“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又近；李斯之奏驩山，事略而意逎；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这又是将文章风格与作家的政治思想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而“政无膏润，形于篇章”一语，则更从不同角度接触到了文章风格和当时政治的关系。

文学作品既是时代生活的反映，时代变

\* 此说出自《礼记·乐记》，不过《乐记》是说音乐，而此处则用以说诗。





了，文学风格也就不能不随之而变。“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确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因为这样，所以文学上的崇古拟古，效颦学步的风气便应该遭到反对。王充《论衡·自纪篇》说：“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就是对文学上拟古风气的—一个绝好的嘲讽。唐代刘知几有一段话更说得透辟：“夫天地久长，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事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二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而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史通·言语篇二十》）这是根据刘勰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论点与历代文学“质文代变”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结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正确的。

### 三

文学作品风格的形成，除作家的主观条件（即“情性”和“陶染”）与时代特色两个重要因素而外，同作品本身的体裁也有关系。关于这一点，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论述的很多。曹丕的《典论·论文》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的《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诘。”这都是说，不同体裁的作品应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根据这种看法讨论了各种文体的风格。

不过，刘勰虽是依据体裁以论风格，但

并不是专从形式着眼，而是首先从这些不同体裁所表现的不同内容来立论的。一定的内容须有一定的体裁来表现它，而一定的体裁则必具有一定的风格特点。《诠赋》篇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秣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作者登高作赋，乃是由于俯瞰万物，内心有了强烈波动，所谓“睹物兴情”，就是这个意思。没有“雅义”，就不能抒写情怀；缺乏“丽词”，便很难描画景物。因此“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就成了赋这种文体的风格特点。《铭箴》篇说：“箴全禦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要以辨，其摘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箴是为防止过失而作的，所以文词应该“确切”；铭有颂扬的作用，所以体式应该“弘润”。而叙事翔实明辨，措词文简意深，则又是这两种文体的共同特色。《论说》篇说：“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辨正事理的是非得失，乃是论文的任务，所以它必须抓住主要问题，不枝不蔓，深刻而周详地阐述道理，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隙。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刘勰在讨论各种文体风格特点的时候，紧紧地抓住了内容的特点，而且还指出了文体的风格特点正是从文章内容的特点而来的。

刘勰虽认为一定的体裁应具有一定的风格特点，但他并不认为这个特点是可以经常



不变的。根据作者的情性与学习的不同，同一体裁的文章，其风格也不能不有显著的差异和变化。在《明诗》篇中，他一方面认为四言诗以“雅澗为本”，五言诗以“清丽居宗”，但接着就说：“华实异用，唯才所安”。又说：“诗有恒裁，思无定位”。**体裁是固定的**，故说“诗有恒裁”；作者的才思是因人而异的，故说“思无定位”。虽是运用同一体裁，但作者才思不同，即会出现不同的艺术风格。这个道理，在《通变》篇中，有进一步的说明：“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教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指出文章体裁与风格的常与变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名理有常”，所以同一体裁的作品，其风格特点有共同的一面；因为“通变无方”，所以同一体裁的作品，其风格也必会因作者和时代的不同而各有异采。因为“名理有常”，出自同一手笔的作品，也会因体裁不同而风格略异；因为“通变无方”，不同体裁的作品也会因为出自一人的手笔而具有由于作家的思想、性格、才思和学习而形成的一贯的风格。只有常而无变，则文学势必风貌混同，而且还将停滞不前；有常而又有变，然后才可以“新声”泉涌，永不置竭，“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 四

在文学园地里，虽然因为“其异如面”的文章风格而呈现出“云谲”“波诡”的情状，虽

然“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葛洪《抱朴子·外篇》），但在我国古代理论家们看来，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并不是同样有益于人们，因而人们应该给予同等的喜爱和评价的。《文心雕龙》概括不同风格，分为“八体”，表面上虽无所抑扬，但从对各体含义的解释以及全书衡论作家优劣的地方看来，什么值得提倡，什么值得反对，刘勰的意见还是灼然可见的。其他各家论文之作，也无不都是这样。总起来说，他们的意见大致有下列几点：

第一，崇自然而抑雕削。文章既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则文章便当具有自然的风格。《文心雕龙》说，文章的“体势”，应如“机发矢直，澗曲滯回”一样，饶有“自然之趣”，作者如果能够“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根据文章所要表现的内容来确定体裁，然后依照体裁的特点来形成气势，则文章风格或刚或柔，莫不具有“自然之势”；如果作者舍本逐末，不是“为情而造文”，而是“为文而造情”，则虽刻意求工，“雕削取巧”，也不会有什么动人的艺术力量。《情采》篇说：“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饰容”的“铅黛”是需要的，但动人的“盼倩”则是“淑姿”所固有；“饰言”的“文采”是不可缺少的，但真正的“辩丽”则必须“本于情性”。“质”固“待文”，而“文”实“附质”，这里有本末和主从之分，是不容混淆、颠倒的。

第二，求简约而避繁缛。文章的繁简，须视文章的内容而定，如果“字去而意留”，则简约为尚；如果“辞殊而意显”，则丰赡亦佳。同时，文章的繁简，又取决于作者的才性。“谓繁与略，随分所好”，“思赡者善敷，



才繁者善删”，就是说明这个道理。然而文章到底“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譬如“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所以陆机说：“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榛楛之勿剪”，“庸音以足曲”，是文章的大忌。因为文辞繁缛，不仅容易“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文赋》），而且“采滥词诡，则心理愈翳”，所以“剪裁浮词”就成为作家创作所必不可少的功夫了。陆机在理论上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在创作实践上却不能完全做到，他的有些作品“諛词弗剪，颇累文骨”，刘勰说他“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实在是很有确切的评断。

第三，贵含蓄而忌浅露。文章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通过它，作者思想和感情才能够为读者所接受。这就是“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文章必须耐人咀嚼、寻味，然后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能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灵，所以文章又最好是有“文外之重旨”。《文心雕龙·隐秀》篇说：“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这就是说，文章须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诗品》），如果文意浅露，不耐思索，它的艺术力量就显得微薄了。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说文章应该：“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捫毛而辩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就是对于含蓄的十分确切而形象的说明。

第四，重明朗而轻晦涩。含蓄与晦涩有别，而明朗也并不是浅露。如果文章本无深意，而仅以僻字拗句文其浅陋，则又是值得

反对的不良倾向了。所以在贵含蓄而抑浅露的同时，我国古代理论家又重明朗而轻晦涩：“晦塞为深，虽奥非隐”。文章如果要风格明朗，首先必须“规范本体”，做到“纲领昭畅”。“纲领”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文章的结构和布局。如果一篇文章在艺术结构上犯有杂乱和松懈的毛病，那么，就是有好的思想内容，也不可能显豁而突出地被表现出来。因此，“附辞会义，务总纲领”，而“纲领”则必以“昭畅”为主。其次，措词造句必须确切、生动。“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如果一篇文章，在语言上不是“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也不可能具有明朗流畅的艺术风格。因为“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作者不是句斟字酌，而想篇章的彪炳、明靡，那是决不可能的。

文学作品艺术风格的问题十分复杂，想对它进行一个精微而恰当的区别和品评，的确不是一件易事。“落落之玉，或乱乎石；碌碌之石，时似乎玉。精者要约，匮者亦黜；博者该赡，蕪者亦繁；辩者昭晰，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典。”这种复杂现象的存在，不仅说明了问题的困难的性质，而且也说明了对它们进行区别和品评的必要性。我国古代的理论家因为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的观点不可能不存在着一些缺陷。尽管如此，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仍然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值得我们重视。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对于发展和提高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是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的。



# 所謂“自由的臂膀”的真相

陈 原

## 一、“臂膀”长在誰的身上？

肯尼迪說过，“没有一个时代比現在的詞汇更丰富了。”可不是嗎，專門从事造謠、誹謗活动的“美国之音”，也蒙这位总统賜給了一个新的“詞汇”——按照肯尼迪在庆祝“美国之音”电台成立二十周年紀念会上的說法，叫做什么“自由的臂膀”了。

当然，所謂“自由的臂膀”原不止这一只，壟断資本家御用的报纸刊物等等是照例都可以成为这种“自由的臂膀”的。

由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胡卿斯主持下的“新聞自由委员会”的一个宣言中曾經說过，“对群众宣傳的机关”，本身“就是大企业，它們的所有人是大資本家”。最近，紐約《工人周报》刊載的迈克尔·紐伯里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一百家大公司控制着全国的电视、大多数报纸和杂志。文章說，在一九六〇年，美国大企业用来資助从而左右全国的报纸、杂志和电视的三十五亿美元开銷中，有百分之四十六点五就是由这一百家大公司出錢的。

《华尔街日报》早就这样宣称：报纸“彻头彻尾是它所有人的一种财产”，因此，“經办报纸的主人，也和其他企业家一样，自己冒險自己承担，制造他的成品在社会出卖。”

这家报纸还发了这样一通妙論：“如果社会公众不欢迎他的主張或他发表新聞的方式，那么唯一的补救的办法是把报纸掌握在他們（公众）自己手里。”說得真好听！可是办报是要錢的。房子、紙張、机器、发行网等等掌握在富人們的手里，赤手空拳是办不成报纸的。美国共产党办的《工人日报》，就是由于經濟困难被迫停刊，只能出版《工人周报》。現在，肯尼迪政府又在援用法西斯法律“麦卡倫法”加紧对《工人周报》进行迫害。据报道，《工人周报》的主編和其他工作人員已在华盛顿受到审訊，这个周报的主編詹姆斯·杰克逊被加上所謂“蔑視法庭”的罪名判处徒刑六个月。在美国，其他进步报刊也同样經常处于經濟困难和遭受政治迫害的状况中。由此可知，美国壟断統治集团所标榜的“新聞自由”，或者如肯尼迪所吹嘘的什么“自由的臂膀”，其实质不过如列宁所說，“是富人、資本家收买报刊的自由”，也“就是資本家收买几百种报纸来制造所謂‘社会輿論’的自由”罢了。

“自由的臂膀”是怎样“自由”地发表“輿論”的呢？举个例說，失业問題在自由資本



主义时期和在壟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美国报刊上，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自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的《芝加哥论坛报》，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篇社论里，对于如何消灭失业就提出过十分“简捷”的“办法”。它在一八七七年七月十二日写道：“将少许马钱霜或砒霜放在那些废料吃用的菜里或其他食物中，经过不长时间，这就引起了死亡；这样不啻对其他废料下个警告，好让他们滚蛋。”这是赤裸裸的毫无人性的狂言谬语，现今的美国，毕竟“文明”得多了，“自由的臂膀”虽然仍旧要捏造种种关于失业的原因来蒙骗读者，甚至还厚颜无耻地赞扬失业的好处，但是，它们一般不再采用这类过于“简单”的语言了。比方去年五月，纽约第一花旗银行印行的《每月通讯》说道：要解决“今日的失业问题，就是如何使人们催促自己去找工作……这就要求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渴望工作

的态度，而且，首先要求每一个人对于为别人创造工作机会的企业组织有一种友好的政治气氛”。多新鲜！原来失业是由人们“懒惰”、“不主动”或者对资本家们不“友好”引起的，而不是由美国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也是在去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竟然把失业列为美国进行战争准备的“有利条件”之一。这家周刊说，美国幸亏有五百万失业人口，才形成了“一个提供人力的水库”云云。失业人口可以为美国统治集团提供大量的炮灰，就是这只“自由的臂膀”所要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比之上面提到的《芝加哥论坛报》的“办法”，的确不是那么“简捷”，但是，阴险狠毒的程度难道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道理很简单，“臂膀”既然长在壟断资本家身上，它就只能按照壟断资本家的意志去制造产品。

## 二、泡制“独立”舆论的“厨房”

“臂膀”既然是长在壟断资本家的身上，那么，肯尼迪把它称之为“政府的一只臂膀”，这也是十分合乎逻辑的。美国有一位熟知国务院内幕的柯尔盖特大学教授埃耳德证实了这一点。这位教授在一本名叫《政策机器》的著作里，运用许多事实来说明国务院是制订政策的一部强大的机器。教授讲溜了嘴，不知不觉地道出了国务院如何泡制所谓“独立”的社会舆论的秘密。用这位教授的形象的说法，国务院里有一个专门泡制各式各

样“独立”舆论的“厨房”，而这“厨房”工作起来也甚是便当，只须抓住全国二十五家最大的报刊和通讯社的记者，绝大部分报纸就会遵照国务院的方针来对读者进行欺瞒宣传。这位教授还讲到，“厨房”还派出一批一批“联络员”，去参加所有能发表“独立”舆论的什么协会、什么基金会、什么俱乐部的会议，顺便带去“国务院所能提供的材料”；这样一来，本来应该印在国务院公报上的东西，很快就变成这些协会、基金会和俱乐部的“独





立”輿論，散发到群众中去。按照这位教授洋洋自得的供认，不是社会輿論影响了国务院，正相反，是国务院这个“厨房”制造了美国统治集团一向标榜的“独立”的社会輿論。

試把《新聞周刊》——这只“臂膀”主要是长在摩根財团身上——新近列举的美国五个“有影响”的評論員略为考查一下，人們就会对美国式的“新聞自由”得到更加深刻的印象。这个刊物举出的第一号評論員是德魯·皮尔逊，美洲六百多家报纸和美国二百多家电台发表他的“独立”評論，而这位先生却是受赫斯特系报閥所豢养的。第二号是戴維·勞倫斯，三百五十家报纸同时等待着这位評論員的議論，据說，勞倫斯跟洛克菲勒財团和軍人有很多勾搭。但是，“最有影响的”据說还是給三百家报纸供稿的李普曼，給二百家报纸供稿的約瑟夫·艾尔索普，給五十三家报纸供稿的賴斯頓。被称为美国“最大的政論家”同时又是“哲学家”的李普曼，是《紐約先驅論壇报》系統的专栏作家，他和摩根

財团有密切的来往，他所屬的报纸又和洛克菲勒財团的利益息息相关，白宫、国务院的要人以及許多外国官員都是他的“密友”。約瑟夫·艾尔索普也屬于《紐約先驅論壇报》，他的見解跟国务院“特別接近”。至于賴斯頓，却屬于《紐約时报》，这个报纸同摩根財团和洛克菲勒財团关系密切，而他本人則是国务院的熟客。在簡略地考查了以上几位“有影响”的評論員的履歷以后，不由得使人們想起做过《紐約时报》編輯的約翰·苏英頓說过的話：“紐約的新聞工作者必須曲解真理，公开撒謊，歪曲事实，辱罵人們，五体投地地为金錢服务。我們是在幕后活动着的財主的工具和附庸。我們是傀儡；財主拉綫，我們跳舞。我們的才能、本領、可能性和我們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是其他人們的财产。我們是智力的妓女。”

事情很清楚，在美国，什么“新聞自由”，什么“独立”的輿論，都不过是資產階級用来欺騙广大人民的障眼法而已。

### 三、向“軍营国家”推进

当“軍营国家”这个詞儿第一次在美国的报纸上出現时，美国人着实給吓了一跳。“自由的臂膀”不是經常吹嘘美国是什么“福利国家”嗎？为什么一下子又出来了一个“軍营国家”呢？这已經是在肯尼迪上台以前的疑云了。去年人們又在議論紛紛，佛蒙特州的参議員弗兰德斯声称，“我們現在被迫（！）将美国生活方式推进到一个軍营国家的模样了。”

的确，現今的美国是在向这个方面“推进”着。不說別的，看一下肯尼迪政府的一九六三財政年度的預算，就可見一般了。在这个預算的九百二十五亿美元的总开支中，就有五百二十七亿美元用于所謂“国防开支”，这笔支出打破了美国和平时期軍費支出的最高紀錄。其实五百二十七亿这个数字，还不是跟战争有关的全部支出。据紐約一家月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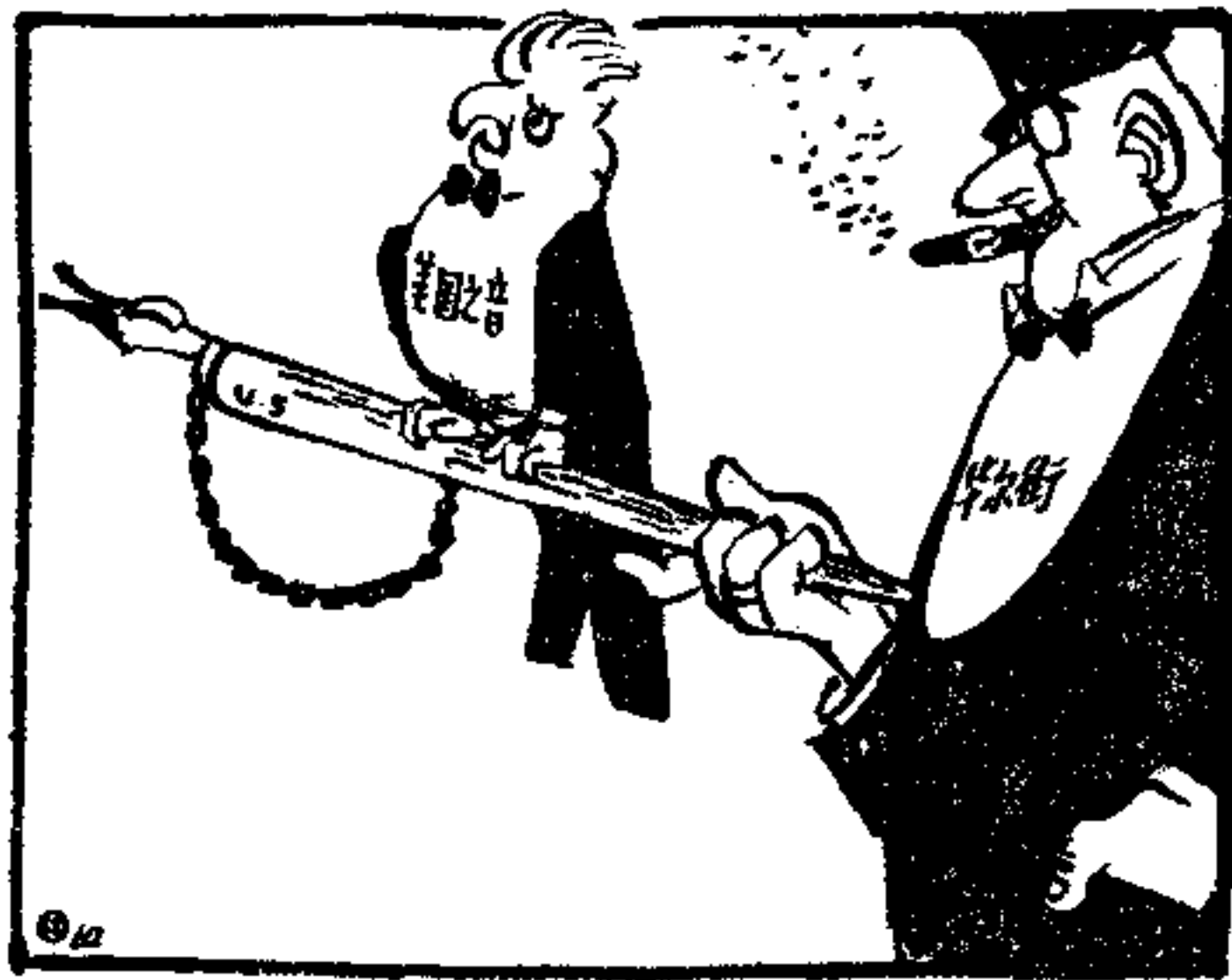
計算，如果把“过去、現在和未来”的有关项目統統加在一起，肯尼迪政府在这一财政年度中，每支出一块美元就有七角九分錢用于战争！

由这本来不存在的“福利国家”，“推进”到已經存在的“軍营国家”，当然不是美国人民所乐于接受的，于是，一切的“自由的臂膀”便立即动員起来，用种种謠言和捏造向老百姓“迟钝的”脑袋展开宣傳。为什么要增加軍事开支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自由的臂膀”除了把那些国家要人們的高見搬出来加以宣揚以外，还不断地发表自己的“独立”的輿論，說什么这都是为了加强美国的“防御”能力。例如，一月十九日《华尔街日报》就做了这样的論断：“庞大和迅速增长的防御(1)費用，应该要求把不可胜数的非軍事补助費用贬到无关紧要的地位或者完全不重

要的地位。”

“自由的臂膀”为五角大楼服务，同宅为大壟断資本家和白宫服务，本来是一碼事。“自由的臂膀”生长在五角大楼的軍人身上，也并非自今日始。《华尔街日报》去年年底宣傳一位隐名的但据說是“著名的”“四星將軍”的观点——当然，这也是宣傳华尔街大老板們自己的观点——道：“(美国)軍队目前的任务不仅仅要进行战争准备，而且要向社会公众宣傳世界共产主义的威胁(1)”。既要打仗，又要宣傳，而所宣傳的“威胁”又要完全捏造出来。在“軍营国家”里当个軍人可真不容易，非文武全才不可；但也不必担心，軍人身上既然可以生长出“自由的臂膀”，这无事生非的勾当也就不愁完成不了的。

这里，还可以順便提一下这样一段頗能說明問題的插曲。也还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說五角大楼現在認識到，在美国报纸上連載的“滑稽图画故事”，比之招兵的招貼画之类的东西，还要起加倍的作用。在这些“滑稽图画故事”的主角之中，有一个名叫巴茲·沙耶的，几年来一直用海軍的冒險生活来娱乐美国讀者。忽然，这位主角的創造者——画家克倫厌倦了海上生活，他笔下的巴茲主角准备“退休”了。五角大楼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动員一批水



美国之“醫”

江 帆



兵提出抗議——怎能无缘无故在这存在着严重“威胁”的时刻脱离海軍现役？海軍当局連忙把这位画家送到太平洋上一支反潜水艇舰队去“体验”生活。果然，不久之后，巴兹·沙耶又在“自由的臂膀”上出现，这一回以他在反潜水艇舰队的惊险活动来娱乐观众。据说，这种娱乐是可以有助于让观众在

不知不觉中支持海軍預算的提高了。

五角大楼运用“自由的臂膀”的熟练程度，并不亚于华尔街、白宫和国务院。这个既长在大资本家也长在达官显贵和职业军人身上的“自由的臂膀”，就这样努力着，一步一步地将这个国家推进到“軍营国家”的境界。

## 在“全民福利”的幌子下

· 張 振 亚 ·

肯尼迪上台以来，一直喧嚷着要建立一个“全民福利国家”。今年一月，他在“国情咨文”中煞有介事地说什么“财富是手段，人民是目的”、“国家是公民的仆人，而不是公民的主人”；在他提出的“預算咨文”中，又宣称，这项高达九百二十五亿美元的和平时期的最高預算“是有关我們国家福利的許多考虑的综合”。

肯尼迪是怎样关心人民福利的呢？他所提出的“預算咨文”本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預算咨文”规定，美国在从今年七月一日开始的一九六三财政年度中，用于农业、开发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建筑、劳工、医药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民政项目的开支，全部加在一起，还不到总开支的百分之二十；而用于所謂“国防开支”、“空間计划”以

及“同过去的战争有关的退伍軍人福利费和(国債)利息”等直接和間接軍費方面的开支，却高达七百二十八亿美元，約占整个开支的百分之八十，相当于“卫生、劳工和福利”开支的十四倍以上。用美国《經濟評論》的話來說，这个預算是“一个杀人能力过高的預算”。

据美国报刊透露，这样一个庞大的軍事預算，将給美国壟断資本带来丰厚的利潤——由于新預算空前增加軍事开支，在今后一年內，美国各大公司納稅前的利潤总额将达到五百六十五亿美元左右，“远远超过历史上最高的利潤水平”。現在，美国壟断資本集团，特别是那些为五角大楼备办軍事物資的大企业主們，在这种大发利市的“好光景”下，一个个正在做着“繁荣”的美梦。不



久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情不自禁地说:“这些(军事)订货将流向大约一万八千家基本合同商……整个工业都受到影响。增加两个陆军正规师的决定意味着将给予食品、成衣和制鞋工业以大量订货。对军备的沉重开支已成为我国钢铁工厂生产率中的重大因素。底特律(汽车工业中心)已经感受到成千上万辆的卡车、坦克和其他军用车辆订单的影响。建造新的舰只和改装旧的舰只的造船厂正在做着繁荣的生意。从七月开始的新的一年的订货是:建造二十九艘新舰,并对三十三艘以上的旧舰进行大改装。”

肯尼迪把“全民福利”这类好话翻来复去地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到头来只不过是连骗带压地要美国人民把裤带勒得更紧一些,为垄断资本集团牟取暴利“承担沉重的负担”和“作出特别牺牲”而已。虽然目前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每年的直接税和间接税负担已经达到二千五百美元左右,但对肯尼迪政府来说,还是难以应付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军事开支的需要,更难以满足垄断资本家们要求取得最大利润的欲望,于是肯尼迪一直在叫嚷着要实行“赋税改革”,向美国人民进行更多的搜刮。在他提出的预算收入计划中,仅仅直接落到广大人民头上的“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两项,就将增加四十六亿二千九百万美元,而在“公司利得税”项下增加的五十三亿美元,也是间接地增加人民的负担。“每做八小时工作,就有两小时是为捐税而工作!”在事实面前,美国资产阶级报刊也无法否认:所谓“赋税改革”,实际上只不过“意

味着企业在机器投资上的大量减税,而对于成千上万的个人来说,则意味着更重的捐税负担”。

尽管肯尼迪挖空心思加重人民的捐税负担,但飞快加大的军费开支仍然给国家预算增添着日益膨胀的赤字。于是,增加国债就成了肯尼迪政府搜刮民财的另一个“法宝”。

在去年六月美国国会应肯尼迪的请求提高美国国债最高限额以后,《华尔街日报》曾经说道:“当肯尼迪先生要求奔向新边疆时,他到底指什么,对此我们无需再有怀疑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叫作二千九百三十一亿七千二百七十九万四千九百八十四元六角二分美元的新边疆。”其实,《华尔街日报》的这番话未免说得太早了一点,因为这个数字还只不过是肯尼迪走向“新边疆”的起点。新年一过,肯尼迪就把国债的数额迅速推进到二千九百七十九亿美元了。而且,紧接着,在他一月份向国会提出的“预算咨文”中,又借口不给财政部的工作“造成严重的困难”,进一步要求国会把国债的限额再增加一百亿美元,达到三千零八十亿美元(美国国会已在三月二日授权肯尼迪把国债的“临时性”限额提高到三千亿美元)。这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国债最高限额三千亿美元还多八十亿美元。

联邦政府的巨额国债,从来是美国人民的一大祸害。因此,美国人民多年来一直要求摆脱这项沉重的负担。虽然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的历届政府,为了缓和人民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曾在口头上扬言要减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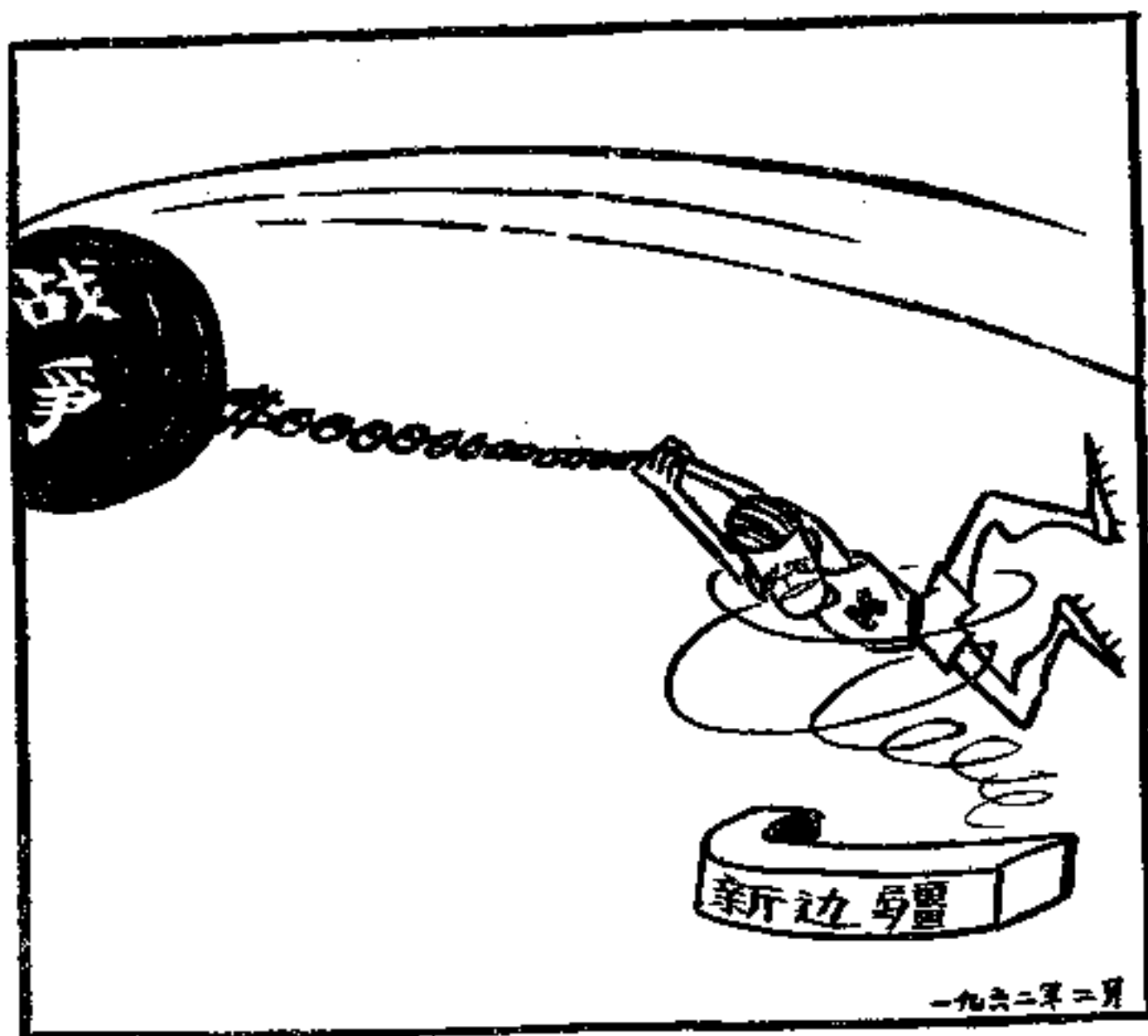


債，但是美国政府預算連年出現的赤字，却使这些諾言一个一个都成了画餅。肯尼迪上台以后，索性连这个餅也不画了，为了加紧搜刮扩軍备战的費用，他一次比一次更急迫地把國債限額提高到新的頂峰。

肯尼迪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假仁假义地表示对“今天最年幼的孩子”的“关怀”，并且言不由衷地許願說：“我們的計劃是要……使所有的人得到美国生活的充分好处”，而且还“要把我們的国家产业遺留給子孙后世”。可是，事实却

是：他提供給美国人民和留給后世子孙的并不是什么“美国生活的充分好处”和什么“国家产业”，而是日益加重的捐稅負担和还也还不清的債務！

这一点，就連英国《卫报》也評論說，美国統治集团这种只“願意在防御上花大笔公共經費，但是特別不願意花在福利計劃上”的政策，已經成为美国“經濟图景中最大的污点”。可是，肯尼迪在他提出的“国情咨文”中，还虛伪地裝出一副乐善好施的面孔，說什么“为了帮助所有的（美国）人中最不幸的人，我将建議一項新的公共福利計劃”。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計劃”呢？肯尼迪回答說：這項計劃“不強調補助”，“不強調救濟”。肯尼迪既要侈談“福利”，却又不願在福利上花錢。在一九六二財政年度中，列在



飞向更新的边疆

华震威

“卫生、劳工和福利”項下的开支，仅不过占全部預算开支的百分之五点二。就是这样，肯尼迪仍嫌太多，表示还要减少失业救济的支出。据美国官方統計，目前領取政府食品救济的家庭，如果按四口之家計算，平均每人每天还摊不上八分錢。

很显然，肯尼迪的这个“大胆而富有想像力”的联邦政府預算，并不是为了建立什么“全民福利国家”，他所說的“国家福利的許多考虑的綜合”，絕不是什么人民的“福利”的綜合，它只不过是从工人階級和广大人民那里拿走亿万美元重新分配給壟断資本的一种巧取豪夺的工具而已。劫貧济富，拚命为壟断資本搜刮財富，这才是肯尼迪的真正的“目的”；而“全民福利”云云，只不过是他掠夺人民財富的幌子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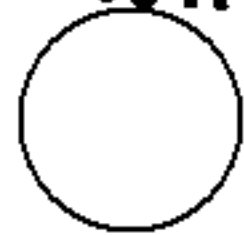




# 关于臭椿—蓖麻—蓖麻蚕—寄生蜂的 連串发展和綜合利用問題的芻議

朱 洗

## 一 为什么要飼养蓖麻蚕？怎样推广蓖麻蚕？



### 1. 需要开辟更多的增产蚕絲的途徑

我国是家蚕（桑蚕）的祖国，几千年来，以飼养这种吐絲的昆虫著名于世，并首先发明繅絲織綢的技术。根据一般想法，要想多增产蚕絲，以滿足人民的需要，只要多种一些桑树，多养一些家蚕，問題就解决了。多种桑树，多养家蚕，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也应该看看世界上能够吐絲的昆虫种类，究竟有若干？可以利用、又适合我們利用的，又有若干？如能广予調查，多利用几种吐絲的昆虫来为我們增产更多的絲料，发展蚕絲的前途岂不是更广阔么？世界上已知的，有三百多种吐絲較多的昆虫。我国过去常利用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早已馴化成家养的、吃桑叶的桑蚕；另一种是尚屬野生放养状态的、吃柞树叶的柞蚕。另外虽然还有几种野蚕（如吃樟树叶的樟蚕，吃臭椿叶的椿蚕等），偶然有人利用，但为数甚少。这些野蚕如果經過改良、培育，也可以使它們

发挥更大的生产能力。这是蚕絲界应该注意的工作。此外，如日本的天蚕和印度的蓖麻蚕，在这些国家里，也有久經利用的历史，各有优点可取。我們应该引种馴化，使其适合我国的环境条件，加以飼养。如能增添一种新的吐絲昆虫，就好比添了一批新兴的产絲生力軍。目前虽能制造各种人造纖維，可是，用人造絲代替天然絲，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我們要积极发展制造人造纖維的工业，同时应当大力发展养蚕业。养蚕比較費人力，但这对于我們人口众多，农村里有广大輔助劳动力可以利用的国家来说，也正是发挥劳动潜力的大好机会。况且我国农村的妇女早有养蚕的习惯。为了增产更多的蚕絲，除了发展久有飼养习惯的桑蚕和柞蚕以外，发展蓖麻蚕也是一条重要的途徑。

### 2. 蓖麻蚕的优点

蓖麻蚕体质强健，发育快，飼育期較短（十八天左右），而且不怕炎热，不怕雨湿；



在 16—32°C 气温的条件下都能养育。华南一年可养八至十次；华中、华北，自七月到十月底，可养五至六次；东北可养二至三次。蓖麻蚕在印度原属半野生的。顾名思义，是以吃蓖麻叶为生的。但究其实际，这蚕的食性较杂，能吃多种代替品，如北方的臭椿叶和南方的木薯叶都能吃。再拿蓖麻来说，它在暖季陆续发芽抽叶，所以生长特别快，叶量较多。从我们在上海地区的试验结果来看，种植一亩蓖麻，每年适当定时疏叶（约占总叶量的三分之一），无妨结子，可饲养二万多头蚕；收茧量与一亩桑树养的桑蚕茧量不相上下。若能同培桑一样，精细培植蓖麻，其产叶量还能大大增加，收子量也能增加。加以蓖麻通常是一年生的植物，当年春间播种，夏秋即可养蚕，无需长期栽培。所以饲养蓖麻蚕不但收茧快，次数多，而且所费劳动力也比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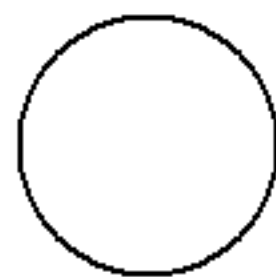
蓖麻蚕的食叶量与桑蚕相似（全生吃八钱到一两），茧的重量也不相上下（每茧三克左右）。蓖麻蚕的茧丝层很疏乱，茧的一端有一小孔，不利缂丝。这是它的缺点。但现已试验缂成“疙瘩丝”，并织成别致的疙瘩绸。上海绢纺厂已将蓖麻蚕丝纺成二百至三百支细绢纱，织成各种有花或无花的丝织品。蓖麻蚕丝的外形与物理、化学的性质，也有与家蚕丝不同之处：“强力”比不上家蚕丝，可是“弹性”却比家蚕丝强一倍。至于上色性、耐热力和吸湿性都很好。它的丝条是扁曲的（家蚕丝是圆柱形的），容易与羊毛混纺，成为丝毛织品，如呢绒等。

### 3. 全国解放后培育和推广蓖麻蚕的经过和初步经验

全国解放以后，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同志，就由国外引入原产印度的、吃蓖麻叶的蓖麻蚕来上海试养。过去这种蚕在我国试养过多次，都先后失败。前人失败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种：1. 这蚕的卵和蛹都不冬眠，冬季无叶饲养，势必绝种。2. 在大陆气候之下蚕卵屡屡孵化不良，蛹也常常不能羽化成蛾传种接代。这些都成为饲养保种的难关。我们经过几年的研究，也遇到几次濒于绝种的危险，但终于一一攻破这些难关，于一九五四年试养成功。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开始在若干省的蚕丝单位中试养或小规模推广。

蓖麻蚕这一名字，一般人是生疏的；而在农村中传授养蚕技术，又是一件较复杂的事情。所以推广起来不是很容易，难免碰到一些困难。好在中国科学院和农业部一直鼓励我们做这种研究和推广的工作。一九五四年以后，我们开始陆续接收各省选派来实验生物研究所学习饲养蓖麻蚕的少数人员。以后，我们又办了几次训练班，以推广这一新兴事业。虽然在推广初期遇到一些困难，但也有若干据点，初次试养就获得成功的。如安徽阜阳专区、镇江蚕丝研究所、西北农学院、安徽农学院、浙江农业大学等，经过试养，都认为这种蚕可以在国内发展。

经过最近几年的推广试验，确实证明蓖



麻蚕为农民所喜爱；它在农村生根落户，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只要有关部门加强领导，注意研究和解决推广中的困难和问题，便能够使饲养蓖麻蚕这一新兴事业逐渐得到发展。从已有经验来看，推广蓖麻蚕应注意如下五方面：1. 先培养有技术的骨干，选择适当的地点，作实物示范性的宣传，并选择一些过去已经具有饲养基础的地区，作为生长点。在试点时，又用带徒弟的方法，边教、边学、边做。如有失败，必须查明原因，成功以后，再考虑向前发展，不宜操之过急。每一个生长点，每年推广的蚕种数量的增加速度，要看实际情况，作适当安排，并应有技术辅导人员，在蚕忙时巡回指导，总结经验教训。要渐次累积经验，增加熟练技工的人数。2. 待点的饲养成功，脚跟站稳，再由点到线、到面，逐步发展。至于发展速度，当然不能预先硬性规定，要以当时当地实际情况为转移。有些地区，可以发展得多一些，快一些；有些地区，可以发展得少一些，慢一些。3. 县或专区应有一个指导的中心，人数不要多，但要有熟练的技术人员，并且使他们有时间从事进修，提高技术水平，逐渐使他们既能担负推广工作又能够钻研问题。4. 这蚕初到一个新地区，倘使初养即获成功，大家一定要争着多养。在这时候，要有一个节制；不然，技术尚属生疏的人，养的蚕数过多，容易失败，造成不良的后果。5. 在幼虫饲养、蛹期保护、制种、产卵、蚕蛾检查等过程中，要严格执行科学的技术措施，遵守操作规程，特别要注意蚕种质量，防止蚕病。总

之，这蚕虽然比较容易饲养，但也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所以发展要有一定的步骤。

#### 4. 今后推广蓖麻蚕的展望

蚕是叶饲的。养蚕首先要有足够的叶量。要想推广蓖麻蚕，必须了解全国各地野生的和播种的蓖麻面积及其产叶的大概数量。蓖麻在我国各省都能生长。据极不完全的统计，东北、内蒙及黄河、淮河流域，原有很多野生的和半野生的蓖麻，所占地面，不在三百万亩以下，特别以内蒙和西北各省为最多。对于蓖麻能够种植的数量问题，我们曾于一九五五年秋季在安徽亳县做了初步的调查。这个县的十一条大小不等的河流两岸和许多道路、公路两旁，或多或少都有野生的蓖麻。根据地图缩尺推算，至少可种六千万株蓖麻。再加坟场、隙地，以及村外围水道两旁隙地，至少可以播种九千万株。这是一个估计。在不影响结子的条件下，每株分期适当疏叶，可以养二十头蚕。暂仅以半数作为基数（每株养十头）计算，则总共能养九万盒蚕种（每盒重二十克，蚕数约一万头）。另据涡阳县的估计，那里能种蓖麻的空地比亳县还多。

至于收益方面，仍以九万盒种估计，假定每盒种收三十斤鲜茧（最多每盒有收六十多斤的），则共可得鲜茧二百七十万斤。茧层量以百分之十二计，可得纯丝料三十二万四千斤，蚕蛹二百三十七万六千斤。蚕蛹富含蛋白质（鲜蛹含百分之十六，干蛹含百分之六十）和脂肪（鲜蛹含百分之六，干蛹含百



分之二十五)，等于无骨的“肥肉”。此外，还有大量的蚕沙（蚕粪及剩叶等）。每养五盒蚕种，所得的蚕沙，便可作一亩小麦的肥料。养九万盒蚕种所得的蚕沙，就可作一万八千亩田的肥料。这是間接的收益。

就全国来說，关于蓖麻的生长情况尚缺少必要的調查資料。但据中国科学院几位做过区系調查的同志說：整个西北和东北黄土、黑土和盐碱土地地区，都适合蓖麻的生长；几乎到处都有野生的叶子可以利用。黄河流域，根据蓖麻自然生长的情况，发展蓖麻蚕也有

現成的叶料基础。在这些地区，可能发展的前途，决不逊于皖北。有些紅壤地区，土质过于結实，酸度过高，在这种地区，蓖麻也能生长，但没有在华北砂土地地区那样容易繁茂。

注意保护野生的蓖麻，再在荒地和零星空地上多多播种蓖麻，所得的收益是多方面的，上面所說的疏叶养蚕，仅是其中之一而已。通过推广蓖麻蚕，还可以使臭椿——蓖麻——蓖麻蚕——寄生蜂，得到連串的发展和綜合利用。



## 二 为什么要連串发展和綜合利用？

我們根据对臭椿、蓖麻、蓖麻蚕和寄生蜂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认为它們的連串发展和綜合利用，对于生产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意义的。

### 1. 臭椿的經濟价值及其与发展蓖麻蚕的关系

臭椿是一种具有羽状复叶的高大树木，我国各地都适宜生长。在我国最古的一部博物书《尔雅》中，名为“樗”（所以这树上的蚕有名樗蚕）。这树生长得特別快，二至三年即可成林。根部入土很深，不怕風災与干旱。枝干富有彈性，能屈而复伸，不易被折。砍伐之后，即能由老株上再生許多新株。树皮很韧，木质洁白；但质地并不坚硬，不是建造的良好

材。虽有这种缺点，但我国森林学家仍认为它是綠化黄土地区的上选。根据新近研究的結果，知道这树中的纖維比較細长，可以作人造纖維的原料，它的經濟价值就更提高了。

臭椿树上，常常寄生一种背上有肉疣的青黄色的毛虫。这虫会結出一种树皮色的茧子，悬挂在叶柄或細枝上，人目易見；蛹在茧中化出两翅有眼斑的美丽蝴蝶。这是人們常見的一种結茧昆虫。河南、山东的农民常利用这种茧絲紡成土綢，名曰“樗綢”，充为衣着。我們問过山东乡村的老人，都說这种土法古已有之。始自何代，尚不得而知，留待考证。

五、六年前，当我们解决了蓖麻蚕本身的飼育問題之后，苦于沒有使它休眠越冬的良法。后来利用这种在我国土生土长的、自



己能够以蛹休眠过冬的臭椿蚕与自己不能休眠的蓖麻蚕杂交，再经过几年的培育与选择，便得到茧色纯白而能以蛹越冬的杂交种，冬季保种的困难也就减少了。

不但我们培育的杂交种蚕欢喜吃臭椿叶，就是纯种的蓖麻蚕也能吃新生的臭椿叶，结出茧子来。在西北和华北地区，每年若要大量发展蓖麻蚕，便非提早饲养不可。因为只有提早饲养，才能够增加饲养次数，增加总的收茧量。要想提早饲养，不能专依靠蓖麻叶做饲料，因为蓖麻是热带性植物，在温带地区，种子发芽较迟，必在清明以后，种子才发芽生叶，待到六、七月以后，才可以取叶利用。至于臭椿，发芽较早，五月即可利用养蚕。这样，臭椿多了以后，在华北各省，每年就可以提早养蚕，多养一代。这对制种繁殖的关系很大：蚕种数量可以因此增加百倍以上。这是臭椿——蓖麻——蓖麻蚕应该连串发展和综合利用的一种很明显的理由。

## 2. 种植蓖麻的经济价值

蓖麻属于无瓣花类中的大戟科，蓖麻属，花分两性，雌、雄花上下分生。欧洲有些人通常以为，这种植物原产非洲热地，后来渐渐传播全球。另有人说，它的祖居地区究在何处，尚未查清，因为在亚、美两洲，早有蓖麻。我国最早的字典书《玉篇》中，已有“蓖麻”之名。《本草》中说：“叶似大麻，子如‘牛蝎’，壳中白，肉如‘纈随子’，油可作印色，

子无刺者良，有刺者毒。”目前一般种植的蓖麻，它的拉丁文名：*Ricinus communis*，意即“狗蝎虫”，而我国的“蓖”字，据说是由“牛蝎虫”的形状推演出来的，因为蓖麻子和这种寄生虫的身材和色相太近似了。

蓖麻很明显地分成许多变种或品种。植物体高大的，叫“大蓖麻”，叶如伞盖；身材小的，名“小蓖麻”；茎紫色的，名“紫蓖麻”；茎红的，名“红蓖麻”；茎青的，名“青蓖麻”；蒴果外面有刺的，名“刺果蓖麻”；等等。蓖麻的产叶量、收子量和种子含油量的多寡，不但与种植地区的气候和土质有关，与品种也有关系。要想大量种植，便不能不考虑到选择适当的品种。

在亚、美、非三洲热地，蓖麻原是野生的植物，树大成林，高达十至十五公尺。在我国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海南岛各地，也成为多年生的木本树。但在有霜冻的各省，临冬枯死，即成草本植物。虽属草本，某地一經长了蓖麻，因其种子容易自己散落地上，明年会自己萌发成新株。所以蓖麻易种，不易除。对我们说，这也算是难得的优点。

蓖麻满身都是宝。第一，叶子可以饲养。第二，种子含油量多（达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蓖麻油是工业上宝贵的油料。因其粘度高（比重为零点九六），酸度低，不易氧化，不易凝結，故可作为上等滑油；染织厂里不可缺少的土耳其红油，也以此油为主要原料。据上海油脂部门的同志所做的试验，蓖麻油脱水后，可以替代桐油或部分替代亚麻仁油





使用，并可制造各种絕緣漆。蓖麻油还有一种特性，就是含有大量的蓖麻脂肪酸。这种酸类的分子結構特別，所以它的用途也特別廣闊。近年又发现这种油是高級尼龙絲的上好原料，更为工业界所重視。至于較細小的用途如印泥油，潤腸油，替代一般潤滑油等，就更多了。榨油后的油餅可作农作物的基肥。每亩野生的蓖麻，如能謹慎收子，每年不难得到三十至五十斤蓖麻子。如能稍事管理，不难达到一百斤左右，可榨油四十斤左右，油餅也有四十斤左右。第三，据上海煉麻厂等有关部門的試驗，蓖麻的皮层可作制造麻袋的原料；如能經過提煉，可作打字紙的原料。麻秆洁白，据上海江南造紙厂試驗，其中纖維也能用于造紙。第四，种蓖麻，对于綠化大地，調剂气候，巩固堤防，隔离虫害与鼠害，也能起一些作用。蓖麻的优点之一是家畜不喜吃它的叶子，鳥类不伤它的种子。所以西北农民都知道，地边种些蓖麻，不但可以收子取油，而且还是地上和地下两用的好藩籬。这正是我們需要的优良特性。

### 3. 利用寄生蜂消灭虫害；利用蓖麻蚕卵作赤眼寄生蜂的培养基

最后，說到寄生蜂。害虫对农作物的危害，众所周知。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灭虫的方法增多了，杀虫的药剂也逐年增多了。但是，消灭虫害，并不是只有使用化学药剂这一条路，我們还可以找到另外一种方

便、有效的方法。

我們知道，自然界中的生物原有互相控制的力量。凭借这种自然力，才能在它們中間建立某种比較穩定的均衡状态：使多的不能过多，少的不致絕种。在种类极其繁多的昆虫界里，相互約束发展的事实，到处可見。有的昆虫是食植物的，有的是食肉的，有的是半寄生的，有的是完全寄生于別种动物或昆虫上謀生的。食肉分子要杀害食植物的分子，例如食肉的瓢虫就欢喜生吞菜上和果树叶上万恶的蚜虫；它們的杀虫效果，不是一般药剂所能比拟。还有一些細腰的寄生蜂能預先为其后代安排寄生的好环境：活活捉住适当的俘虏（多半是害虫，如青虫、蟋蟀、蝗蝻等），用其尾部的毒針，給俘虏注入定量的有麻醉性的毒汁，令其麻醉而不致死，然后送入自己特制的泥窠中，待积起一定的数量，然后产卵于其上，封窠而去，不复返顾。它們的幼虫由卵中孵出之后，即安全地就近取用这些被麻醉的活物充饥，达到傳种接代的目的。

目前就已經知道的，有千百种的寄生蜂，专门寻找別种昆虫作为子代的寄主，借以傳种接代。有的欢喜使自己的后代寄生在別种昆虫的幼虫上，有的专门选择別种昆虫的卵，作为子代寄居的場所。对我們說，具有后一类习性的小蜂是最合理想的。懂得这种自然規律之后，近代的应用昆虫学家們便集中力量，研究那些微小寄生蜂，并找出它們寄生的对象。对象如果是农作物的害虫，那就可以利用它們杀灭害虫，减少损失。一



經找到好的杀灭害虫的寄生蜂之后，再想办法預先大量培养出它們的子孙，在适当的时期——即害虫产卵的时期——大量釋放出去，使其在害虫的卵上产卵，就可以杀死害虫的卵，达到保护农作物的目的。这应该說是近代“以生物制生物”的一种最巧妙、最有效、最經濟的方法。可是到目前为止，这类寄生蜂，一般仍难以在人工控制之下大量繁殖；只有一种赤眼寄生蜂，在这方面比較容易。

赤眼寄生蜂(*Trichogramma evanescens*)因有大大通紅的眼睛而得名。身体极微小，几乎像飞尘一般。在光綫稍暗的場所，可以說見不到它們的影迹。因为身体小，所以能够多养、多放。它能消灭多种鳞翅类的卵(如冬夜蛾、棉鈴虫、螟虫等)。全国解放以后，为了消灭螟虫的危害，許多昆虫学家就注意研究利用这种寄生蜂。广东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蒲螯龙同志，已用这种寄生蜂消灭甘蔗螟虫，收到显著的效果。对其他害虫，各方面正在研究中。据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的同志說，在湖南各地，已經证明这种小蜂对水稻螟虫也有控制的力量。

可是，要大量培养这种寄生蜂，沒有适合的培养基是不行的。那末，用哪些昆虫的卵作为培养基，才能在最經濟、最方便的条件之下，預先大量培养出赤眼寄生蜂，以便临时使用呢？这是我們要討論的关键問題之一。

各国都有作为培养基的对象。有的是用夜毒蛾或柳毒蛾的卵，作为赤眼蜂的培养基。这些夜蛾不便人工培养；每枚蛾卵中，普通

只能培养几只寄生蜂，数目过多，便不能完成其发育。我国学者过去曾用寄生在松树上的松毛虫蛾的卵，作为培养基。这虫也不易人工培养；每卵能寄生的蜂数也不很多，很难达到大量培养的目的。

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間，我們在广东初次推广蓖麻蚕时，蒲螯龙同志发现赤眼蜂最喜欢在这卵中产子，不但数目較多，而且雌蜂的比例也高。他并证明这是最理想、最方便的培养基。于是就把养蓖麻蚕和养寄生蜂这两件事情互相联系在一道了。

赤眼寄生蜂的产卵习性，非常有趣。当雌、雄蜂在蓖麻蚕卵內将出未出的时候，先在卵壳上咬开一个小小出孔，然后一一爬出，伸展翅膀，稍事休息，雌、雄即自交尾；分离不久，雌蜂立即寻找产卵的場所。倘在近旁有蓖麻蚕卵，它就用其尾后的产卵器，刺入蚕卵外壳，产卵于其中。不久即自死去。蓖麻蚕卵不論是新产的，已經受精发育的，或沒有受精、不能发育的，或甚至留在母蛾体中、沒有产出的腹卵，都为赤眼寄生蜂所欢迎。所以制种場里，一切殘卵同样能够利用作为培养基。赤眼寄生蜂的卵一經注入蚕卵之后，立即开始发育。这类寄居的胚胎和寄主的胚胎是势不两立的。几日之后，主胚被害，充作客胚的养料；最后，蚕卵壳內，滿藏这类发育很齐整的寄生蜂。它們很快就破壳問世，再事生殖。在实用方面，每一蚕卵能培养成功的蜂数，愈多愈好。据調查，每一蚕卵內，寄生数目自二十至七十；以五十左右比較多見。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大概每



隔十日，即能繁殖一代。这样，便不难计算这蜂的繁殖力了。假设每只母蜂每代(每十天)生五十个子蜂(雌、雄各为半数)，那末，下一代，就会有一千二百五十个子蜂；这样到了第十代，就有一百九十五万三千一百三十五亿之多！一年之中，倘使环境温度相宜，蚕卵不缺，则可连续繁殖二十至三十代。这种寄生蜂还有别的值得一提的优良特性：第一，只要有未达干燥的蓖麻蚕卵供它们寄生，无需再给任何食物，饲养的人不忙，不乱，而且它们对环境温度的要求，并不严格。第二，因为它们身材细小，在一升大的通气纸盒中，可以养许多万。培养所需的空间可以缩小，设备可以简单，几乎任何房子都可利用。但控制发育时，必须有各种指定的温度，必须有定温的设备。

利用生物防虫的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引起大家注意。将来这种研究工作如能和推广饲养蓖麻蚕密切结合起来进行，则对除灭虫害，增进农业生产，一定会起很普遍的作用。这一工作可大，可小，既可以在公社里进行，也可以设立专门的制蜂厂进行。

作了以上这些申述，方才将臭椿——蓖麻——蓖麻蚕——赤眼寄生蜂这四种不同的动、植物中间的相互关系说清楚。只要这些关系是确实存在的，不是牵强附会的，那末，由这里推演出来的“四位一体”的发展和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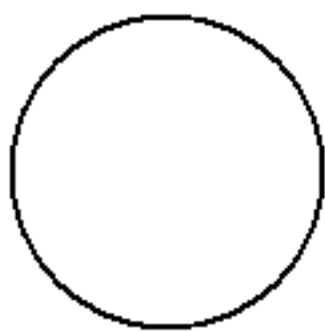
合利用的道理，就可作为考虑问题的线索，也可以作为今后进行工作的目标。我极希望国内林业科学的专家、植物地理学家、油料作物的专家、纤维原料的专家、蚕丝事业的专家、生物治虫的专家们和对这类十分复杂的综合利用问题有兴趣的各有关单位的同志们，关心这些问题，对我这一刍议思考一番，提出意见。

倘使不大搞，不作全面的计划，只作小规模的试验，这也是稳妥的办法。那就可以选择一个县，或某些国营农场和公社，作为试验点。这样反觉灵活，轻而易举，用不了太多的资金，花不了太多的人力。第一年春季，在荒地、隙地、河边、路旁，多种臭椿和蓖麻；长大后分批疏叶，饲养蓖麻蚕，可以陆续有茧收成；待到秋末，可以收蓖麻子；冬初下了霜之后，即可剥麻皮，收麻秆。这都是当年收成的农业和工业很宝贵的物资。待到第二至三年，臭椿长大成林。因为这一植物发芽较早，五月间即能取叶养蚕。这样能提前先养一两批蚕，增加收益。而且这树的生发力很强盛，摘叶时如果不伤顶芽，对于树的生长影响不大。养了早蚕之后，天气正炎热，臭椿叶过老，蚕不爱吃；当时正值蓖麻生长旺盛，即能以蓖麻叶作为蚕的食料。臭椿长大后，木材可以利用。至于借蓖麻蚕卵培养赤眼寄生蜂等工作，可视各地具体情况适当进行。



#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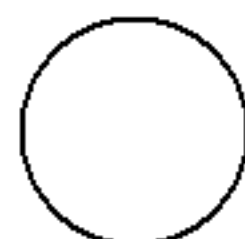
7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七期 ★

## 目 录

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 苏 星 (1)

不违农时是领导农业生产的

一项重要政策 ..... 章 竟 (10)

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 林一舟 (16)

进一步加强成本管理 ..... 赵少平 (20)

自然科学和实际应用 ..... 何祚麻 (24)

中国农民战争的自发性和觉悟性

问题 ..... 宁 可 (29)

☆ 四月一日出版 ☆





# 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

苏 星

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从整个的历史时代来看，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速度，会远远地高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速度。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之所以能够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速度，是由许多条件决定的。从客观条件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地发展生产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它比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从主观条件来看，党和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有可能根据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计划，并且把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和计划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的行动，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再生产不断地扩大。我这篇文章不可能全面地探讨这些条件，打算只对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具体问题，作一些说明。

任何社会的扩大再生产的速度，首先都是由积累增长的速度决定的。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也不例外。因此，研究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必须从研究积累的来源、数

量和增长速度开始。

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产品从价值上看，包括三个部分：（一）转移过来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原料、材料和燃料等）的价值；（二）劳动者的必要劳动（为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为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第一部分，是原有的价值的转移，在再生产过程中，它必须转化为企业的固定资产的折旧，和维持现有生产规模所必要的流动资金（不包括工资基金），这部分价值是不能用于积累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即国民收入），其中，第二部分必须用于补偿现有劳动者的消费基金，也不能用于积累。能够用于积累的只有第三部分，即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也不可能全部用于积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随着生产的发展，劳动者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中，总要有适当的部分用来增加现有工人的工资和农民的劳动报酬，这部分价值，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劳动者的必要劳动。除此以外，还需要从劳动者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中，扣除用于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保



健方面的費用，扣除国家管理費用和国防費用，扣除为丧失劳动力者所設立的社会基金，等等。經過这样一些扣除以后，余下来的才形成整个社会的积累基金。

可見，积累基金的数量，不是随意規定的，它是有客观依据的。我們計算积累基金的数量，应当像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先从国民收入中扣除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所創造的那部分价值，再从余下来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創造的价值中扣除应当扣除的部分。这样，就可以知道，国民收入中究竟能够提供多少积累。計算积累率，用积累基金的数量同国民收入的数量相比，这种計算方法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計算，必須以經過上述各种扣除以后的积累数量为基础。不从已有的积累数量出发，只是把积累率規定为百分之二十或者百分之三十，很难断定积累的高低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如果积累基金的数量多，积累率是百分之三十也許不算高；如果积累基金的数量少，百分之二十也可能就过高了。因此，不能抽象地評定积累率的高低，主要是看积累率是不是建立在客观实际可能的基础上。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数量的大小，基本上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因素決定的：

第一，决定于国民收入的多少，而在国民收入中，又决定于劳动者剩余劳动所創造的价值量的多少。国民收入和劳动者剩余劳动所創造的价值量增加得愈快，积累增长的速度也愈快。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創造的价值，体现为剩余价值，

它完全被资本家所无偿占有。在那里，各个企业的资本家虽然想尽办法扩大剩余价值的剝削，但是，由于存在着生产社会性和資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間的对抗性矛盾，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压抑，工人大批失业，周期性地爆发經濟危机，国民收入和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量的增长，是經常遇到障碍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創造的价值，已經不再体现为剩余价值，它完全属于全民所有或者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社会主义經濟制度第一次开辟了劳动人民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和积极性的广阔天地，由于国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发展，永远地消灭了失业和經濟危机。这样，国民收入就有可能比較快地增长，虽然用于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的一部分价值是不断增加的，但整个社会剩余劳动所創造的价值，还是比資本主义社会的增长速度高得多。

第二，决定于剩余劳动所創造的价值当中，消費基金（包括社会消費基金和用于提高現有的劳动者生活水平的那部分基金）和积累基金各占多大的比重。假定剩余劳动所創造的价值数量不变，在这部分价值中消費基金的比重增大，积累基金的比重就会縮小，反过来积累基金的比重增大，消費基金的比重就会縮小。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消費基金的各个部分有不同的发展趋势。一般說来，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保健方面的費用，会高于資本主义社会，而且是适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逐步增长的；为丧失劳动者所設立的社会基金也会高于資本主义社会（在那里只有微薄的救济費）；国家管



理費用和国防費用則比資本主義國家低。在社會主義社會，儘管科學、教育、文化、藝術、保健等方面的社會消費基金比資本主義社會高，而且隨着生產的發展，勞動人民的個人收入是逐步增長的，但是，積累的比率仍然可以高於資本主義社會。這主要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比起資本主義社會來，可以更多地節約非生產費用，已經不存在剝削階級和它的奴仆們的寄生消費。而這部分消費，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大得驚人的。有人統計，在美國，國民收入中用於剝削階級寄生消費的部分竟達百分之二十！

總之，從一般發展趨勢來看，社會主義社會的積累量的增長速度要比資本主義國家快，積累的比率也比資本主義國家高。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越性的具體表現之一。但是，就我國的目前情況來看，由於過去的經濟基礎比較薄弱，每年新增的國民收入總量還低於某些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今天的積累的絕對量還是比某些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要少。因此，我們今天安排積累，一方面，要看到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巨大優越性，並且要充分發揮這種優越性，克勤克儉，使可能用之於積累的资金，統統利用起來，以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國今天還沒有擺脫“一窮二白”的狀況，底子還不厚，必須根據現有的客觀條件，合理地安排積累的数量。目前我國的農業生產主要的還是靠手工勞動，受自然條件的影響很大，農業有豐收的年头，也有歉收的年头，農業的豐收和歉收，會直接影響工業生產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積累增長的速度。這

樣，在具體地安排積累增長速度的時候，哪一年高一點，哪一年低一點；哪些地區高一點，哪些地區低一點，就應當實事求是地進行精密的計算，按照以豐補歉、瞻前顧后的原則慎重地處理，絕不能刻板地按照一種比率辦事。

積累，這是关系到國計民生的大事情，確定積累的数量，必須同時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同志在談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分配時，曾經說：“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對於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的个人收入這三方面的關係，必須處理適當，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國家要積累，合作社也要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我們要儘可能使農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sup>①</sup>這個原則，也適用於整個國家的積累基金的安排。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須以生產的不斷增長和積累的不斷增加為前提，發展生產是改善生活的物質基礎。但是，如果生產增長了，不使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相應地有所改善，只片面地注意增加積累，也是不對的。同時，還必須注意在生產發展水平不是很高的情況下，積累不能增加得過快，過快了，就有可能影響消費基金的增長，這歸根到底是不利於擴大再生產的。這樣，是不是說我們的積累的增長速度很慢了呢？不是。第一，即使積累的增長速度有幾年低一點，有幾年高一點，從長期

<sup>①</sup>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頁。



来看，我們的积累增长速度还是比資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第二，把积累的增加放在生产发展和劳动人民生活改善的基础上，更有利于調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看起来，积累的增长速度虽然慢了一点，实际上会增长得更快。

## 二

前面我們考察的是积累的货币形态，为了实现扩大再生产，积累資金必須轉化为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等物质形态，使資金和物資达到平衡。

不論什么社会，扩大再生产都是以简单再生产为基础的，只有当社会总产品在維持简单再生产以外，能够提供多余的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时候，扩大再生产才有实际上的可能性，这是一个不以人們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規律。在資本主义社会，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占統治地位，資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經常被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所打断，資本的分配和社会产品的实现，是根本不可能有計劃地进行的。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国民經济的有計劃、按比例发展，我們已經有可能比較准确地計算整个社会扩大再生产有多大的能力，并且自觉地安排資金和物資之間的平衡。

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是可以計算的。假定整个社会产品的价值不变，劳动力的数量也不变，維持简单再生产必須具备下面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是，社会总产品当中，有足够

数量的生产資料，补偿当年的生产資料的消耗。这些生产資料包括：

第一，对已經消耗完了的机器、厂房、矿井、铁路、車輛、役畜、农具等（即固定資產）的补偿部分。机器等等有一定的平均寿命（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不等），当它們消耗完了的时候就要全部更新。从一个企业、一个公社来看，它們的更新时间可能很不一致，但是，从整个国民經济来看，从一个长时期来看，每年总有一定的部分，要按比例地实行替换（例如，全国有几十万台机床，每年总有几万台要替换）。

第二，机器設備当中的周期地或部分地被消耗的部件和零件。这种替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替换机器設備当中种类相同、使用時間长短不等的部件和零件，例如，車站附近的軌道磨損得快，更換得也要快一些，远离車站的軌道磨損得慢，更換得也要慢一些。另一种，是替换机器設備当中种类不同、使用時間也长短不等的部件和零件，例如，紡紗机上的罗拉，可以用十五年左右，錠子可以用十二年左右，鋼領用六天左右。机器上容易磨損的部件和零件，看起来在整个机器設備当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它的作用却不能以比重大小来計量。由于固定資產的特点是全部参加生产过程，必須經常保持它剛剛加入生产过程时候的完整的独立的形态，一个零件替换不及，往往会影响整个机器設備的运轉。因此，为了保持生产的正常进行，必須根据部件和零件的磨損程度，按比例地加以替换。

第三，工业生产上的原料、輔助材料、



燃料；农业生产上的种子、饲料、肥料；对机器设备进行维修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等等，它们经过一个生产周期，也必须在物质形态上进行补偿。

总之，社会总产品中必须有足够的生产资料，按比例地补偿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已经消耗了的生产资料。消耗多少，就要补偿多少。生产资料是第一部类生产的，第一部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在本部类内部就得到了补偿。例如，煤炭企业供给钢铁企业以煤炭，钢铁企业供给机械制造企业以钢铁，机械制造企业供给煤炭企业、钢铁企业以机械，等等。第二部类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它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了的生产资料则必须由第一部类来供给。例如，机械制造企业要供给农业所必需的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其他农业机械，要供给轻工业所必需的机械设备；煤炭企业要供给农业和轻工业所必需的燃料，等等。这样，就要求在两大部类之间按比例地分配生产资料。根据简单再生产的要求，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所供应的全部产品，必须和第一部类本身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的第二部类已经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相等。

另外一个条件是，社会总产品中，有足够数量的生活资料，供给当年的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和其他社会成员消费的需要。供给整个社会成员需要的生活资料，既包括供给生产劳动者（工人、农民、技术人员）及其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包括供给非生产劳动者（科学、文化、艺术工作人员、国家管理人员和其他非生产人员）及其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两方面的需要虽然会经常发

生变化，但是在一定的时期，它总有一个一定的水平。维持这样一个水平，是实现简单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谈到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有些文章只提生产的消费（已经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的补偿），而不提个人消费，这是不全面的。马克思在分析整个社会的再生产和个别企业的再生产的区别时曾经指出，整个社会再生产“这个总过程，包含生产的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及其媒介的形态变化（从物质方面考察，便是交换），也包含个人的消费，及其媒介的形态变化或交换。”<sup>①</sup>个人消费看起来是在生产过程以外进行的，但是，从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来看，这种消费本身就是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生活资料是由第二部类生产的，第二部类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在本部类内部就得到了补偿。例如，农业供给轻工业以粮食和副食品，轻工业供给农业以日用工业品等等。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这个部类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则必须由第二部类来供给。例如，农业供给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以粮食和副食品，轻工业供给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以日用工业品，等等。这样，也就要求在两大部类之间，按比例地分配生活资料。根据简单再生产的要求，第二部类所供应的全部产品，必须和第一部类、第二部类

<sup>①</sup>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28页。





的生产劳动者及其家庭和整个社会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相等。

从以上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出，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哪个部类也不能孤立地发展。自觉地安排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是计划经济的根本要求。为了使第一部类所供应的全部产品和第一部类本身以及第二部类已经消耗了的生产资料能够平衡，计划工作部门首先要依靠精确的调查统计工作，计算出第一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有多大的生产能力（例如，煤和钢有多大的生产能力，机械有多大的生产能力，整个第一部类综合的生产能力有多大），同时，要计算出每一年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生产资料的消耗数量。然后，进行反复比较，使生产资料的生产 and 生产资料的消费达到平衡。对于第二部类也是一样，为了使第二部类所供应的全部产品和第一部类第二部类的生产劳动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能够平衡，也必须精确地计算第二部类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例如，能生产多少粮食、棉花，能生产多少日用工业品），同时，要计算出整个社会生活资料的消耗数量。然后，进行反复比较，使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消费达到平衡。上述两种平衡，是维持简单再生产最起码的条件，破坏了这个条件，整个社会就不能继续保持现有的生产规模。

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是社会生产最概括的分类方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两大部类又包括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等三个部门。重工业也生产一部分生活资料，而且随

着化学工业、冶金工业的发展，重工业中生产生活资料的比重有日益增加的趋势，但是，它的主要部分还是生产生产资料，应该属于第一部类。轻工业也生产一部分生产资料，但是，它的主要部分还是生产生活资料，应该属于第二部类。农业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直接生产生活资料，如生产粮食和副食品等；一种是为工业生产生产资料，如生产棉花、油料等，但这些产品仍然要变为生活资料；一种是生产直接用于农业生产和用于第一部类的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如生产种子、饲料和重工业部门所必需的辅助材料等。按照这三种情况，农业应当同时属于两个部类，但主要部分还是属于第二部类。因此，在再生产过程中，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从基本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如果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为了维持再生产的原有规模，重工业除了补偿本部门生产资料消耗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以外，就应当供给农业、轻工业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同时，农业和轻工业除了补偿本部门现有劳动者及其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外，就应当供给重工业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不可能维持整个社会原有的生产规模，自然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了。

简单再生产，实际上指的是维持上一年的生产规模。假定社会总产品中已经提供了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要消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后，就可以计算得出，整个社会究竟有



多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能够用于扩大再生产。前面我们分析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的时候，是假定积累的货币形态和实物形态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两者往往并不完全相等。就是说，资金和物资可能出现某种不平衡。因此，在确定积累规模的时候，必须仔细地计算资金的数量和物资的数量，使资金和物资达到平衡。订计划，不能只看资金有多少，主要看社会总产品中，除去维持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简单再生产和其他社会需要以外，还余下多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可以用在扩大再生产方面。有多少多余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安排多大的积累规模。积累基金归根到底要用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用于基本建设和为扩大再生产而增加现有企业的生产设备、原料和材料，即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另一个方面，则以劳动报酬的形式支付给新增加的劳动者，用于购买生活资料。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资金和物资之间的平衡，就是要求用于基本建设和为扩大再生产而增加现有企业的生产设备、原料和材料的资金和第一部类多余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相等；用于支付给新增加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第二部类多余出来的生活资料的数量相等。这种相等，不能只是价值上相等，而且要求产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在品种、规格方面符合于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拿生产资料来说，它有成千上万的品种和规格，必须质量符合要求，品种、规格齐全，成龙配套，才能进行生产。一个工厂，只有主机，没有辅机，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一台机器的制造，有时候缺少

一个配件，也不能成为成品。机器不成为成品，不仅不是扩大再生产，而且会给社会造成浪费。因此，用于基本建设和增加现有企业的生产设备、原料和材料的一部分资金究竟安排多少，还必须注意生产资料在品种、规格方面的综合平衡。

积累基金是不是全部用于当年的扩大再生产呢？不是。积累基金的大部分是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但是，必需留有必要的后备。一个个体农户，也要讲究“耕三余一”，一个国家当然更需要积蓄为防备遭受意外（例如歉收）和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所必需的后备基金。我们常常讲，作计划要瞻前顾后，就是说，不要在当年把积累统统用在生产上去，而是要有长期打算，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能够均衡地增加，要留有后备。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生产持续地、稳步地扩大。

### 三

扩大再生产，必须正确地安排生产和基本建设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时候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比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是就其基本的内在联系来看的，实际上，这样相比并不完全确切。简单再生产固然主要依靠原有企业的生产，但是，也需要进行基本建设。例如，煤矿的矿井每年总有一部分开采完了，要有新矿井代替，这一部分新矿井的基本建设，仅仅是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并不属于扩大再生产的范围；森林采伐也是一样，每年总有一部分老林区



采伐完了，要有新林区代替，这一部分为开发新林区而进行的基本建设，也仅仅是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并不属于扩大再生产的范围。扩大再生产，从长远来看，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基本建设。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旧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抗日战争以前，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在工业中，百分之七十是轻工业，重工业不到百分之三十。因此，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三年大跃进期间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基本建设，这样做是很必要的。在这个期间，我们不仅大大加强了原有的工业部门，而且开始建设了过去没有过的许多工业部门，如冶金设备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等等，使工业生产的面貌起了巨大的变化。今后，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也仍然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基本建设。但是，增加基本建设，必须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为基础。首先，进行基本建设，就需要增加劳动力，劳动力增多了，就要相应地增加生活资料的供应。如果生产技术水平比较高，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比较快，工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有一部分转移到基本建设部门，生活资料的供应相对的说，也会增加得少一些。而在生产技术水平比较低，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比较慢的情况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的是来自农业方面。因此，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看农业方面能提供多少劳动力，提供多少粮食和各种副食品

(建设轻工业还要看能提供多少生产资料)。其次，要进行基本建设，还需要增加生产资料，需要增加成套的设备，这些设备是重工业部门生产的。因此，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小，还必须看工业方面在维持现有企业的生产以外能够提供多少生产资料。生产，是基本建设的前提。我们只能在保证原有企业能够进行正常生产、并且尽可能地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根据需求和可能安排基本建设的规模，绝不能脱离工农业生产的基础，孤立地安排基本建设。

从长远来看，要扩大再生产，没有基本建设是不行的。但是，就每一年来说，扩大再生产很大部分并不是依靠基本建设，而是依靠挖掘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因为新建企业当年投入生产的总是少数，而且即使投入生产，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也需要有一个时间。马克思说过：“有多种事业，它们会在长期内取去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但不会在这期间内提供任何有效用的生产物。有多种事业，则不仅在一年间，继续地或多次地，取去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且也同样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化生产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决定前一类事业应以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害于后一类。”<sup>①</sup>如果把前一类事业看做是基本建设（这一类事业不完全是基本建设），在这里，一项工程往往要进行几年、十几年，在这个期间，它们只是占用劳动力（相应的要占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并不向社会提供产品；如果把后一类事业看做是现

<sup>①</sup>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36页。



有企业的生产（这一类事业也不完全是现有企业的生产），它在当年就可以一次或者多次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消耗转化为产品。为了使两者比例恰当，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我们在分配资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时候，就应该先满足现有企业的生产的需要，然后再安排基本建设。就是说，必须是先生产，后基建，而不是相反。生产，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由于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分配资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时候，必须首先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然后再安排工业生产。在工业生产中，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分配资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时候，必须根据农业所提供的原料的情况首先满足供给市场需要的轻工业（包括手工业）生产的需要，然后再安排重工业。

把农业、轻工业排在前面，是不是就不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了呢？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绝不是孤立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的发展，要依靠农业提供粮食、劳动力和一部分积累，要依靠广阔的农民市场，农业不发展，重工业是不可能发展得很快的。同时，重工业的发展，也要依靠轻工业供应市场更多的生活资料，满足广大人民吃、穿、用等方面的需要。没有日益增多的轻工业品供给市场的需要，不但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会影响从农村换取更多的为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农产品，影响国家积累，影响国内市场的扩大。毛泽东同志说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

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sup>①</sup>由此可见，先安排农业；轻工业，再根据需求和可能安排重工业，并不是不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了，恰好相反，正是为了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放在一个切实可靠的巩固基础上。

有些同志把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等同起来，认为不增加基本建设，或者基本建设的规模小一点，就不能扩大再生产，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实际上扩大再生产并不是一定要增加基本建设。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不增加基本建设，只要认真挖掘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现有的不少企业的生产潜力是很大的），也可以使生产进一步扩大。挖掘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方法是很多的，例如，提高劳动者的觉悟水平和技术水平；改善劳动组织；加强生产、财务、技术管理工作；提高现有的设备的利用率；进行有成效的技术革新，等等。只要把这些工作做到了，做好了，就可以使生产大大地增长。

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是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通过实践，进一步深入地掌握它的发展规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自觉地安排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平衡，促使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

<sup>①</sup>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页。



# 不違农时是领导农业

## 生产的一项重要政策

· 章 竟 ·

不違农时，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傳統經驗，也是我們党和国家领导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政策。不違农时，就是說，要保证农业生产中的各項工作按照农事季节进行，不能过早或过晚；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要适应农事季节的需要，积极为农业生产服务，决不能妨碍农业生产，当这些工作与农业生产发生矛盾时，应该主动地为农业生产让路。认真地贯彻执行这项政策，无疑是实现农业增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不違农时，这是由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产生的客观要求。农业生产同其他生产一样，都是人类改造自然、向自然界索取物质财富的斗争。但是，同其他生产比起来，农业生产与自然的关系最密切，最直接，最广泛；农业生产的过程，受着自然条件的强烈影响，带着很大程度的自然性质。正如馬克思曾經指出的：“經濟的再生产过程，无论其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总会在这个范围（农业）内，与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錯着。”<sup>①</sup>农作物是有生命的东西，不同作物、不同品种所需要的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各有各的耕、种、管、收的时宜。农业生产的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农业劳动具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强烈的季节性和時間性，农业生产过程中

的一切工作和措施，都必须根据季节、时令，根据作物所需要的气候条件，及时地进行，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过早或过晚，都要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甚至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馬克思說：“有許多生产部門，在其中，往往必須在一定的期限內，获得一定的劳动結果。这种紧急的时期，是由劳动过程自身的性质規定的。譬如一群羊剪毛的工作，又如若干亩田割麦的工作。这一类工作的生产物的分量和品质，要依存于这一件事：工作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开始，在一定的時間終了。在这場合，劳动过程所必須采取的时期，像青魚的漁期一样是預先規定了的。”<sup>②</sup>天时条件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影响农作物吸收土壤肥力的程度，促进着或阻碍着农作物病虫害的发展。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农作物的产量是由天时条件和农业技术水平来决定的；而如果农业技术不变，那末产量的多寡就是由天时条件和人們对天时条件的运用来决定。

我們的祖先，很早就認識到天时条件与

①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39頁。

②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2頁。





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懂得掌握农时的重要性。古农书中說，“四时各有其务，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时而种，則失之太早而不生，后时而莠，則失之太晚而不成。”<sup>①</sup>“順天时，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sup>②</sup>由于不違农时是生产的客观要求，是发展农业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所以历来被一些“明当世之务”的政治家視为一項重要的“富国裕民”之道。孟子說：“不違农时，谷不可胜食也”<sup>③</sup>。荀子說：“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sup>④</sup>他并把“无夺农时”作为一項富国的要策。<sup>⑤</sup>

天时条件，即風霜雨雪寒暖等等的演变，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轉移的。我們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农业生产水平，比过去是大大提高了，我們已經有了更多的改造自然的能力。随着我們对自然环境的逐步改造，例如进行大規模的植树造林、水利建設等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局部地改变大地的气候条件。在农田中修建風障、阳畦等設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土壤温度和地表空气层的小气候条件，使其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修建温室，更能够人工地为农作物的生长創造适宜的气候条件。运用現代科学技术进行的人工降雨、积雪融化等等的試驗研究，也是局部地改变气候条件的可能的途徑。但是，整个說来，我們在农业生产中还不能控制自然，控制气候，还不得不依賴于大自然的气候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适应和利用天时条件，适时耕作，不違农时，还是决定农业生产效果大小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圣人能輔时，不能違时。”对我們來說，“輔时”就是适应和利用天时演变的客观規律。要在生产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做到“爭天时”，“夺地利”，就必须順时而作，而不能違时而行。这几年連續的自然災害，給我們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一些困难，但也促使我們許多领导农业生产的同志，更深刻地認識到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强烈影响，懂得需要更好地学会适应天时条件的变化来开展生产活动和战胜災害的本領。有的地方的某些同志，不重視农时，不按照天时演变的規律办事，甚至錯誤地提出“打破旧皇历，創造新农时”的口号，随便改变播种期，不顾实际情况机械規定农活的开始和完成的时间等等，結果給生产造成严重的損失。所以，决不能以为我們有了些改造自然的能力，就輕視自然規律，違背农时，如果那样，不仅不能“爭天时”，“夺地利”，而且必然要受到“天时”的懲罰，喪失地利。

恩格斯說：“我們統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我們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仅仅是因为我們胜于其他一切动物，能够認識和正确运用自然規律而已。”<sup>⑥</sup>在农业生产

- ① 《授时通考》，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11 頁。
- ② 《齐民要术疏證本》，农业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7 頁。
- ③ 《孟子譯注》，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5 頁。
- ④ 《王制篇》。《荀子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7 頁。
- ⑤ 參見《富国篇》。《荀子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5 頁。
- ⑥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46 頁。



中認識和运用自然規律，首先就是要通过学习农民群众从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掌握农时的丰富經驗；認識天时演变的規律，学会运用这种規律适时地开展农事活动。只有各項农事活动切合时宜，不違农时，才能在生产中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达到多种、高产、多收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們要把不違农时作为一項重要的农业政策来貫徹执行的最根本的原因。

\* \* \*

在一九四二年，毛澤东同志在总结陝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經驗时，就把不違农时作为一項重要的农业政策提出。他說：“我們的第四項农业政策就是不違农时，即在农忙时允許农民停止一切无关农业的开会与动員。在陝甘宁边区环境內，农忙时期應該停止农民群众除农业以外的任何开会与动員，借以节省人力畜力，使之全部用到农业生产上去。必要的开会与动員，应当利用农隙。”<sup>①</sup>这一政策，反映了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广大农民的要求，确定了农业生产在农村工作中的首要的中心的地位，为解决农村中其他工作与农业生产的矛盾，提供了正确的指針。

凡是开展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作，都必须注意农事季节，不違农时，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一九四二年毛澤东同志在談到粮草运输問題时曾指出：“必須依靠人民运输的粮食，应早計劃，利用农暇或空脚牲口运输。非特殊情形，不准在农忙时間动員运输。”<sup>②</sup>一九四五年，毛澤东同志在談到如何争取农业生产运动的胜利时又指出：“不違农时，减少誤工，也十分重要。現在一面要

为战争动員民力，一面又要尽可能地不違农时，应当研究調节的办法。”<sup>③</sup>一九四八年，毛澤东同志又把“减少不急需的人力和畜力的动員，减少开会时間，注意农业的季节，不違农时”<sup>④</sup>作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經濟困难的一个重要办法提出。

党的不違农时的政策，不仅要求各級組織和各个部門不要因为其他工作的进行而耽誤农业生产，而且要求在农忙时从各方面組織人力参加农业劳动，帮助农民完成生产任务。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曾經提出：“当农忙时，边区軍队一律就駐地附近替农民耕种若干天，鋤草若干天，收割若干天，而不收受任何的报酬(吃自己飯)”<sup>⑤</sup>。并提出学校放生产假的办法：农忙时，农村的小学、中学必須停課，让学生及本地教員回家帮助生产。

党的不違农时政策的切实貫徹执行，是在軍事斗争极为緊張的战争年代，解放区的农业生产能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农村党政机关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組織和领导农业生产，同广大农民一道，为增产更多的农产品而斗争。这就要求我們各級干部更好地貫徹执行不違农时的政策。还应该看到，农村中各个部門都有它們自己的具体任务，它們的工作

①② 《經濟問題与財政問題》，解放社1944年版，第39、236頁。

③ 《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70頁。

④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會議的通知》。《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51頁。

⑤ 《經濟問題与財政問題》，解放社1944年版，第43頁。



都与农民、与农业生产直接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处理得好，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处理不好，注意不够，各个部門就容易片面強調本部門工作的重要性或特殊性，忽視农业生产是农村的中心任务，因为本部門工作的进行而違誤农时，因而与农业生产发生矛盾，妨碍生产。因此，根据党的不違农时的政策，正确地处理农村其他工作与农业生产之間可能产生的种种矛盾，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問題。

发展农业生产是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也就应当成为农村党政机关的工作中心。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更是农村一切建設工作发展的基础。工作脫离生产，就会在政治上脫离群众；因为其他工作的进行而耽誤农业生产，就会使其他工作丧失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农村中的其他工作，包括工业交通工作，財政貿易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政机关的工作，各种群众团体的工作，都是圍繞着发展农业生产这一中心任务并为这个中心任务服务的，因此，都必须服从农业生产的需要，做好部門工作，以自己的业务支援农业，而决不能相反。各个部門在农村举办各种事业，必須严格控制，办哪些，办多少，都要从有利于农业生产出发；并且必須深刻了解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在不誤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不办，决不能事事強調专业化，經常占用一大批人力、畜力、物力，事事限期完成，影响甚至挤掉农事活动时间。在农忙期間，农村中應該停止一切妨碍生产的會議，也不要任意抽調基层干部到上面来开会或进訓練班，以免違誤农时。經驗证明，在农忙季节停止一切

妨碍生产的會議和动員，把有碍生产的其他工作减少、推迟甚至取消，实在不能推迟或取消的必須結合生产来进行，这样做，其最后的结果，并不是妨碍这些工作的开展，而恰恰是为它們的不断前进和順利发展准备条件。因为只有农业增了产，物力、財力才能充足，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政治热情才能提高，举办其他事业和进行其他活动才会既有較好的物质条件，又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所以，这样做，看起来其他工作的进展似乎慢些，其实并不会慢，反而会快些，是真正的快。

因此，應該說，根据党的不違农时的政策来正确处理农村其他工作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和矛盾，不单是为保证农业的发展所必需的，也是为保证整个农村工作和整个建設事业的发展所必需的。认真地貫徹执行不違农时的政策，不单是农业部門的責任，也是各个部門、全党全民共同的責任。

\* \* \*

为了保证不違农时，促进农业增产，除了需要經常注意調节农村其他工作与农业生产的矛盾，使其他工作主动为农业生产服务、給农业生产让路以外，就农业本身的领导來說，也还有些問題值得注意和研究。根据历年来的經驗，主要是：要深入地研究当地农业生产的特点，改进对生产的领导方法；保证生产第一綫有足够的劳动力；一切耕作措施的采用，都要以不違农时为原则；生产的准备工作特别是生产資料的准备和供应工作，要走在农时的前面；要向困难处打算，多准备几套克服困难的办法，根据天时



变化，随机应变。

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不一样，农事季节也各不相同，具体农时的差异就更大。这就决定了，在领导农业生产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和农时的差别性和复杂性，不能千篇一律，用简单的行政命令办事；需要尊重基层生产单位在安排和指挥农事活动方面的自主权，不能管得过多过死。干部领导生产的主要职责，应该是通过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调动广大群众和基层生产单位的生产积极性，通过调查研究 and 典型试验，帮助下解决生产关键问题；而不是对下面的农活安排和生产措施等等进行不必要的干涉，更不准瞎指挥。有的社员说得好：“种庄稼要看节令，不能等命令。”农业生产的工序，也是一环套一环的，常常是：一处打乱，处处受牵连，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指挥下面的农事活动，就不可能照顾到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和农时的差别性和复杂性，就不可能符合生产的实际需要，因此，也就很容易打乱农业生产的正常的工序和基层生产单位的农事日程安排，造成违误农时。

应该看到，经过千百年的生产实践，各地农民对于如何使耕、种、管、收等农活安排适合时宜，都有一套传统的经验和习惯。一般说来，他们的经验和习惯是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相适应的。只要善于尊重他们的经验，不随便打破或打乱他们对农活的日程安排，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可能做到使生产上的各个环节都切合时宜。农民群众掌握农时的某些经验和习惯，如果由于条件有了变化，确实需要加

以改进或改革，在改革时，也需要十分慎重。应该经过群众讨论，根据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先作典型试验，确实成功后，再根据群众的自愿，逐步推广，决不允许主观主义地进行这种改革，或者还没有充分的把握就贸然推广，以免违误农时，给生产带来损失。

党的不违农时的政策，要求我们对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对当地农业生产的特点，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更好地改进领导方法，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倾向。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多下工夫，做认真的努力。

使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是保证农事活动不违农时的头等要素。特别在农忙季节，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工作，这时劳动者的人数更具有决定的意义。马克思曾经指出，“劳动时间的短，可以由紧急时期投在生产场所内劳动量的大，补救起来。在这场合，不错过时间的结果，有赖于多数结合劳动日的同时的利用，效果的大小，则依存于劳动者人数。”<sup>①</sup>根据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力状况，为了保证不违农时，在农忙季节，必须使农村整半劳动力集中用于农业生产第一线。在夏收夏种、秋收秋种等大忙季节，有些机关、部队还需要抽出部分人员参加一定时期的劳动。农村的中、小学，仍应当实行放农忙假的制度。农业中学要实行农忙劳动，农闲开学的办法。总之，要使用于田间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足以适应农忙季节抢种抢收等紧急工作的需要。就是在非农忙季节，也要保证积肥等生产活动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2页。



所必需的劳动力。

因时制宜地采用各种耕作措施，也是保证不違农时的一个重要环节。任何耕作措施，只有运用得适合时宜，才能收到增产的效果。例如，种植某种高产作物可以增产，但如果种得过多，就会使耕、种、管、收各项农活过于集中，在现阶段基本上还是靠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就容易因忙不过来而違誤农时，給生产带来损失。水稻合理密植可以增产，但密植要多用工，如果密植与搶季节发生矛盾，使插秧时间拖长，不利于搶季节的时候，一般說，与其因孤密植而耽誤季节，就不如让密度服从季节。耕作制度的改革也是如此。在劳动力充足，气候等其他条件也具备的地方，适当提高复种指数，例如把单季稻改为双季稻，有利于增加产量。如果在劳动力不足或者气候条件不适宜的地方也随便改，就容易在早稻收割和晚稻插秧期間違誤农时，以至作物不能正常生长成熟，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因此，采用一切耕作措施，都必须因时因地制宜，以适合当地条件和不違农时为原則。

“力田之資，必先于利器。”在农忙季节到来以前，及早把必需的生产資料准备齐全，不仅数量足，而且质量好，这是提高劳动效率、耕作不誤农时的物质保证。“闲时置下忙时用，莫到临渴再掘井”，这是我国农民的固有經驗。生产資料的准备，应该是冬为春，春为夏，夏为秋，只能叫生产資料等节令，不能叫节令等生产資料。不仅要一般的、風調雨順时所需要的物质准备，而且要做特殊的、应付各种自然灾害的物质准备。有准备，才有工作的主动权。許多生产資料是靠工业、商

业、供銷部門供应的，这就需要这些部門的同志能够以农时为重，使自己的工作与农事季节的需要相适应，使生产資料的供应走在农事季节的前面，而不要落在它的后面。

風雨不調，旱涝成災，是农业生产經常遇到的困难，也是常常造成違誤农时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我們根据党一向提倡的“向坏处打算，向好处爭取”的精神，多設想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多掌握一些克服困难的办法。这样，就不致在遇到自然灾害时束手无策，陷于被动。各地的农民群众，都有許多抗御自然灾害、根据天时条件随机应变的生产經驗。例如，在易旱、易涝的地方，选择种植耐旱、耐涝的作物或品种；在作物的种植安排上避开易于发生水旱灾害的季节；在稻田水源不足、遭受干旱的情况下，及时改种旱作物，等等。农民的这些經驗，大都是在过去的个体經濟条件下形成的，現在我們有集体經濟的优越条件，应该更好地运用和发展这些經驗。只要我們善于同群众商量，特别是向富有生产經驗的老农請教，就能够找到对付各种災情的有效办法，做到不誤或少誤农时，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爭取較好的收成。

\* \* \*

現在隆冬已过，大地春回，春耕农忙季节已經到来。“春者，岁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时有成。”就是說，一年之計在于春，春季抓紧农时，及时耕作，将为以后各季和全年生产打下良好基础。显然，在这时候，认真地宣傳和貫徹执行党和国家的农时政策，就更加重要。





# 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 林 一 舟 ·

一个革命者，一定要有远大的奋斗目标，看到光明的前途，树雄心，立壮志，有实现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如果胸无壮志，就不会有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坚强的革命毅力。但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实现革命理想，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一点一滴地做好当前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具体问题。毛泽东同志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sup>①</sup>我们一定要把雄心壮志和踏实苦干结合起来，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才能把革命理想变为现实。

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措施。这是扎扎实实做好工作的第一步的要求。就如修建高楼必须首先勘察地基、打好基础一样，如果地基没有勘察清楚，基础没有打好，上面的砖瓦垒得再好，这座楼房也不会巩固。我们在革命和建设当中每前进一步，都必须脚踏实地，才能快步前进。如果没有摸清现实情况，两脚没有踏在实地上，对于现实情况做了过低或者过高的估计，就不可能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措施，也就不能顺利前进。毛

泽东同志在谈到军事斗争的时候曾经说过：“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需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sup>②</sup>在建设时期进行工作也是这样，必须恰如其分地了解实际情况，把根扎在实实在在的基础上，才能掌握主动权，才能取得工作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除了进行各项工作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以外，每项工作还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对于不同战线、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同志来说，决不是只懂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几条普遍规律就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的，还需要真正摸清自己所担负的工作的特殊规律。这不是别人所能够代替的，不是坐在房子里可以想出来的，也不是走马观花地看看表面现象就能够真正懂得的，而必须深入到工作当中，切切实实地下苦工夫。进行工作，就是要不断地解决矛盾，

①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66页。

②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03页。



而矛盾都是具体的，必須深入到事物里面，一个一个地进行具体分析，才能使一个一个的矛盾得到解决。毛澤东同志說：“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細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問題、解决糾紛、处理工作、指揮战争）。这样的做法，沒有不出乱子的。”他又說：“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我們必須时刻記得列宁的話：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sup>①</sup>要深入地了解具体情况，对于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摸清每一項工作的具体規律，沒有扎扎实实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問題要一个一个地去了解，还要一个一个地去动手解决。工作要一件一件地摸清情况，还要一点一滴地去做。建設社会主义的偉大事业，是由許許多多的具体工作組成的。任何一項工作的成就，又都是由一点一滴的成績积累起来的，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問題的結果。一件具体工作沒有做好，一个具体问题沒有解决，就可能影响到工作的全局。一座高樓缺一磚一木，就会影响它的巩固，一架机器缺一个螺絲釘就不能准确運轉甚至不能开动。有些工作看来是很細小的，然而，如果忽視它，不屑去做，或者不采取認真的态度，不願在这些細小的工作上下工夫，就不会有大的成就。列宁曾經說过：“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須从小事做起。”他又說：“另一方面，‘大事业’成功之后，推翻資本家私有制并把政权交給无产阶级的政治变革实现之后，要在新基础上建設經濟生活，又只能

从一点一滴做起。”<sup>②</sup>一点一滴地、扎扎实实地做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把每一件工作都做得实实在在，經得起時間的檢驗，經得起風浪的吹打，就是为我們的偉大事业做出了可貴的貢獻，就为繼續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真正了解情况，切实解决問題，取得任何一項成就，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奏效的，而必須依靠經常的細致的工作。有了經常的細致的工作，了解情况才能逐步深入，逐步接近于客观实际。客观規律是能够被認識和掌握的，但又不是很容易認識和掌握的，必須依靠长期的反复的实践，一步一步地提高認識，在經常工作中一点一点地积累經驗。而且，客观情况总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必須經常地注意了解，否則，認識就会落后于客观实际。許多小問題、小缺点积累起来，就会成为大問題、大缺点，給工作增加更多的困难，甚至造成損失。有了經常的深入細致的工作，及时地總結和推广經驗，及时地解决問題、糾正缺点、克服困难，就能使我們的工作更順利、更健康地向前发展。有些工作，是需要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有些工作是需要临时突击的，但是，群众运动，突击工作，也必須以經常的深入細致的工作做基础。有的同志，有的单位，不注意建立經常工作，不注意在經常工作中积累經驗，联系群众，而只热衷于突击工作，以为

① 《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1、305頁。

②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創造新制度》。《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5頁。



只靠突击性的群众运动就可以把事情办好。实际上，如果没有经常工作，不把经常工作做好，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突击工作也不会取得好的效果。我们党过去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开展了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能够搞得那样好，就是广大干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的工作的结果。开群众大会，斗争地主，并不需要多少时间。而要把群众大会开好，把地主彻底斗倒，事前却需要用很长的时间调查情况，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队伍。经过这样深入细致、一点一滴的工作，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才取得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效果。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组织互助组一直到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则是经过了更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工作的结果。在当前和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应当进一步发扬这种优良作风，扎扎实实地做好经常工作。

先做典型试验，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广，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进行工作，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工作方法。在土地改革中，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过程中，我们党坚持了这种工作方法，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经验证明，这是把工作做得更加扎实的正确方法。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复指出：“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sup>①</sup>。在建设时期，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应当这样。凡是沒有把握的、沒有成熟经验的事情，都应当先经过典型试验，取得经验，对于原定的计划加以补充修正，做好准备，然后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这样就能够更大的范围内把工作

做得更好。从教育和发动群众方面来说，由于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总是最相信自己看到的、亲身体会到的东西，因此，做出活的榜样给群众看，是最有说服力的。列宁在谈到号召农民组织起来的时候曾经说：“农民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因此他说：“要实际地说服农民。农民不会相信空话，他们这样做是很对的。要是他们一听到法令和传单的内容就相信，那倒不好了。假使这样可以改造经济生活，这种改造是一钱不值的。”<sup>②</sup>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成功的经验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

一点一滴地做工作，一切经过试验，是否太费事、太麻烦了呢？工作会不会进行得太慢呢？当然，我们做一件工作，总是希望少用一些时间和力气，做得快一些，总是希望一帆风顺，不走弯路。而在实际工作中，却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想省事，倒费了事，怕小麻烦，倒引来了大麻烦，想走直路，倒走了弯路，开头看来是快了，结果是慢了；一种是，开头费了工夫，以后就大大省了工夫，开头做了麻烦事，以后就减少了麻烦，开头走了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以后就很顺利了，开头看来是慢了，结果是快了。问题在哪里呢？需要进行具体分析。现实的客观可能性，本来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如果我们制定的计划措施低于这种可能性，经

<sup>①</sup>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232页。

<sup>②</sup>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2、183页。



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事情也认为不能做到，不努力去做，工作就会进行得很慢。相反地，如果我们制定的计划措施超过了现实的可能性，主观上想快一些，也是不可能的。只有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从实际情况出发去做工作，才能做出成绩，才有真正的快。同时，客观事物本来是极为复杂的，进行革命和建设本来是很费事的，是有很多麻烦的，是需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的。如果我们采取简单的方法去处理复杂的事物，怕麻烦，图省事，只想走直路，就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最后还必须回过头来一点一滴地去做那些麻烦事。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sup>①</sup>。我们的工作，应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分析去做。还应当看到，凡是有关群众的工作，只有群众行动起来了，群众前进得快了，才是真正的快。列宁曾经说过：“同农民群众，同普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并开始向前移动，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sup>②</sup>我们要一点一滴地去做工作，要一切经过试验，就是要把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使群众自觉自愿地行动起来，这样表面看来似乎是慢，实际是快，而且会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加扎实牢靠。

一点一滴地做工作，表面上似乎并不轰轰烈烈，实际上却能够真正深入地了解情况，深入地发动群众和教育群众，取得切切实实的效果。相反地，只有轰轰烈烈的形式，却

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讲求实效，不图虚名，这是我们应当具有的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一点一滴地做工作，也有些时候并不能很快地看到多么显著的成绩，但是，伟大成绩的取得，只能这样一点一滴地做准备，一点一滴地积累。这样取得的成绩才是巩固的，经得起检验的。

一点一滴地做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完全不同于工作中的事务主义。事务主义的工作方法，一般表现为整天价被琐碎的事务缠身，忽视思想、政治和政策问题；把很多事情平列起来，分不清轻重缓急，分不清主次，没有计划，碰到什么做什么，甚至“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抓不住主要问题，缺乏明确的方向；只知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却不能从个别看到一般，不注意寻找工作中的规律，不能指导一般；事无巨细，自己都包揽起来，不注意组织大家做工作，发挥集体的作用。我们前面谈到的要扎扎实实地做工作，显然是和事务主义完全不同的。在我们的工作中，应当把这两者区别开来。

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sup>③</sup>我们要进一步发扬扎扎实实的精神，用辛勤的劳动，一点一滴地做好当前工作，做好经常工作，以逐步到达理想境界。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90页。

②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8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 进 一 步 加 强 成 本 管 理

· 趙少平 ·

加强成本管理，不断降低产品成本，是我国工业企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产品的成本，包括生产产品时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工资和工资附加费用、企业管理费用、车间经费等项费用。降低产品成本，就是要求企业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生产同量的产品时，节约各项费用，耗费更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工业企业降低了产品成本，就能够以同量的原料、材料、燃料和劳动的耗费，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更好地供应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必须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制度。经济核算制度要求企业以销售产品

的收入，弥补生产产品的耗费，并且取得赢利。企业产品成本降低了，以同样的价格销售产品，就可以取得更多的利润，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我国积累的主要部分，是来自国营企业的上缴利润。所以，降低产品成本，还可以为整个社会和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创造有利的条件。如果企业不注意节约，产品成本过高，这个企业所

得到的利润就会很少，甚至会发生入不敷出的亏本现象。企业出现了亏本现象，不但没有为社会创造新的物质财富，而且，还损耗了社会已有的一部分物质财富。这种情况，对整个社会和企业的生产，都是十分不利的。

企业厉行节约，不断地降低产品成本，体现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为企业降低产品成本，提供了客观条件。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职工群众是企业的主人，他们很关心产品成本的降低。社会主义企业，不存在竞争和垄断，技术的发展具有广阔的道路。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企业可以做到节约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同时，一个企业降低产品成本，还能够取得其他部门、其他企业的密切协作。凡此种种，都使企业降低产品成本，具有巨大的可能性。企业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做好工作，变可能性为现实性，以达到不断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

降低产品成本，是一件很复杂很细致的工作，它要求企业必须加强成本管理。过去十多年来，我国工业企业在成本管理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十分宝贵的，我们必须认真总结，以便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精打细算，将成本管理工作做得更好。

有一种思想认为，只要产量增加了，不必加强成本管理，产品成本会自然降低。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当然，产量增加了，企业有一些费用，例如企业管理费用，不一定相应地增加，因而可能引起产品成本中这方面费用的降低。但是，随着产量的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的消耗也会增加。企业如果只抓生产，不抓成本管理，只顾增加产品产量，不





愿降低各种消耗，产品成本不但不会降低，反而可能提高。如果做好成本管理工作，产品成本就可能降低得更多。因此，越是在产量增加的时候，越要注意降低产品成本的工作。

有的企业在降低产品成本中，不注意保证产品的质量，这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求的降低产品成本，是以保证产品质量为前提的，绝对不是不顾产品质量，为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如果这样做，从一个企业看，在某种情况下，好像是产品成本降低了，但是，结果却使消费者蒙受经济上的损失，给生活带来不便。质量不好的产品，出售给其他企业作为生产资料，就会影响其他企业的生产，以致给整个社会造成浪费。当然，在保证产品质量同降低产品成本之间，有时是有一定矛盾的，但是，企业在降低产品成本时，也充分重视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工作，企业的产品生产，仍然可以达到成本较低和质量较高的要求。这里重要问题是，要千方百计地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

我们不仅要在生产比较顺利的时候，做好产品成本管理工作，而且，在生产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必须做好产品成本管理工作。企业生产遇到客观困难，的确会影响到产品成本的降低。可是，企业如果加强成本管理，不断挖掘内部增产节约的潜力，不仅可以降低产品成本，而且也有利于企业克服生产上的困难。正是因为生产上有困难，恰恰更需要加强成本管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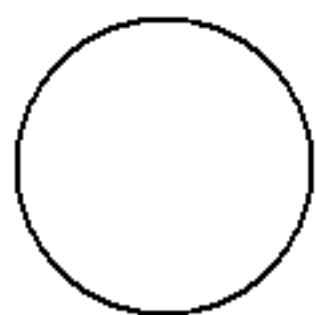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工业企业降低产品成本，不只是一个企业的事情。全民所有制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企业和企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就要求企业的主管部门，必须根

据需要和可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计划，保证对企业资金和生产资料的按时供应，并且在企业和企业之间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这一些，乃是企业完成降低成本计划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从企业本身来说，为了加强成本管理，首先要正确地制定生产、技术、财务等计划，根据设备、原料和材料的可能条件，安排产品的生产。如果企业的生产计划制定的不切合实际，不但不能降低产品成本，而且可能出现某些原料、材料供应不及，积压大量半成品的现象。这对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企业在加强成本管理中，根据企业的生产、技术、财务等项计划，要切实做好成本核算工作。为此，企业应该健全会计制度。马克思说，“个别商品生产者，单是在他的头脑中作簿记”，但是，生产“过程愈采取社会的规模，愈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簿记——当作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就愈成为必要。”<sup>①</sup>企业应该健全财务会计机构，保证配备必要数量的专业财务人员，并且不断提高这些人员的业务水平。企业的财务会计工作人员，必须建立和健全账簿组织和账务手续，按时做好记账、算账、查账和报账的工作；坚决改变账目不全、不实和手续不清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提供准确的数字资料，将企业的成本核算放在可靠的基础上。

企业有多种多样的费用，各种费用性质不同，资金来源不同。哪些应该计入产品成本，哪些不应该计入产品成本；哪些应该一次计入，哪些应该分期计入，国家都有严格

<sup>①</sup>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3、145页。



的規定。為了正確進行成本核算，企業應該嚴格按照國家關於成本開支範圍的規定辦事。一般說來，同產品的生產本身沒有直接關係，和不應該通過產品成本項目進行補償的費用，都不得列入產品成本。例如，企業的基本建設費用、文教費用和企業經營農副業生產的費用，很显然不應當計入產品成本。不是屬於產品成本開支的，也列在產品成本項下來進行補償，人為地擴大產品成本，就會歪曲了產品成本的真實內容，不利於企業產品成本的核算。更重要的是，這樣，就會減少甚至擠掉應當上繳的利潤，從而影響國家有計劃地進行資金的積累和分配。在生產多種產品的企業中，動力費用、企業管理費用等，是各種產品共同支出的。為了保證產品成本的準確，應該按照不同產品的實際耗費和有關規定，來合理地分攤費用，防止簡單地平均分攤。

在正確地進行成本核算的同時，企業應該做好成本計劃和成本分析工作。企業的成本計劃，要按年度、季度、月份分別制定；計劃提出的降低產品成本的指標，要積極可靠。企業在執行成本計劃中，要加強檢查分析工作。企業的廠部和車間，需要經常開展綜合的和專題的成本分析，通過成本分析，發現問題，以便挖掘潛力，規定有力的措施。

在我國大多數工業產品的成本中，原料、材料、燃料等物資消耗，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加強物資管理，節約物資消耗，是降低產品成本的主要方面。在生產中降低物資消耗，必須避免大材小用，優材劣用，並且合理地回用、代用和利用邊角廢料，充分發揮物資的作用。對機器設備，企業應當加強維

護檢修，適當地提高機器設備的利用率，以減少單位產品中的折舊費用。在物資的運轉、貯存方面，大力防止物資的損耗變質和節約有關費用，往往對企業降低產品成本，發生很大的作用。企業應該加強同運輸部門的協作，改進運輸管理，並且在企業內部，認真做好倉庫、料場的保管工作。為了避免物資的積壓浪費，保證物盡其用，企業在采購物資時，從生產和貯備的實際需要出發，結合資源的客觀條件，應該加強計劃性。目前，各工業企業必須認真清查積存物資，以充分發揮物資的潛力。為了加強物資管理，企業在有關的各個環節，要建立和健全一套規章制度，例如領料、退料制度等；做好檢驗、計量、核算、盤點和原始記錄等工作，達到賬實相符，家底清楚。

降低產品成本，還要求企業充分重視節約活勞動。在這方面，最根本的問題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就可以做到消耗同量的勞動，生產更多的產品；或者生產同量的產品，消耗更少的勞動，從而節約產品成本中的工資開支。提高勞動生產率要求企業必須加強勞動管理，充分發揮勞動力的作用。在企業中，人浮於事是一種嚴重的浪費現象，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着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和產品成本的降低。所以，企業必須根據生產任務的實際需要，節約使用勞動力，精簡一切不必要的人員，努力降低行政管理人員和服務人員的比重。這樣做，不但可以避免勞動力的浪費，而且也可以節省企業的開支，特別是非生產性費用。在這里，必須反對那種認為人多好辦事的錯誤思想，企業應當爭取以更少的人力，做好更



多的事情。

生产中的物资消耗和劳动消耗的多少，同生产的技术条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生产中，不断地改进技术，是降低产品成本的物质前提。因此，根据需求和可能，企业应该积极地开展技术革新的工作。技术革新和推广先进技术，要采取慎重的方针，在做好反复试验和科学鉴定工作的同时，企业的生产技术人员和财务人员要密切配合，在经济上进行切实的核算，以求真正做到技术上先进和经济上节省。

加强定额管理，是降低产品成本的重要手段。企业应该根据已经达到的水平，按照平均先进的要求，制定和修改各种物资的消耗定额、储备定额、劳动定额和管理费用定额等等。定额确定以后，最重要的是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定额办事，防止超定额的消耗，并且进一步争取定额内的节约。

从上面看来，加强成本管理牵涉到企业许多环节的工作，它不仅仅是企业财务部门的事，也同企业的生产、技术、劳动、供销等部门的工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加强成本管理，要求企业的各个环节，要保证做好有关工作，并且相互之间，要取得密切的配合。同时，这种情况还要求工业企业，必须加强各个专业机构和专职人员的责任制度。有了严格的责任制度，事事有人负责，才能堵塞漏洞、防止浪费，保证产品成本的降低。严格贯彻责任制，在企业领导上和不同部门之间，应该尊重各专职人员的职权。同时，各专职人员也应当坚持原则，敢于负责。例如财务会计人员，对于一切不合制度、不符手续的开支，必须坚决拒绝支付和报销。

对于违反财政纪律的行为，财务会计人员有权越级上告。为了加强责任制度，需要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做到奖罚分明。

广大工人群众是企业的主人，他们直接从事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物资和劳动的节约，都要通过他们去实现。因此，企业加强成本管理工作，必须贯彻群众路线，通过深入的细致的工作，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制定成本计划和各项生产定额，要发动群众讨论。降低成本的指标，要落实到车间、工段、小组，有的甚至落实到个人。在专业管理的指导下，班组在核算产量、质量的同时，对物资和工时的消耗，也要进行核算和分析，并且在这方面开展竞赛和评比。

加强成本管理工作，要求企业的全体职工群众，发挥高度的当家做主的责任感，十分爱惜国家财产，坚决反对一切浪费。因此，在切实做好细致的经济工作的同时，需要加强经常性的思想工作。要在职工群众中，树立一种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风气。克勤克俭、厉行节约，是经营企业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sup>①</sup>只有在企业的全体职工群众，对这个方针有了切实的领会，并且在行动中坚决贯彻执行的情况下，企业才能不断地降低产品成本，促进生产迅速发展。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页。



# 自然科学和实际应用

何祚庠

在自然科学史上，关于自然科学和它的实际应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历来争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有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为科学而科学”，主张研究所谓“纯粹科学”，反对科学的实际应用，认为讲究科学的“应用价值”是一种“功利主义”。另一种是狭隘的实用观点，主张一切科学工作都仅仅从属于某些狭隘的实际目的，轻视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工作的的重要性。这两种观点，都是各执一端，因而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并将自然科学的发展引入歧途。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sup>①</sup>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研究自然科学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也就是说是为了实际应用。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常常会发现自然科学理论中的缺陷和不足，从而又推动自然科学的研究。反过来，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学说对于客观的反映愈加正确、深入和适用的范围愈普遍，也就愈能获得广泛的应用价值。“为科学而科学”论者的错

误，在于割裂了真理和应用之间的联系，并在科学实践上否认自然科学的应用价值，否认改造客观世界的极端重要性。狭隘的实用观点的错误，在于不了解自然科学中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因而在科学实践上忽视系统研究理论的必要性。如何正确认识自然科学和它的实际应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我国具体条件下，研究自然科学的目的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是说，是为了实际应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自然科学研究中认识客观真理和实际应用之间存在着若干复杂的联系，必须避免使自然科学的研究单纯地从属于若干眼前的、狭隘的实际目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科学总是适应于一定的社会需要而发生发展的，离开了这种社会需要，科学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社会需要其中特别是生产实践的需要，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推动力。恩格斯指出，“社会方面一旦发生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数个大学更加把科学推向前

<sup>①</sup>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0—281页。



进。”<sup>①</sup>这个论点也完全适用于现代科学。例如，在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原子核物理只是世界上少数实验室进行研究的学科。到了四十年代，由于发现了原子能的实际应用，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其中特别是中子物理的研究，才如雨后春笋一般地茁长起来。这些年来，从理论到实验结果，都有重要的进展。又如，等离子物理的研究，在过去只有少数天体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对它发生兴趣。很多物理学家甚至对等离子体这一名词也是较陌生的。然而一旦阐明了等离子物理和可控热核反应之间的联系以后，很快就引起了科学界比较普遍的重视，科学杂志上关于等离子物理的文献，在数量上便有几十倍成百倍的增加。由此可见，科学的发展，主要是由它的应用价值来决定的。对于科学工作的评价，主要也是由它在实践上所起的作用来确定的。忽视或者轻视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就会削弱自然科学和生产实践之间的联系，从而也就削弱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因此，对于我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必须强调研究自然科学的社会目的性，将自己的科学工作贡献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那末，我们强调自然科学工作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功能，是不是如“为科学而科学”论者所批评的那样会流于“功利主义”呢？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功利主义”。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

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sup>②</sup>毛泽东同志这段话虽然是针对文艺工作，对文艺工作者讲的，同样，它也完全适用于自然科学工作。

从哲学上说，“狭隘的功利主义”在思想倾向上属于庸俗唯物主义，其特点是着眼于若干狭隘的实际目的，而忽视对于一些远大目标的追求。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只要是按照严格的科学方法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前提是经过严格考核的，论证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小心推敲过的，并经过一定的实践检验，那末这类科学工作也就能在这方面或那一方面有所贡献，或迟或早地发挥出它的社会功能来。自然科学，只要它是客观真理，就一定具有应用价值。人们只有对自然科学研究得愈深入，也才愈能认识它的应用价值。这是因为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它的实际应用之间有较复杂的联系，如果把这种联系简单化了，就不能全面地来理解自然科学的社会功能。

社会生活对自然科学的需要是多方面

① 《致亨·施塔尔肯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字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504页。

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6页。





的。除了当前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外，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会不断产生新的实际需要。这种实际的需要和科学工作之间的联系，常常不是一眼就能看清楚的。

举例来说，天文学的研究乍看起来似乎是容易“脱离实际”的。宇宙中的星球，可能离开人们有好几万万光年。但天体上却有地球上难以做到的热核反应过程。作为近代的尖端技术之一的可控热核反应的研究，常常需要查考天文学上的资料。而所谓热核反应这个观念，也首先是由天文学的研究中得出的。特别是在星际航行的时代，假如离开了天体力学的精密计算作为先导，就没有可能实现任何星际航行。

社会生活对自然科学还有若干长远的根本的需要。在科学发展的一定的时期，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常常会酝酿出对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一些重大科学课题。这些问题总是很复杂、很困难的，以致于不可能期望它在短期内获得解决。但由于这些长期的根本性的问题对于人类发展前途将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仍应分出一部分力量来进行研究。例如，关于新型能源的利用问题，就是这类基本问题之一。就目前地球上所发现的石油和煤的蕴藏量来看，很多人估计只能够供人们数百年的使用。即使加上铀、钚等原子燃料，也不过多延长若干时间，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而像可控热核反应等一类问题的研究，便成为十分重要的了。虽然这类问题的解决是很困难的，但这无疑是科学上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在科学工作中，我们除了要看到今天的和明天的实际需要以外，还应看到社会生活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的需要。在自然科学工作中，有许多理论研究并不以某一生产部门，某一实际问题为对象，而是以发展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为直接的目的。初看起来，似乎这些理论的研究是和实际问题无关的。然而仔细分析一下便可以看出，许多实际问题的彻底解决却有赖于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特别是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的解决，就能为许多生产部门带来实际利益。

量子力学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量子力学所探讨的是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初看起来，似乎量子力学的研究只是为了解决粒子和波动的二重性这一类理论问题而已。然而随着量子力学基本原理的解决，便在技术上引起了一系列的革命。不论是在原子能、半导体或光量子放大器等等新技术中，都离不开量子力学的指导。显然，量子力学的原理对于今后许多技术问题的解决，还将继续起着原则性的指导作用。

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对于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不只是对于明天的或是后天的问题的解决，要取决于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且在我国目前所碰到的许多重大的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就有许多急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sup>①</sup>。恩格斯的这段话是特别值得我

<sup>①</sup>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4页。



們重視的。

自然科学理論的研究有一系列重要的特点。第一，在理論研究中，要求从大量的資料出发，因而有許多工作是以系統搜集某一方面的材料作为它的直接目的，以便在这些資料的基础上发展理論研究。例如，各种化合物性能的測定，物理常数的測量，植物譜系的編制等等。这类工作的特点，在于要求材料的完备性。很难說这一部分的材料是有用的，而另一部分材料是沒有用的。这类工作要求以整套資料作为一个整体，供应各方面的需要。在各种实际工作中，常常离不开查考这类資料。

第二，在自然科学理論研究中，还有一类工作，其直接的目的是发展一种新的研究工具或新的实验技术。在现代科学研究中，这方面的工作是很重要的。科学史上常有的情况是，随着一种新的研究工具的出现，就有一門新的科学領域随之而出现。例如，原子核物理的发展就和加速器的研究分不开，而晶体結構的研究就直接取决于X光技术和中子衍射技术的发现。在实验工作者中，常常极其重視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因为工具的改善往往能极大地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

第三，在自然科学理論研究中，有大量工作以直接发展某一种理論为目的。理論研究的特点，便是要求严格的证明，因而有大量的科学工作是为了严格证明某一理論、某一思想或某一結論。这在科学史上可以找出不少的例子。一个新的科学思想已早在酝酿之中，但是为了要确切地证明它，却常常要

花費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工夫。在流行的科学文献上，特别是基本科学的研究里，有很多的工作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做实验工作的同志常有的一种体会是，一个实验做起来可能只要一、二个小时就够了，但是仪器的校正，性能的考驗，数据的处理等等，却要花上几个月、几年的时间。这些工作都只是为了严格地证明某一思想、某一理論而已。在科学工作中，在“严格证明”上所耗費的代价是必須付出的。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們的科学工作經得起历史的批判，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还有一类专门以建立科学体系为目的的研究工作。初看起来，似乎有点“形式主义”。例如，把牛頓力学写成拉格朗日的形式或哈密頓的形式、泊松括弧的形式等等。在量子場論中把薛丁格表象换成海森堡表象或相互作用表象。这些不同形式的算式，实际上是完全等价的，有些形式甚至比原来的形式写得更复杂，利用它們来求出解答时也更不方便。但是，这类工作的意义在于它能发展出新的体系。例如，量子力学的发展和泊松括弧有紧密的联系。量子場論的发展，要借助于牛頓力学中的拉格朗日形式和哈密頓形式。量子場論中相互作用表象的引进导致重正化理論的发现，海森堡表象却是“色散关系”理論的出发点之一。

第五，还有一类工作是对所謂“典型”問題的研究，也就是常常在一类問題中抽出一个典型进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典型的选择往



往决定于它的简单明确，而不是它的实用可能。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力学中，人们花了很大的力量去研究圆柱薄壳在轴向压力下的失稳问题，就是因为它是非线性“曲屈”理论的典型。在实际结构中谁也不会用纯粹的圆柱薄壳，而是用加筋薄壳；因而理论并没有直接的用处。然而典型搞清楚了，一大类有关的问题也就清楚了。

在探讨自然科学的应用价值时，除了看到它们有各种不同的作用以外，还必须看到各种性质的工作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由研究抽象的理论问题所得到的结论，可能在最实际的问题上有重要的应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也会提出若干需要解决的高深的纯理论问题。若干长远的根本性质的工作，常常是在某些迫切需要的实际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研究远期需要的理论课题的同时，却可能发展出若干新的实验技术，同样为某些实际工作所必需。正因为自然科学研究中存在着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

联系，因而也就为正确解决自然科学和实际应用相互关系的问题增加了复杂性。把这种复杂关系设想得简单化了，就会抹煞一些重要工作，把它们贬为没有价值，而这将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但是，在正确解决自然科学和实际应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时，仅仅看到自然科学有各种可能的用途这一点，也还是不够的。实际生活对于自然科学虽有多方面的需要，但在不同需要之中，仍有轻、重、缓、急的区别。在自然科学理论研究之中，也有主要、次要之分。有些理论问题是带有关键性的，它的解决常常涉及一大片其他科学问题的解决；而有些问题却是个别性的枝节性的问题。自然科学工作者首先应该把他们的精力集中在那些重大的问题上，但另一方面又应对于各种性质的工作作出适当的安排。总之，要使我们的科学工作既能保证目前需要，又能适应长远的利益，从而更有效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中国农民战争的自发性和觉悟性问题

· 宁 可 ·

中国农民战争史问题，在最近一个时期的历史学界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经过讨论，有些看法已经一致或趋于一致，有些看法还有较大的分歧。封建社会的农民能不能认识自己进行的斗争，认识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农民战争是自发的斗争还是自觉的斗争，它的自发性或者自觉性的具体表现如何，就是在看法上有分歧的问题之一。

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自发的革命而不是自觉的革命。这是多数讨论者都同意的。革命的自觉性指的是，革命阶级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与历史任务，认识到自己斗争的前途，建立革命的理论和自己阶级的政治组织，积极地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及前途而斗争。这种自觉性当然是封建社会的农民所达不到的。把这种自觉性加到农民战争身上，是一种把农民战争现代化的倾向。但是，这不等于说农民自发的斗争中不存在某种程度的觉悟性，也不等于说两千年间农民斗争的觉悟程度没有任何增长。如果为了强调农民战争的自发性，连农民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某种程度的觉悟性及这种觉悟性的逐步增长也一并否定，那就不免走向贬低农民革命性的另一个极端了。

农民长期面对着自己悲惨的生活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必然对封建制度和自

己的命运产生一定的认识(尽管是模糊的、表面的甚至是歪曲的认识)，产生自己的阶级意识。这一方面表现为对地主阶级与封建制度的憎恨，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自己的解放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农民由此而产生强烈的革命要求，并且从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历史地位出发形成朴素的平均主义与朴素的平等思想。列宁说过：“劳动农民在几百年的过程中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sup>①</sup>“他们极度憎恨旧的秩序，他们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了现制度的一切重担，他们自发地渴望从这些重担下解放出来并找到美好的生活。”<sup>②</sup>列宁对俄国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农民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封建制度统治下的农民。这种农民的阶级意识是农民革命的思想基础，同时也就是农民的斗争带有一定程度的觉悟性的原因。

农民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觉悟性是逐步增长的。这种增长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在那些规模较大、时期较长的农民起义中，农民的觉悟程度常常随着斗争的发展而有所增长。像唐末农民战争的“訖宦竖柄朝，垢蠹纪

①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3页。

② 《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2页。



綱，指諸臣与中人賂遺交构，状餘貢失才，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贓者族”<sup>①</sup>的露布和推翻唐政权的号召；明末农民战争的“均田”“免赋”口号及推翻明王朝的目标；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等，都是在斗争过程中提出或者丰富完善的。至于农民在斗争过程中总结經驗教訓，制定与修改斗争計劃，加强队伍的組織和紀律，建立各种制度，提高軍事技术和指揮能力的事例，那就更多了。另一方面，封建社会本身的发展使得封建社会的基本階級关系、基本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在人們眼前，而前代的农民战争又給后代留下了丰富的經驗。因此，尽管有反复和曲折，一般說来，越是后来的农民战争表现的觉悟水平越高。秦末农民战争还只能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模糊的向地主階級封建王朝特权地位挑战的口号。他們还只是开始不相信压迫他們的地主王朝是不可动搖的，开始感觉到（还不能說是了解到）不能听凭統治者的摆布，必須共同进行反抗，改善自己的境遇。他們还認識不清自己和地主階級的区别，認識不清他們的斗争目标和地主階級起兵目标的区别。宋代农民起义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口号，反映农民已經在貧与富、貴与賤之間划出一条界綫，要求改变封建社会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的現象，开始模糊地意識到他們反对的不仅是个别的王朝、官吏、地主，而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意識到穷人应当团結起来与富人对抗，爭取他們朴素意識所理解的那种經濟上的平均与政治上的平等了。到了明代，在土地兼并激烈的情況下，农民开始意識到貧富貴賤差别的根源在于土地占有情况的不同，从而提出“均田”的口

号，这表明农民对封建制度的認識又提高了一步。鴉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資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封建社会开始瓦解，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彻底暴露与空前尖銳，继承了两千多年来无数次农民起义的光荣傳統与丰富經驗的太平天国革命，成了旧式农民战争的高峰与总结。在沒有先进階級领导的情况下，农民对封建制度的認識和他們革命的階級意識在太平天国革命中发展到了頂点。太平天国的英雄們已經在封建社会农民所能达到的觉悟水平上，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把地主当作一个階級来反对了；他們已經在宗教的外衣下，比較系統地提出了朴素的平均思想与朴素的平等思想，并且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理想的“天国”来和封建制度相对立了。他們利用宗教形式，把一切封建社会不合理的現象概括为“閻罗妖”的罪行，号召人們站到“皇上帝”一边，打倒万恶的“閻罗妖”。在这里，“皇上帝”与“閻罗妖”的斗争直接反映了人間的斗争，反映了太平軍与清朝統治者斗争，反映了地主与农民的斗争。在实际斗争中，太平天国的英雄們又用“遇妖即誅，見民必救”这类口号，力求划出人民和封建統治者的界限。他們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帝”，“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这样廢除私有制的理想，从而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提出了一切人都需要参加劳动，收获产品不得私有，平均分配，共同消費的理想，从而否定了不劳而食的思想，否定了地主階級剝削的合法性和社会上貧富不

<sup>①</sup> 《新唐书》第225卷下，《黄巢傳》。





均的合理性；他們提出人与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反对皇帝的特权，从而对封建等級制度提出了疑問；他們又用基督教的一神教思想来反对傳統的封建神权与儒家思想，从而否定了封建意識形态的統治地位。由此可見，太平天国已經在一种朴素的与幻想的形式下，認識到他們的斗争是反对封建制度与地主階級的，企图建立一个新的、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的理想的“天国”了。說它是朴素的，因为这是农民階級对封建制度与自己前途的直观的認識，而非对社会发展規律的真正理解；說它是幻想的，因为它終究沒有科学地认清地主階級的本质，封建制度的本质；而其“天国”的理想，虽然在革命高潮中成为群众反抗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与行动綱領，但归根到底又不过是一种企图保持小农經濟永世长存地位的落后的、空想的图案。列宁在談到农民对旧制度的憎恨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时曾指出：“同时这些群众在革命中还表明，他們的憎恨不够自觉，他們的斗争不够彻底，他們仅仅在狭小的範圍內寻求美好的生活。”<sup>①</sup>因此，尽管是代表旧式农民战争中农民觉悟性增长的极限的太平天国革命，也仍然不可能越出自发斗争的範圍。

蔡美彪同志在《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討論中几个問題的商榷》一文中，为了強調农民战争的自发性，強調农民的沒有觉悟，就认为农民沒有反抗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他們只是以封建的綱紀、封建的理論来反抗封建統治，往往是借助于地主階級的王朝的名义、皇帝的名义而不是以自己的階級的名义，来表达自己的向往和自己的利益。<sup>②</sup>这种提法是值得商榷的。

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处于被統治地位和依附地位的农民，在精神生活方面，一般地說，不可能創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而是受着在封建社会精神生活中占統治地位的封建思想的支配。何况农民的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的階級地位及由此而产生的保守、狹隘、散漫、缺乏远見、私有观念等等階級意識，还与同样根源于私有制的封建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这就使得农民不仅不能避免封建思想的侵襲，而且他們的落后思想还常常和封建思想結合在一起。因此，农民想发家致富，使自己成为地主，或成为大小官員，光宗耀祖。这是很自然的，不看到这点是不对的。但是更重要的，农民又是一个与地主有根本区别的階級。农民与地主的尖銳矛盾，不可能不使农民产生对地主階級的仇恨与解放自己的願望，并且在个体生产的基础上，在企图保护农民劳动者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經濟上的朴素的平均主义与政治上朴素的平等思想。他們企图用某种平均主义的办法滿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用“有飯同吃，有衣同穿”和“等貴賤”的办法，消灭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压迫。这些就是封建时代的农民的革命思想，也是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最进步最革命的思想。农民革命的思想动力，只能是来自农民的革命思想，而不是来自农民的落后思想与封建思想。后二者一般只能起模糊和敗坏革命意識的作用。而革命的爆发与发展正是农民的革命思想战胜了落后思想与封建思想影响的結果。不看到这些，就更不对了。

① 《托尔斯泰和无产階級斗争》，《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2頁。

② 《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农民战争的某些口号纲领，像“等贵贱、均贫富”，“割富济贫”之类，是很难视之为封建的纲纪与封建的理論的。同样是对待北宋时期社会上的贫富不均现象，地主阶级保守派如司马光、苏辙等公开宣称贫富的区别在于人们才性愚智的不同，富民是国之根本，应当“贫富相恃”，坚决反对“破富民以惠贫民”。地主阶级改良派的王安石，也不过只希望做到用封建国家的力量施行“青苗法”之类的改良办法来“抑兼并、济贫乏”，依然没有也不可能去触犯封建所有制。只有王小波、李顺起义才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并且用杀掉贪官污吏、征发富人财粟分给贫民的办法来贯彻这一主张。明末曲阜举人孔尚铎建议“限田”，办法不过是“令本地有司，以理劝諭本地乡官(官僚地主)，于地之太多者或放其购还。”<sup>①</sup> 奏上之后，崇禎令兵部复議，兵部謂：“均富以济贫，人情则不安。”其事遂寝。而明末农民起义軍则在“割富济贫”口号下发动农民夺回被地主强占的土地，来贯彻自己的主张。不管农民的认识多么模糊，办法多么不彻底，上述那些口号終归是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最革命、最进步的口号，它們已經超出了任何封建的纲纪与封建的理論的範圍，它們的阶级性与革命性終归不能磨灭，只能视为与封建思想对立的农民革命意識的結晶。

同样，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也并非总都是借助地主王朝或封建皇帝的名义来表达自己的向往和利益的。特別是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起义更是如此。四世紀初到五世紀初約百年之間，东起山东，西到四川、陝西，南到安徽，不断发生以宗教領袖兼农民起义

領袖李弘的名义相号召的起义。方腊起义，自号“圣公”。明中叶刘六刘七起义套用元末刘福通起义的口号，称“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sup>②</sup>（刘福通起义口号末句为“重开大宋之天”）。明末农民起义領袖常用水滸人物作为自己的名字或綽号。太平天国革命更是借助一个与封建制度对立的理想的“天国”来表达自己的向往，借助一个与“閻罗妖”对立的“皇上帝”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借助一个从不見于圣贤經傳的政教合一的“天王”来与封建皇帝对抗。这些，都很难說成是借助地主王朝与封建皇帝的名义，而只能视之为农民用自己阶级的名义来表达本阶级利益与向往的一种探索了。

但是，农民的革命斗争具有自发性质，农民的革命意識是模糊与贫乏的，他們不能真正看清自己斗争的意义与前途，不能在实际斗争中真正划清革命思想与落后思想、封建思想的界限，再加上傳統的、习惯的因素，这就使农民在斗争中总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深厚影响，即使是把农民的革命思想发展到极致的太平天国革命，也仍然如此。在太平天国的纲领制度里，革命思想、落后思想、封建思想混杂在一起。可以看到，在基督教和儒家大同思想的外衣下，燃燒着农民对地主阶级仇恨的火焰，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封建特权，主張政治平等、严格的紀律与禁欲主义等农民的革命思想在閃爍着光輝；同时，也可以看到家长制，严苛煩瑣的刑律，迷信等农民落后思想的表现，以及在礼仪、

<sup>①</sup> 轉引自李文治：《晚明民变》，第145頁。

<sup>②</sup> 《皇明資治通紀》第33卷。



科举、官制、爵制等许多方面反映出来的封建思想的影响。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具体活动中所反映出来的封建思想影响，就更不胜枚举了。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农民革命和农民意识中的矛盾与局限。

在农民所受的封建思想影响中，那些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之类的思想当然只能是革命斗争中的消极因素。但是有三种情况却值得进一步分析。

第一种情况是，农民在斗争中常常借用某些地主阶级的思想、主张作为自己的口号纲领，而其中的一些却对革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些对革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地主阶级的思想主张，在封建社会条件下，对于改变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是有某些好处的，如惩治贪官污吏、奸臣宦官，减轻赋税徭役，抑制土地兼并之类就是。这些思想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农民的利益，反映了农民斗争的要求，与农民的革命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因此可能为革命的农民所接受和利用。

不仅如此，农民还往往根据斗争的需要，在这些借来的地主阶级思想躯壳中贯注了新的革命的内容，使它们获得了在地主阶级那里从来未曾有过的意义。

秦末农民战争中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是在战国以来社会变动激烈，统治阶级人物的政治地位升降不常，“布衣卿相”时常出现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个口号所反映的思想，本来一般只含有鼓励人们顺着封建的阶梯向上爬的意思。但是，对于困在大泽乡、处于死亡边缘的八百失期

戍卒来说，摆在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不是俯首贴耳充当秦朝苛法的牺牲，就是拚死反抗比这支小小队伍强大得不可比拟的秦王朝。所谓“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正是他们境遇的最好写照。在这种情势下，英勇的农民选择了“死国”的道路，决心发动起义。这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号召，尽管还是为了“取而代之”，反映了农民并没有认清自己和地主阶级的区别，没有认清他们的起义目标和地主阶级起兵目标的区别，但是，这个口号已经不再意味着鼓动戍卒们在封建统治者允许的范围内去猎取功名富贵（这在当时情况下是一种毫无现实意义的可笑想法），而只能是意味着用渺茫的希望激起他们死里求生的反抗意志，鼓励他们向地主阶级和封建王朝的特权地位挑战，鼓励他们通过斗争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个从盛行于汉代的谶纬之学里抄来的、带有浓厚宿命论气息的口号，在黄巾起义军那里，并不像地主阶级其他的类似说法一样意味着“天命”在封建统治者之间的转换，而是鼓励农民戴上黄巾，代表“上天”起来改变封建统治者给他们安排的命运，推翻代表腐朽汉代统治者的“苍天”，建立农民自己的“黄天”。

明末农民战争的“均田”口号，也应如此理解。我们说“均田”的口号来自地主阶级，不仅因为它出自一个参加了农民军的出身地主阶级的李岩的建议，主要的是，从西汉以来，“限田”、“均田”之类的思想常常是一部分地主阶级对待严重的土地问题与尖锐的阶级矛盾的主张。从北魏到唐中叶，还出现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以“均田制”为名的封建国



家土地制度。“均田制”破坏之后，“均田”的主張长期以来仍旧为人所艳称，并且一再企图实行。一直到明末，“限田”、“均田”之議仍然流行。一千多年中，地主階級尽管对“均田”作了各色各样的理解，提出了各色各样的建議，然而所有的理解和建議都沒有超出地主階級利益的範圍，所指的不过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範圍內适当地限制一下土地的集中（如前述明崇禎時孔尚絨的限田建議），最好的也不过是分点官地荒地給无地少地的农民，甚至只是在“均田”的名义下均平一下賦役負擔（像明末朱國楨在湖州一带引起軒然大波的“均田”建議，不过如此）。总之，在地主階級那里，“均田”仅仅是一个改良的口号。这个同样的口号，在农民革命那里，却获得了不同的意义。李岩提出的“均田”口号的具体內容，現在已不可考，可能根本就沒有訂出过实行的制度、办法，但这并不等于說农民軍沒有具体实施过“均田”的主張。据《出劫紀略》所載，李自成的大順政权官員到达山东諸城之后，“以割富濟貧之說，明示通衢，产不分久近，許業主认耕”。于是农民紛起夺回土地，“一邑紛如沸釜，大家（地主）茫无恒业。……互室膏田一无主人，任侵占而誰何。……不为占据者，惟有焚掠后荒田耳”。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当时农民都曾經分到了土地，甚至把地主消灭了。但是，大順政权管轄下的諸城，农村的土地占有关系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却是事实。“均田”的口号既然深入人心，起过“煽誘”大批农民参加革命队伍的作用，而且如前所述，明朝統治者亦會把“均富濟貧”之說与“限田”的建議联系起来，可以推想这是当时流行的看法，

因此，把大順政权这种在土地問題上“割富濟貧”的做法，当成革命农民对“均田”口号的理解与实施，应当是可通的。如果这样的理解不錯，那就可見“均田”的口号在农民那里已經超出了地主階級允許的範圍，获得了新的革命的意义。

第二种情况是，斗争的发展必然向起义农民提出建立比較系統、严密的組織与制度特别是政权組織的需要。但是，农民的階級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使他們不能創造出真正符合自己革命需要的新型的組織制度来，只能从現存的組織制度里汲取灵感。农民朴素的革命的階級意識可以产生原始的、农村公社类型的組織制度。这种組織制度往往披着宗教的外衣，但有时也与宗教沒有什么关系而采取山堂水寨，聚义結盟的形式。这种类型的組織制度較多地反映了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和朴素的平均主义与朴素的平等思想，如合議制、領袖与群众間一定程度的平等关系、严格的紀律、生活上的平均主义等等。这是农民創造性的光輝表現。但是，它也反映了农民階級保守、狹隘、分散等等缺点。当革命在較大的規模上与較大的区域里发展起来以后，当革命面临着推翻封建王朝的历史任务时，这种原始的、簡陋的农村公社类型的組織制度，就不足以应付复杂的革命形势，也无法和在当时是最系統、最严密的封建王朝的政治体系相抗衡。因此，农民在斗争中部分以至全部模仿封建的組織与制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了。在农民战争发展时期，模仿封建的組織与制度这种“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作法，曾經加强了起义軍的政治影响、組織紀律与作战能力，



在一定时期内对农民战争起过积极作用。当然，在起义军模仿封建的组织与制度的同时，也就接受了作为这些组织制度的思想基础的封建政治观点。然而，封建的组织制度的形式和它们的思想基础之间是有些区别的，在革命斗争中起积极作用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一定时期里农民可以利用封建组织制度的形式来从事反封建斗争，但随之而来的与农民革命利益有根本矛盾的封建政治观点却可能暂时不起决定影响。黄巢进入长安后建立大齐政权，改元金统，号“承天广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尊妻曹氏为皇后，政府中设中书令、侍中、左右仆射、御史中丞、谏议大夫、翰林学士、枢密使、京兆尹、将军、游奕使诸官职，完全模仿唐王朝的政治体制。可是这个新政权仍然建立在与唐王朝及地主阶级尖锐对立的基础上。绝大部分的地主贵族仇视它，不承认它，拒绝在新政府做官，写诗在尚书省门上讽刺它。地主文人韦庄的《秦妇吟》轻蔑地骂它是“柏台多士尽狐精，兰省诸郎皆鼠魅”，“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可见这个政权的成员多半不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人。大齐政权建立之后，一方面领导农民军继续与唐王朝斗争，一方面对它管辖范围内的地主贵族进行镇压。张直方一案，即杀掉唐朝高级官僚贵族百余人。一般衣冠士族，也是“罹难者多”，往往“赤族”，“闾门无噍类”，以至长安城中出现《秦妇吟》中描写的“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景象。未死的地主贵族，大多四散奔逃，“窜伏窟穴以保其生”，至有以卖饼为业的。以门阀相炫的世家大族经过这次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李自成一六四三年

在襄阳称新顺王，模仿明政权的组织制度正式建立政府，此后这个政府在西安及北京又有两次扩大与加强。在采用了封建政权的组织形式后，起义军原来的政治口号如“均田”、“免赋”等并没有改变，而且有所发展。起义军在西安就曾运用这个政权的力量，镇压最反动的明朝官僚，迫令乡官富绅助饷。进入北京后，大顺政权有计划地分别处决罪大恶极的明朝官僚。又置比饷镇抚司，对明朝大僚，除少数知名之士外，凡素有贪名而致富者，俱发刑官夹打，追索赃银。畿辅、山东、河南的大顺地方官，到任后也是“首称助饷，绅衿受胁”。在山东诸城，“闾官”“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分久近，许业主认耕”，号召农民起来夺回田产。规模较小的明代邓茂七起义，称“割平王”，“设官署”，“封官职”，“置里图甲役”。但是每次破城，“纵火焚烧衙厅”、“官舍”、“司房”、“廨舍”、“纵狱囚”、“取册籍”、没收“县库”金钱，“民兵被杀者不可胜计”，仍然不失农民起义本色。十九世纪中叶与太平天国同时的广西大成国起义，曾经攻克潯州，改称秀京，国号大成，年号洪德，设官分职，委派官吏，征收赋税，铸造钱币。大成国领袖之一隆国公黄鼎凤，在他所颁布的告谕中指出：“田地为务农之本，天下旱畚水田，均为我农所辟，田主历代收租，实干天怒！自此以后，仍照旧制，田主不得借故收租。”这种告谕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政权都不可能颁布的。可见农民虽然模仿了这些封建的组织制度和制度，但是在封建的组织制度的形式下面，活跃着的主要仍是农民的革命思想，而不是封建政治观点。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然而却不是一个不可理解的现象。





第三种情况是，某些参加起义军的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分子曾对农民革命起过重要的作用。像李密之于瓦岗军，刘基、宋濂、李善长之于朱元璋军，李岩、牛金星、宋献策之于李自成军都是。在他们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和知识才能服务于起义军时，他们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也随之在起义军中散布开去。但是，却不能像有的同志那样，把他们的作用仅仅归结为以封建的理论影响乃至指导、支配了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和政治行动。对他们作用的估计，不单要看他们如何影响农民军，还要看农民军如何接受他们的影响；不单要看他们散布封建思想影响，还要看农民革命思想如何影响了他们；不单要看他们的出身和思想，还要看他们的活动客观上代表了哪个阶级的要求和利益。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如李岩，原先就同情农民，跟群众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并因此受到封建政府的迫害，他的参加起义，标志着对地主阶级的背叛，成为农民革命的领袖。他劝李自成“勿杀人，散所掠财物，收人心以图大事”，都符合农民革命的利益。他所提的“均田”口号，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至于另外一些人，虽然参加了起义，但未改变地主阶级立场，像刘基参加朱元璋军，元旦时朱元璋率部下向所设的小明王韩林儿御座行礼朝贺，“基独不拜，曰：牧豎耳，奉之何为！”<sup>①</sup>就是一例。但是，对他们的作用也要具体分析。他们的某些有关军事行动的建议，如刘基为朱元璋指陈攻取张士诚、陈友谅及北定天下之策等，阶级色彩比较淡薄，客观上符合农民的革命利益。另一些活动，

如仿照封建政权形式建立农民军的组织制度等，一方面在客观上符合了农民当时斗争的需要，有助于农民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农民领袖接受了封建思想的影响与指导，到一定时期就促成了农民战争的失败或转化。还有一些活动，如制礼作乐，讲经论史，以及像刘基、宋濂等人影响朱元璋对白莲教与韩林儿龙凤政权的态度从支持变为敌视，只强调民族矛盾而不提贫富冲突等，则纯粹起了促使农民军领袖阶级立场转化的作用。因此，笼统地把参加起义的地主出身的分子都视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把他们的作用全部归结为用封建理论影响乃至指导农民军的行动，就未免贬低了农民革命意识在斗争中的作用，并且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看得太简单了。

正因为农民不可能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无法真正划清革命思想和落后思想、封建思想的界限，无力抗拒落后思想的发展与封建思想的侵蚀，也由于农民革命思想的贫乏及其空想性质，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民战争面对的各种问题，因此，在农民战争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农民战争取得一定胜利的形势下，农民的革命意识不仅无法发展，反而往往不能保持。农民思想中的落后因素滋长起来。像太平天国初期起过巨大的组织动员作用的上帝教，到太平天国后期却成了妨碍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的凝固僵化的教条，导致了太平天国后期政治方向上的模糊混乱与摇摆不定。更重要的是，农民的斗争

<sup>①</sup> 《明史》第128卷，《刘基传》。



受地主阶级思想支配的倾向越来越显著。那些从地主阶级思想武库中借用的贯注了革命内容的口号纲领，往往恢复了它们本来的意义，变成了农民战争中的消极因素。在大泽乡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激励群众反抗暴秦的陈涉，当局面打开之后，真的做起王侯将相的美梦来，以至被他旧日的伙伴譏为“涉之为王沉沉者”。而封建的组织制度形式与出身地主阶级的分子的作用越大，农民战争所受的封建思想影响也就越深，农民领袖向地主阶级的转化也就越快。农民军利用封建组织与制度形式和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分子从事反封建斗争，结果不是反掉了封建而是自己被封建制度所俘虏，被地主阶级所改造。这些对起义起过积极作用的封建组织制度与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分子终归又成为起义失败或变质的重要因素。这一切，正说明了农民觉悟程度的局限。

总之，旧式农民战争终究是自发的革命。革命农民的觉悟程度无论如何不能超越他们阶级的与时代的限制，越出自发的范围。不看到这点，过分夸大农民战争的觉悟性，把封建社会的农民的觉悟程度看得跟今天的无产阶级差不多，这当然不对，是一种非历史主义观点。但是又必须看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的革命思想及其觉悟程度在斗争中的逐步增长，终究是十分可贵的。这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传统，是珍贵的历史遗产。这也正是农民能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取得反封建斗争

的彻底胜利，最后解放自己的基础。我们研究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就应当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更注意农民战争的这个方面，肯定这个方面，歌颂这个方面。只有这样，才有助于阐明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有助于阐明农民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有助于总结旧式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如果像蔡美彪同志那样，说是反对把农民革命现代化，实际是脱离了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用今天无产阶级的觉悟水平去苛求封建社会的农民，从而片面夸大农民战争的自发性质，甚至否认农民有任何革命思想与阶级觉悟，以致混淆了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界限。这就不免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表现了另一种非历史主义观点了。

封建社会的农民是一个既具有革命性但又远较无产阶级落后的阶级，旧式农民战争又是爆发在一个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的时代。阶级与时代的限制反映到农民的斗争中来，就使得农民战争的许多方面都带有明显的矛盾性质。农民的斗争具有某种程度的觉悟性，但这种觉悟性的增长却始终越不出自发斗争的范围，就是这类矛盾着的现象之一。如何正确地理解与阐述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觉悟性之间的关系，使得一方面不致把农民革命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又不致贬低农民战争的革命性，混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界限，是一个颇为复杂而困难的问题。本文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粗略的，远非成熟的说明，谨供同志们讨论。

